

中國現代史

中國現代史叢書 1

張玉法 主編

中國托派史

唐寶林 著

 東大圖書公司

中國現代史叢書 1

張玉法 主編

中國托派史

唐寶林 著

 東土圖書公司

中國托派史／唐寶林著．--初版．--臺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民83

--面：公分．--（中國現代史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19-1706-0（精裝）

ISBN 957-19-1707-9（平裝）

I. 共產主義-中國

549.375

83007380

◎ 中 國 托 派 史

著作人 唐寶林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郵 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

編 號 E 62029

基本定價 陸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ISBN 957-19-1707-9（平裝）

主編者序

二十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變遷迅速的世紀。在二十世紀將要結束以前，回頭看看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或從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看看二十世紀將要結束的中國；不僅歷史學家會不斷檢討這一段的歷史總成績，走過這個時代的人或走不過這個時代的人，無論自己流過多少汗、多少淚、多少血，受過多少飢寒、多少苦難、多少折磨，還是犧牲過什麼、享受過什麼、獲得過什麼，站在二十世紀的盡頭，不能不對這一個世紀作些回顧、作些省思，然後勇敢地走向或走入二十一世紀。這是東大圖書公司出版「中國現代史叢書」、為讀者提供歷史資訊的最大旨趣。

二十一世紀是否為中國人的世紀？有人很關心，有人不關心。但在地球村逐漸形成的今日，不管是冷漠還是熱心，不管是不自願還是自願，都得住在這個村，並為這個村的一員。就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而論，不僅臺海兩岸的歷史學者，多投入研究，或表示關懷，歐美及日本等地的歷史學者，不少亦研究中國現代史。這便是史學界的地球村。

中國現代史的起點，臺海兩岸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說來，臺灣地區的學者，主張始於辛亥革命時期；大陸地區的學者，早年主張始於五四運動時期，近年又主張始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外國學者的看法，不出上述兩種。嚴格說來，臺海兩岸學者對現代史分期的看法，都受到政治的影響。許多學者以鴉片戰爭作為近代

史的開端，也是受政治的影響；因為鴉片戰爭被視為反帝反封建起始的年代。

爲了擺脫政治的糾葛，可以從世界史的觀點來考慮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梁啓超將中國歷史分爲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三個時期，如果將在中國人在中國境內活動的歷史劃爲上古史，將中國人向亞洲其他地區擴張的歷史劃爲中古史，將中西接觸以後、中國納入世界體系爲近代史，則中國近代史應該始於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中國，不僅與歐洲、美洲進行海上貿易，而且歐洲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進入中國，譬如葡萄牙佔有澳門(1557)、荷蘭(1624)和西班牙(1626)佔有臺灣，俄國進入中國黑龍江流域(1644)。在葡人佔有澳門以後的二、三百年，中西之間有商業、文化、宗教交流，到1830年代以後，因通商、傳教所引起的糾紛日多，由於中國國勢不振，利權、領土不斷喪失，成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對象，到1897-1898年的瓜分之禍達於頂點。1899年英美發佈「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以後，中國免於被殖民瓜分的局勢始獲穩定。我們可以將1557-1899年的歷史定爲近代史的範圍。1901年，中國在義和團的激情反帝國主義以後，開始進行教育、經濟、政治改革，革命運動亦大獲進展，將歷史帶入現代時期。

中國上古史爲中國歷史文化的創建期，中古史爲中國歷史文化的擴張期，近代史爲中國歷史文化的收縮期，現代史爲中國歷史文化的更新重建期。本叢書所謂中國現代史，即始於1900年，涵蓋整個二十世紀，如果中國更新重建的大方向不變，亦可能涵蓋二十一世紀及其以後。儘管由於政治的糾葛，「中國」一詞在近數十年的臺灣及海外各地已經變成模糊的概念，出現了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大陸中國、海

洋中國等名詞，但中國畢竟是現在世界上歷史悠久、土地廣大、人口衆多的國家，不能因爲它時常出現外力入侵、內部分裂，而忽視它的歷史存在。而且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躍爲世界五強之一，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愈來愈重要。因此，檢討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在世界史中也饒富意義。

現代史上的中國雖然災難重重，但亦有機會撥雲見日，這是中外史家對研究中國現代史有興趣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認的，由於臺海兩岸長期缺乏學術自由，而臺海兩岸及世界各國有關學者，由於掌握材料的性質和多寡不同，許多現代史的著作，流於各說各話，這是學術上不易克服的困難，有些困難則是學術界的不幸。本叢書希望包羅一些不同國度、不同地區、不同觀點的學術著作，透過互相欣賞、批評，以達到學術交流的效果。收入本叢書的專著，儘管有不同的理論架構或觀點，但必須是實證的、避免主觀褒貶的。

傳統中國史學，有些持道德主義，主觀的褒貶性很強；近代中國史學，有些受作者個人信仰或好惡的影響，流於宣傳或謾罵；凡此都妨害歷史求知的客觀性。本叢書在選取稿件時，當在這方面多作考量。

承東大圖書公司大力支持，使本叢書得以順利出版，非常感謝。收入本叢書之一的《中國托派史》，係唐寶林先生新完成的著作。唐先生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上海人，1939年生，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對陳獨秀的研究，功力深厚。《中國托派史》即是以陳獨秀爲中心，探討托派在中國的活動。托派爲共產黨的反對派，本書以大量第一手資料，論述中國托派的歷史，始於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國托派的誕生，止於1952年托派在中國大陸被取締。托派是一群青年知識份子的鬆散組合，他們標榜宗奉俄共中的托洛茨基

4 中國托派史

一派，在中國以獨特的理論、路線、方法從事活動，既反國民黨統治，又反共產黨路線，在國共兩黨的夾擊下不斷分化，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消極頹唐，有的投降變節，有的受盡困圍之苦而不悔。托派與蘇聯、共產黨、國民黨的關係，都非常微妙。作者探討深入、觀察入微。書中所述，不僅為政治秘辛，亦為中國現代政治史中的重要環節。特向讀者推薦。

張玉法

1994年8月1日於中央研究院

自序

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分裂以後，一群在蘇聯留學的青年和國內以陳獨秀為旗幟的一批共產黨幹部，在托洛茨基和蘇聯托派的指導和影響下，發起了中國的托派運動。從一九二八年建立第一個小組起，到一九五二年在大陸上被取締，中國托派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二十五年。

中國托派從誕生第一天起，就以中國共產黨「反對派」的面目出現，同時進行反對國民黨的活動。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固執「城市中心」和「階級鬥爭絕對化」的理論，主張只依靠工人階級，通過長期的「國民會議」運動，準備條件，最後發動城市工人武裝暴動，一舉奪取全國政權，建立剝奪一切資產階級（包括農民小私有者）的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他們竭力反對中共執行的以農民為主力軍、堅持長期的農村武裝鬥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又反對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前後，他們又把矛頭集中指向中共，終於遭到鎮壓。一九五二年以後，他們在香港的殘餘勢力，還不斷向大陸上滲透，進行種種破壞活動。但是，歷史發展的趨勢，與他們追求的目標越來越遠了。

鑒於此，中國托派是中共黨史、國民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派史和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值得史學界深入研究。特別對中共為什麼勝利？國民黨為什麼失敗這類長期爭論的老問題，中國托派史會提供另一種更有興味的答案。

2 中國托派史

本稿自一九八四年五月起筆，一九八六年六月完成初稿，以後四次修改補充，力圖公正客觀、實事求是地評價中國托派興亡的全過程。但由於本人水平有限，不當之處，望史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本書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得到了史洛明女士和一些檔案部門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而今日得以出版，則有賴於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學莊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先生的鼎力相助，本人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一九九二年九月

北京 東廠胡同

中國托派史

目 次

主編者序

自 序

第一章 風雨中孕育的怪胎

- 第一節 中國托派的搖籃1
- 第二節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論戰4
- 第三節 紅場上的反斯大林遊行16
- 第四節 「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25
- 第五節 蔣經國與留蘇托派的命運32
- 第六節 莫斯科的秘密組織39

第二章 陳獨秀誤入歧途

- 第一節 「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領導」49
- 第二節 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56
- 第三節 陳獨秀接受托洛茨基主義61
- 第四節 托派排斥陳獨秀71

第五節 托陳派被中共開除黨籍75

第三章 四分五裂勉強統一

第一節 虛張聲勢的「無產者社」87

第二節 混戰中誕生的「十月社」92

第三節 中共開展肅托運動97

第四節 托洛茨基指示堅持原則102

第五節 托洛茨基熱情歡迎陳獨秀109

第六節 陳獨秀快刀斬亂麻117

第七節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123

第四章 夾攻中的顛仆與掙扎

第一節 向中共挑起社會性質的論戰131

第二節 國民黨對托派的第一次毀滅性打擊140

第三節 陳獨秀推動抗日反蔣149

第四節 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155

第五節 「不愛資產階級的國家」160

第六節 陳獨秀托派中央全被逮捕164

第七節 推行陳獨秀路線的「臨委」175

第八節 參與「福建事變」184

第九節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89

第十節 陳獨秀被托派中央「開除」196

第五章 抗戰中亂彈琴

第一節 重振托派運動207

第二節	托洛茨基指示倒蔣反共	216
第三節	「托派即漢奸」的由來	222
第四節	陳獨秀擁護國共合作抗日	229
第五節	托派臨委批判陳獨秀背叛	235
第六節	托洛茨基要陳獨秀出洋	240
第七節	陳獨秀與臨委決裂	244
第八節	對抗戰實行「失敗主義」	248
第九節	分裂成「多數派」與「少數派」	253
附錄：	幾起「托派漢奸」假案	259
	俞秀松案	259
	張慕陶案	263
	王公度案	269
	陳獨秀「間諜」案	271
	湖西事件	277
	王實味案	282

第六章 無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節	不希望中共戰勝國民黨	293
第二節	「對中共實行失敗主義」	309
第三節	蔣經國庇護托派	313
第四節	建立「中國革命共產黨」與「國際主義工人黨」	322
第五節	苦惱的問題	329
第六節	回光返照一夕亡	334
第七節	在香港與巴黎的餘波	342

附錄

原始文件

- 一、歸國留蘇學生第一個托派小組組織辦的刊物——《我們的話》349
- 二、陳獨秀爲首的托派小組組織辦的刊物——《無產者》350
- 三、歸國留蘇學生第二個托派小組組織辦的刊物——《十月》和《十月之路》
.....351
- 四、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國托派組織成立時給托洛茨基的兩個報告——之一(英文及譯文)、之二(英文及譯文)。353
- 五、陳獨秀爲首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358
- 六、「九一八」後抗日高潮中托派中央辦的救亡刊物——《熱潮》359
- 七、一九三一年托派華北區委機關報《斧》360
- 八、一九三二年托派華北區委機關報《火星報》和《先鋒》361
- 九、一九三二年十月陳獨秀和彭述之被捕后在江寧地方法院候審室363
- 十、陳獨秀被捕後何鍵要求處決、金樹仁要求嚴懲的電報364
- 十一、陳獨秀被捕後托派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討論組織問題專號 366
- 十二、陳獨秀被捕後托派內部討論政治問題的集子——《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367
- 十三、一九三六年以後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368
- 十四、提前釋放陳獨秀的國民政府指令369
- 十五、上海「八一三」抗戰時托派散發的傳單——〈武裝保衛上海：發動全面抗戰！〉370
- 十六、少數派分裂出來後辦的機關報——《國際主義者》371
- 十七、抗戰勝利後少數派的機關報之一——《新旗》372
- 十八、抗戰勝利後少數派的機關報之二——《建立》373

十九、抗戰勝利後多數派的機關報——《求真》、《青年與婦女》、《新聲》	376
二十、一九四七年四川托派區委機關報——《電光》	377
二十一、一九四九年華南托派區委機關報——《星火》	378
二十二、多數派機關報《校內公報》上面刊登的建黨文件	379
二十三、一九四八年九月革共成立時發的文件	380
二十四、革共的外圍組織社青團章程草案	381
二十五、中共進占上海前夕革共散發的宣傳品——〈致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信〉	382
二十六、中共占領大陸後革共潛伏組織辦的地下刊物——《叛逆者》	382
二十七、中共占領大陸後國際主義工人黨潛伏組織辦的刊物——《新方向》	383
二十八、一九七七年6月十五日，彭述之、陳碧蘭在美國寓所合影	385
二十九、革共一九七七年四月大會通過的新綱領	386

參考書目

索引

第一章 風雨中孕育的怪胎

第一節 中國托派的搖籃

風乍起，吹縈一池春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是蘇聯十月革命節十周年紀念日。蘇聯黨政部門及群眾團體舉行了展覽、集會、閱兵、遊行等一系列盛大的慶祝活動。但是，在紅場上卻發生了一樁意外的事件：一部分蘇聯群眾和中國留學生，乘機進行了反斯大林遊行。這些中國留學生，大多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學習的學生。

東方大學的全名是斯大林命名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它是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根據列寧的「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精神，為東方和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培養訓練革命幹部而創辦的。一九二一年四月開學。學生分屬於七十多個民族，主要是中國、朝鮮、印度、埃及等亞非的各被壓迫民族，還有日本人和美國黑人，以及蘇聯內部的東方諸少數民族。一九二〇年，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列寧派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幫助下，籌組中國共產黨期間，曾派出第一批革命青年羅亦農、任弼時、劉少奇、蕭勁光、彭述之、汪壽華等赴蘇學習，就進這個學校。所以，進入這個學校的，都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學校中的中國學生，受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領導。

中山大學則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一九二三年，國共合作後，蘇聯

2 中國托派史

政府爲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爲國民黨培養訓練幹部，首先在中國廣州，幫助創辦了黃埔軍校，一九二四年五月開學。接著，中國革命運動飛速發展，黃埔軍校和東方大學培養的幹部，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於是，蘇聯政府又決定在莫斯科再辦一個專門訓練中國革命幹部的學校。正在這時，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不幸逝世。爲了紀念這位對中國革命和中蘇友好關係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偉大人物，該校取名爲「中國勞動者孫中山大學」，並派精明強幹的老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卡爾·拉狄克負責，加緊籌備。拉狄克不負眾望，只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這年秋天，中山大學就開學了。

這所大學座落在莫斯科沃爾洪卡大街十六號，世界著名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一九三〇年改爲「列寧宮」）的對面。開學典禮由托洛茨基主持。他在講話中，針對沙皇俄國以來俄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的偏見，說了一段這樣的話：

從現在起，任何一個俄國人，不論他是一個同志或者一位公民，他如果用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學生，見面時雙肩一聳，那他不配當俄國共產黨人或者蘇維埃公民！

托洛茨基的這段話，再加上他那時在蘇聯國內及國際上遠比斯大林崇高的威望，使他在中國留學生中留下十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還任命其親信拉狄克爲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爲了確實體現中蘇合作、國共合作辦校的精神，拉狄克提議：「該校應置於聯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之下。」^①即中山大學有兩個管理者——聯共和中國國民黨。聯共同時代表共產國際和中共。

一九二六年五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先

後開會，作出決議，「同意拉狄克的提議」^①，並派邵力子代表國民黨方面，常駐中山大學，負責監察校務。邵於一九二六年夏到莫斯科，作為國民黨駐共產國際的常駐代表兼中山大學理事會理事。他不僅在校視察，還在那裡聽課，並與學生傅學文小姐相愛，結為伉儷。學校贈給他名譽學生的學生證。

經過國內國共兩黨嚴格的挑選和考試，中山大學第一期錄取了三百四十名學生。到一九二七年，在校學生達到五百餘名。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努力爭取這個機會；被錄取的學生又成群結隊地奔赴莫斯科，國內出現了一股不小的留蘇學潮。學生中有不少是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子女和親戚，如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李宗仁的內弟魏允成，李宗仁的妻子魏淑英，張發奎的兄弟張發明，鄧演達的兄弟鄧明秋，陳樹人的兒子陳甫，葉楚傖的兒子葉楠，谷正倫的兩位兄弟谷正綱和谷正鼎等。

學生中設有共產黨支部局和國民黨支部局。國民黨黨員約占一半多一點。但當時是國民黨黨內合作，共產黨員可跨黨，加入國民黨，所以與國內有些支部一樣，國民黨支部局的實際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後，國民黨清共時，國民黨中央首先召回邵力子，然後，在七月二十六日正式發表聲明取締中山大學，並與該校斷絕一切關係，聲稱：「莫斯科中山大學非法使用國民黨領袖的名義作掩

① 參見一九二六年四月胡漢民自莫斯科致廣州國民黨中央的電報、國民黨中政會第139次會議（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中執會第27次全會（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的決定，及國民黨中央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致拉狄克的電報。以上文件均藏臺北國民黨黨史會，轉自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

② 同①。

護，從事策劃反對本黨的陰謀活動。爲此理當予以取締，著各級組織都不得再派學生去莫斯科。」

於是，非但國民黨各級組織停止送學生去莫斯科，就是在校的國民黨學生，除少數人轉向共產黨之外，也紛紛回國。這些人回國後成立了「留俄同學會」，多數人成爲國民黨中極端反蘇反共的急先鋒，如鄭介民、鄧文儀、谷正綱、谷正鼎、康澤等。蘇聯共產黨用盧布和麵包培養訓練了這樣一批中國人，實非初衷，也是一種歷史的諷刺。

共產黨選派的學生，非但不能回國，而且由於南京、武漢的國民黨屠殺、追捕、通緝共產黨員、親共分子，因此大批革命者，由組織安排，紛紛逃亡出來，到莫斯科。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沒有文化的工農分子，也都安排進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成爲政治避難式的留學生，使這兩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達到六、七百人。

這些新生，與舊生一起，很快捲入了聯共黨內正在激烈進行的論戰旋渦，並且發生分裂，從而產生中國最早的托派。

第二節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論戰

聯共黨內的這次大爭論起始於一九二三年列寧病重及逝世前後，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挑起的。當時，蘇聯實行列寧制訂的新經濟政策，對渡過十月革命後的經濟困難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但同時也發生了一些不良現象，如黨員幹部在搞活經濟、學會做生意過程中經不起誘惑，有些人以權謀私，腐化墮落；領導幹部官僚主義嚴重，不關心群眾利益，一些企業發生罷工；經濟發展出現了新的不平衡，工農業剪刀差問題日趨嚴重；列寧病重不主持中央工作後，中樞缺乏有力的領導，等等。這些問題使蘇聯的政治經濟和黨的建設陷入了新的困境。

一九二三年九月，聯共中央召開全會，企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托洛茨基在會上發表了一封致黨中央的信，並聯絡四十六人在他家裡集會，發表了一份聲明，發到各區。他們把矛頭集中指向聯共中央，猛烈抨擊黨中央的官僚主義，指出黨的機構已經腐敗，幹部已經蛻化變質，主張依靠青年來挽救黨，因為「青年是黨最可靠的晴雨表」，對黨的官僚主義最敏感；並要求黨內實行民主，在黨內有派別活動的自由等。

聯共中央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批評了托洛茨基的派別活動。托不接受批評，並拒絕中央分配他的工作，於是形成聯共黨內最早的反對派——托洛茨基為首的「莫斯科反對派」。

對托洛茨基的這次發難，全黨討論了兩個月。托洛茨基遭到失敗。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寧逝世後，斯大林作了總結，寫了《論列寧主義基礎》。一九二五年一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陸海軍人民委員和軍委主席的職務。

這一年，聯共十四大前夕，斯大林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口號，在蘇聯進行經濟建設，遭到了托洛茨基以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對。季當時任共產國際主席，是列寧逝世後政治局中的第一號人物。加代理列寧原來的職務——人民委員會主席、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是第二號人物。他們兩人都是當時蘇聯最大的黨組織列寧格勒委員會的負責人。季還是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聯共十四大上，以他倆為首的列寧格勒代表團，反對斯大林提出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為依靠蘇聯落後的技術和經濟條件，不能建成社會主義。

大會否定了他們的意見，於是，他們就形成了「列寧格勒反對派」。

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反對派與列寧格勒反對派結成反對派「聯盟」。

這年，中國發生了蔣介石主導的「中山艦事件」和「黨務整理案」，要求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發展。莫斯科指令中共讓步，滿足蔣介石的要求。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開始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推行的路線。於是，中國革命問題，上升為兩派爭論的焦點之一。托季反對派聯盟為即將召開的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準備了一個文件，內容是：

- 一、要求黨內民主，黨內有搞派別活動的自由。
- 二、反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
- 三、要求公布列寧遺囑（遺囑中有批評斯大林作風粗暴，不能任總書記的內容）。
- 四、批評共產國際在中國及英國、德國革命中執行機會主義路線。

這個文件被斯大林稱為「反黨文件」，不准印發。

聯共黨員和團員，甚至包括群眾，也都分裂成兩派，各自追隨本派的領袖斯大林或托洛茨基，與對立面爭論。以致使爭論在聯共中央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會議、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一直到聯共莫斯科活動分子會議和基層組織的群眾集會及黨內黨外、上層下層的大小會議上，廣泛而公開地進行，在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也有強烈的反映。

中山大學的兩派爭論，從學校一成立就開始了。拉狄克是托洛茨基的一員幹將，他把中山大學變成了蘇聯托派的一個據點，將許多托派骨幹，拉到課堂上宣傳托派觀點，如教列寧主義的沙可夫、教西方革命史的卜里果仁和金果仁、教政治經濟學的哈林和松泉夫、教中國

問題的達林等。拉狄克自己則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程，並在《共產國際》雜誌上撰文，用托派觀點，闡述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

拉狄克的面貌相當奇特：上額寬大，禿腦門兒有點像列寧，但下巴狹小，像猴子。他口才雄辯而饒有風趣，演說時表情豐富，常使人放聲大笑。他眼睛深度近視，不戴眼鏡就走不了路。他學識淵博，能說七、八種語言，是著名的學者、哲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同時他舉止懶散，不梳頭髮，不刮鬍子，嘴上老叨著一個煙斗，不管裡面有沒有煙絲。大家覺得他不像個大學校長，沒有高級官員的架子，而且平易近人，熱情奔放。中山大學的學生都非常尊敬他，幾乎把他奉為偶像。爲了講好「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他用了很多時間研究中國問題。他講的內容，主要是清朝後期到中華民國初期的歷史，著重講太平天國以來中國革命的演變。每周講兩、三次，每次講三小時。他講課時，總是座無虛席，是該校唯一能把不同班級的學生吸引到同一個教室裡來的人。連東方大學的學生和教員以及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也都來聽他的課，因此他在蘇聯和中國學生中影響很大。以他的這種地位和影響來宣傳托派觀點，後果就可以想像了。他對中國托派的形成，起了助產婆的作用。

斯大林鑒於這種情況，派其親信巴·亞·米夫任中山大學的副校長，與拉狄克針鋒相對地鬥爭。

鬥爭是先從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任務開始的。拉狄克認爲：中國自秦漢以後，土地就可以自由買賣，而十九世紀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逐漸在農村占統治地位，從而破壞了中國典型的封建制度，中國就資本主義化了。一九二七年春，他在共產主義學院報告和在《國際評論》上著文時，認爲「中國已不存在封建殘餘，即使有也不起作用了。」他認爲中國的租佃關係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借貸

關係，地主階級實際是資產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儲存他的資本在土地中間」；「他們把自己的錢用放債的形式，投資於鄉村，……剝削農民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作為佃租。」因此，他認為中國革命，國內敵人只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外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所以，中國革命「一定要變成不但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基礎的鬥爭，而且也要反對中國的資本主義。」^③

米夫發表了〈中國農民問題〉、〈中國革命性質和動力〉^④等文章，批駁拉狄克的觀點，論證了中國的租佃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剝削制度；帝國主義的侵入，非但沒有改變這種性質，而且，「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統治，表現為與整個封建殘餘制度相結合的殖民地經濟制度。它非常阻礙這個國家生產力的發展。正在發展的革命，其經濟原動力就在這裡。」因此，「中國革命，在現今歷史階段上，從它發展的內部趨向上看，它是，並且不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這場鬥爭在中山大學學生中發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由於並不是當時革命中現實問題，只對一部分對理論感興趣的人有吸引力。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任務和動力之爭提到日程上來時，拉狄克的觀點與托洛茨基的觀點一起，被中國托派所重視。劉仁靜、嚴靈峰、任曙等人，以這種觀點，參加了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陳獨秀認為中國封建勢力成了「殘餘之殘餘」的觀點中，也可看見拉狄克的影子。

在大革命失敗前後，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爭的中心，是國共合作的方針是否正確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

^③ 拉狄克：〈孫逸仙的二周年紀念〉，《國際評論》第26期。

^④ 《共產國際》一九二六年第10~11合刊；《布爾什維克》（蘇聯），一九二七年第1期。

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議，最早是列寧提出的。列寧對孫中山爲首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精神，一向十分欽佩，並在一九一八年雙方通過電報往返建立了聯繫，表示兩國革命互相支援。一九二〇年以後，列寧和共產國際先後派維經斯基、馬林、達林來華幫助建立中共同時，也拜訪孫中山，提出種種建議，以落實互相支援的措施。一九二三年一月，終於簽訂〈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正式確立聯俄政策，支持蘇俄。在當時蘇俄新政權遭到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反對、包圍和封鎖而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孫中山國民黨的支持，無疑是十分珍貴的。爲鞏固和發展這種關係，使蘇俄東部邊界上出現一個親俄的友好鄰國，而且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一國，斯大林爲首的聯共和共產國際，決定大力支持國民黨儘快打倒北洋政府，奪取全國政權。

與此同時，馬林在考察中國局勢、特別是調查國共兩黨的勢力後認爲，中共初創，還只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團體，難以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而國民黨則是有多年革命歷史的全國性大黨，並且在華南工人中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他提出了國共合作採取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黨內聯合方針。

馬林這個主張與斯大林在中國追求的目標完全吻合，也與孫中山當時的想法一拍即合。孫中山認爲辛亥革命後國民黨屢起屢折，是由於國民黨失去革命精神造成的。他希望把共產黨員作爲「新鮮血液」吸收進來，拯救「正在死亡」的國民黨，從而拯救革命。因此，他拒絕黨外聯合的辦法。如此，共產國際執委會根據馬林的報告，在一九二二年七月正式作出了令其支部——中共加入國民黨以實行兩黨合作的訓令。

陳獨秀爲首的中共中央起初只同意黨外聯合，反對加入國民黨。其理由如他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致維經斯基信中舉了六條，主要是：

「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國民黨「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⑤，等等。

爲此，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在杭州舉行特別會議時，馬林出示共產國際的訓令，陳獨秀等多數中央委員才表示服從，並在翌年六月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通過。

以上，斯大林共產國際醞釀國共合作方針時，對托洛茨基實行了封鎖。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致伊羅生信中回顧說：「這整個事件發生在一九二二年，列寧病了。我則完全不讓知道共產國際的情況。我第一次見到馬林是在他出使中國回來以後。」所以，一九二三年，聯共中央及共產國際執委會正式討論決定這個方針時，托洛茨基從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出發，認爲國共合作是「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堅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但是，在表決時，托洛茨基總是處於「一人反對其他全體」的少數而被否決^⑥。

於是，托洛茨基表示服從，並且還退一步在某種設想下對這個方針表示理解和支持：「即認爲國民黨當時已擁有一些工人；而年輕的中共則是弱小的，幾乎全都是知識分子，因此決定加入國民黨——這樣的加入，特別在華南，本身不是一樁罪惡，甚至還不是一個錯誤，事情如果是這樣，那麼加入只是走向獨立的一個插曲性的步驟。」^⑦

⑤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1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⑥ 托洛茨基致Max Shachtman的信（一九三一年八月七日），載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譯：《中國革命問題》第157頁，春燕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

⑦ 托洛茨基致伊羅生(Harold R. Isaacs)的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托洛茨基檔案。

因此，一九二三年九月蔣介石率「孫逸仙代表團」訪蘇時，托洛茨基及其一派人對國民黨及國共合作的支持，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寫道：「大多數向孫中山博士致意和表示願與中國國民革命竭誠合作的蘇聯黨政領導人是猶太人，……這引起我特別的興趣。我發現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越飛等人，比較起來說，更加關心國民黨和俄國共產黨之間的合作。」「我同托洛茨基談話比同其他蘇聯領導人多。我發現，在他們所有的人當中，數他最開門見山。……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除了蘇軍不直接參加之外，蘇聯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積極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③

以上說明，開始的幾年，托洛茨基反對國共合作是不堅定的。正如他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給拉狄克的信中承認的：「我們當在何時退出國民黨呢？……我不能斷定是否此問題當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或者一九二五年即應嚴重地提出。」

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傳到蘇聯，中山大學國民黨支部，召開了一次國共合作討論會。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被邀請到場講話。托洛茨基從此開始「竭盡全力」反對國共合作的路線，主張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獨立發展。斯大林則堅決捍衛國共合作。

斯大林宣傳他所以主張中共加入國民黨，是因為他認為國民黨是革命群眾組織，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共產黨加入進去是為了爭取群眾，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共同進行國民革命，同時爭取領導權，孤立與打擊右派。托洛茨基則認為國民黨不是一個普通的什麼群眾組織，而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是沒有革命性的，而且越到東方越反動。它被捲入革命是暫時的、被迫的、投機的、必

^③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五七年版，第21、22頁。

然動搖、妥協、投降、背叛。所以共產黨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加入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更不能服從其紀律，信仰其主義；爲了爭取群眾，保證對革命的領導，保證革命徹底勝利並不斷地發展到社會主義方向上去，共產黨必須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絕對獨立，並時刻準備著打倒資產階級，沒收其私有財產。

托洛茨基把這種主張寫進反對派聯盟的「九月提綱」中，提供給十一月舉行的聯共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時，遭到否決，並被撤銷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儘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直沒有退縮。他密切注意著中國北伐戰爭開始以後的局勢。他爲中國南方數省工農運動的興起而高興，同時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共言行，一再提出警告。尤其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和四月初，他敏感到蔣介石反共的可能性越來越嚴重，就寫了〈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等一系列文章、文件，提議共產黨著手在工農群眾中組織蘇維埃，以保證對革命的領導，防止資產階級的叛變，又遭到斯大林的駁斥。斯大林在四月五日向著莫斯科三千名黨的積極分子大會發表演說時，還說蔣介石是「忠於紀律的」。「當我們處於多數地位，而且右派又聽從我們的時候，爲什麼要把右派趕跑呢？」蔣介石可能不贊成革命，但他「除了率領軍隊去反對帝國主義者外，不能有其他的作爲。」他認爲托氏關於中國革命處於危機中的警告是無稽之談，應該繼續支持蔣介石^①。

四月十四日，蔣介石上海政變的消息初步傳到莫斯科，但情況還未十分清楚。季諾維也夫向聯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中國革命提綱」，批

^① 斯大林的演說詞後來未登報，這裡錄自南共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載《羅易赴華使命》第61頁，中國人民大學一九八一年版；《中國革命問題》第17頁注八，春燕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

判斯大林四月五日的演說及聯共中央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要求中共「政治與組織的完全獨立」，「成立不容納資產階級代表的蘇維埃」，批評了陳獨秀與汪精衛的聯合宣言「是絕對錯誤的」，「孕育著最大的危險」^⑩。

接著，蔣介石上海政變的消息，得到完全證實，蘇聯廣大群眾的思想發生混亂，許多人承認托、季反對派聯盟的預言和警告是正確的，而斯大林和聯共中央、共產國際的觀察是錯誤的。

然而，四月二十一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由他起草的「聯共（布）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中國革命問題》時，仍強調事件完全證實了「把共產黨保留在國民黨內的路線」的「正確性」；認為：「蔣介石的政變表示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革命已進入其發展的第二階段」；武漢成了「革命的中心」^⑪。

中國革命局勢的發展，開始嚴重影響蘇聯兩派鬥爭的進程，而且，明顯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有利。然而，斯大林派掌握的權力，竭力阻止這種傾向，黨內思想路線上的分歧，終於很快變成對抗性的矛盾。

隨著中國革命失敗的擴大和深化，斯大林越來越被動。托、季聯盟乘機向斯大林及其領導下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發起猛攻。他們接連發表〈中國革命和斯大林政綱〉、〈反對派政綱〉、〈八十四人宣言〉、〈十五人政綱〉等一系列文件和文章，組織各種集會，發表演說，鼓動群眾。他們主張：中國共產黨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與武漢政權對抗，像俄國二月革命後列寧採取的策略那樣，由兩個政權並存，過渡到一個政權，打倒資產階級的武漢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⑩ 《中國革命問題》第99頁，春燕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

⑪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99頁。

兩派的鬥爭，由口頭辯論發展到暴力鬥毆。有一次，列寧格勒「老布爾什維克團」中幾位托派觀點的要人，藉中國發生的清共事件，擺老資格，開會痛斥斯大林無能，被定時炸彈炸傷，星散來到莫斯科。他們大衣領上翻，帽沿下垂，面貼紗布，十分狼狽地來到中山大學校長室，與拉狄克等人進一步策劃反擊。

於是，中山大學也出現了兩派鬥爭的熱潮，托派教員不僅在課堂上宣傳托派觀點，還拿托派秘密文件給同學們看。幾乎天天有大大小小的辯論會。拉狄克在會上甚至斷言：由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將使中國革命推遲十年。辯論會的氣氛越來越變得激烈。上面兩位代表辯論，下面兩派群眾為自己的代表鼓掌、喊口號助威，向對方的代表起鬨、踩地板，把中山大學搞得天翻地覆。同學們強烈要求斯大林來親自解答問題，並書面整理了十個問題給斯大林。

這十個問題幾乎包括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直到那時為止，在中國問題上爭論的全部內容，它們是：

(一)拉狄克斷言：中國農村中的農民鬥爭與其說是反對封建殘餘，不如說是反對資產階級。這個論斷為什麼不對呢？能不能斷言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是商業資本主義或封建殘餘呢？為什麼中國軍閥既是大工業企業的所有者，同時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

(二)拉狄克斷言：既然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幾個階級的政黨，那麼國民黨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了。他錯在哪裡呢？

(三)你估計國民黨是兩種力量（共產黨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全體學生大會上的演說），而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黨的決議則估計國民黨是連

大資產階級也在內的四個階級的聯盟。這兩種估計有沒有矛盾呢？

(四)武漢政府是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如果不是，那麼今後爭取民主專政的道路將是怎樣的呢？馬爾丁諾夫斷言不經過「第二次」革命也可能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否正確，如果正確，那麼中國的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界限究竟在哪裡呢？

(五)爲什麼武漢政府不進攻蔣介石，而進攻張作霖呢？武漢政府和蔣介石同時向北方進攻，這不是抹殺了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戰線嗎？

(六)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否可能呢？

(七)在中國現在是不是需要提出農民立即奪取土地的口號，對於湖南農民奪取土地的事實應當怎樣估計呢？

(八)爲什麼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在目前是不正確的呢？中國共產黨是不是由於河南已經組織了工人蘇維埃而有做革命運動尾巴的危險呢？

(九)目前能不能在中國提出成立正規紅軍的問題呢？

(十)現在，在和資產階級鬥爭的時候，能不能提出奪取中國企業的口號呢？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奪取在中國的外國工廠，這會不會引起同時奪取中國企業呢？

這些問題表明，當時蘇聯及中國留學生中的兩派，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是多麼的廣泛而深刻。

斯大林沒有迴避問題。五月十三日，他來到中山大學，一一解答了這些問題，並闡述了自己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批駁了托派的觀點。

對於當時最迫切的武漢政府問題，他認為武漢國民黨政權現在是「革命中心」，沒有理由成立蘇維埃，共產黨應該加強國民黨，加強武漢政府，而不是退出國民黨，使武漢政府垮臺。他強調，只有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才必須建立蘇維埃；只有在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建立兩重政權，國民黨和蘇維埃爭奪政權時，「共產黨就必須退出國民黨」；現在主要是「要改善現有軍隊，用一切可行的辦法使軍隊革命化」；「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⑦。

接著，在五月二十四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斯大林又與托洛茨基當面辯論中國問題。托氏要求把反對派對斯大林的中國政策的批評公諸於眾，遭到大會拒絕，並被斥為「反黨罪行」。全會通過特別決議，譴責托一季反黨聯盟的分裂行動，撤銷了托洛茨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職務。

第三節 紅場上的反斯大林遊行

在中國留學生中，斯大林的講話，暫時起了穩定的作用；接著，拉狄克校長也被撤職，悄然離開了學校，由米夫接替中山大學校長之職。托派教員也都被撤職。但是，隨著武漢七月「分共」的很快到來，學生的思想又騷動起來。畢竟事實比雄辯更有說服力。繼「忠於革命紀律」的蔣介石反共後，「革命中心」的汪精衛也反共了；對革命「赤膽忠心」的「人民軍隊的領袖——中國工農運動的捍衛者」^⑧馮玉祥

⑦ 同②第 236、239 頁。

⑧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馮玉祥到莫斯科訪問，受到熱烈歡迎。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的學生們舉著大旗和大幅標語牌在車站上歡迎他，上面寫：「歡迎人民軍隊的領袖——中國工農運動的捍衛者！」

也倒戈了。斯大林一個又一個論斷——保證和預言，都被從中國不斷傳來的革命失敗消息所粉碎。同學們心中的問號和驚嘆號越來越多。斯大林五月十三日講話時，曾答應：「如果還有補充的問題（據說是有的一一斯大林注），我設法在下一次座談中答覆。」^①但沒有再來，他派了共產國際的一位代表去應付，結果更不能解決問題。

一位當時堅信斯大林觀點的共產黨骨幹學生、回國後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的盛岳，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

一九二七年春天的中山大學，對於我們當時揪心的問題，不管是令人滿意的或是使人不快的解答，全都沒有。正當我們深為中國形勢逆轉而感到痛心，這一形勢還是朝著不利於共產黨的方向發展。俄國領導人勸我們要對武漢政府抱有信心，可是這個政府也倒向蔣介石一邊。被斯大林認為特別可靠的馮玉祥這個軍閥，也轉而支持蔣介石。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被屠殺。我們感到心情沮喪，陷於絕境，長期壓抑而愈益表現為暴怒。共產國際來了一個代表，同共產黨學生見面，……我們連珠砲似地向國際代表提出了許多令人氣憤的問題。例如：為什麼共產國際不從上海「四一二」政變吸取教訓，採取措施，防止僅僅三個月後又在武漢發生同樣的政變？一點不假，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斯大林—布哈林的領導最易受人指責。當然，要讓這位國際代表對這一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是困難的。他把這次大失敗諉過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特別是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我們並不想減輕中共領袖們對中國發生的可悲事件應負的

① 同①第217頁。

責任，然而，把全部過錯都推到中共領袖身上，而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領導毫無指摘，這是我們無法接受的。⑤

尤其是那些在國內親身經歷了大革命的洗禮，飽受革命失敗痛苦的磨難，親眼目睹無數戰友倒在血泊中的大批新來的學生，他們從蘇聯黨爭中發現：他們在國內執行的路線，完全來自斯大林。「無論鮑羅廷，無論陳獨秀或印度人羅易，都不過是政策的執行者，真正決策者乃是俄共的中央，是斯大林。在中央派主張的所謂完全正確的政策，與我們在國內見到的所謂被執行錯了的政策之間，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倒是隱隱約約透露出來的，斷章取義摘引來的反對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謬的論據，根本和國內所曾實行的政策不同。」⑥

於是，中山大學以及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對批判托洛茨基及蘇聯托派產生反感。盛岳說：「很少有人感到中國革命的道路非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領袖們的英明領導不可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我們許多人心目中的威望一落千丈。這種局面當然為對托洛茨基寄予同情的學生和教員改善了處境。他們可以提出托洛茨基的立場來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⑦就這樣，越來越多的學生轉向托派，有的還加入了蘇聯托派組織。

一位後來一直是中國托派的領袖之一、大革命失敗後赴蘇入學的東方大學學生王文元，在談到看見托派文件後如何轉向托派的情況時

⑤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43頁，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⑥ 《雙山回憶錄》第57～58頁，香港周記行一九七七年版。「雙山」即王文元（又名王凡西）。

⑦ 同⑤第145頁。

說：

我最早讀到的一個文件是季諾維也夫的〈不得已的答覆〉，然後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綱〉，以及反對派的「政綱」。這些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為它那無堅不摧的邏輯的力，也因為它那鋒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於論斷和警告之一一為歷史事實所證明，特別關於中國革命部分，那是太顯然了，任誰看了都要驚嘆和贊成的。……我看了這幾個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來悶積於胸的、關於中國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問，這時就全部清楚了：原來在根本上與重要的方針上它都受命於斯大林一系的，決非陳獨秀個人的錯誤；這些錯誤原來並非沒有人見到，因而並非不可能預防的。聯共中的反對派，特別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曾預早而及時地提出過警告，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只因斯大林—布哈林們固執了自己的錯誤，排拒、壓制並打擊了反對派的批評，所以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才會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終於完全斷送了它。……從此，我成為「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當時反對派的名稱），最初在思想上，不久又在組織上。

⑬

中山大學加入蘇聯托派的有：徐雲作、陸一淵、董汝誠、梁幹喬、朱懷德、張特、宋逢春、史唐、安福、范金標、卞福林、曾猛、謝英、趙彥卿、耿堅白、李梅五、蕭冰洋、徐正庵、楊華波、陳亦謀等。同

⑭ 同⑬第72~73頁。

情托派的有：杜畏之、陳原道、高衡、曾弘毅、徐達文、彭桂秋、馬景山、安景明等。

東方大學同情或加入蘇聯托派的有：馬員生、孟炳昶、王文元、吳季嚴、彭桂生、江尚師、趙濟、朱代傑、嚴明傑、段子亮、劉胤、羅漢、濮德志、陸夢衣、王平一、李平、徐乃達等。

當時他們還沒有成立獨立的中國托派組織，只是參加蘇聯的托派。梁幹喬還受到托洛茨基的接見。蘇聯托派有專人與他們聯繫，向他們提供宣傳材料和托派文件。他們學習並傳播這些文件，還與觀點對立的學生和教員辯論。甚至像蔣經國也加入了托派。

蔣經國是一九二五年十月赴蘇進中山大學的。入學的第八個星期就加入共青團。蘇聯人稱他為「尼古拉同志」，受到特殊青睞。因為他父親蔣介石是北伐軍的總司令，起初，在不斷傳來的北伐勝利進軍聲中，也傳來人們對他父親的頌揚聲，及對他的敬羨目光，他感到無比的興奮和自豪。「四一二」事件發生後，武漢《人民論壇報》有他署名的一個聲明，譴責蔣介石，表示與他劃清界限，宣稱：「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是我的敵人。」^⑩

現在，他又毫無顧忌地站在托派一邊，參加辯論。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演講臺上露面。他不時帶著一堆書，從中引證馬克思、列寧的有關論點，為托洛茨基的立場辯護。由於每個演講者一般只准講五分鐘，所以他講話總是像機關槍一樣，一邊講，一邊飛快地翻書，及時找到和宣讀針對問題的適當引文，然後再講，再找下一段引文。大家誇獎他是個「出色的有條理的演講者」，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分配給他

^⑩ 漢口《人民論壇報》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的時間。同時，他還寫了許多尖銳有力的短文，貼在牆報上，公開擁護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主張。

對此，蔣經國在他的唯一的一篇回憶錄中這樣說道：

中山大學校長芮德克(即拉狄克——引者)，是教我中國史的老師。他對於中國的種種問題極為熱中，時常在下課後與我私下討論。他是托洛茨基所創學派的領導人物之一，因此時常向我詳說托氏是位偉大領袖。他常對我說：「要做一位年輕的革命志士，首先你得勇敢。其次，你必須苦幹，積極進取。就像上樓一樣，如果你辦得到，就一次跨兩三步。不要設法一步一步走，那樣子就表現不出革命志士應當有的朝氣。第三，你永遠都不得屈服或退卻。托洛茨基是位勇武的革命志士典範。」

碰巧我的觀點與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於是許多人認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實上，他們的臆測是正確的。我開始與幾位中國同學研讀托洛茨基學派的秘密著作，對於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尤感興趣。後來我越來越熱中托洛茨基學說，終至加入秘密學社。跟隨我的同學日多，並開始視我為托派的領導者。

這時候，相信托洛茨基理論的同學都不敢讓別人曉得他們的觀點，我遂在校刊上發表〈我從未如此說過〉一文以糾正他們的緘默。我竭力鼓吹同學間的暗中活動，並勸他們以小冊子和開會表示反對斯大林的態度。

蘇聯當局和聯共早已以嚴厲手段箝制托派。我的一些同學已經被捕。校方為平息學潮邀請斯大林來校演講「托派的錯誤」，這是我們首次看見斯大林。然而我不為所動，堅持我的政治觀點

並繼續反抗斯大林政權的活動。②

必須指出：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某些論斷，只是給人以似是而非的感覺。從當時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考察，由於反革命（包括後來脫離革命陣營的右派）力量的強大，和中國共產黨的不成熟，中國革命也是不成熟的，不具備奪取勝利、建立人民政權的可能。革命的路線、政策、策略的討論和決定，不是在中國的革命領導機構中進行，而是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進行，本身就說明這種不成熟性。所以，儘管斯—托雙方爭論得都很認真，見仁見智，都自以為有理，誰也說服不了誰，也許雙方的意見中各有一些正確的因素，但誰也不可能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取得勝利。即使中國大革命按托洛茨基的主張進行，也是如此。所以這場爭論是一齣悲喜劇、一場鬧劇，它是不成熟的中國革命和不成熟的中國共產黨的產物。中國托派也是這樣一種產物，致使它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成為革命的畸形兒。

聯共中央一面批駁反對派，一面繼續採取組織措施，在這年十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致使矛盾進一步激化，終於在十一月七日紀念十月革命節時，發生了反斯大林遊行。

這天，紅場上紅旗如海，十分壯觀。斯大林等蘇聯最高黨政軍領導人，站立在列寧墓上的主席臺上，檢閱隊伍。中午時分，中國留學生的隊伍繞過克里姆林宮圍牆城角，剛剛踏進紅場入口，斯大林等人就向他們招手。同時，在揚聲器裡呼喊出支持中國革命的口號：「中國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向中國人民致敬！」「堅決支持中國

② 轉自漆高儒：《蔣經國的一生》第11～12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革命!」「世界革命萬歲!」……接著就在主席臺及兩旁的貴賓臺和紅場上成千上萬的群眾中發生震天動地的響應，「嗚啦!」「嗚啦!」中國留學生的隊伍越行近檢閱臺，氣氛就越發熱烈，叫喊聲也越發高昂，使許多在國內飽受磨難的年輕革命者熱淚盈眶。一位剛來莫斯科的學生談他當時的感受時說：

前前後後的紅旗揮動著，形成了火海。四周圍的人，列寧墓上的，墓房兩側貴賓臺上的，面向宮牆，層層疊疊排列在遊行隊伍之另一邊的，上千上萬的人，揮舞著帽子或者旗幟，對我們歡呼出慶祝中國革命的口號。人們彷彿要奔向我們，要舉高我們，要緊緊地擁抱我們。處在這種情景中，任誰都要被感動得掉下淚來的。我們何幸而生為中國人？何幸而成為中國革命者？更何幸而遭遇到已經勝利了十年的俄國的兄弟們呀？這種歡呼一直送我們走過了紅場。①

但是，就在這時，在遊行隊伍中，還發生了另一件事：

中山大學的遊行隊伍走到紅場入口處時，隊伍裡的蘇聯托派分子突然從口袋裡掏出布旗揮舞，呼喊反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這一挑釁，當即引起擁護聯共領導的其他遊行學生的反擊，於是雙方發生鬥毆。新調來的教列寧主義課程的達格馬洛夫教授，在這場混戰中，遭到托派分子的毒打，鼻孔流血，滿臉青紫。就這樣，一邊打，遊行隊伍還不停頓地繼續前進。走到主席臺時，在上面的斯大林等領導人，自然也看到了在他們面前發生的鬥毆場面，但沒有也不便有所

① 同④第59頁。

表示，而當他們看到中國留學生時，仍一如既往，舉手高喊支持中國革命的口號——「革命的中國青年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中國學生則按照習慣，用俄語高喊：「嗚啦！」

然而，又使斯大林和聯共領導人吃驚的是，另一部分中國留學生，也突然打開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字樣的旗子，並高呼口號，支持遊行隊伍前面被圍攻的俄國托派分子。他們拚命大聲呼喊，比俄國托派分子喊得更響^①。

參加這次紅場事件的中國留學生是梁幹喬、區芳、陸一淵、史唐、陳亦謀、宋逢春、張特、朱懷德、楊華波等人。他們的公開造反完全出人意料，使主席臺上的聯共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感到震驚；當著許多來自世界各地重要來賓和革命領導人的面，發生這樣的事，更使斯大林感到難堪。

這一聯共黨史上從未有過的嚴重事件，加劇了聯共黨內反對托派的鬥爭，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程度。事件發生一週以後，即十一月十四日，聯共中央及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終於作出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黨籍的決議。第三天，曾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代表蘇俄政府與孫中山發表聯合宣言的越飛，因同情托洛茨基而悲憤地開槍自殺，成為死於蘇聯反托運動中的第一個上層人物。十二月聯共的十五大，批准了開除托、季的決定，同時開除七十五名托派骨幹分子。一九二八年一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蘇聯東南邊疆城市阿拉木圖。蘇聯國內開展了大規模的肅托運動。托派活動轉入地下。

參加紅場事件的中國留學生，都被開除黨籍和團籍。少數人如陳琪、聞岳留校當了一段時間的「反面教員」，然後充軍到南俄靠近伊朗

① 《唐寶林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28頁。

邊界地方服苦役（後來二人想乘機逃入伊朗，一人被國境上衛兵當場擊斃，另一人押解回來，投入監獄）。多數人在一九二七年底，被遣送回國。

聯共領導人也許希望藉中國反動派之手，消滅這些異國狂徒；萬萬沒有想到，托派的種子，就這樣飄撒到中國的土地上，日後曾給他們繼續操縱中國革命，帶來許多麻煩。

第四節 「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

被蘇聯政府遣送回來的這批人，出國前多數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梁幹喬是廣東人，入黨後曾是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在東江地區打過土豪，大革命時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然後赴蘇留學。區芳是廣東瓊崖人，一九二五年秋在廣州中山大學加入共青團，因工作努力，受到中共兩廣區委的特別信任，兩個月後加入共產黨，先後任中山大學黨支委、書記，第二年畢業後，被派任香港共青團市委書記，半年後赴蘇留學。陳亦謀也是廣東人，出國前是共青團員。陸一淵是浙江餘姚人，出國前是團員。史唐是浙江諸暨人，大革命時是上海中共中央的機要秘書。宋逢春是河北景縣人，出國前在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做機關報《政治生活》的發行人。他們回國時，中共黨內正處於大革命及各地武裝起事失敗後的混亂狀態。因此，他們中多數人得以繼續混在黨內，並被中央委派工作。如梁幹喬到廣東海陸豐，在彭湃領導下搞過一段農民運動。區芳到香港太沽船廠做工人運動。宋逢春到北方區委做宣傳工作。暗地裡，他們則互相聯絡，醞釀成立托派組織。

經過約一年的醞釀和籌備，他們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陸一淵家中召開了所謂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自稱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簡稱「總幹」），其成員分工是：史唐任幹事長，陸一淵任宣傳部長，張特任組織部長；梁幹喬、區芳、陳亦謀負責華南區，宋逢春、蕭冰洋、李梅五負責華北區，徐正庵負責江浙區。他們還在武漢、香港、蘇州、廣州、北京和哈爾濱等地建立了支部●。

由於他們中不少人是團員，黨員則企求繼續混在黨內，還由於這時忙於建立組織，未及在黨內大肆活動。所以他們對黨還沒有什麼影響。活動主要是秘密的、黨外的。

組織成立以後，他們的活動主要還是放在上海。為此，區芳、梁幹喬不久也調到上海，加強「總幹」的工作。

但是，總幹的工作主要由區芳承擔。梁幹喬以領袖自居，不愛幹具體工作。在蘇聯時，因他性情暴烈，作風驕橫，愛好辯論，聲音宏亮，在會上常用高亢的調子發表聲明，被有些人奉為領袖。中山大學副校長庫秋莫夫，有一次還開玩笑似地給他起了一個綽號——「被壓迫民族的領袖」，而且，在當時他又是托派留學生中唯一受到過托洛茨基接見的人，因此，他總是昏昏然，要人家奉他為領袖。到上海後，他每天只知道在北四川路新雅利男居茶樓上品茗，把工作全推給別人。陸一淵在蘇聯時，以優異的學業成績畢業於中山大學第一期，留校當了譯員，與學校食堂的一個名叫安娜的漂亮服務員結了婚。遣送回國時，妻子留在了蘇聯，因為這個刺激，間或譯點文章掙錢外，也是什麼事都不幹。張師則為謀生到處奔走。張特不會做文章。

●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86頁，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唐寶林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

宋逢春也是甩手掌櫃。他回國後，在中共北方區委工作時，機關被破壞，來到上海。中央又派他到湖南去進行農村武裝鬥爭，打游擊，搞土地革命。他認為到農村去打游擊，鑽山洞，危險不說，生活太艱苦，就藉口聽不懂南方話，拒絕分配，於是就在上海進行托派活動。所以宋逢春後來承認：「當時許多托派分子，口頭上錚錚有詞，引經據典，說按照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搞革命，不能離開無產階級，因此，應以城市為中心，反對中共執行的農村為革命根據地的路線。實際上是，我們這些過慣了城市生活又吃過洋麵包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害怕農村的艱苦生活。」說到此，他不無感慨地說：「想不到，農村艱苦的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我熟悉的那些同志，現在都當了大官。當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許多人犧牲了。而我們在城市的鬥爭，卻完全失敗了。也有些人死在國民黨的監獄裡；活著的人，在新社會，又都當了階下囚。」[●]他的意思是，悔不該當初，一念之差，走錯了路，沒有上天堂，卻走向地獄。

於是，總幹的工作，主要靠區芳、陳亦謀、宋敬修二三個人撐持。

區芳被視為托派中的「怪傑」。他兼有書酸子和實幹家的兩種氣質：尊容像張飛，面黑如炭，長滿刺人的鬍子，一年難得理兩次髮，長毛頭髮披散著，像個女人；太長了，就用剪刀剪兩把。也決不到澡堂洗澡。平時洗臉也馬虎，身上的汗泥，能用手指刮下。白布被子和床單，常呈黑色。皮鞋沒帶，拖拉而行，幾天就磨出一個大洞。因此，他總是找不到女人，成不了家。他的外文及文筆很好，譯著有《西方革命史》（署名高峰，新宇宙書店出版，當時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等，經常有稿費收入，但他總曠沒有飯吃。每天只吃兩碗麵，或拿著大餅油

● 《唐寶林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

條，在馬路上邊走邊吃。原來，每次得稿費，他就請來梁幹喬、張特、陸一淵等及他們家屬，一起大吃一頓，大家勸他留著點過日子，他卻說「今朝有酒今朝醉」，花去大部。第二天，生活依舊窘困。後來，在上海藝術大學當了教授，只得從北四川路的陋室搬出來，到巨潑籟斯路住。一輛人力車，裝了他的全部財產，只剩一隻馬桶。他說：「沒紙煙，我寫不出文章來；不坐馬桶，我想不出文章來。馬桶與文章是有因緣關係的。」於是，他又回去，手提著馬桶，要上電車。售票員不讓他上，他硬是擠了上去。乘客們，見他穿著西服，手拿馬桶，有的笑他，有的捂著鼻子，罵他「屈死」。他卻安然自得，無動於衷。

就這樣一個怪物，卻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的經驗和拚命的實幹精神。王文元讚譽他「吃苦、耐勞、謙虛、樂觀，重實幹而能思想，狀似苦力而文采斐然」^②。起初，他在楊樹浦電燈廠做工、添煤，很快拖進二十多名工人，在廠裡開始搞起群眾動運，奠定了他們托派在滬東的工作基礎。後來，他又進入某個報館做印刷工人，又發展了不少人，並使報業中托派的力量一度超過了共產黨的力量。此後，區芳又改拉板車，在滬西紡紗工人中做聯絡工作。

最後，總幹把工作重點放在上海藝術大學上，企圖把上海藝大辦成「上海大學第二」（上海大學是中共培養幹部的搖籃），為他們培養幹部。藝大校長是周勤豪，他不懂藝術，也不懂政治，聘請的教員，有共產黨方面的，如王學文、華漢（陽翰笙）等，也有托派分子劉仁靜、王獨清等，特別倚重當時小有名氣的創造社詩人王獨清。王是陝西人，早年留學日本和法國，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當教授。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一度主持創造社工作。這時，他與中共中央派去聯繫

② 同①第154頁。

創造社的代表鄭超麟結識，後來就與鄭及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密切往來，一起轉向托派。一個是「世人皆昏，他獨清」，一個是「世人皆醜，他獨秀」。二者「獨」到了一起^②。

周勤豪聘請王獨清任上海藝術大學教務長。但是，王只會寫詩，不會繪畫，更不會彈琴，於是又另添一所文學院，王獨清任院長。爲此，他就網羅了一大批托派分子幫助辦學。文學院下設社會系，主任是陸一淵，教授區芳等；還有中國文學系，共一百多人。托派分子嚴靈峰、陳岱青、杜畏之、吳季嚴等都應聘去文學院當了教授。所謂藝術大學，主要是文學院的這兩個系，其他如洋畫系、音樂系只有幾個學生。

由於文學院的教授多是托派分子，該校成立了托派支部，由區芳負責。他們的活動，使一大批青年學生加入了托派。區芳的學生李國棟、何樹芬等，後來成爲溫州托派的骨幹。

歸國留學生托派活動的大本營是北四川路新宇宙書店。書店的負責人是史唐、張師和陸一淵。他們利用這個書店，一方面代售其他書店出版的新書，另一方面出版自己翻譯的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的著作，例如托洛茨基的《列寧傳》、拉狄克在中山大學的講稿《中國革命問題》等。

天馬書店也是他們的一個據點。店主人樓國華是浙江餘姚人，共產黨員，沒有去蘇聯，但由於受到留學生托派的影響，參加了托派，後來成爲托派上層堅定分子，負責托派中央的籌款和出版工作，一直到今天還在香港活動，不斷撰寫反共文章。

新宇宙書店不久被查封，但是由於托派與國民黨當局在反共上有

^② 王獨清在一九四〇年病死於上海同仁醫院。

一致性，他們還常利用國民黨的陣地如「新生命書店」和大陸大學進行活動，或謀取一些生活費。

新生命書店是直接為國民政府服務的輿論陣地。蔣介石獲得大革命成果後，也搞起為他統治服務的理論建設，親自指定周佛海負責，與戴季陶、陳果夫、陳布雷、邵力子組成一個委員會，在上海辦了一個《新生命月刊》和「新生命書店」，大力宣傳「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與共產黨爭奪青年的思想。具體由陶希聖、樊仲雲主持的新生命書店，主要經營出版業務，對托派所寫所譯的宣傳托洛茨基主義、反蘇反共的著作，也接納出版。

上海大陸大學則是國民黨改組派的一個據點。一九二八年，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為了與蔣介石派爭奪國民黨的領導權和反共資本，由陳公博出面，辦了《革命評論》，發表他們的所謂「革命理論文章」同時，又創辦了大陸大學，標榜「為了培養革命力量」，發展他們的勢力。為了搶人才，他們在各方面都降低辦學標準，與一般大學相比，該校的特點是學期短，學費低，教法靈活，教職員工資不高。因此，吸引了不少生活比較貧困而傾向革命的知識青年。學校也聘請了像許德珩等一些激進教授。托派於是也就千方百計打了進去，區芳等人去當了教授，並且把教務主任劉侃元也拉進了托派。該校結束後，許德珩和劉侃元等，又同時轉入北京的中國大學當教授。在三十年代，兩派經常論戰，劉侃元於是又影響了一批學生轉向托派，為三十年代中國托派領導集團的持續和北方托派運動的開展，培養了骨幹。

此外，托派還在上海印刷工人和青年學生中進行鼓動，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法租界曾成立一個學生支部，雲南人閔蔭昌任支部書記。

為了傳播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件，宣傳托派的主張，「總幹」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創辦的地下刊物

《我們的話》，也創辦了一個同名的油印刊物，作為「總幹」的機關報。從此，他們被簡稱為「我們的話派」。《我們的話》的編輯、發行、刻板、油印以及大半文章的撰寫工作，都由區芳一手包辦。

《我們的話》發刊詞宣稱：「我們要拯救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消滅一切黨機關的官僚化，指出國際及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政治路線和策略——使我們的黨無產階級化，使黨的領導走上無產階級行動的正軌。」接著，他們就在《我們的話》上連篇累牘地把托洛茨基的論著翻譯介紹到中國來，並在共產黨內傳播，終於造成了中共黨內一次大分裂，使陳獨秀為首的一批中上層幹部脫離共產黨轉向托派。

六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著重討論了托派活動侵入黨內的嚴重情況，通報全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近已侵入中國黨內，它在目前中國黨內理論水平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餘的條件下，很有可能與黨內一般落後的、消極的、離開工作、不滿意指導機關的黨員相結合，以助長黨內小組織傾向與派別觀念的暫時發展，而形成中國的反對派。」^①會議分析了這個事態的嚴重性，指出：「這一反對派現在已成為帝國主義破壞蘇聯、反對世界革命的工具，無疑的在中國的反對派要同樣的成為中國統治階級反對革命破壞黨的工具，所以黨必須堅決的予以制裁。」^②會議號召全黨與其堅決鬥爭，以鞏固黨的組織。

托派卻對在中共黨內宣傳活動獲得的初步成果，感到歡欣鼓舞。為了加速共產黨的分化，他們在九月特發表〈中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告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同志書〉，全面宣告他們的「主張與任務」，聲稱他們已經「找到了達到勝利的道路和方法」；「中國的反對派在國際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在自己的艱苦奮鬥中，一年來已經把自己的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238頁。

② 同①第192頁。

幟樹立在中國各大城市，而得到我黨的同志和無產階級與勞苦群眾熱烈的同情和擁護，在香港已經得到我黨中的戰士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護衛。中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已經成爲中國革命的旗幟了。」最後，他們向全黨同志們呼籲：「中國的機會主義者斯大林的信徒，已經拋棄了革命的立場，拒絕了改正錯誤的誠意，公開的叛變了列寧主義，正在毀滅整個黨的組織，不顧一切來擁護斯大林主義了！我們——中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最嚴肅的來號召全黨的同志起來注意機會主義者非階級的企圖與行爲！我們號召全黨的同志起來解決黨的生死關頭！我們要求全黨的同志，都一致站在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旗幟之下，勇敢的向機會主義者鬥爭！我們將在中國無產階級同情與幫助之下日益強大起來，在列寧旗幟之下完成中國革命！」^②

看來，由於托派組織的成立，共產黨內部開始分化，他們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爭取共產黨的群眾，進而取而代之，奪取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抱著巨大的希望和信心。殊不知，歷史是會捉弄人的。以後的幾個托派小組誕生時，都曾給他們帶來過美好的希望，給他們留下美好的回憶，可是後來滿不是那回事。

第五節 蔣經國和留蘇托派的命運

一九二七年底被遣送回國的托派分子，只占留學生中托派分子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人隨著蘇聯肅托運動開展，隱蔽了下來；有的則是後來新加入的。也有人在肅托運動中被揭露出來，或遣送回國，或流放西伯利亞。但是，被打擊的人，不少並非托派，有的是反對「紅色

②· 《我們的話》第10期。

買辦」王明集團官僚專制主義統治，而有的只是同情托派觀點。

在這些被打擊、被迫害的人中，蔣經國由於他的特殊身分——中國新的統治者蔣介石的兒子，受到了特殊的處置。蔣經國在回憶錄中說：「當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認為我回國比留在莫斯科對他們威脅更大。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從孫中山大學畢業，同一群畢業同學要求回中國，卻未得他們允許。中共說：『讓蔣經國回國，他一定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們要他留在蘇聯。』我現在被完全孤立於中國之外。從前雖然可在經過檢查後和親友通信，現在已被禁止。我無法不懷念雙親和祖國，看起來，回國探視家人的機會非常渺茫。」

但是，他並不因此消極、悲觀而放棄奮鬥，而是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努力與命運抗爭，開始為爭取較好一點的生存條件而奮鬥。他說：「我在失望之餘申請加入蘇聯紅軍。獲准後被派駐莫斯科的第一師，首度過起軍人生涯。」不久，他又進入一所軍事學校深造。在三年中，「我在戰術、游擊戰，以及武裝顛覆方面——其中包括發動顛覆攻擊及反顛覆攻擊，花了極大功夫，仔細深研；我還寫了一篇主題為〈游擊戰術〉的論文，測試自己的學養。除了軍事課程外，我還研習政治、經濟、哲學，尤其是唯物辯證法。」由於他表現如此出色，在這裡，他被吸收加入了蘇聯共產黨，成為候補黨員。

然而，蔣經國說：「我的政治活動卻一直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嚴密監視。一九二八年早期，我的部分同學勸我寫份聲明，退出托洛茨基組織。由於我當時並不瞭解托洛茨基理論，我接受這項勸言，與該組織的秘密活動斷絕關係。」但是，中共王明集團還是不放過他，繼又指控蔣經國在蘇聯組織了一個稱為「江浙同鄉會」的反革命團體。「中共指稱，該團體是在其父指示下組成的，並由他資助。」據此，王明要求蘇聯政府逮捕蔣經國。

斯大林顯然為掌握一只與中國統治者打交道的棋子，把蔣經國當人質，沒有採納王明的提議，而是讓這位「尼古拉同志」到基層去「鍛鍊」。

於是，蔣經國跑遍俄羅斯許多地方，當過工人，住過農舍，歷盡艱難，受夠煎熬，兩次差一點病死異域。但是，憑著他蘇武般的吃苦耐勞、善於處人和眷戀故國的精神與意志，以及俄國勞動人民善良的人道主義精神，他竟然神奇般地活了下來。最後，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他由技工、技師，升到副廠長，並與一位叫芬娜的俄國姑娘（中文名字蔣方良）結為伉儷。

一九三七年，國共第二次合作，蔣經國才被允許帶著妻子和兒子回國。蔣介石顯然理解並原諒了兒子在蘇聯的行爲，著意栽培，逐步委以重任，從贛南督察專員到行政院長，終於成爲一世之雄。於是，從他贛南發跡起，就有一些過去同在蘇聯留學的托派分子，於托派事業不斷受挫時，紛紛脫離托派，投靠蔣經國，成爲他與共產黨爭鬥的參謀與助手。

隱蔽下來的托派分子，繼續在中國留學生中傳播托洛茨基主義。他們把托派主要文件譯成中文後，用精細的字體抄在小小的日記本上，在中國人中謹慎而廣泛地傳閱，從而使托洛茨基主義在蘇聯托派組織受到打擊的同時，藉著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對斯大林、共產國際以及中山大學米夫—王明集團的不滿情緒，在中國學生的思想中，卻大踏步地前進了。

與蘇聯黨內鬥爭糾纏在一起的，還有東方大學學生反對中共旅莫支部的鬥爭，和中山大學王明集團與「第二條路線」之間的鬥爭。

一九二五年，中山大學成立時，「中國共產黨莫斯科支部」的領導人之一是任卓宣，他又是中山大學黨支部書記。他以支部的名義，搞

了一個《訓練工作指導綱要》，對黨員實行專制統治。《綱要》強調「組織利益就是個人利益」，完全抹殺個性的存在和發展，把人之常情的友誼、愛情、家庭、愛好等個人利益和自由的東西，統統斥之為「幫助反革命」、「摧毀黨組織」的「小資產階級惡習」；把追求愛情和愛好文學，說成是「破壞組織的浪漫主義的基礎」。任卓宣——這位後來在國內被捕叛變、化名用「葉青」、專門用蔣介石的專制主義攻擊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家——想用這《綱要》來實現其個人的專制統治，但是遭到廣大學生黨員和團員的強烈反對。一九二六年夏，中共莫斯科支部終於解散，黨團員分別轉入蘇聯的黨團組織，但都降為候補期，經考查才能轉正。

中共莫斯科支部解散，任卓宣回國，但支部的殘餘勢力仍是學校的骨幹。他們以武扶經為首，搖身一變，成為學校中聯共黨支部的依靠對象，擔任師生之間的翻譯，與學校當局（校長修緬斯基和軍事班負責人馬斯洛夫）結合，繼續壓制廣大學生。尤其是對大革命失敗後入學的文化程度低的數百名工農學生，認為把他們訓練一年半載後，便送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所以不必學習費時間的俄文和過多的理論書籍，又引起學生的強烈不滿。於是，幾乎是六、七百名全體政治班和軍事班的學生聯合起來，開展了「反對中共旅莫支部殘餘」的鬥爭。鬥爭一度相當激烈，同學們到共產國際門前請願遊行，造成嚴重影響。結果，一九二八年夏，東方大學中國部撤銷，大多數同學算是畢業，回國工作，少數人升入其他學校深造，剩下一、二百人，併入中山大學。這些學生中，有許多是托派分子或同情托派的。分散以後，加強了國內及中山大學的托派隊伍。

這時，中山大學已經成為米夫——王明（陳紹禹）集團統治的天下。一九二七年暑假畢業後，王明留校當翻譯，同時協助校長米夫研究中

國共產黨送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和文件。早在一九二五年中山大學成立時，校內就設有副校長米夫主持的「中國研究室」，研究中國學術和革命現實問題。以後，米夫就一直參加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會議和工作，貫徹斯大林制訂的方針。一九二七年二月，聯共中央派遣以米夫為首的宣傳工作者代表團來華。米夫又帶著王明，先後訪問廣州、上海、武漢等地，向中國黨介紹蘇聯黨務工作經驗，實地考察中國革命情況。他們還參加了中共「五大」，然後回國，米夫接任中山大學校長。於是，王明成為米夫的心腹。一九二八年三月，米夫又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副部長，直接負責指導中共和中國革命。六月，中共舉行「六大」時，米夫委派王明當他的助手，協助他組織大會。

王明如此得寵於米夫，他的野心也越來越大。他想成為中國的斯大林，於是就在中山大學開始施展他的謀略。他一面培植自己的宗派勢力，拉攏沈澤民、秦邦憲等人，成為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牢牢掌握了中山大學的黨務和教學工作；一面利用反托派運動，剪除一切異己分子。

當時，在中山大學，除了托派之外，還有董亦湘、俞秀松、周達明等一批老黨員，有西門宗華、高承烈、林其濤等一批共青團領導人，和李建玉、余杜三等一批上海、武漢的工農學員，他們思想傾向上都擁護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但不滿意米夫—王明集團及其控制的黨支部的官僚宗派主義的統治，尤其厭惡「紅色買辦」王明的思想作風，認為他「不是革命家，而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工於心計，能玩無恥手腕的政客」。他們聯合反對王明集團，被稱為「第二條路線」。當他們與托派形成統一戰線，準備向王明集團攻擊時，首先被王明集團利用肅托運動所擊敗。王明藉口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多是江浙籍的人，製造了一個「封建性團體——江浙同鄉會」的莫須有罪名，打擊董、俞

一系的人^⑩；以違背共青團服從黨組織的組織關係原則為由，把西門宗華一系，打成「先鋒主義」；把那些反對王明集團的工農學生，說成是「江浙同鄉會」的「群眾基礎」。最後，又把他們統統作為「托派」或同情托派的集團，進行審查、批鬥、開除、監禁、流放。結果，又有許多人因不滿這種迫害，而真正轉向托派。

就這樣，中山大學托派分子的數量，在梁幹喬等人被遣送回國以後，反而大大地增加了。而他們在思想理論方面，由於獲得了托洛茨基最新起草的關於中國革命的系統意見的文件——〈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的學習和武裝，比已經回國的托派分子，更加成熟，更加堅定。

托洛茨基的這個文件，是對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共產國際綱領〉批判的一部分。

一九二八年七月，繼中共「六大」以後一星期，共產國際「六大」也在莫斯科舉行。會前，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獲得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要提供給大會通過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文本，就寫了〈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猛烈地批判這個綱領，成為托派的一個重要文件。文件分三部分：(一)「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以托洛茨基發明的所謂「不斷革命」的理論，批判斯大林的綱領是「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二)「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誤策略，和在這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闡述了蘇聯托派的綱領。(三)「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把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作為批判斯大林共運策略錯誤的重型炸彈，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共

^⑩ 參見本書第三章附錄〈俞秀松案〉。

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及其慘敗的結果。

托洛茨基要求在國際「六大」上印發這個文件，並要求恢復黨籍。斯大林只印了其中第一、第三部分，分發給少數幾個黨的代表團看，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閱後收回，不准帶回國。

托洛茨基的這個文件及後來他創立的以「不斷革命論」為核心的「托洛茨基主義」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強調一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應以後者為中心，認為十月革命勝利後的蘇聯，不應以主要力量搞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因為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下，靠本國落後的經濟技術力量，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所以他主張把蘇聯建成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戰爭的橋頭堡」，「世界革命的基地」，不僅一般地支援各國革命，還應直接輸出革命。認為只有在世界革命的勝利中，蘇聯一國的無產階級政權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建設，也能在其他革命成功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先進的經濟技術的支援、交流和合作中，取得成功。為此，他在一九一九年，曾建議派三萬至四萬名騎兵到印度去「直接推動被壓迫群眾的起義」；在一九二三年，他又堅決主張派遣紅軍正規軍去德國，以此「在歐洲點燃無產階級革命之火」，並表示他自己願意親自率領紅軍前往。

托洛茨基的這些理論、主張和建議，雖然荒謬，但對當時未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共產黨來說，卻感到親切和鼓舞，因而受到熱烈擁護，並被視為「真正的列寧主義的國際主義」，而斯大林提出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就被視為「民族主義」。所以，斯大林雖然控制了國際六大，規定了限制閱讀托洛茨基文件的紀律，在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中，非但不起作用，反而產生了欲蓋彌彰的逆反效應。連參加大會「綱領委員會」的美國共產黨代表坎農及加拿大代表斯辟克托爾等人，在讀了托洛茨基的文件後，也受了影響，完全支持托洛茨基，並

不顧禁令，把文件偷偷地帶回國。雖然在會上不敢有所表示，但大會結束後，托派卻在不少國家的共產黨內蔓延開來。坎農後來回憶說：「我們的疑點，得到了解答。和白晝一樣地明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在托洛茨基一邊。……斯辟克托爾和我決定回國去，開始站在托洛茨基主義旗幟下而奮鬥。雖然我們早被說服了，但我們在莫斯科的大會中，不作鬥爭。……共產國際早已完全斯大林化了。大會是被包辦的。如我們在大會中披露自己的立場，所得的後果將是被扣留於莫斯科，一直至我們被打得粉碎並在國內陷於孤立止。而我們的職責，和我所預計的政治任務，是在我們的黨內組織擁護俄國反對派的基地。為著要幹這件事，我應首先回國。因此，我在斯大林化的大會上保持緘默。」^①坎農竊帶托氏文件回國後，馬上脫離美共，開始托派活動，並成為美國托派組織「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袖。他所創辦的《鬥爭》(Militant)週刊，成為英語國家宣傳托派思想的主要刊物。

第六節 莫斯科的秘密組織

托洛茨基的文件，在中共黨內也發生了同樣的影響。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期間，為中國代表團服務的工作人員是一批中國留學生。他們中的王文元、劉仁靜、趙濟等人，就是隱蔽下來或新近加入的托派分子。這些人在翻譯大會文件時，看到了不准翻印、不准帶回國的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被深深打動，不僅翻譯流傳出來，而且決定組織起來。

新學期開始以後，九、十月間的一個星期天，中山大學的十幾名

^① 詹姆士·P·坎農：《美國托派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 Trofkyism)第50頁，一九六九年紐約出版。

中國學生，裝作郊遊的模樣，帶著食物，分批出發，坐電車到了終點，再步行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大松樹林裡，圍坐在一起。他們唱著、吃著，玩了一會兒；當遊人稀少時，他們就嚴肅地談起話來，討論莫斯科中國反對派的組織問題。安福主持會議宣布說：「我們現在分散在莫斯科各校（砲兵學校、步兵學校、列寧學院等）及本校的大多數同學，已有五六十人，俄國同志指示我們要成立起組織來加緊活動，因為環境困難，需要極端秘密。」^⑫結果，在這個「積極分子」會議上，推舉出安福（書記）、范金標（組織）、王文元（宣傳）、李平、曾猛、卞福林、謝英等七人，組成幹事會，正式成立了莫斯科獨立的中國托派組織^⑬。

安福是無錫人，在紗廠做過工，後來到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事。大革命失敗後，帶了一批工人到蘇聯留學。起先，他們只是比較信任董亦湘、俞秀松等一批老黨員，被王明集團定為「江浙同鄉會」的「群眾基礎」，受到打擊，引起他們的不滿。後來，他們接觸到托派文件，就一起轉向托派。而那些被打成「江浙同鄉會」「反黨集團」的多數黨員，卻始終是擁護中共「六大」路線，反對托派主張的。

范金標，早年在杭州讀書時，就參加學生運動，是杭州學生會的幹部，先後加入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後來到廣州參加大革命，進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師，任某團黨代表。「四一二」以後，左派師長嚴重被蔣介石撤職，他也離開了部隊，到故鄉臺州一帶搞農民運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安福同樣的情況，轉向

^⑫ 同^⑪第83頁；曾猛：《一九二八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中托派組織活動情況》手稿，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

^⑬ 同^⑪。

托派，並且是這次莫斯科中國托派組織成立會的發起者之一。

王文元又名王凡西，筆名雙山，浙江海寧人。一九二五年在杭州省立甲種商業學校讀書時，與范金標同在杭州學生會工作，曾領導學生運動，響應上海的「五卅」運動。九月考入北京大學後，參加共產黨，並任學校支部領導工作，不久又調東城區委，專職做地下工作。一九二七年六月，來到大革命正在流血和失敗中的武漢，被派在「四省黨部」工作。這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因蔣介石「清黨」結果，大批革命同志逃難來漢而成立的。這個「黨部」的原來目的是策劃該四省的秘密工作，而實際則是招待流亡人員了。七月下旬，王文元因革命失敗，赴蘇留學。在蘇聯，他一方面被蘇聯政府對中國亡命的革命者熱情接待所感動，並為參加紀念十月革命節十周年豐富多采、規模宏大的紀念活動而激動不已；另一方面，又對蘇聯黨員和群眾中許多人擁護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情緒所感染，更為托洛茨基和蘇聯托派受到的殘酷迫害而憤憤不平，終於走上托派之路。

曾猛是浙江溫州人，一九二五年九月由鄧中夏、李森介紹加入共產黨，先在上海中共中央辦的印刷廠當校對，後調中央秘書處，任機要主任，在王若飛領導下工作，負責刻寫油印機要文件。旋又赴浙江，任省委秘書長。後來又隨中央遷武漢。革命失敗，赴蘇留學。

卞福林是紗廠工人出身，平時不大愛說話，但考慮問題切實周到，有所言時，總是扼要精當，很受大家擁戴。

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一位工人運動的領袖季達才。大革命時期，他是浙江省總工會的主席。此人外粗內精，對革命忠誠勇敢，理論上也有一定的修養，深受杭州工人的信仰，在領導工人配合北伐軍攻克杭州的戰鬥中，表現突出，立下了汗馬功勞。

卞福林和季達才，在第二年的肅托運動中，被捕入獄，沒有能回

中國，死在蘇聯的監牢中。

會議上詳細討論了幹事會在莫斯科中國留學生中的組織發展和活動事宜，決定主要工作是翻譯反對派的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的文章），閱讀文件，研討文件，宣傳觀點，吸收成員，以備回國後用托洛茨基主義領導中國革命。

會議決定，除了鞏固發展中山大學的托派組織之外，還要在莫斯科步兵學校、砲兵學校及列寧格勒的中國學生中發展組織。列寧格勒的發展工作由在列寧學院學習的劉仁靜負責。

會議決定，各校的托派分子成立若干小組開展活動，每週按小組集會一次，報告工作，安排任務。學習文件，主要取自學方式，在小組會上，每個人都要報告自己一星期來的學習心得，研討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觀點和分析，以達到理解和掌握這些觀點。小組會上還要報告與外界接觸的情況，有何發展對象，對新對象如何進行工作，要把新對象思想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然後決定是否吸收或由另一人去進行考察。決定吸收，就加緊工作，否則就中斷聯繫^①。

莫斯科中國留學生中這個托派秘密組織成立後，按照上述方針開展工作，果然取得相當成績。據說到一九二八年冬天，加入組織或思想上的同情者，達到一百四五十人，而當時留學生總數是四百人。

這個秘密幹事會對外的聯繫有兩方面：一是與蘇聯托派的聯繫，接受托派文件，主要由安福負責，范金標和王文元協助；二是與國內的托派聯繫，為他們翻譯寄送托派材料。莫斯科秘密托派中最早回國的是曾猛。他因患咳嗽、咯血，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瞿秋白、鄧中夏等人）要求回國工作，獲得批准。托派

^① 曾猛：《一九二八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生中托派組織活動情況》。

幹事會就責任曾猛回國後與史唐等人聯絡，要他們努力在中國發展組織。一九二九年一月，曾猛回到上海，即向中共中央報到，被安排在中央秘書廳文書科工作；二月，與史唐等人取得聯繫，才知道他們已經成立了國內第一個托派小組，於是把莫斯科秘密組織的情形及對國內托派的「熱切希望」轉告給他們^①。這樣，兩地的中國托派組織建立了正式的關係，聯絡地點就是上海的新宇宙書店。莫斯科組織主要由王文元負責，他曾幾次把譯好的托洛茨基文件寄到這個書店，轉給史唐^②。

當時與王文元聯繫的蘇聯托派是莫斯科反對派秘密委員會的成員，叫波略可夫。他在中山大學教過書，肅托時被開除出黨，失了業，轉到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工廠做工。由於他的照顧，王文元在他家裡工作了一二個星期，秘密翻譯了托洛茨基對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判的文件。後來，波略可夫因在廠裡發動罷工而被捕，家被抄，妻子也被開除國籍、學籍^③。王文元只得另覓地方把托洛茨基的文件譯完。

這年十月四日，托洛茨基又寫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詳細地論述了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革命形勢和策略。此件和上述《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被中國托派視為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它與中共「六大」制訂的綱領路線針鋒相對，為中國托派規定了系統的理論、綱領、路線和策略。它們由王文元和劉仁靜直接帶回國內，從而使中國托派具有了比較完備的系統的理論武裝，致使一些托派分子，一直比較頑固地堅持錯誤的立場。

王文元和劉仁靜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回國的。同時回國的留學生

① 同①。

② 同①第101~102頁。

③ 同①第84~85頁。

還有二十多人，大部分是未暴露身分的托派分子，其中有五對夫婦：王文元和葉英、濮德志和張穎新、黎彩蓮和陸夢衣、高恆和羅亞蘭、劉胤和王明先，以及解叔達、江尙師、趙濟、杜畏之、陳岱青、吳季嚴、周慶崇、張世興、謝英(謝公墨)、雷劍峯等。共產黨員有惲雨棠、吳黎平等。

其中，葉英，湖北人，大革命時期入共產黨，派在國民黨軍官學校女生隊學習軍事。革命失敗後赴蘇，轉向托派，並與王文元結婚。濮德志，安徽懷寧人，陳獨秀的表侄，早年曾留學日本，後赴蘇。黎彩蓮，生於漢口一貧苦人家，父早故，母親爲人洗衣服。一九二七年北伐軍進入武漢，她十五歲即投入革命浪潮，在橋口一帶積極進行工人運動。革命失敗，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由於年小活潑，被稱爲「美麗的小麻雀」，全校聞名，不斷爲大官僚的公子哥兒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們，卻和一個並非公子的陸夢衣結了婚。高衡，又名高素明、高理文，湖北人，一九二五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蔣經國關係密切。劉胤，湖北人，大革命時期在武漢做共青團的工作，是漢口團市委委員。趙濟，雲南大理人，早年在上海讀大學，加入共產黨。大革命時期，被派到廣東工作，先做中共廣東區委與上海中共中央之間的聯絡工作，然後在廣東區委和共產國際代表領導下，在楊希閔軍閥部隊中從事策反活動。北伐開始後，在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六軍唐生智部下，任政治部秘書。革命失敗後赴蘇。吳季嚴，又名吳稽天，陳獨秀的外甥(其母是陳的姐姐)。早年在共產黨辦的「上海大學」讀書。一九二六年赴蘇，團結了一批人如江尙師、杜畏之等轉向托派。江尙師，安徽人，大革命時期入共產黨，被派在國民黨中做統戰工作。

爲了安全，他們回國時，一般都化裝成華僑，少數富裕者，繞道歐洲回國，如劉仁靜、吳季嚴等；多數人乘西伯利亞大鐵道到遠東海

參歲，然後持華僑的假護照，坐船到日本統治下的朝鮮仁川，換船直駛上海，如王文元、葉英等十八人。

這批托派分子回國前，曾在莫斯科砲兵學校開了一次會，到會的除了幹事委員會幹事外，還有劉仁靜和各校中國托派負責人。會上集中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回去怎樣工作；二、國內反對派的組織形式。最後決定：一、回國後必須留在黨內。爲了取得繼續留在黨內的權利，不公開自己的立場，即在工作中遵守紀律，服從多數；在思想討論中，應曲折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圖糾正「六大」路線，但應盡量不暴露自己反對派的面目。二、必須以中國共產黨中的一派自居，不要到黨外去組織新黨；萬一被開除，應該在已有的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中工作，不應另立門戶。

這裡，他們遵循的是托洛茨基制定的方針。一九二九年一月，托洛茨基被蘇聯政府驅逐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他就開始聯絡各國托派，籌劃托派國際組織。七月三十一日，他署名「古羅夫」，向法、德、英、美、意、西等國托派組織發出信件，號召同各國的共產黨「進一步劃清思想界限」，並建議對一些問題交換意見，以求通過交換意見，逐步消除分歧，達到思想上的基本一致，爲建立托派國際組織奠定思想基礎。交換意見的問題之一是，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否是「中派」，「它背離馬克思主義」達到何種程度？爲進行這種討論，互通信息，出版了《反對派通報》。

托洛茨基起初是集中力量在法國拼湊起一個直接忠於他的組織，由他出錢，八月份出版了《真理》雜誌第一期。托洛茨基在上面發表文章表示：「我們建議，作爲當前的目標，是在思想、方法和策略一致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國際性派別組織」，即「共產國際的反對派」。出於策略考慮，他拒絕了當時有人提出的立即成立「第四國際」的建

議。他認為當時根本不具備這樣做的條件。

一九三〇年四月六日，托洛茨基終於召集法、美、德、比、西、意、捷、匈等國托派組織代表和法國「猶太反對派組織」代表在巴黎集會，宣布成立了「共產國際左派反對派臨時國際書記局」，同時又宣稱，它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派別」[●]，它的任務是要「改造共產國際」，因此，要各國托派留在或「加入到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中去」。一九三二年，托洛茨基為托派臨時國際起草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左派反對派：它的任務和方法》中，有一章的標題就是：「是一個派別，而不是一個政黨」。所以，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各國托派組織都自稱是各國共產黨內的一個派別，雖然他們早已被有關國家的共產黨開除了。

遵循托洛茨基制訂的這個方針，王文元等人回國後，除了劉仁靜之外，都到中共中央報到。接著，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便約他們在四馬路振華旅館談話，談了兩個下午。談話是在嚴格保密和警衛的情況下進行的。周恩來侃侃而談，給他們分析當時中國的形勢。幾天後，黨中央又在新開路一幢三層洋房裡，舉辦了一次訓練班，讓這些新回國的人熟悉中國實際工作的各種條件。因為這些人，至少已離開中國一兩年，有的在一九二五年就去了外國，所以對中國情形相當隔膜，對秘密工作的一切，更是茫然。

訓練班辦了十多天，由周恩來、惲代英、向忠發（總書記）、項英、羅綺園、顧順章等人，輪流給他們做報告。除了周恩來作政治報告之外，其他人都是報告實際工作經驗，如項英講工人運動，羅綺園講農民運動，顧順章講秘密工作等。當時黨中央知道這批人中有托派嫌疑分子，但並未追究，一是因為多數同志弄不清楚托派與斯大林鬥爭的

● 《第四國際文件集》第7頁，紐約一九七三年版。

全盤內容，二是覺得那主要是聯共內部的問題，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集中全部力量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甚至簡單到每個人參加的實際工作上，再加上當時是艱苦危險的地下鬥爭環境，寧願把這批經過蘇聯訓練而又願意不顧生命危險到黨內來報到的人，當作同志，當作黨的寶貴財富而加以歡迎，因此對托派問題，黨中央採取了「超然的」態度：不管你在莫斯科參加了什麼派，一旦回到中國，只要你誠心誠意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政黨工作，你就是一個好同志。所以在訓練班上，無論是周恩來的政治報告，還是大家的討論，都沒有提到托派的問題，分配工作時也沒有歧視現象。像王文元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直接在周恩來手下工作，吳季嚴在宣傳部當幹事，其他人也都在中央各部或上海幾個區委機關，各有所得，當時中央工作人員每月生活費是二十五元，區委會的同志為十九元。這個數目約等於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如有特殊需要，如疾病之類，或有家屬而「住機關」者，則有額外補貼。這點生活費雖不寬裕，卻足夠維持。

他們的工作安排以後，除個別人如劉胤、趙濟藉故未到所分配的滬東及浦東區地委報到而自動脫黨之外，都執行既定的方針，服從黨的領導，「積極」完成各項任務，取得信任；同時，他們又兩週一次定期與「我們的話派」聯絡、交流情況，以不被黨開除為原則，小心謹慎地進行托派活動。當時的主要活動是以托洛茨基在國際「六大」前後寫的兩篇綱領性文件為材料，加強對托派在中國革命問題之基本的系統的理論的學習、翻譯、研究和宣傳，以早日制定出中國托派的綱領，同時也重視組織發展工作。

莫斯科歸國留學生托派活動的加強，很快在中國發生重大影響，它不僅加速了陳獨秀等一批黨員幹部轉向托派的進程，使他們完全從

黨內分裂出來，而且也大大加強了中國托派的發展，使它很快發展為一個有綱領、有領導、有系統的全國性的政派性組織。

第二章 陳獨秀誤入歧途

第一節 「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領導」

中國托派在莫斯科留學生中產生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一大批在大革命時期中共黨內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的幹部，也在思索著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尋找革命新的出路。

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陳獨秀正式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九月十日，他和秘書黃文容等人化裝後秘密登船，由武漢來到上海，過起了漫長的隱蔽生活。因為國民黨政府懸賞萬金，要緝拿這位「共黨首禍」。

九月下旬，中共中央也遷到上海。這時陳獨秀雖然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在他身上有些不滿，他與中央及國際的關係還是正常的。首先是中央「沒有把他當敵人看待。中央並沒有給他處分，他的待遇還是同往常一樣。」^①瞿秋白等中央領導同志還經常去看望他，向他提供中央文件，徵求意見；每月給他三十元生活津貼費（當時中央工作人員每月二十五元）。對大革命失敗，陳獨秀也主張要檢查自己的錯誤和責任，如他自己所說：「自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

① 〈關於八七會議的回憶——訪問李維漢同志談話紀錄〉，《黨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4期。

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在個人的反省期間。」^①

表面上看，陳獨秀這時似乎有點消極。他多次拒絕共產國際和黨中央要他去蘇聯「討論中國問題」的決定。整天埋頭於他愛好的中國文字學研究。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出版時，瞿秋白請他寫文章，他每期只寫些「寸鐵」一類的小東西應付，署名「撒翁」。這是對他自己所處地位的一種自嘲。但對於國民黨，他決不停止戰鬥。他的「寸鐵」雜文犀利潑辣，像匕首，似投槍，對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等輩，竭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另外，他還寫了一首諷刺國民黨的歌訣，每期《布爾塞維克》上都登載，開頭幾句是：

三民主義，糊塗道地。
五權憲法，夾七夾八。
黨化教育，專制餘毒。
軍政時期，軍閥得意。
訓政時期，官僚運氣。
憲政時期，遙遙無期。^②

對於革命問題，陳獨秀一直沒有停止思索。他密切注視著政治局勢的發展，認真閱讀中央文件，研究各項方針政策，並將自己的意見經常寫信給中央參考。

在這些意見中，有些意見不無可取之處，如他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的看法，認為是「往下落」，是低潮，而不是「往上漲」。這個形

① 〈答國際的信〉（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無產者》第二期。

②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手稿，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日。這首歌訣是印在每期《布爾塞維克》兩頁之間的騎縫裡，所以複印的合訂本內沒有了。

勢估量，與黨中央的觀點完全對立。當時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執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不承認大革命的失敗，錯誤地認為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①，並且在政策上嚴重混淆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線。為此，陳獨秀「寫了不避忌諱的信給中央，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估量那樣快的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估量的那樣高昂。」^②他還對中央「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綱」表示懷疑，認為與國際屢次決議案所說的「民族革命」不同，指出「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急須確定，應迅速由中國黨起草送國際批准」（可見他對國際的尊重）。在廣州起義時，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又寫信給中央，對起義中採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這些口號，殊不以為然，其理由是這些口號離開「無產階級獨裁」並無特殊的意義。這表明他當時仍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革命。

陳獨秀的這些觀察和建議是難能可貴的。因為當時在黨內尤其在中央內部，有這種認識的人極少；有了這種認識也不敢說出來，因為當時中央領導自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正確路線」，如有人對於革命高潮有點懷疑，便要拿「機會主義的殘餘」、「觀念不正確」等罪名加以打擊，大有「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氣勢。

王若飛原來也持革命處於高潮的觀點。有一天，他到陳獨秀家拜訪，談到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時，兩人爭論起來。陳獨秀問他：「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嗎？」這麼一問，使王若飛恍然大悟，但他沒有反

①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室部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

② 〈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

對中央，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破產，共產國際第九次執委會議作出的糾正中共中央錯誤路線的決議案傳到中國時，王若飛才以江蘇省委的名義，起草了一個決議案，接受國際決議、批評中央的「高潮」形勢估計和盲動的策略。

另一方面，陳獨秀的意見中，也露出了取消主義的端倪。

陳獨秀正確地看到了革命正在「往下落」的形勢，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革命應該全面退卻。他不像毛澤東那樣，在承認革命低潮的同時，看到中國的特殊國情，從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出發，把城市的防禦與農村的進攻結合起來，堅持革命的武裝鬥爭；而是教條地搬用西方國家在低潮時的革命經驗，主張在敵人的瘋狂屠殺面前，實行完全的退卻和防禦的策略，「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要動，也「應偏重於經濟的鬥爭」，如「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尤其「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⑥。可是，一個月後，當廣州暴動的消息傳到上海時，他又寫信給中央，贊成舉行廣州暴動，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這是毫無疑義的。」並建議：「在廣州的非戰鬥員悉數遭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而且，「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⑦

這種情況表明，陳獨秀當時的思想是混亂的。這時全黨的思想狀況也是如此。「八七」會議正確制訂了武裝起義的方針，但在執行中，又出現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即使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於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也僅僅是開始。南昌、秋收、廣州等各次暴動，正確堅持了武裝鬥爭的大方向，但又都以城市為中心，農村的鬥爭是

^⑥ 同^⑤。

^⑦ 同^⑤（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

被動的、輔助性的。

針對這種狀況，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決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於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發動全黨來總結大革命及其失敗後一年多來的實踐，制訂正確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以統一思想，整齊步伐，爭取中國革命早日走上正軌。

黨在籌備「六大」時，把陳獨秀當作特邀代表邀請他出席。這表明在盲動主義路線糾正之後，中央及國際對他的意見是重視的。但是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搞文過飾非，把大革命失敗責任全推到他身上耿耿於懷。他強調中國的情況中國人了解，「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領導」。因此，他拒絕赴蘇。但關於自己，他則表示：再不參加黨的領導工作，不為自己辯護，也不出面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字；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①。

從這個表示看，他不願意再捲入到關於自己的無謂的爭論中去，對「六大」能不能解決問題，也持懷疑態度。這是因為據小兒子陳喬年告訴他，他過去以赤誠之心向中央寫信貢獻的意見，非但不為黨中央所接受，而且被當作笑話到處宣傳。這顯然使他寒心。

但是，「六大」不負眾望，制訂了基本正確的綱領，規定了革命的任務仍是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從而肯定了當前中國革命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大會批評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大會在批判大革命時期的右傾錯誤時，就陳獨秀應負責任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

王若飛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對陳獨秀比較了解，友情較深，因

^①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366、367頁，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此對陳獨秀錯誤的批評比較實事求是。他在大會上一次發言，兩次發表聲明，一方面進行自我批評，一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也批評瞿秋白「左」的錯誤。他說：那時，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陳獨秀的右傾思想也很明顯，特別是「五大」召開前夕，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應該承認我在當時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認識陳的錯誤，盲目的信仰執行，自己應負一部分很大責任。」^⑨他還指出，一九二七年瞿秋白主持的「八七會議」和十一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批判陳獨秀的錯誤時，不允許陳參加會議是不對的；陳獨秀據此不參加黨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他還提議選陳獨秀為中央委員。

瞿秋白、張國燾認為他袒護陳獨秀，譏笑他是陳獨秀的「尾巴」。雙方在會下爭吵起來。王若飛對他們說：「革命失敗了，陳獨秀要負主要責任，但我也不是沒有責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後諸葛亮一樣，把責任推給別人，好像自己一貫正確，以布爾什維克自居，請問你們在緊要關頭提出過什麼建議！不過也是跟著走罷了。」^⑩

由於王若飛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鬥爭，「六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在寫到大革命問題時指出，大革命時期的機會主義是發生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沒有採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事隔十六年後，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對王若飛說：你在「六大」時對陳獨秀錯誤採取的態度是正确的。

應該說，中共「六大」這個「決議」，對於陳獨秀來說，是比較公道的。而且，「六大」制訂的路線，即民主革命的路線，與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致中央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六大」以後，他也承認，

⑨ 《王若飛自傳》，未刊稿。

⑩ 李培之（王若飛之妻）：〈飛度關山的人〉，《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四月八日。

六次大會對於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和對於機會主義一樣，「加以相當的矯正」^①。尤其在革命實踐中，「六大」路線的貫徹，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以他所屬的江蘇省委來說，各項工作很快進入正軌。特別是上海的黨組織和群眾組織都有所恢復和發展。工人運動也逐漸復甦，日常鬥爭取勝的較多，如英商電車公司、法商電車公司、郵政系統、怡和紗廠等基層的罷工運動都取得了勝利。絲廠的罷工規模很大。秘密機關比較穩定，破壞比較少。外縣工作也有了開展，省委建立了外縣工作委員會。在南通地區甚至組織了紅軍——紅十四、紅十五軍。在徐海蚌地區（即蚌埠、徐州、連雲港等地）都開闢了工作。京滬線上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等一帶，也都有了黨的組織，開展了鬥爭。甚至在敵人的監獄裡還建立起黨支部，與獄外相結合，進行巧妙的獄中鬥爭和營救活動。所有這些說明，只要路線正確，策略對頭，排除「左」的干擾，把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區別開來，把非法鬥爭與合法鬥爭結合起來，那麼城市鬥爭是可以有所作為的。陳獨秀的取消主義主張和托派把一切鬥爭都視為「盲動主義」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尤其可喜的是南方，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利用新舊軍閥混戰的時機，正在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所有這些情況，陳獨秀是知道的。況且，王若飛又對他做了工作。王在參加中共和共產國際「六大」後，自請留蘇學習，加強自己的理論修養，進了列寧學院，共產國際又指派他為代表中國農會駐農民國際的代表，與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余飛五人，合組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他很想把「六大」情況轉告陳獨秀，幫他放下包袱，積極投入新的革命鬥爭中來。一天，他找到即將回國工作的東方大學

① 〈關於中國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學生彭健華。要他回上海後，務必找陳獨秀談談，勸陳切不要消沉，並動員他還是到莫斯科去，和蘇聯黨內的負責同志把過去的問題詳細談談，在莫斯科住個時期，總結一下前段工作，作點理論上的研究工作，以便將來繼續對中國革命作出貢獻。還說，蘇聯黨內對中國革命問題，對中國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所採取的措施，都存在不同的意見，以解除陳獨秀到蘇聯後必然挨整的顧慮。

王若飛用牛奶汁給陳獨秀寫了封信，托彭健華轉。彭不慎，在旅途中烤火時，信經火烤字跡顯露出來，彭怕出事，將信燒了，決定口頭轉達。到上海後，彭兩次向陳獨秀轉達了王若飛談話和信件的內容。陳聽得很認真，並表示可以考慮王若飛的意見^②。所以他起先是並不反對「六大」路線的，也不參與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為恢復他在黨內領導地位而進行的宗派活動。他履行「六大」前說的諾言，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分，參加黨的活動，過著平靜的生活。然而，在一九二九年春天，接受托洛茨基主義以後，他的思想就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第二節 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

陳獨秀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是經過他周圍那些熱心宗派活動的人介紹的。這些人，在「六大」以前，都擔任過共產黨中央和地方的領導職務。例如彭述之是湖南寶慶人，最早的中共旅莫支部的領導人之一，後來先後任中共中央教育宣傳委員會委員、中宣部長、順直省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副書記。其妻陳碧蘭，湖北黃陂人，在中央婦女部工作，兼上海區委婦女部書記。尹寬，安徽桐城人，早年與周恩來、陳

^② 彭健華：〈回憶和陳獨秀的兩次會晤〉，《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延年等一起，赴法勤工儉學，創建「少年共產黨」，是五個執行委員之一，後來做過中共山東地委書記兼濟南團委書記、中共中央局秘書、江浙區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安徽省委書記。汪澤楷，湖南醴陵人，也是旅法「少年共產黨」的執行委員，做過安源地委書記、湖北區委組織部部長、江西省委書記。鄭超麟，福建漳平人，長期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編輯中央機關報《嚮導》、《布爾塞維克》，還做過中央出版部部長，參加「八七」會議。蔡振德，陝西榆林人，曾任湖北省委委員、江蘇省委委員。馬玉夫，湖北襄陽人，做過上海區委委員、上海碼頭工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劉伯莊，四川人，做過中共北京地委書記兼團地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順直省委「前委」書記。何資深，湖南安鄉人，做過湖南省委組織部長及書記、中共中央特派員。任曙，四川人，做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湖北省委代理書記，等等。

他們在過去與陳獨秀接觸較多，崇拜陳的才華，擁護陳的主張，自認為是陳的親信。開始時，他們對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把大革命失敗責任推在陳獨秀身上不滿，更不同意「八七」會議對陳獨秀問題的處理：批判陳的右傾機會主義，並成立沒有陳獨秀的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等於是撤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實際上他們也是擔心對大革命錯誤的批判和對陳獨秀的否定，損害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於是，他們就自稱「陳獨秀派」，進行反對瞿秋白為首的新中央的活動。但是在「六大」前，由於這些人還擔任著各種領導職務，不少人還在外地，所以他們的活動比較緩和隱蔽，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陳獨秀本人也不支持他們。據鄭超麟說，他們曾爭取陳獨秀來領導他們活動，但陳表示消極，「並不鼓動我們活動，也不阻止我們活動」^⑬。所以這

^⑬ 鄭超麟一九四五年寫的《回憶錄》手稿。

時他們自稱「陳獨秀派」，卻是「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

「六大」以後，瞿秋白、王若飛、張國燾被留在莫斯科學習和工作。總書記向忠發、宣傳部長蔡和森等人回國。但不到一個月，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錯誤被撤職，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員犧牲、變節、消極，李立三由候補中委上升為正式委員，並任宣傳部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領導人，而且，他們又都在「六大」前後失去了黨內重要職務，紛紛聚集到上海來，於是他們就積極活動起來。

首先是汪澤楷，他參加「六大」後一回國，就去看望陳獨秀，報告了「六大」情況，然後鼓動陳與他們一起行動起來。但是，陳獨秀斷然拒絕。因為他認為「六大」路線，在基本上還可以接受，沒有反對黨中央的理由，更厭惡爲了恢復自己的領導權，團結一部分親近的人，在黨內進行秘密的小派別活動。他真誠地希望批判他和擁護他的人能團結起來，恢復過去的工作精神，開創革命的新局面。

陳獨秀這種態度，反映了他一貫光明磊落的品質。李維漢說他是我黨早期犯錯誤領導人中，少數幾個不搞陰謀的人之一。魯迅先生說得更形象：「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①

與陳獨秀相比，那些人就顯得很不光彩。當時他們完全是爲了個人利益進行無原則的派別活動。鄭超麟也承認，我們這時反對中央，「與其說有什麼路線或理論的鬥爭，寧可說只有人事的鬥爭。我們仍未拋棄恢復陳獨秀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幻想。」^②所以，周恩來在分析這

① 《魯迅全集》第6卷第56頁。

② 同①。

幫人與托派結合原因時指出：「大革命失敗以後，許多國共合作時代的動搖分子，有脫離工作的、有堅持地方觀念的、有固執自己錯誤的，這些在組織上並未克服。他們專以個人的小問題鬧無原則的糾紛，而反對派就抓住了這些不滿意黨的路線的分子，利用這種無原則的鬥爭，以進行其反黨的活動。」^⑯

這個所謂「陳獨秀派」參加的一個重大活動是「江蘇省委獨立事件」。

一九二九年初，李富春為書記的江蘇省委，在政治局委員、原省委書記項英的支持下，對抗中央派人加強省委領導的措施，宣布「獨立」。省委組織部長何孟雄也參加了這個事件。據鄭超麟說這次事件「不是什麼原則的衝突，而是人事的鬥爭」。不過為了宣傳他們的行動是正當的，以爭取黨內的同情，他們也製造了一些藉口。

「六大」後，中共中央為了執行「奪取群眾」的中心任務，決定全力整頓全國各重要區域的產業支部，並把江蘇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為江蘇有全國第一個產業區域經濟中心——上海（當時上海黨組織屬江蘇省委領導），有全國第一個政治中心——南京。中央決定派一個政治局委員去做江蘇省委書記，擴大省委的力量；江蘇省委同意中央對省委的批評（力量薄弱）和加強省委的意見，但反對中央派人去當省委書記，也反對中央由別處調人去加強省委，主張從江蘇省內部找幹部。中央批評了省委地域觀念後作了妥協，同意省委的意見^⑰。

接著，中央發現省委在上海郵務工人罷工鬥爭中工作薄弱，於是

^⑯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46頁。

^⑰ 李立三：〈江蘇問題與全體黨員應有的認識——在各省來滬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載《黨的生活》第5期，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決定在即將發動的上海法租界電車工人罷工中，組織一個行動委員會來指導這次鬥爭。此委員會由中央、省委、共青團、全總、上總共同派人組織，又遭江蘇省委反對，認為這個委員會「妨礙了江蘇省委的職權」。於是中央派巡視員視察了江蘇的黨組織和工會，提出兩個辦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消省委和上海市委，將省委幹部分到區委，再由別處調二、三同志，加強區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分人組織省委，同樣將省委分到各區。這兩個辦法正討論而未作出決定時，江蘇省委就表示無論中央怎樣決定，一概不接受，宣布「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拒絕一切指示，拒絕中央巡視員李維漢巡視，要各區委轉移，使中央找不著，同時向在滬各省黨部代表進行宣傳，企圖聯合反對中央^①。因為當時江蘇省委的經費有獨立的來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濟；他們還能單獨與外省黨組織通信，有可能聯絡某幾個省委起來響應，壯大聲勢^②。

江蘇省委製造的藉口是：現在的中央被「廣東派」及「舊中央派」把持，解決江蘇及各省問題是「搶地盤」；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仍是「盲動主義」，只專注農民，忽視工人；中央經濟不公開，中央委員生活奢華等。

中央批評他們的藉口「全是造謠」，是用「派別觀念」和「封建思想」、「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觀察中央；攻擊中央「盲動主義」，則本身就是「不動」，是對大革命失敗的悲觀、動搖^③。

江蘇省委「獨立」後，他們通過省委委員蔡振德、馬玉夫找「陳獨秀派」幫助，特別是在宣傳方面，因為他們缺少搖筆桿的人。李富春還親自登門請鄭超麟，鄭答應幫忙。於是彭述之、鄭超麟、劉伯莊、

① 李立三：〈江蘇問題與全體黨員應有的認識〉。

②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

③ 同①。

汪澤楷、蔡振德、馬玉夫等人連日集合在蔡家，收集研究鬥爭情況，起草了幾篇宣言和決議案，結果由於文件的調子太高，超過李富春、何孟雄等人的政治界限，沒有被接受^①。

中共中央立即召集緊急政治局會議，在批駁了省委製造的謠言之後，決定不採取組織的、紀律的辦法，解決的「原則是教育」，「方法是說服」^②。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出來對江蘇省委做了工作，還召集各省在滬代表開了幾次會，以全黨的名義譴責江蘇省委的行動，擁護中央。在政治局中，也批評了項英^③。最後江蘇省委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放棄「獨立」，接受中共關於「改組省委，加強區委」的辦法^④。

省委改組以後，恢復了日常工作。但是蔡振德和馬玉夫不知悔改，宣布退出省委^⑤。對此事件，陳獨秀的態度依然是不介入。

江蘇省委獨立事件的正確解決，各地黨組織和革命鬥爭在「六大」路線指引下逐步恢復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這個所謂的「陳獨秀派」，本來也是搞不下去的。然而，與陳獨秀一樣，這個派別在接觸到托派文件以後，也死灰復燃了，而且，終於與陳獨秀相結合，成為「托陳取消派」。

第三節 陳獨秀接受托洛茨基主義

一九二九年五月，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首先從歸國留學

① 同①。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李立三：〈編完以後〉（即《黨的生活》第5期「江蘇問題專號」編後語）。

⑤ 同①。

生王平一手中，見到了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幾篇文章。

王平一，山東臨淄縣人，一九二五年進莫斯科東方大學，轉向托派後，在二八年東大中國部解散時，畢業回國，在上海被分配在共青團中央經濟鬥爭部工作，後調做黨的工會工作。同時，他又是黨外的留學生托派組織的成員，把《我們的話》和油印的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文件，秘密傳到黨內。由於出國前，他在山東地委書記尹寬手下工作過，認識尹寬，所以，他先把文件給尹寬看。尹寬看了很受感動，帶著一臉興奮的神氣，跑到東有恆路鄭超麟夫婦、蔡振德夫婦和張以森（何資深的妻子。這時何在山東工作，被捕入獄）所住的一幢三層樓房子裡^①，介紹給他們看。鄭超麟回憶說，這些文件雖翻譯得不好，印得也不好，但看了後，比黨中央秘書處精印的文件和瞿秋白精譯的共產國際通告之類，「給我們更深刻的印象，彷彿有什麼電光閃過我的頭腦」。於是，把他們完全吸引住了。過去他們只知道蘇聯黨內有激烈的爭論，但他們究竟爭的是什麼問題，不清楚，甚至還不知道他們爭的也有與中國革命有關的問題。現在明白了：原來托洛茨基早在革命失敗以前就公開指出布哈林和斯大林應當擔負中國失敗的責任；原來，托洛茨基早在武漢失敗以後就指出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了的。這同陳獨秀和他們所謂「陳獨秀派」模糊的認識相同。他們立即接受了，由此，他們又對進一步研究托洛茨基系統的思想發生了興趣，研究他怎樣來說明上述二個結論。從事實到文件，從理論又回到他們親身經歷和思考過的實踐。最後，他們都很快接受托洛茨基主義了。

尹寬拿托派文件給鄭超麟他們看時，也拿給彭述之夫婦、汪澤楷

^① 這幢樓原是江蘇省委的，蔡振德和馬玉夫退出省委後，省委為照顧二人生活，把這房子連同傢具，讓給蔡振德住。然後鄭超麟夫婦和張以森帶著一個兩歲女孩搬進馬玉夫原有住所，經常到這兒來聚會。

夫婦和劉伯莊、陳獨秀等人看。彭、汪二家住在提籃橋昆明路一幢房子，陳獨秀常到那裡去。當時陳獨秀的住址是保密的，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彭述之等人也很快接受了，但陳獨秀這次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謹慎，抵抗得最長久。他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意見，與彭述之、尹寬、汪澤楷等人辯論；但他下次來時，就放棄他上次的不同意見，而以他們所說意見為基礎，提出進一步的不同意見；他們進一步說服他，當場他沒有接受，可是再一次來時，他又以上次他們的意見為基礎而再進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見了。這樣，一步一步深入，但最後，還有個別問題，如革命性質及新政權性質（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陳獨秀仍沒有被說服。在這個辯論過程中，陳獨秀不僅口頭說，而且有時還寫了書面意見或文章。其中一篇叫〈論中國革命的性質〉。雖然這些文章沒有發表，也沒有保存下來，但從他接著寫給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信中，從他和劉仁靜等人的爭論文章中，可以看到這位中國近代叱咤風雲的思想家走向接受托洛茨基主義的軌跡。

陳獨秀看了托洛茨基寫的文章後，首先被托氏關於中國大革命的論述深深打動。他驚喜地發現，大革命時期，自己提出的先是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來又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原來與遠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謀而合；而正是因為這種主張被共產國際一再否定，才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由此可見，他原來的主張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正確路線」。於是，陳獨秀恍然大悟：「當你們（指共產國際）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他極口稱讚「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⑦後來他回顧說，只是由於得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文件，「從此以後，我們才徹底的系統的了解在中國革命中所

犯的機會主義之真實根源所在。」²⁷

根源何在？他認為以「階級聯盟」政策代替了「無產階級獨立的領導革命」政策，「是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根本政策之錯誤」²⁸。由此，他改變了原先對「六大」所作的評價，認為「六大」未曾把機會主義「錯誤之根由系統的徹底的指摘出來，遂至留下現在的禍胎」²⁹。

按照陳獨秀的邏輯，「國共合作」政策是一錯再錯，黨的機會主義路線貫徹大革命的始終，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歷史事實的。衆所周知，正是由於共產國際的倡議和支持，中共決定黨員加入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階級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從而推動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周恩來說：「當時是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是歷史上空前的。」³⁰黨本身的組織力量，也由「三大」時的只有四百三十二個黨員的小黨，迅速發展到「五大」時擁有五萬七千九百餘黨員的大黨。這次大革命，在終於失敗之前，「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³¹

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有正確和錯誤兩個方面，要進行具體分析。過去全盤肯定共產國際，而把錯誤全推在陳獨秀身上是不對的；現在有些人又全盤否定共產國際，也是片面的。

大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國共合作革命統一戰線本身，也不在

²⁷ 〈答國際的信〉（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

²⁸ 同²⁷。

²⁹ 〈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³⁰ 同¹¹。

³¹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69頁。

³²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於這種統一戰線採取「黨內合作」還是「黨外合作」的形式，而在於在統一戰線中沒有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領導權。在這個問題上，共產國際及其在中國的代表是有右傾錯誤的。他們正確地看到了孫中山國民黨有革命性的一面，提倡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與其合作，也提出了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但是，對蔣介石、汪精衛等右派的反共性質估計不足，失去警惕，沒有在具體的政策策略上落實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這個錯誤是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陳獨秀。

但是，也要看到，陳獨秀犯錯誤又有其本身的原因，那就是「二次革命論」的思想。這個思想認為：「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⑭；「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生這類問題。」^⑮所以，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執行共產國際的右傾政策時，往往走得更遠；而且，以這樣的思想領導大革命，即使採取「黨外合作」的形式，甚至不實行「國共合作」，陳獨秀同樣會放棄革命領導權的，又怎能不失敗呢？

因此，從主觀上檢討，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要負主要責任，陳獨秀也並非沒有錯誤，對此，他始終沒有足夠的認識。

另一方面，也必須指出，對於陳獨秀執行共產國際路線，也要進行具體分析。他在執行正確的共產國際決定和指示時，創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如推動國共合作的實現、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成功等，但在執行國際錯誤指示時，如「三二〇」事件時對蔣介石讓步，「四一二」事件前，反蔣鬥爭不要倉促公開進行，

^⑭ 〈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二號。

^⑮ 〈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嚮導》第172期。

把武器隱藏起來等，也加進了他自己的許多色彩，深深地打上了陳獨秀的烙印。這是因為陳獨秀不是一個照本宣科的平庸之輩，更不是共產國際手中的一個木偶，他有獨立的思想，有領袖才華和倔強的個性，又有在中國黨內崇高的地位和影響。所以，他在執行國際路線時，不管是正確還是錯誤，都並非處於絕對服從的境地，更不是如他自己所說，他是在「尊重國際紀律」、「服從國際命令」，被迫放棄自己原來正確意見的情況下，執行國際錯誤路線的，而往往加以主觀的發揮和「創造」。所以，陳獨秀在歷史上的表現，又能立大功，還會犯大錯。馬克思說：「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喜劇出現。」^②陳獨秀就是這樣一種偉大人物，不過在他一生中，悲劇和喜劇，不止出現過兩次。

然而，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在大革命失敗根源問題上，陳獨秀投向托洛茨基懷抱，只是他轉向托派的開始，「悲劇」的啓幕，更嚴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理論路線上的全面轉向。

從八月到十月，陳獨秀給中共中央寫了幾封論述當前中國革命的信，其觀點都來自托洛茨基那兩個被中國托派稱為綱領的文件，例如：

關於中國社會性質：陳獨秀認為，「中國的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已顯然不能夠以農村經濟支配城市，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而且，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使社會關係發生了「大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它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打擊，……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它為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⑩為此，他在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組織部長周恩來辯論關於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比重問題時，反對「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的說法。

中國托派就是由此出發，得出了一系列錯誤的結論，輕視反封建的任務，從而輕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鬥爭失敗的情況下，反對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

關於革命性質和任務：托洛茨基聲稱，要解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完全要歸於無產階級專政」，攻擊「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他的根據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約有半年時間主要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而在中國未來的革命中，托洛茨基認為連這樣一個「民主」的時期都沒有，「將被逼於一開始就要最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對此，中國托派認為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轉變得比較勉強。他接受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民主任務的觀點，反對「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同時也不贊成「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觀點，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須用一段時間（那怕是很短的）專門用來徹底完成民主任務，再接上社會主義的任務，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下，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面走到社會主義道路^⑪。——這恰恰是他當年致中央信中談到廣州起義時否定了的主張。這樣，他就

^⑩ 同^⑨。

^⑪ 〈陳獨秀覆劉仁靜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載《無產者》第9期。

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論」一下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一次革命論」上來了。

爲了論述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從托洛茨基、拉狄克到陳獨秀和中國托派，都強詞奪理說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至少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但是，到六七十年代，托派國際——「第四國際」走得更遠。他們承認亞非拉許多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下，還處在封建社會、甚至奴隸、部族社會階段，卻仍號召「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竭力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階段論。巴黎「第四國際書記處」的擁護者聲稱：「沿著階梯一步一步地走，無疑等於拒絕革命」^⑩；「劃分革命階段的公式，是改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想法。」^⑪倫敦的「第四國際委員會」也把「革命分爲兩個階段的路線」稱爲「孟什維克路線。」^⑫

關於革命形勢與策略：托洛茨基認爲中國現在並無革命局勢，「報紙上已經有幾十種消息，證明中國相當的和平及相當的統一，已經使各種各色的經濟生活開始活躍起來，……明顯露出興盛的徵兆。」據此荒誕無稽之談，這位在中國之外根據主觀想像和報紙上片面宣傳來觀察中國局勢的先生開出的藥方是：「共產黨能夠而且應該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的選舉權爲基礎之全權的立憲會議口號。」

陳獨秀也鸚鵡學舌地說中國目前「資產階級政權相當穩定」，「經濟相當恢復」，在目前反革命時期中，應該把「爲召集國民會議而奮鬥」

⑩ 《國際社會主義評論》（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機關報），一九六一年第3期第88頁。

⑪ 同⑩，一九六一年第2期第8頁。

⑫ 《新聞戰線》（英國托派組織「工人革命黨」的機關報），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倫敦「第四國際委員會」是從巴黎「第四國際書記處」中分裂出來的「少數派」。

作為黨的中心口號；強調「只有這一口號、這一運動，才能夠調動群眾，才能夠推動群眾向前鬥爭，才能夠動搖統治階級的威權。」並且，不管國民會議是否能夠召集成功，通過這一運動，把群眾引導到革命暴動，以此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①。

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為中國革命設計的這種通過議會鬥爭的合法運動，過渡到暴動奪取政權的道路，完全是閉門造車。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裡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②因此，在中國，國民會議的主張，實際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張。對當前的鬥爭採取這樣的態度，而又高唱將民主任務和社會主義的任務畢其功於一役，豈不是南其轅而北其轍。所以，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③「『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④

陳獨秀就是這樣，在接受托派觀點後，把原先一些不失為正確的思想拋棄了，而把那些零碎的取消主義的觀點，上升為系統的理論，從而走上了與托派相結合的道路。

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②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0、532頁。

③ 同②第678頁。

陳獨秀和毛澤東在維護民族自尊方面，有共同點，但兩人在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獨立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方面，卻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典型。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一開始就獲得共產國際的指導，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沒有花費很多時間在理論探索上，也沒有在受到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思潮嚴重侵蝕的條件下，就很快採取行動，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高潮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俄國爲此花了一二十年的時間。缺點是中國革命的理論準備不足，造成了一大批缺少和輕視革命理論的實幹家，而缺少像列寧那樣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作爲革命的導師。因此，中國革命的航船在「遙控」下，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險性，有暗礁，不會繞道；有狂濤，不能沖過；有了錯誤，不能及時糾正。最後，大革命終於失敗，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之後，又走過了曲折的道路。

國民黨蔣介石的屠殺，使無數革命者犧牲於迷惘之中，也驚醒了許多倖存者的頭腦。他們痛定思痛，開始認真思考革命的理論問題。雖然當時中國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仍然在按莫斯科的指揮棒轉，陳獨秀和毛澤東則離經叛道，開始獨立思考，摸索中國特式的革命道路了。他們二人本來應該殊途同歸走上一條真理之路的。王文元曾說毛澤東爲人的基本態度及其性格，與陳獨秀有不少共同點。陳獨秀十分厭惡來自外國「毛子」的瞎指揮和那些唯「毛子」是從的「紅色買辦」，強調「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因此多次拒絕到蘇聯去。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冬天，也曾對與他有深交的何資深說過：「革命不成功，我不去莫斯科。」何資深知道他的心思，在分手時，送給他一部亞東圖書館汪原放標點本《水滸傳》和幾幅湖南各縣郵路地圖。毛澤東很重視這兩件禮物，尤其後者，因爲這是大革命高潮時，郵電工人同志送

給黨的非賣品，很難得，其所記村鎮及相互距離，當然比他種地圖可靠得多，對於毛澤東領導紅軍在井岡山地區堅持農村游擊戰爭，幫助極大。同時，他也同樣對那些「紅色買辦」極端鄙視，不過用詞較為客氣，稱之為「教條主義」、「本本主義」。

但是，陳獨秀和毛澤東兩人奮鬥的結果卻完全相反，後者成功了，前者失敗了。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條是兩人走了二條不同的理論創造之路。因為真理來自實踐，只有扎根於實踐的土壤，理論之樹才能常青，而脫離實踐，就會枯萎。陳獨秀由於大革命失敗後一直生活在脫離革命重心（南方農村）的上海大城市，他自認在這個很長的「過渡時期」中，中國沒有革命運動，只有「反革命的全盛統治」，因此他對於中國革命理論的探索，只能從理論（馬克思主義）到理論（托洛茨基主義），而毛澤東則一直戰鬥在農村武裝鬥爭實踐的第一線，不斷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出豐富的新鮮的經驗，敢於檢驗馬克思主義，大膽地肯定和否定，發展馬克思主義，最後終於積累、昇華為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創造出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增添新的明珠。

陳獨秀轉向托派以後，就自然而然地與周圍的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一批人融為一體，「托陳取消派」應運而生，接著，他們就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

第四節 托派排斥陳獨秀

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派以後，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首先由陳獨秀以個人名義，給黨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貢獻「我一年來慎重考察的結論」。他以上述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

命的觀點，猛烈地抨擊「八七」和「六大」以來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集權制」等等，並要求「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妄圖挑起全黨性的大爭論，以托派路線代替「六大」路線。

這時他們並不打算成立獨立組織，而爭取加入歸國留學生的托派組織。因為陳獨秀看到這些年輕人很有革命朝氣，能吃苦。他們回國之初，生活一般都無著落，只得睡水泥地，冬天還穿一件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掙飯吃，抽香煙屁股，還要受到各種欺凌和意想不到的打擊。像區芳，找了一個賣小報的差使，結果被某地段的報霸打了一頓。——就這樣，他們還繼續幹「革命」。而他們是黨內的老幹部，拿著組織上發的津貼，夏有綢，冬有皮，出門坐車，崇尚空談，常常通宵打麻將，養尊處優。對比之下，陳獨秀認為這幫年輕人了不起，打算加入他們的組織，實行兩派聯合。但是，八月份，他們與「我們的話派」談判聯合時，掌握該派實權的那幾位頭頭，卻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倫的眼光來看待他們，不但不歡迎，「而且很厭惡」，認為這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向我們托派投機了」。

在具體做法上，「總幹」內部發生了分裂：梁幹喬、張師（一九二九年初接替陸一淵任總幹宣傳部長）認為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是「企圖消滅反對派」，主張不予理睬；區芳、史唐、張特則要求托陳派在承認他們「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它的組織」^①。

陳獨秀起先同意個人分別加入「我們的話派」的方案，但是彭述之、尹寬堅決反對，認為他們「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

^①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載《反對派內部生活》（「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報）之二，油印件，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只能受我們領導。」^①這樣，八月份的談判沒有結果。

恰在這時，在蘇聯的秘密托派劉仁靜回到國內，他向中央代表憚代英公開表明托派觀點，並說要以書面形式，就革命的根本問題，向黨表示自己的意見，然後就脫離組織，自由活動去了。他回國時，曾繞道土耳其拜見托洛茨基。除了梁幹喬外，他是中國托派中受過托洛茨基接見的第二個人。托洛茨基親自起草了中國托派「政綱」——《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派（反對派）綱領》，由劉仁靜帶回中國。托還給劉起了「列爾士」(Lels)假名，委他充當托洛茨基與中國托派之間的「通訊員」。

所以，劉仁靜回國後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調解「我們的話派」與「陳獨秀派」的關係。他在中共建黨初期一度是團中央的負責人，與陳獨秀的關係很密切。兩人還一起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他向陳詳細介紹了拜見托洛茨基的情況和托氏起草的中國托派政綱的內容。陳委託劉向「總幹」表示：他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此議被「總幹」拒絕^②。

九月，「我們的話派」在上海惠中旅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史唐、區芳（在大會上當選為宣傳部長）主持下，排除了梁幹喬一派的意見，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

(一)公開宣布斯大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

(二)公開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

^① 同^①。

^②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列爾士：《反對派統一運動的前途》（油印小冊子）。

(三)公開解散自己的獨立小組織⁴⁷。

劉仁靜由於回國後違反繼續隱蔽在黨內活動的原則，被排斥在「二代會」之外，但可以列席「總幹」會議。陳獨秀就托劉向「總幹」提議，陳獨秀派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我們的話派」。劉仁靜則根本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他另提出召集參加「二代會」的代表舉行「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政治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參加領導。他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只可以說是全為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議均遭總幹拒絕⁴⁸。他們堅持上述三個條件。

於是，陳獨秀憤怒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說「我們的話派」組織內部不准自由討論，我們加入無益有損；「乳臭未乾，猴兒崽子，……想學斯大林，未免過早了。」他終於與彭述之等人，正式組織起了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出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⁴⁹；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搞「門羅主義」⁵⁰；還請劉仁靜參照托洛茨基寫的中國托派政綱，起草托陳取

⁴⁷ 〈「我們的話派」致托洛茨基的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載《反對派公報》（俄文）第九期（一九三〇年二、三月合刊）。

⁴⁸ 同⁴⁷。

⁴⁹ 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何之瑜：《關於陳獨秀的托派活動》。陳碧蘭：〈彭述之的思想與他在中國共產黨以及托洛茨基運動中的作用和活動〉，載中島崑雄編：《失去了的中國革命》（彭述之選集）第184頁，一九八〇年東京版。

⁵⁰ 門羅是一八一七～一八二四年的美國總統，他在一八二三年向國會提出一個咨文，其中制訂了美國對拉美政策的原則，被稱為「門羅主義」。當時拉美各國紛紛獨立，為防止歐洲「神聖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美國以「保護者」的姿態出現，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這在當時對防止歐洲列強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為美國長期侵略奴役拉美的一個工具。

消派的綱領。

就這樣，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的第二個小組織成立了。時間是一九二九年九月。接著，他們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面加緊了在黨內的分裂活動：

尹寬起草了「宣傳大綱」，寫得很長，油印成一本好多頁的小冊子，作為小組討論的依據和對外宣傳的材料。他們把「我們的話派」散發流傳的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章蒐集起來，鉛印出版，名為《中國革命問題》，一共出了兩集。此外，他們還出版油印的無名刊物。

第五節 托陳派被中共開除黨籍

他們一面分頭對上海本地的黨員和外地來上海的黨員進行宣傳，拿托洛茨基的文章和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給他們看；一面把原來的陳獨秀派和新影響來的人編成小組，學習和討論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主張，並在支部會議上，就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同其他人及江蘇省委和中共組織部派來的代表進行辯論。

九月二十日，在中共江蘇省委召開的「支部幹事會及中央、省委、區委各代表聯席會議」上，彭述之三次發言，與中央宣傳部秘書惲代英同志辯論，攻擊中央一年來的政治路線是「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之繼續」；聲稱他們與中央路線上的對立「是沒有不可以的」，「應該的」；誣蔑黨的「鐵的紀律」是「廢話」、「官僚們壓迫群眾」的工具。

托陳取消派的挑釁，的確在黨內造成了思想混亂，「引起了中上層幹部內一次軒然大波」。於是，他們就乘機加緊進行組織上的分裂活動。

他們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托派。這方面最突出的是馬玉夫。他是江蘇省委中負責工人運動的幹部，認識許多工人同

志和工人支部的負責人，此時他雖已退出省委，黨內關係仍舊存在。他爭取了《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工人支部；又爭取了許多個別工人同志，有鐵路工人、電車工人、紗廠工人、印刷工人、建築工人等等；還爭取了外地駐上海長期工作的幾個幹部。

《時事新報》社原共產黨工人支部書記是屠仰之，浙江海寧人，大革命時在杭州活動，失敗後來到上海，進《時事新報》社當排字工人。受馬玉夫影響轉向托派後，他還想把整個支部都拉過去，鄭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報社大廳裡召集了幾次報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二十多人參加，鄭超麟在會上講話，宣傳托派立場，反對中央的路線，多數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後，解散了這個支部，開除了屠仰之，於是這個支部就被托陳派接管。爲了鞏固托派的影響，馬玉夫和鄭超麟商量後，帶著屠仰之和二個支部幹部去同陳獨秀談了一次話^①。

綢廠工人支部書記是杜培之，江蘇鹽城人，也受馬玉夫影響後轉向托派，並把支部全體成員拉了過去。接著杜培之就作爲工人代表參加托陳派領導機關。

彭述之和汪澤楷被分配在外地來上海的黨團員中間活動，也拉過去幾個人，甚至通過馬任之把滬濱書店爭取過去，爲他們服務。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彭述之的小同鄉，大革命中加入共產黨，隨北伐軍到福州，領導那裡的國民黨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後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一九二八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委託辦了滬濱書店，任經理，楊獻珍當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的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進托陳派，運動楊獻珍時遭到了拒絕。不久，楊獻珍去北

① 參見鄭超麟：《回憶錄》及《陳獨秀與托派》。

方工作，滬濱書店就全由馬任之控制，成爲托陳派的一個支部^①。

此外，其他托陳派成員也都利用各自的關係，千方百計地爭取人。如鄭超麟利用其愛人劉靜貞是雲南人的關係，在駐上海的雲南同志中活動，其中有一個是雲南省委派來上海同中央接頭的代表。鄭超麟還與在印刷工人和鐵路工人中活動的幹部建立聯繫，定期見面，在工人中講課，講大革命失敗後的理論和策略問題，與中央的路線唱對臺戲^②。

中共中央一開始就對陳獨秀等人非組織的派別活動進行教育。早在六月份，即陳獨秀等人與托派接觸之初，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就指出托派活動侵入黨內的嚴重性，要求全黨提高警惕。

八月十三日，黨中央專門發出了第四十四號通告——《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現在中國機會主義思想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正憑藉著托洛茨基的理論……反對現實黨的路線，企圖掩蓋過去的機遇主義錯誤」；我們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主要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同時要從組織上「堅決地消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③。

對於陳獨秀「八·五」信中的錯誤意見和無理要求，中共中央理所當然地加以拒絕。八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與黨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批評陳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因爲「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中央不能在黨報上公布他的信件。陳

^① 參見鄭超麟：《回憶錄》及《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的早期歷史》。後來滬濱書店被國民黨封閉，馬任之脫離托派，參加國民黨部隊。

^② 同^①。

^③ 《紅旗》第43期，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出版。

獨秀指責這是「用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⑤。於是他宣布，「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們傳觀我的信稿」，進一步將他們的小組織活動升級。中共中央注意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為了維護黨的紀律的嚴肅性，為了在當時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持革命鬥爭，消除傳閱陳獨秀致中央信可能在黨內造成的思想混亂，向全黨表示中央對陳獨秀八月五日來信的態度，在十月五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⑥，批判陳獨秀八月五日的信「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極可恥的取消主義！」決議在逐條批判陳信觀點後指出：「這是很明顯的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決議特別譴責陳獨秀「在未經中央決定以前，把他寫給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間宣傳」等「小組織行動」。黨把陳獨秀在組織上的分裂活動看得更為嚴重，因此決議最後決定：「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予以組織上的制裁。二、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三、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第二天，中共中央據此決議精神，致函陳獨秀，向他發出「書面警告」，指出：「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

^⑤ 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⑥ 《中共中央文集選集》(5)，第394頁。

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中央重申公布陳獨秀的信「有妨害於對敵人的鬥爭」，決定陳「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要他作一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並編入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生活。

可是，陳獨秀在十月十日覆信中央時，卻反過來向中央作「最後的警告」，表示決心「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

中共中央見陳獨秀他們如此我行我素，不思悔改，便開始採取組織措施。十月二十五日，先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舉行聯席會議，通過《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指出江蘇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中央所指出陳獨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錯誤，就是他們的共同的觀點，他們並且拿陳獨秀的信來向黨內作宣傳與活動，煽起同志對黨的懷疑，經過黨幾次的解釋，不僅不能接受，並且連省委限期要他們把意見寫出交來，不能在下邊自由的宣傳的決議，他們都認為是「命令主義」，馬玉夫甚至說這是「蔣介石的辦法」。他們積極的進行小組的活動，企圖使黨分裂^①。決議最後批准閩北區、滬中區區委的要求，開除彭述之等四人的黨籍。同時，中共中央直屬支部作出了開除王平一黨籍的決議。

這些決議在提請中共中央審批時，還要求中央開除陳獨秀。

很清楚，這是對陳獨秀等人的最後警告了。他們理應懸崖勒馬。但是，他們顯然覺得自己有國內外托派勢力的背景而有恃無恐；陳獨秀與彭述之竟然在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聯名致中央的信中，又對

^① 載《紅旗》第52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中央進行了一系列的攻擊，宣稱：「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經預先見到你們不正確的政治路線之發展和你們真正的政治面目。」最後，他們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黨示威，並宣布：「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

顯然，這種情況表明，陳獨秀等人與黨的關係已經發展到政治上組織上的全面對抗，矛盾不可調和了。

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終於通過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批判陳獨秀屢次拒絕共產國際及中央決定，拒絕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後兩封信中，「公開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黨所開除的托洛茨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決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接著，在十一月下旬，中共江蘇省委召開了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擁護中央反對托派的方針，擁護開除陳、彭等人，並作出決議開除了省委委員羅世璠。會後，又經江蘇省委批准，滬東、滬西、法南、閩北各區委支部，分別開除了鄭超麟、劉伯莊、尹寬、李季、陳碧蘭、杜琳、謝莊、薛農山等人。因為他們對於中央開除取消派領袖陳獨秀、彭述之等人「或始終表示懷疑與藉故反對，或公開破壞黨的決議，而終則完全走上取消派反革命的道路，甚至有些分子秘密印刷傳單咒罵全省二次代表大會與全黨同志。」^①

① 同①第65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其中李季，湖南平江人，一九二一年曾隨陳獨秀在廣東政府中做教育工作，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進上海大學教經濟學。他雖加入共產黨，但對政治不感興趣。大革命時，兩湖農民運動轟轟烈烈，他卻躲和平江一個山廟裡寫《馬克思傳》，到革命失敗時才寫完，下山來，由族長保護，才免於被白色恐怖吞沒。由於他在中國歷史和社會經濟上的觀點傾向於托派，就加入了托陳取消派。杜琳是汪澤楷的妻子，湖北人，是汪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長時結識的，後來二人又一起轉向托派。薛農山又名薛鐵珊，蘇北人，《時事新報》社的總編。該報社的共產黨支部被馬玉夫和支部書記屠仰之拉進托陳取消派時，他也受影響，加入進來，從而使《時事新報》社完全成爲托派的一個據點^①。接著，薛又任托陳派組織法南區（法租界南市區）的負責人。

據當時與陳獨秀在同一個支部——閩北文化支部的柯柏年回憶：「那時，我們是地下黨，從陳獨秀開始，一批一批開除托派，不可能做仔細的工作。在支部開會時，黨說他們是托派，非開除不可，我們就舉手同意，幾乎沒有人反對。」^②這也說明，托派在黨內多數人面前，沒有影響。李維漢（當時任中央巡視員，聯繫上海的工作）也說：托陳派「有個陰謀要打進上海的黨組織裡，除了個別街道支部受到一些影響以外，上海黨的組織抵制了這種分裂活動，從整體來說，他們的陰謀並未得逞。」^③如托派骨幹陸一淵，赴蘇聯前在滬江中學讀書時，爲了掙一點稿費，常向《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專欄投稿，學杜甫，

① 黃理文：〈一九三〇年江蘇省委和閩北區委的一些情況〉，《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一年第3期。

② 〈訪問柯柏年談話記錄〉（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唐寶林訪記。

③ 〈李維漢同志談一九二九年時的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一年第3期。

寫些詩詞之類，與柯柏年認識。回國後向柯宣傳托派主張，就受到抵制。

有的轉向托派，有的繼續跟黨走，朋友斷交了，甚至有的夫妻也分手了。尹寬的愛人王辨是山東共產黨組織創建時期老黨員王翔千的女兒。一九二五年，尹寬在任山東地委書記兼共青團濟南市委書記時，王辨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共青團員。父親是個清朝秀才，特別疼愛女兒，把她當作掌上明珠，介紹到青年團中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託很大的希望。可是，王辨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尹寬在會議上講話，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著，表現十分佩服的神氣。她似乎把尹寬看作馬克思主義的化身，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也以爲是尹寬的功績，對尹寬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感知了王辨的感情，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當他奉中央命令調到上海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辨，要她隨著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簡單的衣服，跟他走了。結果鬧了一場風波。

山東的黨員同志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同志的女兒王辨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要帶刀來上海，同尹寬拼老命。山東的同志都支持他。

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當然不會對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這件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也不能置之不理。王翔千和山東同志看見中央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寬和王辨正式舉行婚禮，而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和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出來做證婚人。中央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掛了一段時間。陳獨秀本來主張戀愛婚姻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肺結核，大口吐血。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

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的工作，王辨去莫斯科讀書。雖然沒有開除尹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尹寬和王辨的感情依然十分深篤。特別是王辨，尹寬吐血以後，她盡力服侍。尹寬當時擔心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問王辨：「我死了，你怎麼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嗎？」王辨搖搖頭，表示「你死了，我終身不愛人。」後來爲了服從組織決定，她才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在莫斯科，男多女少，而且十分懸殊。國內有愛人的姑娘，在男同志的圍攻下，一般都要「倒戈」，另擇佳偶。尹寬在國內爲此寢食不安。他同王辨經常通信，表示這種憂慮。可是，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兩年，經常有人從莫斯科開會回來的人，都批評尹寬不對：「你擔心王辨愛了別人，可是她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心念念不忘尹寬；好多男同志都追求她，她都不理會。」事實上也是這樣。似乎當時，在莫斯科，王辨是未曾「倒戈」的唯一女同志，在思想上，她也沒有轉向托派。

可是，王辨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難環境，她和尹寬倆人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碰頭。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敘舊情。只有一天，稍有閒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同王辨倆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

誰料好景不長。不久，安徽的共產黨組織被國民黨特務破獲，王辨和另一女同志被捕。尹寬還支持了一個時期，以後也逃到上海。

王辨被判短期徒刑，出獄後到上海時已是一九二九年秋天。這時，尹寬和陳獨秀、鄭超麟他們已轉向托派，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黨

中央向王辨介紹情況後，勸她不要與尹寬見面。她堅持要見，終於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尹寬住處，二人相見。這時的王辨已經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澀，增長了識別是非的才幹。她當即與尹寬及在場的鄭超麟夫婦爭辯起來，堅決反對托洛茨基和所謂「左派反對派」，勸他們回到黨的路線上來。她見沒有說服尹寬和鄭超麟，就去鼓動鄭超麟的愛人劉靜貞，去反對他們，結果完全失敗。於是，她就拂袖而去，再也不與尹寬見面。尹寬則一直希望與她破鏡重圓，直到五十年代，被關在監獄裡時，還在打聽她的下落。

這是因托派分裂黨而同時使家庭破裂的典型，當然，也有像彭述之夫婦、鄭超麟夫婦等，一起轉向托派，又共同堅持到底的典型。

不過，對於開除陳獨秀等人，黨內並不是沒有人表示異議。一九二〇年中國共產黨籌備時期任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翻譯的楊明齋，因不滿蘇聯當局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措置，一九二八年辭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的職務，來到中國平津地區工作，公開的職業是中學教員。當他聽到陳獨秀與黨中央鬧矛盾時，曾表示要到上海來進行「調解」，為中共順省委所阻止，告訴他黨中央與陳獨秀之間的問題不是偶然的誤會造成的，也不是僅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而是重大政治路線鬥爭，是不能靠調解解決的。但是他認為共產黨的同志是一家人，意見不同不能分家，以減弱自身的力量，給敵人可乘之機，尤其不能隨便開除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創始人。他的意見，被中央斥為「調和主義」。待中央開除陳獨秀以後，他便辭去冀東豐潤縣中學國文教員，隻身偷越國境，進入西伯利亞，想到莫斯科找共產國際，為陳獨秀說情。他以為共產國際經驗學識豐富，許多人也認識陳獨秀，不會採取極端的態度。他到伯力後，人被留住，報告書遞到了共產國際。

這時共產國際執委會也接到了中共中央的報告，並立即作出答覆，

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經中共中央轉給陳獨秀一封電報，說：國際「決定予你以機會來參加本政治局審查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除你的黨籍決定的會議」；「如果你對此提議置之不理，……這一問題將提到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日程中去討論。」^⑫這是共產國際給陳獨秀的特殊待遇。

不過，陳獨秀對此並不抱幻想。二月十七日，陳獨秀寫了回信。他在全面猛烈抨擊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路線後宣稱：「關於這些根本問題，我和你們實有不可調和的不同意見。……這些根本問題決不是調我個人到莫斯科便可解決的，而且這是官僚的辦法。」^⑬

就這樣，陳獨秀無可挽回地被開除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雙方對此都不可能有別的選擇：不能企望托陳派不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路線，不進行小組織活動；也不能設想黨能容忍托陳派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這是一個關係到黨的存亡和革命成敗的大問題。

^⑫ 陳獨秀《答國際的信》附件。

^⑬ 《無產者》第2期，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出版。

第三章 四分五裂勉強統一

第一節 虛張聲勢的「無產者社」

陳獨秀等人被開除出黨，托陳派在黨內的活動和發展基本結束了。他們與共產黨的矛盾，由黨內的路線分歧，變成了黨外關於如何推翻國民黨統治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應該說，還是屬於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得到了鞏固，然而，黨內清除托派的鬥爭，並沒有就此完結，還繼續了一個時期；而批判托派的鬥爭，卻一直沒有停止過。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托陳派召開了一次會議，正式通過了原由劉仁靜起草、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該件後來被中共稱為「托陳取消派綱領」。意見書猛烈抨擊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路線，要求恢復托洛茨基的黨籍和領導工作，恢復中國黨內被開除同志的黨籍，改組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各國支部的領導，重新決定聯共、國際及中共的路線政策等。

這表明他們當時執行的也是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的方針，即從共產國際和中共內部奪取領導權，而不是獨立組織新黨。為此，他們甚至不承認自己已被開除，仍自認為是中國黨內的一個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並以有如托洛茨基、陳獨秀這樣的領袖而自豪^❶。

❶ 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

會議正式選舉了「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秘書長吳季嚴。不久，杜培之去做了強盜，在一次搶劫中被捕槍斃，由羅世藩補上。

他們把下屬成員編了幾個支部。據說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初托派統一時，該派發展到一百人左右，在北平、香港都成立了區委，上海則設置了滬東、滬西、法南（法租界及南市）三個區委^②。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托陳取消派的機關報《無產者》創刊。在討論刊物名稱時，鄭超麟提議用《無產階級革命》，後來決定用《無產者》，是模仿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日內瓦主編的地下刊物名稱。從此，托陳派又被簡稱為「無產者社」，而正式名稱還是叫「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這就是「無產者社」的來歷。

陳獨秀在《無產者》創刊號寫的〈本報發刊詞〉中宣稱：「本報的責任就在團聚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在國際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領導之下，徹頭徹尾地掃除現在國際及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之機會主義的路線，盲動主義的策略和官僚主義的黨制。」同時，他又在上面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的長文，認為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在「走向逐步統一與相當的穩定」，主張無產階級應極力要求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抨擊共產國際和中共對革命形勢的估計（革命形勢在兩個浪潮中間）和策略口號（蘇維埃）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是從「左」的方面「消極抵制」國民會議。

在《無產者》第2期上，陳獨秀又發表了一篇使他一直蒙受惡名的文章〈關於所謂「紅軍」問題〉，以教條主義的口吻，著重攻擊中共

^② 同^①。

正在把工作重點移向農村的轉折。文章從所謂的西歐和俄國革命經驗出發，攻擊中共領導農民做游擊戰爭是「背叛」中國工人運動，攻擊紅軍大部分是「土匪與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被統治階級擊潰或收買；(二)因自己內訌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被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

以上這兩篇文章，是托陳取消派反對中共堅持農村武裝鬥爭路線的代表作，發生了深遠的影響，集中暴露了托陳派取消革命的真面目。托派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離開城市工人運動這個中心，而到農村去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農民的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土匪黨」^③。

《無產者》是中國早期托派中最早鉛印的刊物。印刷「是通過一個由馬玉夫從共產黨中拉入托派的印刷工人王成偉聯繫的。」但是只印了二期，第三期印刷時被國民黨特務發現，稿子沒收，追究到王成偉，被捕，判了半年徒刑，以後他就與托派斷了關係。所以第三期以後，全是油印的。

托陳派成立後的活動經費，包括鉛印油印的費用，主要由陳獨秀利用他的社會關係籌措的，隨著活動的開展，捉襟見肘，日感困難，他們曾派李仲山去西北籌款。李仲山是陝西潼關人，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儉學，一九二一年回國。一九二四年參加馮玉祥的北京政變，推翻了曹錕、吳佩孚政權，歡迎孫中山北上，嗣後他就作為馮部第二軍（軍長胡景翼）的駐滬代表，在北京辦理籌餉等事務。大革命時他傾向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營救過被捕的共產黨員鄭超麟等人。於是，他想通過他們接近共產黨，但是由於鄭

^③ 鄭超麟：《回憶錄》。

超麟等人接著轉向托派，就把他帶進了托陳派。這次他去西北為托陳派籌措活動經費，找了他的老朋友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西安市警備司令馬青苑。但是他的托派身分暴露後，楊虎城就立即叫他離開了。

托陳派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草成後，在黨內徵集簽名者花了三個月，才公布出來。簽名者共有八十一人，故被稱為「八十一人聲明」，實際上只有五六十人。據鄭超麟說，為了壯大聲勢，三分之一的姓名是虛構的。有的是別人代簽，如李季。別人代他簽名登出後，他就向陳獨秀、鄭超麟等人提出抗議，說他有公開的職業，以真名出版譯稿和著作，不像他們過地下生活，真名列入托陳取消派會妨害他的安全。所以，李季有點像「逼上梁山」。

考慮到安全等方面的原因，有人以偽名簽署，如喻守一。他當時是共青團法南區打浦橋地區支部書記，在滬濱書店當編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經理馬任之從外面回來，對黨支部書記楊獻珍說，「老頭子」（指陳獨秀）他們寫了一個給黨中央的政治意見書，希望大家能看看談談，提些意見。楊不表示拒絕。次日下午，代表陳獨秀來做說明的是尹寬，馬任之從口袋裡拿出一份油印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草稿，唸到攻擊黨堅持農村武裝鬥爭是「殺人放火」時，楊獻珍就表示不同意這種說法，馬任之就沒有再唸下去，會議就散了。喻守一看了意見書草稿，表示完全同意。馬任之就約他到一個小公園裡，接受彭述之的談話，就加入了托陳派。十二月份，團中央通知喻去接受新任務時，他就斷然拒絕了^①。

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上看到這些簽名的名單後，在中央機關報《紅旗》上，分別致函那些還在黨內的簽名者，

① 參見喻守一：《中國托派的形成和我追隨陳獨秀加入托派的情形》，未刊稿。

如何資深、張以森、莊季貞、陸沉、劉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劉靜貞、吳季巖、王永慶等，要他們表明在意見書上的簽名，「是否你們自覺的列名，抑係取消派的假借名義」；「如係取消派假借名義，應立即作一聲明書，並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則，黨認為你們已自覺的參加反動的行動，黨只有給予最後的制裁，以鞏固黨的鐵的紀律。」

⑤結果，他們都不予理睬，遂被開除出黨。

其中張以森是湖南長沙人，大革命前曾和母親二人掩護過在長沙做地下工作的毛澤東；大革命時，在武漢曾為毛澤東抄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共「五大」時做秘書抄寫工作。革命失敗後，又與母親二人掩護過湖南省委書記何資深，並與何結婚，後來與何一起轉向托派。

陸沉，原名盧斌，湖北黃岡人，早年與惲代英同為私立中華大學附中學生，後來到安源煤礦搞工人運動，任共青團安源地委書記。一九二五年春，劉少奇離開安源以後，他任安源工人俱樂部主任。嗣後調中共中央，任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並協助農運書記毛澤東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務主任。旋到武漢，任中共湖北區委農民部長、湖北省農協委員長，參加中共「五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任江西省委書記，曾參加「八七」會議。

劉靜貞，雲南人，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三一八」遊行。之後去廣州，進國民黨中央辦的婦女運動講習所，畢業後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工作，又隨國民黨中央遷往武漢。武漢分共後，受通緝，出走江西，乘船追趕葉賀南昌起義的部隊，未及，折回上海，到江蘇省委做組織工作；後又一度調上

⑤ 《紅旗》第86、101期。

海總工會和《布爾塞維克》編輯工作，與鄭超麟結婚，二人一起轉向托派。

這批人被開除以後，托陳取消派在黨內的影響，基本上被肅清了。

第二節 混戰中誕生的「十月社」

托陳派小組組織形成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的話派」陷於更加混亂和分裂。

首先是「總幹事會」內部，由於「二代會」通過了在三個條件下可以吸收陳獨秀派的決議，梁幹喬、張師、謝莊、郭志馨、李血淚等人，攻擊區芳、史唐、張特等人是「受了陳獨秀金錢收買」，「投降了陳獨秀」，紛紛辭職或自動脫離總幹及上海區幹的工作。梁幹喬還捲走總幹國內外通訊處，截留外國寄來的文件，斷絕該派經濟來源，致使該派工作一度癱瘓；他還幾次寫信煽動廣東的托派反對總幹，致使「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作出決議，要挾總幹，「誓死不同陳獨秀派妥協，否則香港區全體同志脫離反對派」（當時香港托派組織屬於廣東省幹事會領導）。

於是，總幹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召開了「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會議左右開弓，同時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梁幹喬等人的錯誤。

他們批判陳獨秀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和曾經遷就「六大」決議案等錯誤，說他還在堅持「反動的工農民主專政」和「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

其實，陳獨秀認為他在十月十日給中央信中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恰恰是反對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的。他認

爲「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中，不包括中農和富農，這就排除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與托派的傳統口號「無產階級專政」是一致的，而且更切合中國的實際；他以此攻擊黨在「工農民主專政」口號中給資產階級「留有席位」，是「反動」的。至於說到陳獨秀「遷就六大決議案」，那是指他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所說的話：「我在八月五日寫給你們那一封長信，是用了合法手續，很委曲求全的極力遷就在第六次大會的議決案範圍內，向黨建議，希望有相當的補救。」所以，「總幹」的這些攻擊，完全是莫須有的，是拒絕托陳派加入他們組織的藉口。

早在四月二十五日，總幹就分別致函梁幹喬和張師，強烈譴責他們二人自動辭職，席捲總幹所有通訊處地址，造謠攻擊總幹成員，「客觀上幫助了陳（獨秀）劉（仁靜）派」等六大錯誤，要求梁一星期內「聲明改正」，否則「自絕於反對派」。但是，梁、張拒不承認錯誤，並在會上變本加厲地提出「打倒總幹」的口號。會後，他們又在虹口公園召集本派別的聯席會和代表會，進一步分裂「我們的話派」。結果，他們都被總幹「從反對派組織中開除出去」^⑥。後來因區芳被捕，與陳獨秀派鬥爭激烈，梁幹喬又回總幹。

與此同時，宋逢春因爲在與陳獨秀、尹寬談判時就表示同意無條件吸收陳獨秀派及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誣爲「投降主義」而被開除^⑦。

⑥ 〈總幹致梁同志函〉，〈總幹致張師同志函〉，〈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致總幹的信〉，均載《反對派內部生活》，一九三〇年四月；〈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總幹致幹喬、張師同志的信〉，均載《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一九三〇年六月。

⑦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

最嚴重的是劉仁靜與陳獨秀派及「我們的話派」的爭吵和分裂。一九二九年九月托陳派小組成立後不久，劉仁靜就與之分裂。分裂原因，有的說是劉想當托陳派的「宣傳部長」未遂^⑧；劉自己則說是因為陳獨秀仍堅持「機會主義」。

從一九二九年九月到次年三月，劉仁靜寫了好幾篇文章和給托洛茨基的信，在反映陳獨秀轉向托派時，又批評他轉變得徹底。他從陳獨秀寫的〈論中國革命性質〉、致中央的信〈告全黨同志書〉及〈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等幾篇文章、書信、聲明中，挑出某些觀點進行猛烈的抨擊：

(一)批評陳獨秀不徹底承認自己大革命時期機會主義的錯誤，說他企圖「脫卸過去革命失敗應負的責任」，「表面上承認錯誤，實際上反執之愈堅。」^⑨因為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批駁中央開除他黨籍的決議案時，一方面宣稱他原先反對國共合作，繼之屢次主張退出國民黨的主張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辯護自己因屈服於共產國際紀律，才未能堅持自己的主張，而違心地執行國際的錯誤路線，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劉仁靜及所有莫斯科回來的托派分子，則認為陳在大革命中是「自覺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

(二)批評陳獨秀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與托派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對立，而與共產黨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相接近。

(三)批評陳獨秀不願解散自己的小組。

^⑧ 《雙山回憶錄》第144頁。

^⑨ 列爾士：〈一篇虛偽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十二月十日「告全黨同志書」〉，載《十月》第1期，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列爾士：〈評陳獨秀雙十日給中央的信〉，載《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附錄。

鑒於此，劉仁靜宣布，陳獨秀派是「假藉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宣稱：「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爲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⑮

所以，當他幫助起草、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他斷然拒絕在上面簽字，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陳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誤。」^⑯

在這樣批判陳獨秀派同時，劉仁靜又竭力攻擊「我們的話派」，也是左右兩面開弓：

(一)先是指責「總幹」不吸收陳獨秀派，揚言要與「我們的話派」決裂；後來他自己也與陳獨秀派鬧翻後，就說「總幹」之所以拒陳，「完全是爲了地位」，而不是路線分歧^⑰。

(二)批評「總幹」只「注重在黨內進行反對派的工作」，而不是同時在黨外活動。這是指梁幹喬當時的一個主張：「中國反對派組織是黨內的小組織，所以黨外的工人必須先加入黨，然後加入反對派，且要規定一定時間的限制；向黨外吸收同志是『不得已』的舉動。」區芳等人雖反對梁幹喬的主張，但認爲黨內工作是重點，黨外工作「不過是一個陪襯」。劉仁靜則認爲，「我們的組織是獨立的，黨內的工作只是一

^⑮ 同^⑨。

^⑯ 〈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附言，載《十月》第1期。

^⑰ 〈告同志書〉，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署名，單行本，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發表。

部分」；由於「反對派的文件和意見在黨內沒有公開和發表的自由；站在反對派有所主張的同志都被開除或停止工作；因為黨領導的錯誤政策，黨內無產階級分子減少，黨的腐化和墮落日深一日；要抵抗這種黨的墮落，要救黨於危亡，只有……組織強固的思想上團結的國際小組織，在自己旗幟之下，公開的勇敢的，一方面在黨內，同時在黨外進行工作。」^⑮

(三)攻擊「我們的話派」二代會政治決議案偷運斯大林主義的觀點。因為決議案認為「世界大戰的危險程度是一天天緊急起來」，「中國革命的形勢開始恢復」，「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導全世界無產階級預備革命高潮的來到」，「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是：(一)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二)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對「國民會議」，決議案認為只是個策略，它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劉仁靜認為，這些都違背托洛茨基為中國托派起草的政綱的精神。他認為「中國現在有或然的議會制的前途」，應該認真地為國民會議而奮鬥。

鑒於此，劉仁靜攻擊「總幹」執行的是「投降派路線」，投降斯大林主義。因此他夥同王文元、宋逢春、陸夢衣、紫亮、董汝誠、廖麟、黎白曼、周慶崇九人，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發起成立「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發表了〈告同志書〉，宣布總幹「已經死亡」，提議徹底批判「我們的話派」和「陳獨秀派」的錯誤，「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統一，再做組織上的統一」。

這就是中國托派第三個小組織。三月三十日，他們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他們被稱為「十月社」。

「十月社」這最初的九個人，多數是黨內的人。劉仁靜因回國後

^⑮ 同^⑮。

公開進行托派活動，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實際上被中共中央宣布為自動脫黨了。這天，黨中央在機關報《紅旗》上致函劉仁靜，指出他逾期已久，終不見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住處亦未告知中央，「又據王平一說你回國時經過歐洲，曾找見托洛茨基，並受托命回國活動，最近又以列爾士署名公布〈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的文章，顯然你不僅在宣傳反對派的意見，且公開承認你在進行第二黨組織……。」信最後要劉三日內書面答覆中央，公開表示對「六大」決議案及中央路線、托洛茨基主義的態度，「如逾期再不回答，中央即認為你已經默認，根據以前事實作最後決定。」^①劉仁靜沒有回答，也就自動脫黨了。

宋逢春被選為「總幹」成員後，繼續隱藏在中共北方區委宣傳部，在有托派思想的部長羅漢手下工作，同時負責華北地區托派工作。後來羅漢及區委書記張某被捕，新上任的書記蕭敏發現宋逢春有托派觀點，就停止他的工作。他離開北平來到上海，見陳獨秀等因托派問題都被開除了黨籍，也就沒有再找黨，自動脫黨了。接著，在吸收陳獨秀派問題上，他被「總幹」開除，遂轉向「十月社」。

第三節 中共開展肅托運動

王文元等是混在黨內「工作積極」的托派分子，則因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秘密組織被破獲而暴露了身分，也紛紛開除出黨。

事情是這樣的。托洛茨基被驅逐到土耳其以後，由於獲得了比較自由的環境，反對斯大林及其政策的活動，非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

^① 同^①第66期。

加厲。他在聯絡各國托派、籌組托派臨時國際同時，很快與他的俄國信徒建立了聯繫，繼續在國內開展反對斯大林的鬥爭。他不斷地撰寫反斯大林的小冊子，偷運到俄國散發。一九二九年七月，他又創辦了《俄國反對派通報》，作為俄國托派的機關報和他指導其信徒活動的陣地。十一月，他寫完《我的生平》，書中以歷史見證人的身分，敘述了斯大林在俄國革命中的真實表現，描寫了斯大林種種最醜惡的方面。十二月，他完成了他的「托洛茨基主義」的代表作《不斷革命》。這些情況，都由蘇聯克格勃情報人員及時匯報給蘇聯最高當局，引起了斯大林的極度恐慌與憤怒。而在中國，據中共中央報告，由於莫斯科歸國留學生中托派分子的活動，不僅產生了中國托派組織，還使陳獨秀等黨內一大批中高級幹部轉向托派，並且還發表了一系列猛烈攻擊斯大林及共產國際的文件，這更是斯大林所未曾料到的。於是，聯共中央作出了開展清黨運動的決議，再次掀起一場肅托鬥爭的高潮。

這次肅托運動採取了比以往更加嚴厲和殘酷的手段。一九二九年底，聯共中央監委派出一批清黨委員來到中山大學，該校也捲入了運動。王明則乘機進行更加瘋狂的掃蕩，以邀寵斯大林，又進一步剪除異己勢力。

在運動中，每個黨員都要面對其他黨員的各種挑剔。王明就安排親信指控反對他的人是托派、托派嫌疑或其他「反黨」分子。然後，被指控的人就被審查，不僅審查個人現實表現、以往經歷，還追究到好幾代祖宗的家史。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托派分子終於開始動搖。代替王文元負責托派宣傳工作的是一位三十來歲的河南人，名叫趙彥卿，過去在武昌第一師範當過教員。此人性情溫和忠厚，又因他的俄文姓名叫「馬馬希金」，大家都稱他「媽媽」。他首先動搖，向當局作了交代，將留學生

中托派組織的情況，全盤托出。此人交代後，又受到良心責備，就在房裡上吊死了。

趙彥卿自殺，恐怖氣氛籠罩了全校。全校學生和教職員人人自危。於是，接替范金標負責托派組織工作的李平，也屈服了，交出了莫斯科秘密分子約二百餘人的名單（有的說八、九十人），接著就是大逮捕。一天夜裡，大批警察來到學生宿舍，將二百多名學生從睡夢中喚醒，裝上囚車而去，其中不僅有托派，還有因反對王明而被扣上「托派」或「反黨」分子的人。

這些人被關押在莫斯科盧比什卡廣場格別烏總部的地下牢房裡，進行嚴厲的拷問，從幾天幾夜不讓休息的疲勞折磨到各種體罰，無所不用其極。經過審訊，非托派的學生多數遣送回國，少數轉入其他學校讀書，或派至某機關服務。托派學生，約有十人屈服了，於徹底坦白之後，開除黨籍，並在短期刑滿出獄之後，立即送回中國。尚有約二百人，包括「第二條路線」中只反對王明的骨幹「反黨分子」，都流放到西伯利亞，在阿爾泰金礦或其他勞動營服苦役。其中有安福、季達才、范金標、卞福林等。有些托派骨幹分子，雖然在嚴刑拷打下屈服交代了問題，表示悔改，但擔心他們回中國後會增強中國托派的力量，仍不釋放，一併流放遠東。這些人中，只有二人後來偷越國境成功，回到國內，其他人都葬身在流放地或俄國的監獄中。這二人是徐雲作和幺心一。他們回到北平後，徐成爲托派華北地區負責人之一，幺當了中國大學的教授，在華北地區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發展托派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莫斯科中山大學辦了五年。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共時，曾聲明取締它，未成，只是單方面不再派國民黨所屬的學生入學。現在，斯大林看到用俄國麵包竟然培養出了如此眾多

反對自己的人，深感受到了歷史的嘲弄而極為震怒，不得不承認辦學失敗。於是，中山大學終於自行「取締」了。

在逼供信搞出來的名單中，約有三十人已在此前回到中國。中共中央在莫斯科來信中得知後，見到不少人已成爲黨的各部門工作骨幹，採取了慎重的態度，先向信內所指出的同志，分別發出通知，要他們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意見，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活動的情形。

然後，惲雨棠等在莫斯科只反王明而擁護中共「六大」路線的同志，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個別托派分子如濮德志、張穎新也混雜其中，以求繼續混在黨內。趙醒民則登報聲明與托派脫離關係，表示：「幼稚的我，沒有深刻的認識和了解『六大』的策略，因而走上了極端錯誤的歧路。」他承認自己由於意志薄弱，一年來陷於「合法運動」泥坑中，呼籲托派分子「趕快脫離可恥的取消主義的路線，回到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之下來」^⑬。「我們的話派」則立即宣布開除他的「黨籍」^⑭。

大多數托派分子對中央的通知不予理睬，想蒙混過關。黨於是對他們做爭取工作，如周恩來對王文元的爭取。這時王正生病在醫院裡，周恩來發現名單中有王文元的名字，就去與他談話。據王文元回憶：「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爲了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面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王文元當場沒有說什麼話，只答應寫聲明。第二天，周恩來看到了他的聲明，聲明用清楚明白的語言，表明了他的政治意見：不同意黨的「六大」所作的關

⑬ 同⑤第80、90期。

⑭ 《我們的話》第15期。

於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同時他又表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違反多數的決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依舊工作。」^①

這在當時黨的狀況所不可能的。即使中國黨容許，共產國際也不會容許。於是，這些堅持托派立場的人，也都紛紛被清除出黨。但是公布開除他們黨籍的原因，乃是他們在托陳派〈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和劉仁靜的〈告同志書〉上簽名的問題，表明了他們與黨的路線正式決裂。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四日，《紅旗》（第 101 期）發表了中共中央〈為開除吳季嚴、王文元、周慶崇黨籍事通知全黨〉的告示，指出吳、王反對「六大」決議案，反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屢教而不能覺悟，中央直屬支部已開除其黨籍，中央已批准，「但因他們的住址對黨秘密，開除的通知無法送到。以後又發現吳季嚴列名於陳獨秀等的〈政治意見書〉，王文元列名於劉仁靜的〈告同志書〉，同時周慶崇拒絕工作……，列名於劉仁靜的〈告同志書〉，中央亦決定開除其黨籍。特此公布。」

有的托派分子，自知在黨內已隱藏不住，就悄然離去，中央仍想最後拉他們一把。五月七日，中央組織部也發表致黎彩蓮、葉英的信，指出：「你們許久失了與黨的關係，不自動的積極找黨，這是一種有意離開黨的表現，中央不知你們住在何處，無法與你們發生關係，希望你們速設法將自己的地址交來，否則這是有意離黨，黨在組織上應給以最後的處分。」^②

① 同①第 141 頁。

② 同①第 99 期。

第四節 托洛茨基指示堅持原則

劉仁靜等人發表〈告同志書〉，組織「十月社」後，「總幹」立即作出反應，通過決議，譴責「反革命機會主義反對派劉仁靜等人向我們——反對派嚴重進攻」，並將劉仁靜等人開除^①。

劉仁靜雖是「十月社」的發起人，但他與王文元等人的合作也不長久。七月十九日，劉仁靜又因在批判陳獨秀時，堅持認為一九二三年國共合作時「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觀點，被「十月社」開除^②。王文元等人認為根本不應加入國民黨。

一九三〇年夏天，一些莫斯科回來或從「我們的話派」中分裂出來而游離在「我們的話派」、「無產者社」、「十月社」三派之外的托派分子趙濟、劉胤、王平一、解叔達、徐乃達、閔蔭昌和未去蘇的來燕堂七人，又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戰鬥社」。該派頭目趙濟坦率地承認，他們所以另立組織，不是由於路線分歧，而是為了「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占一位置」；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派別不會長期單獨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滅，就是勢必會趨向於統一」^③。

這樣，連王文元後來回憶時也承認：「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只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各自稱王，自鳴不凡」；「個人野心與派別偏見……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④。

①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

② 〈十月社對於劉仁靜同志的決議〉，載《十月旬刊》第2期。

③ 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一年第2期。

④ 同③第147頁。

在這種怪誕的情勢下，有些人對托派的前途感到悲觀，另找出路而去。如托陳派骨幹蔡振德，就在一九三〇年脫離托派，到西安投靠楊虎城將軍，任《西京日報》社社長。後來，此人作為楊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才聯絡時，被盛殺害。另一說法是，他在一九三〇年參加馬仲英軍事冒險，進入新疆，死於戰場。

又如陳公培(即吳明)，早年與周恩來、尹寬等赴法勤工儉學，曾參與創建「少年共產黨」和中共旅歐支部，後來曾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隨譚平山加入「第三黨」(鄧演達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半年以後，與該黨領袖之一章伯鈞意見不合而退出，企圖回共產黨未遂，就進入了托陳派。今見托派內部如此勾心鬥角，十分失望，很快也不告而別，去投奔廣東反蔣派陳銘樞。一九三三年「福建事件」成立的「人民政府」中，他任經濟委員會和文化委員會的委員。

以上種種情況表明，中國托派一出世，就面臨著夭折的危險。關鍵時刻是托洛茨基給它打了強心針，挽救了它的生命。

托派各個小組激烈爭吵同時，都向主子托洛茨基寫信，匯報情況，標榜自我，攻擊異己。

托洛茨基始終十分關心中國的托派運動，把它視為自己的事業在東方的一個據點，因此對於來自中國托派的信件，他都認真閱讀，及時答覆。迄今為止，在各種書刊及一九八〇年一月啓封的托洛茨基檔案中的密封部分中，發現從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八月逝世前，他給中國托派寫的信有二十二封之多。他還給中國托派寄送每期托派臨時國際機關報《反對派通訊》、《真理》及他寫的各種小冊子。

一九二九年九月，劉仁靜回國不久，就寫信給托洛茨基，報告中國托派運動進展情況，講了陳獨秀轉向托派但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仍有

保留的情形；他促使陳獨秀派與「我們的話派」談判統一的經過。劉認為托派在共產黨內很難開展活動，反對「我們的話派」注重在黨內工作和不與陳獨秀派統一的主張，並表示因此要與他們決裂。十一月份，托洛茨基覆函劉仁靜，對劉報告的中國托派情況，表示「擔心和不安」。但他不同意劉的立場。他認為托派「在黨員內部工作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不能放棄。他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評劉不應在吸收陳獨秀問題上，而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你說他們（指『我們的話派』）反對陳獨秀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爲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一九二四至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的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決裂，那是魯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R ❶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可是這個問題卻是基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原諒的輕率。」 ❷

托洛茨基當時正在寫《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的小冊子，想分出若干章節專門論述中國問題，但苦於缺乏材料。爲此，他要求劉仁靜把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提出些什麼口號，朱德及其統率的隊伍，陳獨秀對這些問題的立場，中國托派對他提出的民主過渡時期口號採取什麼態度，以及劉仁靜對這些問題的意見等等，儘可能確切詳盡地告訴他。

❶ 即拉狄克。雖是蘇聯托派的骨幹，但在大革命時期中共退出國民黨及以後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一直動搖，與托洛茨基有分歧。一九二七年被蘇共開除後，表示悔過，承認「工農民主專政」等觀點。一九三〇年恢復黨籍。因此，被托派視爲變節者。後來，他又被開除，並在一九三七年「托布反黨案件」審判中被判長期徒刑。

❷ 雙山譯：《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第3頁。

——這裡看出，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關心到什麼程度，以及他需要中國托派，又到什麼程度。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們的話派」致函托洛茨基，報告因為陳獨秀不接受「三個條件」，繼續自己的獨立活動，因此，「我們認為陳獨秀不曾脫離機會主義，我們決定像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反對他。」^②十二月二十二日，托洛茨基覆信，對劉仁靜說的陳獨秀趨向托派，表示「很歡迎」；同時又說：「我很知道他（指陳獨秀）在革命那幾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馬爾丁諾夫的政策。」而對「我們的話派」說陳還沒有放棄機會主義，則表示「直至現在我還沒有讀過陳獨秀任何綱領式的聲明書，所以沒有可能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爲了弄清楚這個問題，他在信末提出了他與斯大林分歧的十五個問題，作爲衡量陳獨秀和其他人「與我們是否原則上一致」的標準。這就是：

關於革命第一時期（即大革命時期）：

一、能不能因爲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性質，就做出結論，以爲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領導作用」（斯大林、布哈林的意見）？

二、四個階級——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與無產階級——聯盟（斯大林與布哈林的理論）的口號，是不是甚至於有片刻是正確的？

三、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俄國共產黨政治局的決議）是允許的嗎？

四、爲北伐的利益而妨害土地革命（俄國共產黨政治局的電令）是允許的嗎？

五、一九二五～二七年廣大工農運動發展的時候而拒絕蘇維埃的

^② 同^①第16頁。

口號是允許的嗎（斯大林、布哈林）？

六、斯大林派關於「工農黨」的口號——即俄國民粹派的舊口號，應用到中國，是否有片刻是對的？

關於革命第二時期（即大革命失敗以後）：

七、共產國際的決議說，國民黨左右派之摧殘工農運動，是「革命轉變至較高階段」的表現（斯大林、布哈林），這是對的嗎？

八、在這種條件之下共產國際提出的武裝暴動的口號是對的嗎？

九、在工農失利的環境之下，由共產國際所認可的賀龍、葉挺的游擊戰爭，是對的嗎？

十、由共產國際的代表所組織的廣州暴動是對的嗎？

關於過去的問題：

十一、一九二四～二七年共產國際在中國方面對於反對派的攻擊是列寧主義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抑是孟什維克主義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

十二、一九二四～二八年共產國際對於反對派的攻擊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對「取消派」的鬥爭，抑是冒險主義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

關於將來的問題：

十三、在目前反革命勝利的條件之下，反對派深信要用民主口號，尤其是國民會議口號，動員群眾是必需的嗎？還是此時只限於蘇維埃口號的抽象宣傳，像共產國際所決定的一樣呢？

十四、「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否含有革命的內容，像共產國際所想像的那樣，或是恰恰相反，此時應揭破這樣掩飾著將來國民黨的公式，並說明中國「農聯合的勝利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呢？

十五、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否適用於中國，或是相反，中國革

命能否得到勝利，能否徹底完成其任務，全看他是否成爲全世界革命的鎖鍊之環？

托洛茨基認爲：「這都是中國反對派在他的政綱中所必須答覆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表明，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即中國托派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分歧是多麼深刻，根本不可能有調和的餘地。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劉仁靜同時與陳獨秀派及「我們的話派」決裂以後，又寫了一封長信給托洛茨基，繼續攻擊這兩派的錯誤，報告他與之決裂的情況，同時按托的要求，詳細報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情況。

二月二十四日，托洛茨基回信說他的信很有趣，並把它刊登在托派臨時國際的機關報《反對派通訊》上。同時又提出十五個問題，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產黨和托派的活動方式、刊物、被捕者、組織分布、工會等方面的具體情況。托洛茨基完全贊同劉仁靜反對中共農村武裝鬥爭的立場，認爲劉對鄉村戰爭的描寫，「完全證實了反對派理論的診斷」是正確的：鄉村中的游擊戰爭不過是「過去革命的餘波」，由於它脫離城市無產階級，必然「陷於可悲的腐化與墮落」。他要中國托派「在黨的前面和參加游擊戰爭的真正革命分子面前，描寫這種前途」。但是，托洛茨基不同意劉仁靜對共產黨當時搞的上街示威採取「卑棄」態度，指出：「這是不正確的。就其傾向而言，是異常的危險，反對派在原則上，應當保持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但是在黨進行實際的行動之時，反對派應當採取統一戰線的政策，……和黨員在一塊參加遊行示威。」他指示托派在遊行時喊出托派的「國民會議」、「土地歸貧農」、「八小時工作日」、「國家獨立」等政治要求，以與黨的口號「打倒國民黨」、「共產國際萬歲」相對立。對於劉仁靜與兩派關係，托洛茨基同意他與陳獨秀派決裂，但不同意他與「我們的話派」決裂。他說：

「關於陳獨秀派，因為這一派繼續的站在『民主專政』的主張上，換言之，即對於最根本的問題站在斯大林及馬爾丁諾夫的主張上，這就決定了問題，……同他統一組織，全然談不到，因為他的軟弱，同他作實際的協定，是沒有意義的。」還說：「關於陳獨秀派的估量，『我們的話派』比較的正確。現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已經消滅，因為你十分正確的對陳獨秀派採取了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①

但是，托洛茨基畢竟是有政治家頭腦的人物。他不能總是根據別人反映的第二手材料來判斷一個人、一個派的政治傾向，更不能偏聽偏信片面之詞來調解爭論雙方的是非曲直。所以，在接到劉仁靜二月二十一日批判陳獨秀等八十一人意見書的信後，托洛茨基心中開始疑狐起來。四月三日覆信，他要劉把這個意見書「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並強調說：「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儘可能完美確切。」他要親閱陳獨秀的文書，作出自己的判斷。同時，托對劉堅持要與「我們的話派」鬧分裂，十分不滿。他寫道：「從你的來信，我還是不明瞭你何以與「我們的話派」統一不起來。你說他們做了錯誤，但是照你自己的話說，你也做了錯誤。誰在世界上沒有錯誤呢？只有一個上帝，但是上帝是沒有的。」托洛茨基認為劉與「我」派沒有「嚴重的原則的不同意見」，沒有理由分裂。他要劉負起統一中國托派的責任。他嚴厲地指出：「否則你們即不能脫離無力的狀況，……妨害你們運動的前途，不要以為分裂成兩派就軟弱兩倍；不是的，你們要弱小十倍。因為你們使人的頭腦陷於可怕的混沌。」^②

這四封信，充分反映出托洛茨基對中國托派、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對陳獨秀關心到何等細微的程度，同時也表明，他在掌握到

① 《十月旬刊》，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② 《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陳獨秀發表的聲明之前，對陳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既歡迎、又有疑慮，但卻堅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則立場。不久，當看到「無產者社」寄去的陳獨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之後，他的態度就十分鮮明而熱烈了。

第五節 托洛茨基熱情歡迎陳獨秀

這年八月二十二日，托洛茨基分別覆函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熱情地讚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他甚至強調青年托派「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志學習！」他說：「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志們所未有的」；「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托洛茨基毫不掩飾自己對陳獨秀的信任和親熱的情感，並用特殊的方式，把這種情感傳染給中國托派中的反陳者們。他對劉仁靜說：「我怕我這裡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表示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

信又嚴厲批評劉仁靜堅持與「我們的話派」分裂的立場，重申托派在目前沒有「建立第二黨」的使命。「我們必須繼續自視為黨內的一派」；「我們的黨外工作，一定要帶有這樣的性質：讓黨內同志看來，我們是他們的朋友而非敵人。」托洛茨基還嚴厲地批評「我們的話派」：

「要其他兩派都須向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他強調各派「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你們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決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有什麼各自分立之理由。」最後，他要求三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並依照人數為比例，召集一個統一大會。」

托洛茨基的這封信，對中國共產黨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詢問現在的農民戰爭是否有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機會？要求托派利用農民暴動的影響，推動城市裡的革命，並指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托派才支持農民暴動，並揭穿共產國際和中共散布的謊言——「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工人階級積極參加運動，而能建立『蘇維埃政權』。」^①

九月一日，托洛茨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的信（「對十月社」七月二十七日來信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一）國際局的立場，並不袒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因為我們的所有材料未證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嚴重的分歧意見。（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認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反對另外的派別。（三）對於陳獨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接得譯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志公開信。在這信中，陳獨秀同志對於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為什麼幾個中國同志繼續的稱陳獨秀同志的一派為『右派』的理由。」

關於統一的方法，這封信提出一個新的建議：四派組織協議委員會以擬就政綱的根本提綱和統一組織的方法^②。

① 《建立》（中國托派少數派機關報）第1期，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

② 《十月之路》第1期，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版。

可以看出，托洛茨基雖對四派平等看待，但對「陳獨秀派」格外垂青，並且給原來被留學生托派百般奚落與侮辱的陳獨秀很高的評價，一下子把他提高到中國托派領袖的地位上。這是完全出乎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本人的意料之外的。陳顯然為此深受感動，這可以從他後來在托派小組組織統一中的作用看出。托洛茨基在以後看到陳獨秀寫的其他文章時，還直接寫信給陳，推崇備至，說從這些文章中看到：「儘管中國革命遭到了潰敗，而馬克思思想卻依舊活著，而且在發生作用。」^①還表示爲了閱讀陳獨秀的文章，他要學習中文。

與此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茨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也發表〈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並寄到中國，系統地重申了對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小組組織早日統一，其內容與托氏八、九月份來信相同^②。

於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商。「我們的話派」代表區芳、史唐（不久區芳被捕，史唐消極，換上陳亦謀和梁幹喬）；「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巖、馬玉夫；「十月社」王文元、宋逢春；「戰鬥社」趙濟、劉胤。協商會議決定了兩項主要任務：一、起草文件；二、準備統一大會。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決，一談具體問題，各派又施展手段，爭吵起來。

「我們的話派」受了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作出決議，表示：「我們認爲國際委員會所指示的統一步驟與方法是正確的。」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布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時間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③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托派內部

①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第42頁。

② 同①。

的鬥爭，特別是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採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他指出：「一個幾十人甚至十幾人的小組內，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派別，互相仇視攻擊，而且每個小的派別內，習慣感情稍為相同的人，又形成派別的派別，在那裡攻擊與仇視別的思想習慣與感情不同的人。每一個政治問題發生，預先藏著成見地去斷定某些人是中派，某些人是左派，某些人是右派，去找尋他所說的話或文章有沒有可疑的一句或半句以為攻擊的資料，而且每個人都在設想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為了堅持自己的意見，採用著布爾什維克對待敵人的方法來對付自己思想相同的同志。這種現象已不能再繼續下去了！」^⑬但是，他們實際上仍堅持以「我們的話派」為正統的統一方法，把統一大會定名為「第三次代表大會」，並且為了在統一後的領導機構中控制多數，梁幹喬採取了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人數是三百人，等於其他三派人數的總和，按二十人出一代表，可出十五人。此舉遭到其他三派的強烈反對，後來約定該派人數為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人^⑭。

「十月社」對陳獨秀派還是不買賬，王文元為「協委」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⑮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嚴厲地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些都遭到「無產者社」的反對。

九月二十九日，「十月社」與「我們的話派」的北方區組織聯合成

^⑬ 同^⑬第 22 期，一九三一年一月六日出版。

^⑭ 區芳：〈談談統一問題〉，《我們的話》第 22 期。

^⑮ 《雙山回憶錄》第 160 頁；〈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我們的話派」——全上海積極分子第二次會議決議案〉，《我們的話》第 22 期。

^⑯ 托派視辛亥革命為第一次革命，大革命為第二次，未來革命為第三次革命。

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產者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志，在許多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接著列舉了五大問題：

(一)對於革命性質問題，據其最後發表的政治主張（〈論中國革命性質〉一文）以為「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因之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

(二)政權問題，他堅持「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

(三)國民會議問題，他始終說它是「一個簡單的主觀的策略」，不把它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

(四)「紅軍」問題，他認為是純粹「流寇土匪」，沒有一點出路。

(五)對中東路問題之錯誤，即迎合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所謂「誤國政策」的口號^①。

這樣，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陳獨秀派與三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確和尖銳了。每次協商會議變成了「無休止的辯論會」，「照例是把糾纏不清的古老爭論重提出來，互相間唇槍舌劍，弄到面紅耳赤而散。」如此吵來吵去，名義是協商統一，實際是勾心鬥角，吵得一天星斗，使統一更加遙遠。於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又寫來一封長信，力圖調解。他針對上述「提議」中攻擊陳獨秀的幾個具體問題，逐條表態，除了在紅軍問題上表示紅軍與「土匪」混為一談「應該糾正」之外，其他問題都肯定陳獨秀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① 同^②第1期。

(一)關於革命性質問題：托洛茨基沒有正面表態，只是引了陳獨秀起草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後，托洛茨基說：「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絕不能引起誤會。」托洛茨基的這個解答並沒有解除雙方的分歧，因為雙方對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並沒有分歧，分歧在於「一開始」要解決什麼性質的任務。陳獨秀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其他托派則堅持「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民主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期附帶地完成」，就是說民主任務與社會主義的任務「糾纏」在一起進行的，分不出先後階段^⑤。

(二)關於政權問題：托洛茨基說：陳獨秀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這個回答使反陳派十分意外。因為他們以為托洛茨基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自己理論的核心，對「工農民主專政」深惡痛絕，所以只要高喊「無產階級專政」，批判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就會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誰知托洛茨基卻來了這樣一個「裁決」，反陳派只得閉口無言了。

(三)關於國民會議：陳獨秀開始所以有那樣的觀點，是因為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

● 〈對區白的「我們之間不同意見」的批評〉，載《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下冊），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出版，一九三四年十月。

⑤ 〈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王文元起草），一九三〇年十月。

心政治口號」的說法。在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制」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後來，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但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是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有實現的可能性，應該認真為此而奮鬥，但他認為即使實現，也要經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這一條又與「議會迷」劉仁靜不同，劉認為可以通過國民會議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而青年托派則認為「國民會議」口號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其實，托洛茨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只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在一月八月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寫了多少文字進行解釋或批評，始終未解決中國托派內部的這個爭論^⑨。

（四）關於紅軍問題：據鄭超麟說陳獨秀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的文章，當時「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該文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茨基。托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⑩式的行動；除

⑨ 〈論國民會議口號——致中國反對派〉，載《中國革命問題》第249頁。〈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載同書第215、220頁。

⑩ 馬黑諾是一九一八年烏克蘭游擊隊領袖，反對烏克蘭反動派和德國佔領軍；受無政府派、富農及反動分子影響，拒絕參加集中化的紅軍，妨礙了對反革命的鬥爭，且成為鄉村反動分子集團的中心。最後為蘇維埃軍隊所消滅。

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擊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裡一堆那裡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①直到一九三〇年九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裡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

但是，由於陳獨秀的文章太露骨，黨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紅軍動運的勝利進展，到一九三〇年，全國紅軍擴大到十三個軍十萬人，分布在十餘省三百多個縣，建立了十五個革命根據地，給陳對紅軍的誣蔑以有力的駁斥，並使有些人震醒。尤其是蔣介石對蘇區進行軍事圍剿時，還將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②。於是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托洛茨基在一月八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著，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裡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實際上，托洛茨基和陳獨秀一直沒有改變對紅軍的教條式的攻擊，陳獨秀在一九三二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托洛茨基的「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

① 〈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

② 王學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鬥爭情況〉，載《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3輯。鄭超麟：《回憶錄》。

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

很清楚，托洛茨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派，而批評其他三派，於是，各派代表又被迫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商統一。

第六節 陳獨秀快刀斬亂麻

托洛茨基來信屢屢袒護陳獨秀，「無產者社」就翹起了尾巴。主要是彭述之，當時青年托派對他印象極壞。此人是一個矮個子，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大家認為他低能自大高傲。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只看了一本《共產主義ABC》，就以理論家自居，嘮嘮叨叨，愛擺老資格、大幹部的臭架子，還假裝斯文，道貌岸然。大家戲謔他是「孔老夫子」。他這種表現，不僅那些青年托派厭惡他，就連鄭超麟、何資深等也看不起他。彭述之有感於此，怕在未來統一的組織中大家不會奉他為領袖，所以背著陳獨秀，操縱「無產者社」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地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在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談組織上的統一^①，致使協商的工作又受到阻礙。鄭超麟和尹寬反對彭的行為，向陳獨秀告狀。陳的態度成了中國托派能否儘快實現統一的關鍵。

陳獨秀是真誠希望統一的。再加上托洛茨基的知遇之恩，更認為自己推動中國托派組織統一責無旁貸。他認為過去的爭論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②。現在，他見到托洛

① 「無產者社」：〈給「協議委員會」轉「我們的話派」、「十月社」和「戰鬥社」的一封公開信〉，載《無產者》第6期，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茨基和托派國際急切呼籲統一的信後，十分感動，說：「使我們慚愧無地」，「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他譴責那些還熱中於分裂的人是「罪惡」，明確表示：「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捧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眾，這是……我所深惡痛絕的，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即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什麼『光桿』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①

於是，他親自出馬，分別找「我們的話」、「十月社」、「戰鬥社」的頭頭梁幹喬、王文元、趙濟談話，做工作，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天夜裡，陳獨秀通過原與王文元在北京大學的同學，把王文元請到尹寬家中，對王說：統一為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則「老人」太多了^②。對此，王文元也有同感。他說他原以為這批老幹部在托派統一運動中，「本應起最積極的帶頭作用。但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原因在於那大多數老幹部的暮氣太深。在長期的國共合作中，他們中有不少人已被定型為紳士或官僚了；同時做慣了現成的機關工作，今天要他們從一無所有的白地上重幹辛苦的下層活動，就覺得非常的不合適。這個純粹由『軍官』和『參謀』組成的集團卻只有一部分能從事於普通士兵的戰鬥。」^③

① 陳獨秀：〈答列爾士同志〉，《無產者》第9期，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② 陳獨秀：〈對於統一運動的意見〉，《無產者》第11期，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③ 同②第159、155頁。

陳獨秀在與這些年輕人談話後，對「無產者社」講感想時說，他好像在五四運動時同青年人見面一樣，又像在建立共產黨時同青年人見面一樣，覺得他們朝氣蓬勃，很有希望^⑧。另一方面，他召集「無產者社」全體會議，通過他起草的〈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譴責彭述之等人的行爲，指出：「我們各派或各個人過去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觀察確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但這些意見，無論如何不能「做爲分裂的理由，……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賬』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⑨會議不顧彭述之的反對，以「常委」（四票通過，彭一票反對）名義發出〈反對派統一的問題〉通告，向各支部揭露「我們無產者社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了枝節問題，即是認爲……統一須以無產者社爲中心」；「這分明和別派的正統觀念，同樣的不正確，同樣的要阻礙統一。」^⑩同時，陳獨秀又斷然採取措施，召回了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出任「無產者社」的代表。

必須指出，陳獨秀在大刀闊斧地採取這些措施，宣講托派統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時，特別強調了當時中共黨的狀況。因爲當時中共正處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第二次「左」傾路線從統治到垮臺、王明接著上臺的時期。黨內出現了嚴重的混亂。

首先是江蘇省委中以羅章龍、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爲首的一大批老幹部被殺或被開除，使黨的機體受到極大的損傷。這批幹部長期從事工會工作，是傑出的工人運動活動家。他們踏實苦幹，比較了

⑧ 同⑧。

⑨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

⑩ 《無產者》第9期。

⑪ 同⑩第11期。

解並注重中國實際情況，因此對革命運動的許多觀察、感情和見解，常常是正確的。一九二八年五月，他們就以江蘇省委名義作出決議，反對當時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六屆三中全會時，又是以他們為群眾基礎，批判並結束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但是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他們被米夫支持的王明小集團所排斥，攻擊他們是以「右」反「左」。米夫直斥他們「把失敗主義的撤退計劃強加於黨」，是「右傾機會主義者」^①。於是，何孟雄一系列的幹部，完全被排斥在中央之外，反對立三路線的成果，被王明小集團所篡奪。何孟雄等人，非常憤怒，繼續進行反對王明「左」傾宗派主義的鬥爭。但是他們採取了錯誤的方法，獨樹一幟，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另行成立江蘇省委，王克全任書記，反對中央領導的省委。當時，何孟雄等人正在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該會設在上海東方旅社等地的聯絡處遭公共租界巡捕房破壞，大批共產黨員被捕，其中除了何孟雄之外，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林育南、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工作人員李求實、上海總工會秘書長龍大道、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憐雨棠、黨的機關工作者李文、中共上海閘北區委宣傳部長蔡博真、共青團江蘇省委委員兼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歐陽立安、共青團上海閘北區委書記伍仲文、上海總工會組織部長阿剛、中共青島市委書記王素士、左聯作家胡也頻、柔石、殷夫和馮鏗等二十四人。他們受盡酷刑，忠貞不屈，二月七日，被國民黨當局殺害在龍華警備司令部。

何孟雄等人被捕時，王克全倖免，他向中共中央作了檢查，表示退出新江蘇省委，該省委隨即垮臺。然後羅章龍成為反對王明小集團的領袖，不承認六屆四中全會。但是，他們受到托派思想路線的嚴重

^① 巴維爾·米夫：《英雄的中國》第 69 頁，紐約工人圖書社一九三七年版。

影響，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公開擁護托洛茨基，擁護陳獨秀派的主張，在反對六屆四中全會時，同時反對「六大」路線，攻擊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爲了反對王明小集團的篡黨活動，他們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了所謂「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等組織，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在「中央非常委員會」中，「一個傻頭傻腦的工人」當了總書記，羅章龍任中央宣傳部長，徐畏三任組織部長，劉子才任中央秘書長，李大漢任江蘇省委書記。其下屬尚有浙江、江蘇、湖北、河北和滿洲等機關。這是中共建立以來最大的分裂事件。

中共中央很快將羅章龍集團的分子全部開除出黨。接著，王明集團派人到各地開展清除右派的鬥爭。王明親自擔任了當時最重要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職務。他們通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宗派主義手段，大批撤換各級幹部。被王明集團派到湘鄂西蘇區的夏曦，發起了一場清洗A B團分子和托派分子的運動，使大批無辜的黨團員被處決。

以上這些事件，特別是何孟雄等二十四烈士壯烈犧牲，在黨內激起持久而深刻的悲憤，產生了敗壞性影響。失望與消極情緒，一時迷漫全黨。

針對這種狀況，陳獨秀頗有使托派早日統一、取黨而代之、奪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野心。他十分痛心的是，由於托派長期爭吵，使這種時機正在喪失。羅章龍等人從共產黨中分裂出來後，曾想加入托派而又離去，就是一例。陳獨秀說：「現在正是正式黨的領導陷於完全破產，黨內同志及一切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都感覺無出路的時候，……絕對需要我們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紛爭，迅速統一起來，以集中力量並建立反對派在群眾中的信仰」^④；「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

④ 〈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

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面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若不痛改前非，若仍舊要搜索枯腸……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之罪惡。」他大聲呼籲：「從大處著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④；「以最簡捷了當的手續完成統一工作，……立即開始作召集統一大會的準備，政治、組織、職工、農民等決議案的起草委員會立即開始工作。」^⑤

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深深打動了各派代表，終於使協商一帆風順。可以說，中國托派組織統一的實現，得之於陳獨秀最後的推動。

這時又發生了劉仁靜組織「明天社」的事件。托洛茨基多次來信批評劉仁靜，讚揚陳獨秀以後，劉才覺得形勢不妙，只得寫信給陳獨秀承認錯誤，並要求加入「無產者社」。他說過去反對陳獨秀「完全是基於誤會」；「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⑥

但是，「無產者社」討論結果，拒絕了他。陳獨秀回信說：「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一致以為現時已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產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⑦

④ 〈對於統一運動的意見〉。

⑤ 同④。

⑥ 劉仁靜致陳獨秀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載《無產者》第9期。

⑦ 〈答列爾士〉（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載《無產者》第9期。

劉仁靜見拒於「無產者社」，惱羞成怒，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與他妻子兩個人出版了《明天》雜誌（油印的六十四開本），自稱「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明天社）」，並以此要求作為獨立的一派，參加托派小組組織協議統一的會議。別派小組組織認為它是劉仁靜一個人的「組織」，予以鄙視和拒絕。他在給「協委」的信中遺憾地表示：「獨秀同志已向我轉達了協委對我們的請求之答覆，意思是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的小組織，只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這即是說不許我們與聞參加和影響協委的種種決定（制定政綱在內），只許我們在決定既成為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覆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但他又要求參加托派小組組織的統一大會，也被拒絕^⑤。

就這樣，劉仁靜這位有點像中國托派運動鼻祖式的人物，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所排斥和冷落，他於是進行種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

第七節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

四派小組組織重新協商後，決定托派綱領改由陳獨秀起草。為了避免爭論，陳以一九二九年夏天劉仁靜帶回的托洛茨基寫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綱領〉（又稱〈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為藍本，稍加擴充，完成了這個文件，最後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在統一大會上順利通過。

〈綱領〉分五個部分：（一）過渡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二）中國革命

⑤ 〈「明天社」給協委的兩封信〉，《明天》第4期，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失敗的教訓，(三)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四)中國革命的前途，(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

〈綱領〉認為：「我們目前仍處在上一次革命早經結束下一次革命尚未到來的兩個革命過渡時期。」托派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明瞭地了解革命失敗的原因；正確地估計現時的形勢；團結無產階級先鋒隊中最堅決勇敢而能堅持的分子，在過渡時期要求之基礎上，重新與群眾發生聯繫，並且在各種社會生活中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中國革命。」

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綱領〉列了四條：

(一)「黨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被引導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而且斯大林派和馬爾丁諾夫用種種胡縲哲學的『工農黨』甚至『四個階級聯盟』隱蔽該黨的資產階級性，因此，無產階級在最緊急關頭沒有自己的政黨，尤其甚者，所謂共產黨反變成資產階級欺騙工農的輔助工具。」〈綱領〉認為：「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中從未有過類似這樣的罪惡，此應由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靈魂——斯大林負其全責。」

為此，中國托派「鄭重宣言」：

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的政黨或同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的和先決的條件。

中國托派這個立場，規定了它以後始終反對中國共產黨運用革命統一戰線法寶的態度，尤其瘋狂攻擊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二)「帝國主義及殖民地資產階級問題」。〈綱領〉認為：「資產階級

和最反動的封建軍閥的衝突，與外國帝國主義的衝突，比起他們與工人和貧農的不可調和的衝突，在最後一分鐘內永遠退至不重要的地位」；「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持以反對中國工農的，是有國際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為後援，他們比任何的資產階級更要迅速的殘忍的將階級鬥爭變為國內戰爭，以屠殺工農。」〈綱領〉痛斥道：「共產國際領導的最重要的歷史罪惡，莫過於幫助資產階級騎在中國工農的頭上，而且掩護它以抵制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之攻擊。」

(三)「關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問題」。〈綱領〉指出：「我們反對派說無產階級應與小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聯盟，我們指的是被壓迫階級的幾千萬幾萬萬的城市與鄉村的貧民；共產國際說的所謂小資產階級，乃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主要的是知識分子，他們（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以民主政黨和團體的名義利用城市及鄉村貧民，在緊急關頭即將他們賣給大資產階級。」

(四)「蘇維埃問題」。〈綱領〉認為：「蘇維埃是一種組織形式，在廣大的革命高潮時期即應組織」；指責共產國際斯大林在大革命高潮中「妨害中國工農組織蘇維埃，有意剝削他們（工農）的地位，在資產階級面前解除他們的武裝，使資產階級有摧殘革命的可能；以後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企圖在二十四小時內組織蘇維埃，這只是一種冒險罪惡，反使軍人更可肆無忌憚的屠殺英勇的廣州工人。」

〈綱領〉認為，以上四條教訓，也是斯大林的共產國際領導「在中國的根本罪狀」。

關於過渡時期托派的策略。〈綱領〉認為：「貧農游擊隊固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在工業的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運。」又說：「蘇維埃口號在現時若是實行的口號，則只是冒險和高調」，攻擊中共「企圖依靠鄉村散亂的游擊隊來組織紅

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還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綱領〉指出，針對國民黨召集的御用國民會議，托派的策略只能是「要求召集自由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普選而產生的全權的國民會議」。但「我們必須預先聲明：我們的目的，並不在爭取議會制的和平發展，也不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國，而是要求走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

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綱領〉強調下次革命的勝利，「必然是要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政權一開始就要堅決的動搖和推翻城鄉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爲此，〈綱領〉批判中共提出的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及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綱領，指出：「工農民主專政，實質上仍是資產階級專政」，它將在下一次革命中，「替資產階級開放門戶，讓其絞殺革命」。

〈綱領〉最後宣布：

中國反對派目前的任務是：

- (一)統一左派反對派，創立堅強集中的反對派小組織。
- (二)儘量介紹國際反對派的理論，建立集中而堅強有力的政治理論的機關報。
- (三)在主要的工業區域之重要產業中，重新建立黨的核心(支部)。
- (四)在革命的徹底的民主口號之下，重新與群眾發生聯繫，並在各個社會生活中，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革命。
- (五)與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集中組織發生經常的密切的聯繫。

〈綱領〉宣稱，托派執行這些任務，是爲了「復興共產國際」，「挽救共產國際於變節及死亡」。爲此，托派對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策略是：

「它絕不與共產黨的活動隔絕，它在每個問題中採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地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領導作任何的讓步。」——這就規定了托派始終反共的一面。〈綱領〉甚至這樣斷言：「中國共產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臺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此種文字出自曾是中共創始人、並擔任了第一至第五屆黨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之手，殊屬驚人。〈綱領〉還宣稱：「假使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不能獲得關於黨的政策上及黨制上之根本變遷，則共產黨將必趨於滅亡。」⁵⁸

這個〈綱領〉忠實地表達了中國托派對中國革命的全部理論、思想、政策和策略，從而規定了它在思想上只能是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宗派小集團的角色，在政治上則扮演既反國（民黨）又反共、而被雙方打擊圍剿的可憐蟲角色；而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後，必然滾進反革命的沼坑，成爲它的最後歸宿。

統一大會在五月一日至三日秘密進行了三天。會場由「無產者社」負責布置，在上海大連灣路租了一間房子，讓王茨槐帶著妻子、女兒住進，掩護開會。王茨槐原是中共黨員，鐵路工人，由馬玉夫拉進托派，並任「無產者社」滬東區委委員。會議期間，只有陳獨秀一人可離開會場回家，其他人須待會議結束之後⁵⁹。各派按協商的人數，二十人出一代表，「我們的話派」七人：梁幹喬、陳亦謀、宋敬修、張九等香港四個工人；「無產者社」五人：陳獨秀、鄭超麟、江尚師、王茨槐、彭述之；「十月社」四人：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志；「戰鬥社」二人：趙濟、來燕堂。共計正式代表十七名，另有四名沒有表

⁵⁸ 《統一代表大會文件集》（一九三一年五月），油印小冊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委員會編。

⁵⁹ 鄭超麟：《回憶錄》（一九四五年手稿）。〈唐寶林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

決權的列席代表。他們代表了當時原屬四派小組織的四百八十三名成員。

在對參加大會代表資格審查時，發現「我們的話派」組織部長張特與日本特務有聯繫。張本人交代，在他到閩北吳淞路郵局，向托洛茨基寄送每一期《我們的話》及信函時，有一次被埋伏在郵局中的日本特務發現。特務見有人向托洛茨基寄東西，大為驚訝！就跟蹤搭訕，最後脅迫張每期送一份《我們的話》給日本特務機關。日特給了地址，或寄或送都可以。日本人則保護他的安全，假如他們托派被國民黨逮捕，日本負責保釋。大家懷疑他與日本人有更深的勾結，未讓他參加大會，也未選他當中央委員^①。

大會由陳獨秀主持，開始時陳說劉仁靜要求參加，徵求大家意見。大家都不同意，理由是代表都是各派選出來的。劉仁靜是獨立大隊，無人選舉，無資格參加^②。另外，「戰鬥社」的陳岱青未被選上代表，也要求參加大會，說要貢獻意見，也被拒絕。彭述之起先也不是代表，開會第二天才被補選上。

大會討論中國托派名稱時，根據托洛茨基當時提出的托派仍是共產國際內部一派、從內部奪取領導權實行改造的原則，決定沿用陳獨秀派的組織名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或叫「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

在大會上，陳獨秀作政治報告，解釋他起草的綱領。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職工運動問題提綱〉、梁幹喬起草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王文元起草的〈國民會議問題提綱〉。在討論陳獨秀提草的另一個文件〈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時，

^① 〈唐寶林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

^② 同^①。

其他三派代表協商後決定在紅軍問題上壓一壓陳獨秀，發生了爭執。王茨槐出來調解，謊報外面有人來刺探會場，於是〈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未付表決，決定交特別委員會繼續討論。選舉也是在這種緊張氣氛中草草進行的^⑭。

大會選出了陳獨秀、鄭超麟、陳亦謀、王文元、羅漢、宋逢春、張九、濮德志、宋敬修、彭述之等十三人，組成「全國執行委員會」^⑮。其中九個委員，四個候補委員。

他們合併了各派在上海的小組，其組織約略等於黨的規模，分成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法南四個區委。另外還設立了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委和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區委。華南區委的特點，主要在工人中活動；華北區委書記是汪澤楷，委員有徐雲作、耿堅白等。他們在一些大、中學校中影響較大，教師和學生中都有他們的人。如北京大學、民國學院、北平師範大學、女師大、燕京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學院及一些中學裡，都建有托派支部。北京大學的托派頭目是李子翼(季燕)，還有閻子柱、石寶瑚、王樹本等。教師中，中國大學的教授劉侃元、玄心一比較活躍。他們組織讀書會，叫「馬列主義學習團」，還公開講演，發表文章，反對斯大林路線，說中國現在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應該直接搞無產階級革命，攻擊中共講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行民主革命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等等。

擁護中共的是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黃松齡、范文瀾、李達等。開起會來托派常與擁護共產黨的師生爭論，從中國社會性質、革

⑭ 《統一代表大會文件集》(一九三一年五月)。《雙山回憶錄》第159頁。〈唐寶林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

⑮ 托派中央的這個名單，係根據鄭超麟、王文元、濮清泉(即濮德志)、宋逢春四人回憶綜合而成，四者互有出入。

命對象、任務，一直到道路。他們主張國民會議運動，反對農民暴動和建立紅軍及蘇區。爭論激烈時，兩派就掄起板凳大打出手。

托派主要是組織讀書會吸引青年學生，出版一些油印小冊子，混在進步書籍中，在東安市場等小書攤上出賣^⑤。

此外，張家口、青島、淄博、德州、西安的托派支部，也屬於華北區委領導。

據估計，全國托派人數最多時在五百人以上^⑥。

⑤ 〈唐守愚訪問記錄〉（一九八二年七月）。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唐守愚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李爾重訪問記錄〉（一九八二年六月）。

⑥ 周仁生：《關於早期中國托派情況》。

第四章 夾攻中的顛仆與掙扎

第一節 向中共挑起社會性質的論戰

自從發生「五四」、「五卅」運動以來，中國的五月成了紅色的禮拜日。五月統一大會的成功，使中國托派充滿了希望。當時，國民黨各派激烈爭鬥，國民政府的表面統一，掩蓋不了四分五裂的真相。共產黨由於王明「左」傾集團的倒行逆施，正陷於混亂之中，大有分崩離析之勢。托派認為，這給他們帶來了最好的機運：取代共產黨，打倒國民黨。

陳獨秀在統一大會的閉幕詞中滿懷激情地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擔當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❶王文元回憶說：「中國托派那時確實呈現了新氣象，遠大的憧憬鼓舞了每一個同志的心。」^❷他們給托洛茨基拍了一個電報，喜氣洋洋地告訴他：「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之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❸

五月五日，他們召開了托派中央一屆一中全會，選出了中央書記

❶ 濮清泉（即濮德志）：《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❷ 《雙山回憶錄》第164頁。

❸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寫給國際書記處和托洛茨基的信》（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原件藏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托洛茨基檔案。

處：書記陳獨秀、組織部主任陳亦謀、宣傳部主任鄭超麟、黨報主編王文元、秘書宋逢春。決定責成組織部長陳亦謀儘快把四個集團的基層組織合併起來。指派吳季巖、趙濟、嚴靈峰三人參加宣傳部，協助鄭超麟開展宣傳工作。責成王文元迅速出版中央機關報第一期。該報定名為《伊斯克拉(Iskra)》，一般譯成《火星報》，原是列寧在一九〇〇年歐洲進行地下工作時主編的全俄第一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報紙。它在建立俄國工人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過程中，以它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列寧火星派」，並在俄國許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等）建立了列寧火星派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蘇聯共產黨的前身）小組和委員會。後來它終於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中國托派中央機關報用這個名稱（用《伊斯克拉》的名稱出了幾期，後來改為《火花》），自然希望它的命運也會像列寧的《火星報》一樣，變成燎原烈火。為此，他們決定全面出擊，同時進行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國民黨的鬥爭。

在反對共產黨方面，早在統一前他們利用自己掌握或影響的宣傳陣地挑起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進入了高潮。

托派分子主要靠賣稿為生，托派組織的活動經費，也靠此維持，尤其是賣譯稿，因為他們多數留過學，懂一點外文。但是，他們所以能這樣，又與當時中國及上海的特殊歷史環境有關。

上海原是全國出版中心。大革命失敗後，中國人民尤其是革命知識分子，感到徬徨與迷惑，痛苦地覺悟到沒有革命的理論而盲目地追隨遠方的指導來行動，是多麼地可悲，革命無論順利還是最後失敗，都不知道為什麼。於是大家在遭到殘酷鎮壓慘重犧牲後，痛定思痛，掀動了一股追求革命理論的熱潮。在上海，小型的書店（兼出版）像

雨後春筍似地出現，都以出版社會科學書籍和雜誌為時髦。這些書店的投資者成分極其複雜，純粹的商人較少，官僚軍閥者居多。這些政客軍人一般是受了國民黨蔣介石一派的排斥，帶有南京政府反對派的傾向。他們交托給直接或間接的朋友搞點「文化事業」，是為異日再起時撈一點資本。於是托派就乘機利用這些書店，如神州國光社、新生命書店、辛壑書店、南強書社、亞東圖書館等，辦雜誌，出譯著，寫新書，大肆宣傳托洛茨基主義，攻擊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路線，同時以賣稿得來的稿費維持個人的生活和托派組織的經費。這是當時上海托派分子所以能聚集較多，搞成一點小氣候的政治背景和經濟原因。沒有這個條件，那些離開了文字手段難以謀生的人，很難較長時間聚集在一起，中國托派運動也就很難搞成那樣的聲勢。

神州國光社，一九〇三年開設，原是專營碑帖美術書畫的小書坊。一九三〇年，正與鄧演達一起組織反蔣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三黨）的國民黨廣東派陳銘樞，到處招兵買馬，看中了神州國光社，想通過它在上海占一塊地盤，網羅知識分子，同時又拉攏十九路軍為後盾，建立起一支文武雙全的反蔣力量。為此，陳銘樞先派其幕客陳孚木、曾顯聲入社，以巨額投資操縱了經理權，使之成為第三黨陳銘樞所屬的文化與政治機關，以此為據點，收買人才。起先聯絡了一些共產黨方面的人，如潘梓年、潘漢年、錢杏村、孟超、李一氓、馮乃超、李初梨等為其譯著了一批作品。不久，陳銘樞又派親信劉樹模和王禮錫，分別任該社的總經理和總編輯。實際主持人王禮錫會吟點舊詩，以詩人自命，但對出版事業一竅不通，尤其對社會科學知之甚少；對政治也十足外行，沒有成見，完全是個書呆子式的人物。但是，他又愛左傾，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賣弄幾個社會科學的名詞，他都延攬之惟恐不及。在事業上，他又每嘗以蔡元培自況，

主張兼容並蓄，所以左、中、右的東西都要，共產黨、托派、改組派的書文，一視同仁。

然而，這種狀況維持不久。一是由於共產黨自身「左」傾錯誤的影響，劃地爲牢，逐漸與這種所謂「反革命」的第三勢力劃清界限；二是書社與「無產者社」的劉伯垂關係密切，於是中共方面的人就紛紛離去，斷絕了來往，而托派分子的大量譯作卻源源不斷地湧了進來。

劉伯垂又名劉毓芬，湖北人，大革命時期得林伯渠提攜，任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秘書長，武漢政府司法廳廳長，與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陳銘樞過往甚密，又是書社總經理劉樹模的堂兄。所以通過他的關係，托派分子的書稿很順利地被接受了，如劉仁靜（劉鏡園）譯、托洛茨基著的《我的生平》，高衡（高素明）譯的《社會形式發展史》，濮德志譯的《工資價格及利潤》、《雇傭勞動與資本》，杜畏之譯的《戰鬥唯物論》、《自然辯證法》，陳岱青譯的《中國農村經濟》，王平一（王伯平）譯的《蘇聯黨爭文獻》，趙濟譯的《土地問題》，嚴靈峰著的《中國經濟問題》，薛農山著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王凡西譯、克魯泡特金著的插圖本《法國革命史》，還有彭述之、王獨清、彭桂秋、吳季嚴、高語罕等，都有書稿賣給神州國光社，並且除個別被國民黨中宣部審查時被扣留外，一般都能出版，薛農山因此進社當了編輯。與共產黨進行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陣地《動力》和《讀書雜誌》，也是該社出版的。因此，托派與該書社的關係顯得特別密切。當時一些人認爲，「動力派」劉仁靜、彭述之、吳季嚴、嚴靈峰、任曙等人，是陳銘樞的「理論班子」。後來劉仁靜、嚴靈峰、任曙等人還一度加入了陳銘樞組織的「社會民主黨」。

新生命書店是國民黨改組派周佛海辦的，因辦有《新生命》月刊

而得名，同時因出版周佛海的三民主義理論著作《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而出名^④，主持者是陶希聖和樊仲雲。他們是極右翼，卻又要偽裝左傾欺騙群眾，於是就出一些托派的書稿，如劉胤譯、考茨基著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趙濟、劉胤、李俚人合譯、魯賓著的《經濟思想史》，趙濟譯、柯金著的《中國古代社會》等。

辛墾書店是被稱為「共產黨叛徒」的任卓宣（即葉青）用四川軍閥的錢開辦的^⑤。托陳派骨幹劉伯莊與他是小同鄉，又是赴法勤工儉學同學，通過這個關係，也出了一些托派的書。任卓宣本人雖然從未加入托派組織，但他專門用托派觀點及所謂「三民主義」的觀點攻擊中國共產黨，後來還寫了一本《毛澤東思想批判》的書，系統攻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因此人們都把他看成是「托派」。

南強書店是第三黨人辦的，老板陳卓凡和經理王鼎新過去與周恩來關係較好，現在又通過林伯渠、杜國庠（林伯修）與共產黨的「社聯」發生關係，出了一些「社聯」的書。他們不出反動的書，但對形左而實右的托派的東西沒有抵制^⑥。

亞東圖書館的老板汪孟鄒與陳獨秀是莫逆之交，並以出版陳獨秀、胡適作新式標點符號的《紅樓夢》、《水滸傳》及《獨秀文存》、《胡適文存》而出名。由於這種與陳獨秀的關係，所以該社與托派的關係之深是可想而知的。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文章、文件（包括共產國際「六大」前後寫的那兩篇綱領性文件）最早的匯編本《中國革命問題》（由

④ 周佛海：《往矣集》第61-62頁，古今出版社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版。

⑤ 王學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鬥爭情況》，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一年第3期，文中說任卓宣即任曙，不對，二任是二個人。前者並非托派，後者是托派。

⑥ 訪問柯柏年記錄。

劉仁靜、王文元、鄭超麟等人譯)，就是由亞東出版的。但是汪孟鄒很精明，在當時複雜的環境下，他不願意把自己綁在一派身上，他出書「只講銷路，不講派；實際有派，但表現不是派」。所以共產黨的東西拿去也可出版。而且爲了在國民黨統治下能站住腳，他聽從陳獨秀的意見，把書社辦得較爲灰色，完全政治性的明顯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東西不出，文藝的有銷路，出得較多^⑦。

以上這些書店，再加上托派直接控制的新宇宙、滬濱、天馬等，表現出托派在這個領域相當的活躍。共產黨方面，由於大革命失敗時及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使城市的革命力量受到極大的摧殘，接著「左」傾路線又冒險蠻幹（堅持出紅色書刊，黨的出版宣傳陣地不斷被封而縮小），或作繭自縛（不願利用灰色合法中間派的書店），致使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上海理論界和出版界的托派勢力一度占了上風。曾猛曾自誇說：「那時中國的理論界掌握在托派手裡。」^⑧他們利用這樣的條件，向中國共產黨挑起了一場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

這場論戰的序幕，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就揭開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爭論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社會性質是什麼。前者認爲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的資本主義國家；拉狄克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講壇上竭力宣傳這種觀點，使中國留學生深受影響。斯大林則認爲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及與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和組織部長周恩來的談話中，用托洛茨基的觀點正式向中共中央挑戰。黨沒有接受他的意見，進行了批駁。於是，從一九三〇年開始，托派與共產黨開展了一場大論戰。

托派分子嚴靈峰打頭陣。他是福建省連江縣黃歧鄉人，一九〇四

⑦ 訪問柯柏年記錄。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

⑧ 轉引自周仁生：《關於早期中國托派情況》（周曾任托派中央委員），未刊稿。

年六月十九日生。一九二四年畢業於福建省立第一師範，旋入福建大學肄業。一九二九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歸國後任上海藝術大學教授，主講政治經濟學及哲學概論。在這次論戰中，他在吳季嚴主編的《動力》雜誌上發表了托派觀點的代表作：〈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再論中國經濟問題〉^⑨，後來以這兩篇為主，又加了一篇〈我們的反批評〉及〈序言〉，編成《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書，一九三一年六月由新生命書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他還寫了《追擊與反攻》一書，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因托派以《動力》雜誌為主要陣地，在這場論戰中，他們被稱為「動力派」。任曙為了批駁共產黨以王學文為代表的觀點，在東方圖書館花了整年的功夫，寫了本《中國經濟研究緒論》的書^⑩，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第二年二月又出了修訂版。另外，他還在《讀書雜誌》上寫了好幾篇文章。在嚴、任吃了敗仗，真面目被揭穿，聲名很臭之後，劉仁靜又參加進來助陣，寫了〈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和〈中國經濟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預測〉，刊登在《讀書雜誌》一九三一年八月的第一卷第4、5合期上和一九三二年三月第二卷第2、3合期上。

在這些論著中，他們擺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架勢，引經據典，把托洛茨基、拉狄克已經用過的破爛重新搬出來，胡說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把帝國主義為了掠奪中國而建立的殖民地經濟以及農村商品經濟和高利貸，都說成是資本主義經濟，從而論證出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的資本主義社會，以此來否定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從根本上取消土地革命和農村

⑨ 二文分別載《動力》第1、2期，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和九月三十日出版。該雜誌就出了兩期。

⑩ 王學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鬥爭情況》。

武裝鬥爭。當時國民黨在向南方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的同時，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也發起了進攻，企圖扼殺革命理論和革命思想的傳播。代表國民黨進行這場文化「圍剿」的幹將之一就是主持新生命書店和《新生命》月刊的陶希聖，時稱「新生命派」。他在《新生命》上先後發表〈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中國之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等文章，歪曲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狀況。但是，他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公開的國民黨文人和政客，欺騙作用有限。這些托派理論家以「左」的面目出現，又從陶希聖同一個戰壕裡發出攻擊，則密切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中共中央以宣傳部（部長李立三）、中央文委（書記潘漢年）領導革命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組織「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和托派的進攻進行反擊。中共為「社聯」規定的任務是：「（一）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及國際的政治經濟，促進中國革命；（二）研究並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於一般；（三）嚴厲地駁斥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及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社會民主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及機會主義；（四）有系統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擴大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根據這些任務，革命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積極地開展了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投入了文化反圍剿和對托派的鬥爭。

一九三〇年四月，「社聯」的刊物《新思潮》月刊第五期出版了〈中國經濟研究專號〉，發表了潘東周（又名潘文育，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

● 〈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綱領〉載《世界文化》創刊號，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出版。

中央機關報《紅旗》的主編)的〈中國經濟的性質〉、吳黎平(即吳亮平,代表中央宣傳部參加「社聯」工作)的〈中國土地問題〉、王學文(「社聯」黨團成員)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李一氓(也是代表中央參加「社聯」工作)的〈中國勞動問題〉等文章。其中潘東周和王學文的文章是代表作。由於李立三主持全黨的工作,這場鬥爭具體由潘東周領導^⑩。因為「社聯」的文章主要發表在《新思潮》上,所以時稱「新思潮派」,與托派的「動力派」對壘。他們的文章著重從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的關係、民族資本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農村土地關係等方面,分析了中國經濟的性質,給托派的謬論以有力的駁斥,揭穿他們採取混淆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這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以及把殖民地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混為一談的伎倆,實際上是在「左」的詞句偽裝下,讚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反動統治者效勞,取消中國革命。

與此同時,共產黨還在一些大學裡組織進步教師和青年學生,利用講壇、學術討論會、講座、談書會、牆報等多種形式,進行學習和批判。

這場論戰在當時社會上規模較大,影響較深,除《動力》、《新思潮》之外,多數社會科學出版物參加了論戰。「動力派」和「新生命派」看上去氣勢洶洶,但由於他們的理論是錯誤的,經不起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南方農村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實踐的檢驗,所以最後他們的觀點都被進步的人士所唾棄。馬克思主義在鬥爭中擴大了陣地,使更多的人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

^⑩ 〈訪問吳亮平談話記錄〉(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節 國民黨對托派的第一次毀滅性打擊

在反對國民黨方面，托派準備為「國民會議」進行廣闊的鬥爭，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陳獨秀以為這次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意志來進行中國革命，不再受「老毛子」的干涉了，並且不久將代替在混亂中「解體」的共產黨。

正好在托派統一大會期間，國民黨搞的「國民會議」進入高潮。

孫中山晚年曾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後來並把這個主張寫在他的遺囑中，但蔣介石上臺後，公然宣稱無須召集國民會議和由此會議制定約法。於是，在野的西山會議派、改組派進行反蔣鬥爭時，就以召開國民會議和制定約法為號召，並在一九三〇年七月，聯絡閻錫山、馮玉祥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正式議決「召開國民會議，制訂約法」。他們確認這是打擊蔣介石的有力手段。

蔣介石在鬥爭中吸取了教訓，懂得了應該使用兩手，在武力統一的基礎上，抓住「國民會議」；由國民會議制訂「約法」。這樣，不但可以堵塞反對派的藉口，還可以使他的獨裁統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因此，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初，蔣介石對閻、馮的中原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他便從開封專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要求「確定召集國民會議」，「制定在憲法頒布以前訓政時期適用之約法」。經過半年多的籌備，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正是托派一屆一中全會召開的這一天，蔣介石掌握的「國民會議」正式開幕了。

會議匆匆地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約法以國家根本法的權威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對人民的各種「權利」和「自由」，

沒有任何保證，反而為接著制訂無數的「法」來限制和取消人民的各種活動，創造了前提。關於「國民生計」，連孫中山主張的平均地權也隻字未提，只規定「國家應興辦油、煤、金、鐵礦業」，「國家應創辦國營航業」，「工商業之專利、專賣特權屬於中央」等等。

針對這種蔣介石由不召開「國民會議」轉變為召開「國民會議」的情況，托派認為他們對形勢的預計比共產黨「英明」，「國民會議」的策略也比共產黨武裝鬥爭的策略正確，切實可行。他們決心為國民會議而進行廣闊的鬥爭：一方面揭露國民黨假民主真獨裁的真面目，一方面利用這種假民主，充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從而為最後武裝群眾，奪取政權開闢道路。為此，陳獨秀起草了一篇很長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聲討國民黨統治四年來的種種罪惡，徹底揭露國民黨搞御用「國民會議」假民主的陰謀，宣言：「中國人民不能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下，受盡帝國主義軍閥的蹂躪了！」「號召」一切被壓迫民眾起來奮鬥；「召集群眾的國民會議預備會」；「各業工人否認國民黨的工會法，自由的組織自己的工會」；「農民自動平均土地」；「反對國民黨屠殺農民及共產黨」等等。

陳獨秀為首的托派中央，以為接過執政黨「國民會議」的口號，為真正的國民會議而進行合法的鬥爭，會像西歐國家那樣，得到當局的允許，而使他們領導的國民會議運動在中國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但是，他們犯了兩個錯誤：一是高估了托派自身組織的穩定性和戰鬥力，二是低估了蔣介石政權的性質。國民會議運動還未真正開始，他們自身的組織就在內亂外壓夾擊之下，很快瓦解了。

由於他們的路線是根本錯誤的，所以，這樣的組織是經不起任何考驗的。統一後的托派，並不如他們想像的那樣興旺起來，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斷的背叛、瓦解和破敗的泥坑中，原來隱藏著的那些矛

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發出來了。

首先，對於統一大會，由於在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中，自認「元勳」的「我們的話派」明顯處於劣勢（常委中「無產者社」、「十月社」、「我們的話派」三組織的比例是二：二：一；中央委員會中是三：三：三，而兩機構的實權更是操在「無」、「十」兩派手中），「戰鬥社」則完全被排斥在外，所以，對統一大會的評價發生了分歧。得利的兩派認為，大會堅持了原則，堅持了正義，優勝劣汰，理所當然；失利的兩派認為，大會是「無產者社」和「十月社」勾結包辦，陰謀壟斷，排斥異己，自己是受害者。其中受刺激最大的是梁幹喬，他本打算讓陳獨秀當上托派中央書記後，就推陳到土耳其托洛茨基身邊去工作，任中國托派常駐托派國際的代表，而由他梁幹喬來代理書記。結果落空。統一大會選舉時，他和彭述之票數相同，却是最少；補選時他落選了。梁認為自己被排擠。其他派人認為梁作風跋扈，不得人心。又有人說是由於香港幾位工人代表不認識梁所致。於是，他和陸一淵首先跑到南京，向國民黨投降，並公開發表聲明，聲稱共產主義理論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還沒有「建立健全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懷疑」和「失望」，並說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正是現存的無產階級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純粹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們，落到中國現實環境上必然發生的心理現象。」●陸一淵則誣蔑「中國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的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

托派一直把自身視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把托洛茨基主義視為「真正的共產主義理論」，梁、陸的背叛和聲明，從反面宣告了他們

● 梁幹喬：〈回憶與展望〉，《蘇俄評論》第1期。

● 陸一淵：〈以前種種〉，《蘇俄評論》第3期。

對托派事業的幻滅。他倆投降後，住在南京「留俄歸國學生招待所」。

這個「招待所」由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長方覺慧親自主持，採取「優待」（實是軟禁）的辦法，免費提供一日三餐和零花錢，對投誠者實行審查改造：當局提出若干問題考核，被考者每日一次思想匯報，審查三至六個月，認為合格者，發給證件，介紹職業，一般都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不合格者，延長審查期，或轉移到別處去「反省」。

梁幹喬、陸一淵投降後，立即幫助國民黨，利用「招待」條件，對托派做瓦解工作，使一大批對托派事業絕望又不願自謀出路的人，紛紛投入國民黨的懷抱，如陸夢衣、張師、解叔達、徐乃達、王新衡、劉漢卿、蔣先啓、兪季虞、劉重華、王寶禮、劉楚衡、傅勝蘭、宋玉田、朱漢傑等。

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國民黨的軍統或中統特務，反過來專門從事追捕共產黨員或未投降的托派分子。尤其是梁幹喬，起先他以曾是廣州黃埔軍校同學的身分，投靠戴笠。那時蔣介石正以「黃埔系」為基礎籌建軍統特務機構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梁幹喬與戴笠等人結成「十人團」，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他又是籌組「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於他反共有功，頗受蔣介石和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的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內部的工作。抗戰爆發後，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企圖發展個人勢力，私自收容各地流亡青年八百多名，辦了一個訓練班，向胡宗南等要了幾百支槍，請憲兵團派了一批憲兵幫助訓練，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戴兩次派人拿著他的手令，把這批學生硬是帶走了。於是梁幹喬就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該部隊政治部主任，並又吸引一批托派分子當助手，專門從事破壞延安的反革命活動。後來，梁幹喬鬱鬱而終，病死在耀縣任上●。

張師也先後擔任過軍統上海區書記、南京總處書記長^①。抗戰勝利後，他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保護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托派組織「相當安全地在上海進行活動」^②，一九四九年後逃往臺灣。

「無產者社」雖是統一大會的得利者，也因分利不均而發生內訌。先是尹寬，乃是為「無產者社」的創立和發展、為托派統一做了許多工作的人，由於受到彭述之等人排斥，連大會代表都未當上（統一大會前夕被推倒，彭述之取而代之），更未被選入領導機關，於是就聯絡羅世瑀、薛農山、及嚴靈峰、杜畏之、陳岱青等，組成聯合「反對派」，控制幾個支部，進行反對「中央」的活動。而馬玉夫這個被托派視為工人運動領袖、轉向托派時從共產黨內拉出好幾個工人支部的人，自認為托陳派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進入最高領導，舍我其誰，沒有想到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於是，他竟去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致使「統一大會」後不到二十天，即五月二十二日，托派中央即遭破獲，除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因馬玉夫不知地址而倖免外，其他中委悉被逮捕。五個常委，捕去四個。

這些被捕的人，在龍華警備司令部拘押了半年多，然後判刑：鄭超麟十五年，何資深十年，王文元、陳亦謀、宋逢春、江尚師、樓國華五年，濮德志因為花了一點錢，又托許世英打了招呼，輕判為二年半，最後分別送進蘇州監獄和南京第一軍人監獄。

在拘留所和監獄中，他們同關向應、李震瀛等許多共產黨員關在一起。在獄外，他們與共產黨誓不兩立，鬧到被開除出黨；中共也把

① 沈醉：《軍統內幕》第25、26、43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② 同①。

③ 周仁生：《關於早期中國托派情況》，未刊稿。

他們視爲「反黨」、「反革命」。在獄中，雙方面對共同敵人的迫害和死亡的威脅，關係緩和得相當友善，相互間談話亦無所顧忌。黨員都能平心靜氣地聽他們講述托派的立場和主張，生活上更是互相照顧，鬥爭中互相鼓舞。托派分子照顧李震瀛就是一例。

龍華司令部拘留所被稱「肉票窩藏所」。在此拘留期間，按照「犯人」身分，只要交出相應數量的錢，就可以贖買出去。當時有許多黨員，由組織贖買出去了。李震瀛是中共建黨初期的老黨員、北方工人運動的領袖、中央委員。他在龍華「肉票窩藏所」時，理應首先被贖買，但由於他曾贊成何孟雄等反王明鬥爭，被當時王明中央視爲異端，不予理睬，非但不去贖他，甚至經由「紅色救濟會」（全名是「國際革命者救助協會」，是國際組織，目的在援助全世界被迫害的革命者，特別救濟在獄的人，其對象不限於共產黨人）送進來的接濟品，李震瀛也都沒有份拿到。托派王文元、鄭超麟等就幫助他一些小菜及日用品等。後來，李幸而獲釋，又是靠他們介紹的社會關係，才使他不致在出獄初期淪爲乞丐。

托派犯人在初審後，被加釘重鐐，難友們（全是共產黨員）以爲他們要帶出去槍斃，對他們異常同情，甚至有請他們吃紅燒豬肉（當時龍華司令部中唯一可以辦到的上等菜）來送行的。轉移到蘇州監獄後，先他們托派而來的共產黨人，已住了一至三年的長時期，與實際政治脫離已久，和黨的生活更是隔膜。多數人不知有什麼「立三路線」或「調和派」，更不知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爭。因此，他們不懷任何成見歡迎這幾個托派分子的到來，並向他們提出要求，請他們比較客觀地將幾年來黨內分成兩派的原因和雙方論據寫出來，讓大家閱讀和討論。王文元站在托派立場寫了這個材料，經共產黨員傳閱後，雖未出現托派希望的「動人的轉變」，也沒有出現把他們視爲異己，斥爲「反

革命」的現象。相互間仍非常友善和親熱。

獄外的托派組織經過馬玉夫出賣和中央機關這一次大破獲的震蕩，又發生崩裂現象，一大批托派分子認為托派已經滅亡，作鳥獸散，各奔前程。

首先是原「我們的話派」的頭目張特、史唐及秦強等，本來對統一大會排擠本派不滿，現在頗有幸災樂禍之感。張特在五月二十二日托派中央機關破獲時，當場被捕，但他又乘混亂中帶著手銬當場逃脫，更加深了大家認為他與日本特務勾結的懷疑。當時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要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對抗，搞地方自治，正在上海招賢納士。於是，張特就與史唐、秦強、胡蘭澄等人離滬到廣西投靠桂系去了。他們曾在南寧一中和師專等教書，在講壇上散布托派觀點，結果，為四十年代的中國托派，培養了不少領導骨幹，如毛鴻鑑、丁毅、蘇燕海、黃鑑銅、林華、李培等。張特在抗戰時期曾任安徽民政廳長。一九四七年改任廣西民政廳長。廣西人李血淚也去投靠了桂系軍閥，改名李文釗，主持一個話劇團的工作。另外，參加過紅場上反斯大林遊行的朱懷德、楊華波，也都投靠了國民黨。朱在航空委員會任職。後來蔣經國回國高升，他又去投奔蔣。

「無產者社」的馬任之，在他主持的滬濱書店被查封後，去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時，他隨李覺起事，向人民靠攏，立了功，在新中國做到副廳長。江尚師則跑到華北參加了宋哲元的部隊，抗戰時在重慶任陸軍大學政治教官。王茨槐因在托派中央裡住機關，與王文元等一起被捕，後因是工人，沒有什麼證據，無罪釋放，隨後就離滬，靠了他原是鐵路工人的關係，在修築浙贛鐵路工地上做小工謀生。

「戰鬥社」的劉胤，因為賣稿給新生命書店，與書店老板樊仲雲、

陶希聖拉上了關係，就改名李建華，由樊、陶介紹進了復旦大學教書，兼做國民黨的文化特務，一九三四年病死。張興世去華北投靠了軍閥張殿英，在第四十一軍政治部效勞。抗戰時到陝西，做過縣長。徐乃達、解叔達和來燕堂，也都去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成爲追捕陳獨秀和共產黨員的鷹犬。

原「戰鬥社」成員閔蔭昌和「十月社」成員段子亮，因不滿統一大會，曾結成獨立組織。他們自認出身工人，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應該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批判陳獨秀爲首的托派中央及尹寬爲首的「反對派」是代表小資產階級，進行分裂活動。但托派中央被破獲後，他們也作鳥獸散。閔蔭昌回雲南，段子亮去大連，都脫離了托派。

另外，王文元的妻子葉英，濮德志的妻子張穎新，在丈夫被捕後，都另找男人。葉英與薛農山同居了一段時間，後來到重慶一個國民黨機關裡工作，又有新歡。張穎新嫁給了王昌耀，回到山東老家。據說抗日戰爭期間，二人還搞了一支游擊隊，打日本鬼子。

托派中央被破獲後，陳獨秀著手重整領導機構，吸收尹寬、宋敬修、蔣振東等人加入，但到八月份，又受打擊。某日，尹寬受陳獨秀之托召集滬西區委會議，研究該區托派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會議在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舉行，中央組織部長宋敬修臨時代陳獨秀主持會議^⑩（另有兩種說法：一、尹寬說，他們看見當時沒有領導機關，他聯合幾個同志在福州路一個旅館開會，要建一個領導機關。二、宋敬修則說，當時已有領導機關，尹寬聯合一部分人搞小組織，他宋敬修聞訊去旅館勸阻），是夜，因一個與會人是特務，出賣了他們，與會者全體被捕，其中除尹、宋外，包括蔣振東、劉毅、金鴻圖、孫玉傑

^⑩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局前身）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臺灣文海出版社。

等，一共七、八人。

宋敬修被捕後，瘐死獄中。五月被捕的陳亦謀也是如此。宋在「我們的話派」中被稱為從事上海工人運動的「艱苦卓絕的革命家」。陳亦謀在思想與文采上雖不逮區芳，但苦幹精神則猶過之。區芳在統一大會以前就已死在上海漕河涇監獄裡。就這樣，「我們的話派」中三位被托派群眾尊敬為最傑出的人物，都葬身於國民黨的監獄中。該派其他骨幹又多投降國民黨，成為殘害革命黨人的幫凶。「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我們的話派」）這個中國托派的奠基組織，就是這樣瓦解的。

宋敬修、尹寬被捕後，陳獨秀又把吳季嚴等人吸收入中央委員會。但是，一九三二年春，在中山公園，吳又被已經叛變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認出（因吳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被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在抗戰爆發前，家屬托請唐生智保釋。出獄後，脫離托派，改名吳希之。抗戰時曾去福建劉建緒處做事。東南淪陷後，舉家流亡到四川江津，對舅舅陳獨秀的晚年生活有所照顧。陳去世後，他到江西贛州投奔莫斯科留學時期的至交蔣經國，任蔣辦的江西出版社總編。抗戰勝利後，又隨蔣去長春，做「接收」東北的工作。嗣後去上海，在趙君邁手下的漁業管理處任高級職員。一九四九年後，從事翻譯工作，一九五二年八月，患腦溢血去世。

一九二七～一九三一年，「我們的話派」的迅速崛起，又急速消亡的歷史，已經表明了托派在中國的命運。但是陳獨秀、彭述之、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等人，似乎都不願面對現實，不吸取教訓，改弦更張，還要蠻幹下去，在希望與監獄中掙扎，直到徹底滅亡。

第三節 陳獨秀推動抗日反蔣

托派重要骨幹接連被捕，組織大傷元氣，並呈分崩離析之勢。但陳獨秀並不氣餒，他多次收拾殘局，重振旗鼓，然而，又多次失敗，很長時間收不攏來。所謂「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個人。羅漢處於消極狀態。

即使弄到這種地步，陳獨秀與彭述之之間也合作不好。由於協商統一期間的糾紛，他們二人的關係搞得很僵。「常委會」上，兩人常常爭吵，不歡而散。

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主要由於陳獨秀的努力和形勢的推動，托派中央的工作還是開展了起來。

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終於問世。十二月，又創辦了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報《校內生活》，這兩個刊物都是油印的。據當時擔任刻印工作的曾猛說，他的住房（又是工作室）房租、伙食費、以及蠟紙、油墨和紙張等等的費用，「都是由陳獨秀一人負擔」^⑩。陳獨秀當時主要的經濟來源是《獨秀文存》及一些文字學論著的稿費和版稅。在這兩個刊物上，陳獨秀為首的托派中央，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或「常委」的名義，發表了大量的宣言、決議、通告之類的文件和署名「獨秀」、「雪衣」的文章。有的還以傳單形式，廣為散發，引起了國民黨和社會各界的注意。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戰，達到了高潮。蔣介石在此浪潮衝

^⑩ 曾猛：〈火花的情況〉，未刊稿。

擊下曾被迫下野，國民黨出現了統治危機。這引起了陳獨秀爲首的托派中央極大的興趣。

尤其是陳獨秀，他看到在這場抗日民主運動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學生，發揚「五四」愛國運動的光榮傳統，從請願遊行，到搗毀上海、北平、浙江、山西等地的國民黨黨部和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給了當時執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國民黨政府以沉重的打擊，以及因此遭到的血腥鎮壓，就根據他在「五四」、「五卅」運動中的經驗，爲了給運動以更大更直接的影響，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創辦了一個類似五四時期《每週評論》和五卅時期《熱血日報》那樣的刊物——《熱潮》週刊，並自任主編。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自辦刊物。該刊是鉛印的正式印刷物，遠比《火花》和《校內生活》考究。目前發現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共出了七期。據當年應陳獨秀之約、以「胡年」筆名在《熱潮》上發表文章的劉仁靜說，也就是出了這七期。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後，就停刊了，轉而大量印發傳單，進行更及時更廣泛的鬥爭。《熱潮》每期重要文章皆陳獨秀所撰，以「頑石」或「三戶」筆名發表。陳獨秀所以取「三戶」筆名，來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個典故，以示自己當時力量雖小，將來定能推翻國民黨龐大的統治機器^②。此外，《熱潮》每期還有一組似匕首投槍之類的「時事短評」，共一百零二篇，據劉仁靜說也都出自陳獨秀的手筆，別人寫不出來。

陳獨秀寫的《熱潮》「發刊詞」宣稱：「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飢寒奴隸向一班寄生蟲算賬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算賬的熱潮；這兩種熱潮，雖是時有起伏

^② 〈訪問劉仁靜記錄〉（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唐寶林訪記。

而不是一直高騰，其結局將無物能與之抵抗，特別是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凶焰開始決鬥時期，在這一次決鬥中，將是他們的凶焰薰溷我們的熱潮，還是我們的熱潮淹滅他們的凶焰，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最後表示：「本刊之發行，便是要為熱潮做一小小記錄，也要供給熱潮一點小小動力。」

那麼，《熱潮》是怎樣給當時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熱潮供給「動力」的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譴責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和英、美帝國主義袒護日本、欺壓中國的行徑，主張「對日絕交」、「對日宣戰」^①。

抨擊蔣介石、汪精衛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在日本侵略面前，蔣介石自認無力抵抗，不僅令數十萬東北軍「嚴禁抵抗」，致使東北三省很快淪陷，還進一步指使中國駐國聯代表顧維鈞提出了中國軍隊從錦州撤軍、設立中立區、國際共管天津等妥協方案。消息傳出後，國民黨政府怕激起民憤，放出空氣說是「日方向國聯要求」的。《熱潮》立即發表文章，揭露了國民黨政府主動提出此案的真相，並在第二期封面上，以大標題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還不覺醒嗎?! 政府為避免和日軍衝突，不惜提出中立區和錦州撤兵這種賣國政策。」後來，在美國示意下，中國政府與日本就「滿州中立區問題」直接談判時，陳獨秀又撰文抨擊：「犧牲東北的政策實現了!」「城下之盟實現了!」^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在抗日民主運動的衝擊下，被

① 頑石：〈國際第三次決議後的局勢〉，《熱潮》第1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② 三戶：〈直接談判之途徑〉，《熱潮》第1期。

迫下野；汪精衛上臺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陳獨秀即指出，在對日避戰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對民眾反日運動的高壓手段上，「汪精衛政府和蔣介石政府將沒有什麼不同」^②。果真，汪精衛上臺後第三天就製造了屠殺愛國學生的「珍珠橋慘案」。《熱潮》第四期就作為〈「一二·一七」血案專號〉推出，從各方面報導、評論這個事件，猛烈抨擊汪精衛國民黨政府。頭兩篇重頭文章由陳獨秀所寫，揭露汪精衛標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獨裁代替個人獨裁之裝飾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蔣介石做兩件事：「屠殺愛國民眾」，「簽訂賣國條約」。他指出愛國學生的血將宣告「政府死刑」^③！

除此以外，陳獨秀等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學生抗日民主運動的評論上，企圖影響學生運動按他們托派的路線進行。

《熱潮》每期都有文章報導和評論學生運動，對初期學生的和平請願，基本上持否定態度，批評他們「愚蠢無知」，「隨在他們的上層領袖和一般高等華人的尾巴後面」，任人「玩弄和欺騙」，對統治者抱有幻想。當學生鬥爭發展到搗毀國民黨黨部的暴力鬥爭後，陳獨秀等人就熱情地稱讚學生運動走出了「只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希望運動走上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道路^④。這反映了他們對運動過「左」的估計和期望，甚至提出「不打倒國民黨便不能抗日」的口號來引導學生運動，把階級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上。

當運動汹涌發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等廣大中間勢力發生動搖時，陳獨秀又提出了「擠他們到後臺去」的口號，鼓吹「必

② 頑石：〈真正的危機〉，《熱潮》第3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③ 頑石：〈「一二一七」與「三一八」〉；三戶：〈「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熱潮》第4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④ 頑石：〈由反日到反國民黨〉，載《熱潮》第7期。

須把他們擠到後臺去，反日鬥爭才能向前發展」²⁵，表現了「爲淵驅魚，爲叢驅雀」，唯我獨左、孤家寡人的傾向。

當學生運動在白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鎮壓而停滯不前時，陳獨秀明確地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國民黨）黨部，毆打妥協賣國的官僚……，還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面而來，……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²⁶

在學生運動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攻擊和鎮壓時，陳獨秀等人就出來捍衛學生運動的正義性，批駁反動派加在愛國學生頭上的「越軌行動」罪名，指出站在愛國民眾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因封存和沒收奸商的日貨而發生了侵犯私有財產和干犯法律的問題」等等「越軌行動」，都是「必要的」、「必需的」，應該「大幹其『越軌行動』」；「『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²⁷

這些表明，在民族危機面前，陳獨秀爲首的托派中央一方面還保持著反帝愛國的立場，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在革命來潮時托派的極「左」傾向。這兩種傾向，集中表現在他們托派的基本綱領——國民會議的主張中。

他們極力鼓吹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高潮中湧現出一個和國民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作爲全國反日民眾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組織武

²⁵ 頑石：〈擠他們到後臺去〉，載《熱潮》第7期。

²⁶ 同²⁵。

²⁷ 〈真正的危機〉；〈「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

²⁸ 頑石：〈談談「越軌行動」〉，《熱潮》第5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出版。

裝，組織國家，以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的總機關^①。

這個國民會議的綱領是：

宣告對日絕交。

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及由此得到的權益一切永遠無效。

武裝全國反日民衆參加戰爭。

解散一切不受國民會議命令者的武裝。

沒收所有奸商親日派的財產充作軍費。

全國工廠由各廠工人設立工廠委員會監督生產。

宣布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宣布土地歸農民。^②

托派推行的這條極左路線，使「九一八」後出現的抗日民主愛國運動受到干擾。尤其在北平學生南下請願團中，由於一些大學學生會掌握在托派手中，南下請願團及其領導層中也混進了不少托派分子。他們趁當時中國共產黨由於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給城市工作帶來被動局面的機會，與共產黨爭奪學生運動的領導權，表現得更加極「左」，竭力鼓吹「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南京國民黨政府」以及「奪取政權」等口號，慫恿學生的暴力行動，致使運動失去大多數群眾的擁護和社會輿論的同情而很快地消沉下去。

① 頑石：〈中國民眾應該怎樣救國即自救〉，載《熱潮》第6期。

② 三戶：〈論國民救國會議〉，載《熱潮》第3期。

第四節 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駐守上海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在日軍的挑釁面前奮起反抗。陳獨秀為首的托派中央極為振奮，在事變第二、第三天，接連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起草發表了〈為「上海事變」第一次告民眾書〉和〈第二次告民眾書〉（油印傳單），稱「現在的事實已顯然證明，中國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級軍官，在民眾反日的激烈空氣下，在違反國民黨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國主義強盜軍隊的。」文件揭露蔣介石南京政府破壞十九路軍抗日的種種活動，號召「上海一切被壓迫民眾立刻武裝起來到前線去！一切巡捕義勇軍及各地的士兵自動起來參戰！十九路軍的士兵及下級軍官們堅決反對南京政府的無抵抗主義，防止上級軍官的妥協，作戰到底！」「立開上海市民眾代表會議，組織緊急行動委員會，集中一切物質力量，幫助抗日的武裝隊伍！」

這時，托派中央主要是陳獨秀對「九一八」以後的形勢，進行了新的更加激進的估計。他認為「九一八」後的形勢與一九二九年他與黨決裂及一九三一年五月剛任托派中央書記時形勢完全不一樣。那時，他認為革命處於低潮，國民黨統治日趨穩定，經濟也會隨之而有相當的恢復和發展，所以他反對中共採取的武裝鬥爭的策略，主張利用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的時機，開展以召開「國民會議」為中心的合法運動。但是現在，他認為正是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決鬥時期。尤其是反日運動發展到反國民黨，蔣介石下野，國民黨政府發生統治危機時，他更進一步認為：「目前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的統治已由動搖而走向崩潰，民眾已經開始擡頭的新時期，形成了無產階級進攻的客觀

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造成了武裝民眾的特殊機會。」^②因此，在策略上，陳獨秀認為應該實現由國民會議到奪取政權過渡、把兩者結合起來的方針，提出「武裝群眾打倒帝國主義代理人」、「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等口號。於是，托派中央指示各級組織：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鬆抓住目前這一階段的實際環境與機會，鼓動工人群眾起來為這些口號而鬥爭，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③。「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而且）要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眾政權』。」^④

陳獨秀從這樣的估計出發，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起草了常委〈政治決議案——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在上海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表決通過。

「政治決議案」提出「我們的任務」是：組織及參加各地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義勇軍運動，堅決進行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特別要全力推動城市工人發起進攻。罷工運動一廣泛起來，便應組織工人蘇維埃，如果當地已有義勇軍或我們能夠影響的軍隊，更進而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同時，召集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領導全國範圍的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⑤。不僅如此，陳獨秀在這個「決議案」中，還提出了一個偏離托派傳統觀念——不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作任何聯合——的策略：「如果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

② 〈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校內生活》第2期。

③ 同②。

④ 獨秀：〈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火花》第7期。

⑤ 《校內生活》第3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眾之最凶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三月三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發表〈爲日軍占領淞滬告全國民眾〉（油印傳單），以上海抗戰失敗，列數蔣介石國民黨「縱敵賣國」六大罪狀，疾呼「全中國的革命民眾們！要抗日救國首先要推翻縱敵賣國的國民黨政府。」

陳獨秀在後來解釋爲什麼有這個策略轉變時，強調正是由於「九一八」後的形勢，所以一九三一年五月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政綱「已經不適用至少是不夠了，當然只有重新決定目前的任務」^⑤。

陳獨秀和托派中央以工人階級代表自居，根據「五四運動」和建黨初期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經驗，十分重視北方的學生運動特別是工人運動。他在這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常委」名義給北方特委的信中，估計北方的政治形勢「在最近將來很有劇變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熱河、甚至進攻平津之可能。」指示北方托派組織迅速健全起來開展工作：「……尤其是北平的現狀下，在學生群眾中，關於民族民主的運動，特別值得注意。」「在北方真正的基礎，當然是鐵路工人、天津的產業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礦工。……特委無論如何必須設法在鐵路（平漢、平奉、津浦、平綏等）上，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眾的聯繫，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堅定的同志到上敘的群眾中去工作，建立我們的組織！這是我們整個北方工作的基礎之所在。」^⑥

這期間，托派中央還主動緩和與中共的對立情緒，呼籲與黨合作領導運動。二月十日「決議案」中說：「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黨……爲執行以上的

⑤ 「常委」爲公布〈法南舊區委同志答覆常委的信〉加的按語，《校內生活》第4期，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⑥ 〈給北方特委的信〉（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載《校內生活》第4期。

任務，我們……積極要求我黨的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謀整個黨策略上組織上的統一；在未統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托派中央又發表〈告全黨同志書〉^⑧，更明確地表示：在所有工會運動中、罷工鬥爭中、學生運動中、反日運動中、國民會議鬥爭中、反國民黨鬥爭中、以至蘇維埃運動中，一切共產主義者聯合行動，「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都準備和全黨同志攜手前進！」不僅如此，陳獨秀、羅漢、彭述之還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議^⑨。

但是，陳獨秀托派中央對中共的態度的這種轉變，僅僅是在抗日問題上。他們反對中共的基本綱領的立場，一點也沒有變。就在當時，他們在《火花》上還不斷發表文章批判中共在瑞金中央蘇區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抨擊黨始終不肯拋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

對紅軍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們需要的紅軍，是當托派國民會議的配角，如二月十日決議案中說的，「紅軍一與某一工業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漢）民眾運動匯合起來，即應在那裡召集國民會議。」甚至在二月十日決議後一個月，陳獨秀還撰寫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前途〉一文，又重彈老調，胡說紅軍是土匪「為生活而奮鬥的方式」；現在的紅軍運動「不但還沒有城市工人革命運動的領導，即黨（國際與中國黨）的領導亦不充分，領導的政策更不正確。……而且黨有農民意識化的危險。」^⑩

⑧ 《火花》第7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

⑨ 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⑩ 同⑧第1卷第7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

彭述之也在北方托派區委機關報上發表題為〈怎樣去正確認識和領導目前的「紅軍」鬥爭〉文章，攻擊說：「斯大林主義者幾年來將農民的武裝隊伍，甚至將土匪隊伍，都冠以『紅軍』的頭銜，這顯然是一種指鹿為馬的滑稽勾當。……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權，紅軍是絕不能組織成功的。」他認為中國「紅軍」「不但名實不符，而且在將來的革命中留下魚目混珠的危險。因為此種『紅軍』在將來城市無產階級真正起來奪取政權時，究竟能否擁護無產階級而不為其他資產階級政派所利用，還是一個極大的疑問。」他斷言：「農民的弱點最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觀念」，雖有共產黨的領導，但無產階級成分十分微弱，「當然很難影響於農民群眾」，而且「在斯大林主義的壟斷包辦之下」，共產黨「不惟沒有能糾正農民和遊民無產者的弱點，反而助長了他們的弱點；他們本身久已與農民和遊民無產者同化。」於是，彭述之又故伎重演，公開挑撥廣大中共黨員起來反對中共中央。他說：「我們希望每個真實的革命分子，尤其共產主義者和『紅軍』中的革命家，應立刻起來重新分析『紅軍』的真實狀況，正確認識此種武裝隊伍在目前民族鬥爭中的可能作用及其前途。首先應向斯大林主義的錯誤領導作堅決的鬥爭，……推動目前中國整個民族民主運動走向真正的革命局面。」^⑩

由於這樣的原因，再加上當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全黨，把托派與國民黨改組派、江蘇耆老和第三黨一樣，視為「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⑪所以，陳獨秀托派中央要求與中共合作抗日的呼籲沒有得到響應。

^⑩ 《先鋒》第6、7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

^⑪ 〈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第34頁。

第五節 「不愛資產階級的國家」

陳獨秀托派中央要求與中共合作抗日的呼籲沒有得到響應，同時還遭到托派內部極左小集團的強烈反對。他們以「工人無祖國」、「大同主義」、「不愛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國家」、「反對狹義的愛國和虛偽的民族主義」、「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的階級立場」等等荒誕無稽的說教，鄙棄「對日宣戰」、「民族主義」、「愛國運動」、「抗日救國」的口號。陳獨秀批評他們這種思想與耶穌、托爾斯泰、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一樣，是反動的^⑬。

反對陳獨秀中央常委最厲害的是陳岱青、陳其昌、趙濟、王平一、李特五人組成的上海最有影響的托派區委——法南區委以及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他們認為陳獨秀對形勢「陷入了幼稚的過分的估計」，「不能說已經走上群眾運動直接上升、開始革命高潮的時期。」^⑭還說十九路軍的抵抗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表現，對工人階級影響「只是一種欺騙的作用」，「沒有絲毫抵抗主義或半抵抗主義的氣息」。批評陳獨秀對十九路軍的「歌頌」和「原諒」，「必然增加工人階級對十九路軍乃至其他左派資產階級的幻想，充分表現尾巴主義的精神，必須嚴厲加以糾正。」^⑮他們特別猛烈地抨擊所謂「共同行動」的策略

^⑬ 陳獨秀：〈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應不應該領導愛國運動〉，載《校內生活》第1期。頑石：〈論對日宣戰與排貨〉，載《熱潮》第1期。

^⑭ 〈法區擴大會議的意見〉，載《校內生活》第3期。

^⑮ 法南區委陳岱青等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致常委的信，《校內生活》第3期。

和對共產黨態度的轉變，說與小資產階級及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在反蔣鬥爭中「共同行動」的策略，「徹頭徹尾是機會主義」，是「引導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服從自由資產階級當苦力」的「尾巴主義機會主義的道路」；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占領城市是「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張」^⑮。「我們應當與這些意見堅決無情的鬥爭」^⑯。

對於這些批判，陳獨秀都立即一一給以回擊。他以「常委」的名義，「警告法區擴大會議及一切同志：我們萬分不應該因反對斯大林派全然不顧客觀環境的盲動主義，遂走到客觀主義取消主義之另一極端；我們萬分不應該因為反對斯大林派依靠農民來代替無產階級執行革命任務的錯誤，遂走到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過輕之另一極端。」^⑰他解釋說：所謂「『共同行動』，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時的協作，而不是長期的政治聯盟；所共同行動者，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其次才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派，而不是整個資產階級。」他認為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主張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是反對與資產階級政黨「混合」，「並不反對兩黨利害一時一致時，有一時的聯合」；「我們是否做資產階級的苦力，要看我們是否有獨立的組織和政策，不在乎拒絕任何共同行動。」^⑱最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陳岱青、劉仁靜等人曲解和反對常委決議案，反對「共同行動」的策略，是爲了「辯護他們認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經是我們主要敵人這一錯誤的觀察」^⑲而反對與蘇維埃紅軍「匯合」，則是「走到等待主義的道路」。陳獨秀的結論是，

⑮ 同⑮。

⑯ 〈中國的前途〉；〈對於政治決議的意見〉，均載《校內生活》第3期。

⑰ 〈對法區擴大會意見書的批評〉，《校內生活》第3期。

⑱ 〈批評列爾士同志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載同上。

⑲ 同⑮。

他們「在理論上是根本反對不斷革命論的機會主義；在現時局勢的估量上，是徹頭徹尾的取消主義。」^①可見，雙方都拿著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攻擊對方的「機會主義」。

法南區委不僅一般地反對陳獨秀托派常委的意見和政策，還拒絕散發常委的宣傳文件，如〈爲日軍占領淞滬告全國民眾書〉等。所以，在他們堅持自己的立場觀點，屢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況下，陳獨秀最後不得不採取組織手段，首先是撤消陳岱青區委書記的職務，後又解散了法南區委^②。

與上述事件的同時，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也因不同意陳獨秀常委的上述意見和政策，而分裂成兩派——以汪澤楷爲首的「舊臨委」和以任曙爲首的「臨時工作委員會」。陳獨秀「常委」曾三次作出決議，批評前者右的「取消主義等待主義的路線」，批評後者「極左」及分裂組織的錯誤，要二者在糾正錯誤的基礎上立即合併統一，遭到雙方抵制。爲此，陳獨秀以「常委」名義派劉伯莊爲特派員到北京，取消「北方區委」，成立「北方特委」；還是受到抵制，又兩度改組「北方特委」；最後提出，對於常委的決議「必須絕對執行，誰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該決定，常委就認爲誰是不想留在反對派組織之內，有意破壞反對派的組織，必須予以最後制裁。……誰不願意參加新特委，必須書面聲明理由，以憑常委審查處置，否則即以違反紀律論。」^③甚至說：「誰表示不幹，就讓誰滾出去。」^④

① 〈對仁靜同志論「中國前途」的批評〉，《校內生活》第3期。

② 〈通告第6號——爲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校內生活》第4期。法南區委陳岱青等五人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致常委的信，《校內生活》第3期。

③ 〈對於北方問題的第三次決議〉（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伯莊對北方問題的報告〉（一九三二年六月三日），《校內生活》第4期。

④ 〈給北方特委的信〉（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校內生活》第4期。

此外，對於陳獨秀提出的在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後建立「民眾政權」的主張，連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對。彭聲稱陳在機關報上發表這種主張時，他在生病，「事前並未預聞」。他認為「民眾政權」的提法「不能表現政權的階級性」，而目前又未到發出「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的時期，因此宣傳不應涉及政權問題，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只提「反蔣」就可以了^⑤。

所有這些都說明，當時以托派組織及托派「中央」、「常委」名義發出的一系列文件，主要都是陳獨秀個人思想的產物。只是由於當時托派組織不健全，再加上他一貫個人說了算的家長作風，還有他掌握的宣傳工具，使得他的意見主張，得以迅速而順利地通過組織和個人的名義傳播各方；另一方面，則由於他當時托派中央書記的地位和歷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時，他可以利用會議多數，通過他起草的文件。不過也正因為如此，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一直不服。法南區委堅持反對「常委」決議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經常狀態的集體領導機關的健全，而且差得很遠」；況且，某些重大問題「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發出，口號亦在機關報上提出了。而且事後述之同志到處說明他對獨秀的意見不能同意^⑥。

就這樣，九一八後陳獨秀唱獨腳戲的托派中央，雖然以為革命高潮到來了，作出了一系列反應，想利用托派組織大幹一場，結果由於主客觀和內外條件種種限制，歸根到底是由於他們離開了黨和人民群眾，一切努力都落空了，落花流水春去也，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什麼痕

⑤ 轉引自〈法南區委致常委的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雪衣：〈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均載《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二日。

⑥ 〈法南區委致常委的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跡。

第六節 陳獨秀托派中央全被逮捕

一九三二年春天，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獄中時疫流行，保外就醫。陳獨秀知道後幾經催促，又把二人拉回來，才整頓起比較健全的五人「常委會」：陳仍為中央書記，常委彭述之（宣傳部長）、羅世璠（組織部長）、濮德志、宋逢春，秘書吳季嚴，不久被捕，由謝少珊接替。陳碧蘭為宣傳部幹事，彭道之（彭述之弟弟）為組織部幹事。曾猛、何止錚負責刻印《火花》。上海三個區委：滬西區委書記金鴻圖（後由高衡接替）；滬東區委書記蔣振東（後由寒君接替）；法南區委書記陳岱青。陳獨秀因患慢性腸炎，經常臥床，掌握托派的路線分針。彭述之率領其妻陳碧蘭、其弟彭道之，經常出席區委及支部會議，指導實際工作。

由於「一二八」時期托派中央與區委、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分子之間的爭論和糾紛，使陳獨秀托派中央的威信受到嚴重挑戰。所以，這次中央領導機關重新成立後，六月二十五日，首先寫信給托洛茨基，在報告了中國托派重整組織的情況同時，詳細匯報了托派中央在「九一八」後採取的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共同行動」的策略引起的爭吵，請求「最高權威」裁決。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和十月三日，托洛茨基兩次覆信，首先對托派中央的重建表示高興。他說：「中國左派反對派經過了最殘酷的破壞之後，又復活與復興起來了，我們的歡樂是無需言說的。」

關於與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紅軍結成反蔣抗日聯合戰線，托洛茨基表示了審慎的態度。他認為領導中國紅軍的許多共產黨員是「失掉階

級性的知識分子與半知識分子，他們都沒有經過無產階級鬥爭的嚴格訓練。」根據俄國內戰那幾年的經驗，這樣的農民游擊隊「時常和工人及地方黨部發生衝突」；而在中國，「農民運動的本身是有著很強的私有性與反動傾向的，……它會仇視工人的，因為早已有了武裝，會更增加這種仇恨。」爲此，他指示中國托派首先必須建立「工會和黨的中心」，「先進的工人必須教育起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團結在一起，進入戰爭中去」，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對農民運動的領導，特別是領導它的『紅軍』」。托洛茨基認爲，「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運動，和農民戰爭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這將構成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開始。」在這個意義上，他支持陳獨秀的「和正式黨及其領導下之農民運動聯合戰線之政策」；他企望這樣能「避免農民與無產階級的可怕的危險衝突，實現這兩個革命階級之間的必要的共同行動，並且轉變他們的聯合戰線爲走到無產階級獨裁的歷史的步驟。」^①

托洛茨基親身參加了俄國轟轟烈烈的革命實踐，具有豐富的革命經驗，這本來是很可貴的。但是他把這變成固定不變的公式，到處套用，就走到了反面。俄國革命的公式是，由城市到農村，無產階級政黨先在工人運動中成長壯大，然後再爭取農民運動。殊不知在中國，由於城市裡國民黨勢力特別強大，又實行法西斯白色恐怖，工人運動很難開展；只有在農村武裝鬥爭中，無產階級政黨才能發展壯大，中國革命之火才越燒越旺。因此，中國托派按托洛茨基路線進行，只能在城市中枯死，還談什麼領導農民運動和紅軍。不過，正因爲如此，自詡爲「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托派一直在城市活動，而中共則主要在農村鬥爭（自然也不完全放棄城市工作），所以在中國革命的長期過

^① 〈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中國革命問題》第301頁。

程中，托派對中共和革命事業的破壞作用不大。

關於目前中國反日反國民黨鬥爭的策略，托洛茨基說：「俄國革命在許多年過程中，是匯合了兩個口號：『打倒沙皇！』與『立憲會議萬歲！』而目前中國，「除了國民會議，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夠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號」；「現在革命的煽動，首先應該儘可能向著反對國民黨政府方面進行。……無論是關於什麼具體問題之口頭的與文字的煽動、罷工、露天大會、示威、抵制，都必須加上『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對於反日與反國民黨的關係，托洛茨基說：「反對外來壓迫的鬥爭越擴大，則國民黨越困難。我們越使民眾反對國民黨，則反帝鬥爭越擴大。」但對陳獨秀提出的在「愛國主義」名詞下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他表示反對。他說：「布爾什維克以革命的方法擁護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反對民族主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剝削者，如國民黨。我們能不能把已經被玷污了的『愛國主義』這名詞來利用？我是懷疑的。在這一企圖中，是否有小資產階級意識和名詞的傾向呢？這樣的傾向，如果它是在我們的隊伍中真正發現時，應該給以無情的打擊。」●

托洛茨基這兩封信寫了十幾天，寫得很長，認真回答問題，坦率陳述意見，滿腔熱忱地扶持中國托派運動。

但是，陳獨秀的托派中央還未接到這兩封信，即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所破獲，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五個常委全被逮捕。

關於陳獨秀這次被捕事件真相，臺灣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陶希聖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傳記文學》編輯部舉辦的「陳獨秀專題人物座談

● 〈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中國革命問題》第 307 頁。

會」上，還在說「陳獨秀被捕是共產黨告密」，其實不然。據當時與陳獨秀一起被捕的濮德志、曾猛和主持這次逮捕事件的原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首領徐恩曾所說，事件的具體經過是這樣的：

濮德志參加托派常委後，有一天，他的妻子張穎新在路上碰到一個過去在莫斯科留學的同學——費克勤。此人與她的小姑費俠（即徐恩曾說的「那個女的」，後來成爲姚文元的「乾媽」）同是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而且都在回國時被捕。費俠在莫斯科時僅係一普通團員，未入中共，既不爲陳紹禹（王明）派所賞識，也與托派無涉（外傳她是托派分子，不實）。徐恩曾說，費俠被捕後叛變了——「寫了一張效忠保證書」。不僅如此，她還加入了中統特務組織，與費克勤以及曾參加過托派小組的徐乃達、解叔達等叛徒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揮下，專門搜捕共產黨的領袖，包括托陳取消派的首領陳獨秀等。

當時張穎新不知道費克勤已是特務，所以就約她到家玩。那天正好陳獨秀借濮家約見友人，叫費克勤見著了這位被國民黨懸賞三萬元通緝的共黨首領。事後，濮德志比較機警，批評張穎新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情報很快由費克勤—費俠傳到徐恩曾那裡。十月十五日，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委秘書謝少珊家開「常委會議」，特務即跟蹤而至，來了個緊急搜捕，濮德志和彭述之、宋逢春、羅世璠四個常委及謝少珊全部被捕。陳獨秀因病在家未赴會，本可倖免，但是由於唯一知道陳獨秀住址的謝少珊，當天就出賣了他，晚上，他就被捕入獄[●]。

關於這個史實，當時任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給南京政府的兩個密電

● 參見濮清泉（即濮德志）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八日給筆者的信；曾猛：〈關於陳獨秀被捕經過情形〉，未刊稿；沈雲龍〈有關陳獨秀生平的補充資料〉，臺灣《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

也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

篠日（即十七日，陳獨秀被捕後第三天）的電報稱：「……共黨首領陳獨秀在滬活動，前經與租界當局特別交涉，協同捕房偵查月餘，茲咸日（即十五日）在虹口破獲共黨常委會議機關，捕獲共黨謝少珊等五人，按謝供地址，將陳獨秀捕獲。」^⑩

十九日的代電講得更詳細：「……據共犯謝少珊稱甘願自首，並可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拘捕到案等語，即於當日下午七時，帶同該犯至岳州路永興里十一號樓上將共黨首領陳獨秀拘獲。」^⑪

所以，陳獨秀這次被捕，與中共毫無關係。對所傳的「共產黨告密」的謠言，中共中央駐滬辦事處當時就致函中統刊物《社會新聞》就進行了闢謠^⑫。《社會新聞》事後發表文章，不得不承認，陳獨秀被捕，外界傳說「為共黨幹部派之陷，似非確事。」^⑬

爲了保護叛徒，掩蓋謝少珊出賣陳獨秀的真相，後來在審判時，國民黨檢察官沒有對謝少珊提出起訴，在起訴書和判決書中敘述陳獨秀被捕經過時，也撒謊，詭稱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時，「當場抄出大批反動文件，並有小條通信處數紙。探捕等即根據此項地點，……將陳獨秀拘獲。」^⑭可見其用心之良苦。但是他也未敢附和「共產黨出賣陳獨秀」的謠言。

不僅如此，國民黨起訴書和判決書在引證謝的口供時還透露，謝還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真實姓名和身分，以及托派

⑩ 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院密第 1277 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存。

⑪ 同⑩，天字第 16034 號。

⑫ 《社會新聞》第 1 卷第 7 期，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⑬ 劉珊：〈共產黨取消派的過去〉，載《社會新聞》第 2 卷第 9、10 合刊。

⑭ 〈檢察官起訴書〉，《陳案書狀彙錄》，亞東圖書館出版。〈江蘇高等法院判決書〉，《中央日報》，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中央的另外幾處機關，其中有托派中央與外地組織聯絡機關，有《火花》的印刷機關等。所以，國民黨特務又「根據謝少珊口述地點」，先後破獲了這些機關，逮捕了另外幾名托派骨幹分子，如陳碧蘭、彭道之、曾猛、王平一、何止錚等，致使這次事件，除謝外，最後共捕獲並判刑者達十人之多。

謝少珊又名謝德盤，廣東人，大革命時期在黃埔軍校學習過，後留學日本，被日本驅逐回國，轉到蘇聯中山大學讀書，與吳季嚴接近，轉向托派，回國後又與吳一起加入托陳派「無產者社」。一九三二年吳被捕後，他由彭述之推薦接替吳任托派中央秘書長，並負責與陳獨秀的個人聯繫。出賣陳獨秀及托派中央一些重要機關後，他改名「謝力公」，意為國民黨立了一功。他先加入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不久因是黃埔同學轉到戴笠門下，成為軍統特務骨幹，專門從事反共和訓練特務學生的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戴笠聯絡上海青洪幫組織和一些社團工會，成立了一個「蘇浙行動委員會」，杜月笙為主任委員，戴笠以委員兼書記長的名義負實際責任，下設參謀、政訓、情報、訓練、總務等處，謝力公為訓練處長，並在該行動委員會武裝特務訓練班中任副主任，主持訓練班工作^⑤。一九三七年冬天，上海淪陷後，他被戴笠派到湖南籌辦了一個約八百人的大規模特務訓練班——「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後來正式定名為「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學生大多數是從另一個托派叛徒梁幹喬在鄭州辦的特務訓練班中搞來的。在湖南這個特務訓練班中，戴笠是班主任，謝力公任總教官兼任教務處長，並主講情報課程^⑥，因為他親自做過共產黨及托派的保密工作，又幹過出賣陳獨秀及其中央的勾當，可以現身說法如

⑤ 參見沈醉、文強：《戴笠其人》第21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

⑥ 參見沈醉：《軍統內幕》第11、13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

何搞到共產黨的情報。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中，謝力公受戴笠指使，潛到上海唐紹儀家中，用斧頭將唐劈死。唐紹儀原是袁世凱親信，後來與桂系軍閥、孫中山及蔣介石政府都有瓜葛，若即若離。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後，竭力拉攏唐紹儀出來充當漢奸傀儡，唐正在猶豫觀望中，就被軍統砍死。

陳獨秀領導的托派，連連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打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國民黨方面看，國民黨政府對托派的政策，有一個演變的歷史過程。在初期，以鎮壓為主，後來漸漸演變為以懷柔和利用為主，這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差不多是與托派同時產生的。初期國民黨政府在維持其統治權方面，經驗還不足，較側重於鎮壓的一面。同時，初期托派自稱是共產黨內的一派，他們與中共的矛盾及其深刻程度，還不為外界所重視。

所以，國民黨這時把陳獨秀搞托派主要看成是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對於國民黨來說，二者都是敵人。一九三〇年四月，蔣介石為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曾得到一份陳獨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寫的〈告全黨同志書〉，該部調查科寫的「審查報告」稱：

這篇〈告同志書〉我們可以看出幾點：

- (一)陳獨秀自去年八月即開始積極的作反中央的工作。
- (二)陳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動。
- (三)陳開始在黨內組織小組。
- (四)該黨內部日漸分裂。●

●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檔案 1-3-647 號。

但是，「審查報告」的結論仍稱〈告全黨同志書〉是「共黨首要陳獨秀」的「反動刊物」。特別在「九一八」以後，國民黨政府把陳獨秀爲首的托派中央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運動中所散發的宣言和傳單，所創辦的刊物，所進行的種種「反日反國民黨」的活動，看成與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蘇維埃運動一樣，都是反對國民黨統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們一直把陳獨秀當做中共領袖看待，說「該黨專事赤化」，「嚴令警務人員密查拿辦！」^⑤。

據托派稱，國民黨兩次大規模破獲托派中央，主要目標是針對陳獨秀的。一九三一年五月馬玉夫向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因不知道陳獨秀的住址，那批人被捕後，就重點審問鄭超麟，當時只有鄭超麟一人與陳聯絡。所以，鄭超麟一被帶到提籃橋巡捕房，司令部偵緝員王斌就要鄭「幫幫忙」，說出陳獨秀住在哪裡。鄭拒絕。他又要求外國捕頭用刑逼供，捕頭不答應。到引渡給司令部那一天，他雙手一攤說，過了那麼多天，說出來，陳獨秀也跑掉了。他們被引渡到西門白雲觀司令部偵緝隊駐地。隊長姓馬，安徽人。他在審訊用假名的鄭超麟時說：「不行，你連姓名都不承認，叫我怎麼交差？」爲此磨了很久。最後他說：「你也要替我設想，我並不要求你做別的事情，只要你承認真實姓名，承認加入共產黨就夠了。」說時，他用手指蘸著茶水在桌子上寫「仲甫」二字，說道：「我也不問你這個，他是我的老朋友。」顯然，他也認爲，這時鄭超麟即使說出來，陳獨秀也搬了家，因此落得做人情^⑥。所以，陳獨秀這次被捕，被國民黨稱作捕到了「久緝未獲之共產黨領袖」，大肆宣傳。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廣東省黨部、

^⑤ 〈滬上共獄陳獨秀被捕記〉，《晨報》，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⑥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

湖南清鄉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以及全國許多國民黨縣黨部、軍隊的師黨部等，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列數陳獨秀從創建共黨到南方「巨火燎原」的各種「罪狀」，懇情嚴辦，迅予處決。直到後來，蔣介石、陳立夫和何應欽等，通過研究「罪證」，調查叛徒，審訊陳獨秀本人，確證「被告等與湘鄂贛各省武裝暴動共匪自無聯絡關係」，並且「反對斯大林派在中國現況之下採用紅軍策略」，才在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奔走營救之下，蔣介石親自作出了將陳獨秀案「交法院公開審判」的決定。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終審判決陳獨秀、彭述之「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八年。判決書上稱被告「乘日本之侵略，妄詆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國名義，欲將建設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國民政府推翻。」^①其他被捕者有的證據不足，無罪釋放；有的判三、五年徒刑。

陳獨秀判刑後，被押到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執行。當局對他特殊優待，一個人住一間牢房，可以每日接見親友，接受大量書報；還讓濮德志、羅世璠照顧他的病體。國民黨想以此來軟化他，為其服務。他則利用這個優待條件，通過經常自上海到南京探監的鄭超麟的妻子劉靜貞（化名吳靜如），與上海托派臨委建立了聯繫：傳進托派活動的情況和托派臨時中央作出的各項決議、文件，帶出陳獨秀的書信、文章和意見。陳獨秀還想以此來遙控獄外的托派活動。

陳獨秀等人被捕，對於中國托派真是雪上加霜，本來就衰微破敗的托派組織，頓陷群龍無首，一片混亂。陳其昌在一年後回顧說：「陳獨秀被捕後，組織的惡劣面目便充分暴露無遺了！區委機關有的無形

① 〈江蘇高等法院判決書〉，載《中央日報》，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消滅，機關報無法出版，同志與區委、區委與領導機關之間，連過去的散漫關係也斷絕了；所謂『臨委』也者，不過三區書兒戲的產物，甚至造成從個人玩弄到無人過問的現象，乃至基礎區書被捕以後，臨委對於區委工作怎樣繼續，一二個月不問不聞。」^①

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一大批托派分子感到無前途，紛紛離去，另謀出路。

化名杜叔林在北平民國大學和中國大學任教的托派北方區委書記汪澤楷，在陳獨秀被捕後，曾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方區」的名義，發起了一個頗有聲勢的「援救陳獨秀運動」。他們發表了〈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開信〉，要求中共就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事，審察「過去對獨秀同志所加的一切非議誣蔑之錯誤，接受反對派的政治路線，並為援救獨秀同志而鬥爭。」^②他們還向社會呼籲：「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號召推翻某黨統治」；「中國的革命群眾和一切左翼的社團、一切革命分子都應立即起來，遊行、示威、通電、開大會，堅決不拔的為援救陳獨秀而鬥爭！」^③在他們鼓動和組織下，幾個大學部分學生舉行了集會演講。不久，汪澤楷因不滿上海新臨委的領導而脫離托派，到廣西桂林師專作教員。一九三四年又回北平，在大學任教。抗戰時，又到桂林、湖南等地當中學教員。一九四九年後，曾在湖南大學、武漢大學當教授。

陳獨秀的安徽同鄉高語罕，二十多年來一直追隨陳進行活動。辛亥革命時期，他扶助韓衍劍辦青年軍，與陳獨秀一起，先後輔助孫毓

① 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② 同①第4期。

③ 同①。

筠、柏文蔚督皖。「五四」前後，他與陳獨秀相呼應，在安徽推動反封建、揚民主、寫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和反帝愛國運動。中共成立後，又受陳的影響，加入共產黨，然後參加了大革命和「八一」起事，失敗後追隨陳轉向托派。現在陳獨秀被捕，他對托派運動深感失望，脫離組織，向國民黨靠攏，經常在報紙上發表吹捧國民黨的文章，抗戰期間當選為國防參議員。

另一位托陳取消派的老人、「無產者社」上海法南區委負責人薛農山(又名薛鐵珊)，在陳獨秀被捕後，去投靠了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孔祥熙，進入《時事新報》社任主筆；後來又得政學系首領張群的提攜，任國民黨海外部長，利用職權發了橫財；抗戰勝利後回上海，搞對外貿易。

曾把《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帶進托陳派、後來當了托派滬西區委和法南區委委員的屠仰之，也脫離托派，投靠了國民黨。

陸沉也在一九三三年到南京，當了國民黨中統特務。抗戰時，作為中統派到山東膠濟鐵路的特派員，進行武裝活動，在與「軍統」的矛盾鬥爭中被殺：一天晚上，幾個人跑到他的住處，用一張桌子壓在他頭上，把他的頭壓破了。

王平一曾為在中國宣傳托洛茨基主義，促使陳獨秀派轉向托派，以及推動托派小組組織統一上，做過許多工作，出過大力氣，但在統一大會上沒撈到一個席位，隨即消極，利用父親提供的幾百元錢，在上海福履路建業里開了一家紙煙店。父子二人靠此過活，紙煙店成了他們的命根子，精心經營，同時還與托派有聯繫，因此與陳獨秀等一起被捕。最後以證據不足，無罪釋放。實際是已成特務的托派朋友徐乃達、解叔達拉攏和關照，他也寫悔過書成了特務。因此，不久他以王伯平之名，正式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抗戰勝利後，他曾任國民黨政

府山東省社會廳長(有的說是濟南市社會局局長)。後來，隨國民黨撤到臺灣，當了「國大代表」。

還有與陳獨秀一起被捕的兩個溫州人曾猛和何止錚，在獄中經過黃埔同學的關係，寫了悔過書，很快獲釋。然後，兩人受國民黨特務機關批准，回到家鄉溫州，組織起該地的托派組織，與國民黨勾結，只從事反對共產黨的活動。托派中央視他們為叛徒，要求溫州托派組織與其脫離關係。抗戰勝利後，曾猛到國民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任政治教官，直接為蔣介石訓練反共反人民的兵痞。

統一大會中當選的中央委員中，唯一未被捕的羅漢，見到托派中央機構和組織接連被內部的叛徒告密而破壞，對托派事業極度失望。他在後來述說：「我自一九三二年秋，即已脫離了實際的政治生活，在滬蘇一帶的工廠中服務。」因見陳獨秀等「被叛徒背賣，遭受縲紲之後」，他也「對於一些言論似左行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們陸續叛變出去，還未完全馳懈。」因此事實上與托派組織脫離了關係^①。

第七節 推行陳獨秀路線的「臨委」

在托派組織分崩離析的形勢下，中央機構頻頻改組，不到一年時間，像走馬燈似地換了好幾個「臨時委員會」書記。

先是由上海滬東、滬西、法南三個區委書記高恆、寒君和陳岱青舉行緊急會議，協商拼湊了幾個人——劉仁靜、陳岱青、嚴靈峰、高恆、寒君、陳其昌、任曙，成立了一個托派「上海臨時委員會」。劉仁

^① 參見羅漢：〈給周恩來一封公開的信〉，《正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羅漢給述之的信〉（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手稿。

靜任書記。

托洛茨基得知陳獨秀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後，曾給劉仁靜爲首的「臨委」發來指示：對陳獨秀等人表示慰問，認爲此事件是托派的「莫大損失」，今後應嚴肅組織，反對只追求成員數量上的擴大，應著重質量上的堅實，肅清一切動搖分子；目前應穩固組織，逐漸轉守爲攻，利用敵人的弱點，取得保護色，以保證同志們的安全；險惡的環境，不容許有大的活動，「停止一切直接行動」，集中力量於文化運動^⑤。

但是，劉仁靜「臨委」的委員們，爲了「質量上的堅實」，「肅清一切動搖分子」，都「力爭自己是『馬克思』，……相爭不休，一事不能作，鬧了幾個月，於是不得已而改組。」^⑥劉仁靜、陳岱青退出臨委，任曙接任書記。

陳岱青離滬去北平，任教於中國大學；不久被捕，投降了國民黨，改名「林一心」，與反共理論家鄭學稼搞在一起，追隨陶希聖，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教，控制學生的思想。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大陸政權時，他又隨留蘇時同學蔣經國去了臺灣。

一九三三年九月，任曙擅自召來廣東、北平托派組織的代表，召開「全國緊急會議」，補選了幾個外省的委員，就把「上海臨委」，改名爲「全國臨委」，並且解散了上海各個區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陳其昌等人反對，致托派工作完全癱瘓。

任曙沒法，只得同意改組，他對劉伯莊說：「你是中國托派的發起人之一。你不出來做事，誰出來呢？」改組會議地點由蔣振東和李平尋覓，最後在塘山路找了一間前後都是馬路的過街客堂屋，緊急時可以疏散。改組結果：劉伯莊任書記，嚴靈峰（宣傳）、任曙（組織）、趙

^⑤ 《社會新聞》第3卷第9期。

^⑥ 紀它：〈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

濟、李平等爲委員^①。

但是，新臨委成立不久，任曙撒手而去，到北平當大學教授去了。抗戰時，他又投靠國民黨，在四川做偽縣長。接著，李平又被捕。他之被捕，是混進托派內部的國民黨特務「小張」告密所致。張原是日本絨布廠工人，在工人運動中，被日本資本家收買，充當內奸，破壞共產黨在廠內搞的工人運動。爲此，他偽裝積極，混入黨內，受寒君、李平的領導；在六屆四中全會時加入羅章龍派，爲分裂共產黨推波助瀾，結果被開除，又與寒君、李平一起混進托派，然後，他投靠國民黨，當了特務。李平被他出賣被捕後，在特務機關裡秘密審訊時，因拒不投降，大罵國民黨，很快被槍斃了^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福建事變時，嚴靈峰去了福建。於是，臨委又增補蔣振東、陳其昌和「王麻子」爲委員，陳其昌爲組織委員，趙濟爲宣傳委員。但是到十二月，臨委又因「工作無計畫、無辦法」而倒臺。陳其昌和做印刷機關報及傳單的陳積之不滿劉伯莊的無能，猛烈予以攻擊，迫使劉伯莊辭去書記職務，從此劉脫離托派，化名劉劍南，到北平民國大學任教。後來，他在共產黨叛徒任卓宣辦的反共刊物《抗戰嚮導》上寫文章。另一委員「王麻子」也回四川老家去了。於是，臨委成立起比較穩定的三人小組——陳其昌（書記）、趙濟、蔣振東。其實，蔣、趙都消極，只有陳其昌一人唱獨腳戲。陳積之幫助他出版油印刊物。一些重要文件和文章，經常給獄中的陳獨秀先看過，然後去油印。陳其昌在租界裡租了一間房子，作爲托派機關，與外國及外地托派分子接頭，並印刷機關報。

陳其昌，又名陳清晨，河南洛陽人。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大學讀書

① 蔣振東：《陳獨秀被捕以後》，一九八二年一月九日手稿。

② 同①。

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在學生和工人中進行秘密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轉向托派，是「無產者社」成員。托派統一後，參加法南區委。此人在托派中有威望在於他能吃苦、正直和踏實。當時他一家三口，靠他寫稿生活，寫的主要是報章上的社評。北新書局出版的《青年界》雜誌上，那些有關國際政治的文章，都出於他的手筆。妻子是一個純樸的家庭婦女，有時幫人做傭工。他們的生活極其艱苦，雖然當時托派在上海的生活多數是清苦的，但沒有窮苦到像他那樣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然而，他從不發一句怨言，不向人訴苦，也不輕易向人告貸，不影響對托派工作的熱忱，以此贏得托派同志的尊敬。後來他被日本侵略者殺害後，王文元這樣評價說：「陳其昌不僅是中國托派的光榮烈士之一，而且是最值得我們後繼者學習與矜式的一個革命家。……他具有最優秀的革命家的一切性格。吃苦安貧，從不懂得生活的享受；嫉惡如仇，對一切被踐踏與被欺侮者懷有無上悲憫，最不喜歡架子；他不但沒有領導分子的裝腔作勢，而且永遠把自己安置在危險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和著新式的同志愛和舊式的義氣，對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他是『大哥』這個綽號聞名的。」

王文元還說，在一九三二年陳獨秀被捕後的幾年蔣介石白色恐怖時期裡，中國托派組織一次接著一次地被破壞，而在每次破壞後作慘淡的重建工作，使組織得有一線存續者，總是「我們這位大哥」。說陳其昌在秘密工作中非常機警，又總把同志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他的警惕性永不鬆弛。所以不止一次的組織大破壞，曾因他的事前覺察而勇敢地加以挽救而倖免。最著名的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他在一個臨委家門口被特務追逐。他用盡方法，使自己既脫於難，又把那個臨委救了出來。這就與當時有些自稱是「革命者」的不同。他們往往太看重自己的安全，因此，一經嗅到危機，便獨自逃之夭夭，棄其他有危險的

同志而不顧。陳其昌最鄙視這種行爲。

蔣振東是浙江人，機械工人出身，大革命時期入中共，先在上海總工會第二辦事處工作，一九二六年被江浙區委派到杭州開展工人運動，任杭州地委職工部主任，一度代理地委書記。北伐軍攻打杭州前，參與領導杭州工人武裝起義，獲得勝利，旋到湖州領導工人鬥爭。大革命失敗後，他來到上海，一九三〇年春參加托陳派，與馬玉夫一起在工人中活動。這次參加臨委，也分工負責滬東工人運動，如一九三四年美亞綢廠工人罷工，就是一例。

這年三月四日，爲反抗資本家一再減低工資，十個廠四千餘工人一致罷工，由共產黨員爲主的罷工委員會領導，結果遭到資本家勾結帝國主義軍隊的屠殺，造成「三一—」慘案。然後，罷委會領導工人到市政府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交涉慘案，政府卻逮捕工人，禁止報紙登載罷工消息。工人不屈服，四月十五日，全體工人又向國民黨社會局請願，冒雨露立達二十多小時之久。政府又扣留罷工工人代表，武力驅散請願群眾，逮捕罷委會委員，強迫工人復工。工人孤軍奮鬥月餘，精疲力竭，領袖喪失，最後無條件復工，罷工失敗，罷工領袖被資本家開除達一百三十餘人。

托派在這些廠中沒有組織基礎，原滬東區委書記蔣振東在楊樹浦慶平小學教書，妻子在塘山路綢廠做工，罷工開始後，通過她找了幾個托派的同情者，向罷委會提出托派對形勢的分析和策略是：(一)罷工工人必須設法與資本家直接交涉；(二)用各種方法擴大宣傳，擴大聯絡；(三)健全罷工工人組織，並以群眾力量，保護罷工委員會。

這些意見不無可取之處，但是當時正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橫行時期，未被共產黨所採納。共產黨甚至建議工人帶備棍棒，與軍警對抗，還要工人臥軌。托派批評這是盲動政策。工人也表示拒絕。

最後，在失敗時，罷委會中幾個共青團的代表，認識到托派提出的策略是可取的，但是，已經晚了。托派乘此機會，就在工人中宣傳托派政治主張，擴大托派影響，說什麼「必須爭得政治上自由，才能在經濟鬥爭中勝利」，所以必須為「國民會議」而鬥爭；又說「共產黨信仰完全破產下降，工人躲避共產黨員，必須組織新黨」^⑦云云，並且在廠中開始建立托派支部。

但是，托派始終抱憾自己力量太弱，不能成立這個「新黨」，取共產黨而代之。

這兩年的托派臨委，繼續推行托洛茨基來信指示的、陳獨秀托派中央執行的方針。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上海托派臨委通過的〈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決議案中指出：「我們當前的基本任務還是集中一切力量去領導和發展民族和民主鬥爭。」口號是「打倒國民黨和召集全權的國民會議」；並且表示「為要在一切群眾鬥爭中保持共產主義者的一致，我們向正式黨提議在一切群眾組織中和鬥爭中願意與他們切實合作，以反對外部敵人的進攻。」同時又要求改變中共的領導^⑧。

在具體工作上，他們繼續遵循陳獨秀提出的「共同行動」的策略，採取了一些行動。

當時，全國人民激憤於日本的侵略，自發產生了許多抗日救國的民眾團體，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放棄妥協政策，進行抗日戰爭。單是上海一地，就出現了各種抗日救國聯合會的組織。陳其昌和趙濟就曾參加「上海著作者抗日協會」，與曹聚仁、謝冰瑩等人一起，進行抗日宣傳活動^⑨。

⑦ 宇：〈美亞綢廠工人罷工失敗的原因及其教訓〉，《火花》第2卷第4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⑧ 油印小冊子。

⑨ 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

一九三三年，爲了反對德國、日本法西斯和帝國主義日益猖獗的戰爭準備，支援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總部在巴黎）決定這年九月在上海舉行一次遠東反戰會議，委派該委員會名譽主席宋慶齡主持會議，並且派英國工黨領袖馬萊爵士、法國共產黨人古烈久率領的代表團來參加大會，調查日本侵略東北的事件。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也指示中共與宋慶齡聯合籌備這次活動。

當時中共中央已遷往江西蘇區，中央就指示江蘇省委籌備這次會議，宋慶齡公開出面交涉，具體工作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馮雪峰主持，由「社聯」、「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和「左聯」四個單位負責。馮雪峰和劉芝明（「左聯」代表）、張凌清（「社聯」代表）組成了籌備會的核心小組。在宋慶齡的直接推動下，成立了上海各界歡迎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團委員會，並由她親自簽名發出了給上海市各團體的委任書：「根據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之決議，你們被委任爲本會會員，鑒於世界反戰大會代表，現已陸續來滬，我們應該一致努力籌備歡迎，以便對他們的熱情援助，表示我們的熱烈心意。」^②

籌備會還要求：各團體各個人即刻來參加我們的籌備會，來準備歡迎工作，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自己的意見、各地反帝運動的狀況等等，寫交本會，以便收交世界反戰委員會代表團，發動廣大民衆擁護代表團在中國召開國際反帝反戰大會。

八月十八日，世界反戰委員會一行四人來到上海。宋慶齡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禁令和阻撓，親自到船上去歡迎這些歐洲的反帝和平戰

^② 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1輯。

士，並且以世界反戰委員會遠東會議上海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發表聲明——〈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聲明向人民群眾揭露了德、日、英、法、美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擴軍備戰的陰謀，指出世界面臨著嚴重的戰爭危機，而日本侵華只是這場危機的一部分。聲明闡述了遠東會議的意義，使中國人民知道，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決不是孤立的。聲明最後呼籲：

一切願意參加這個運動的人們，都派遣代表出席這次大會。我們特別歡迎工廠工人、失業工人、工會、工人俱樂部、農民團體、國民黨支部、各大中學、青年學生團體、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文化團體、反帝和反日團體、抵制日貨的團體、義勇軍、各行會以及一切願意參加這個鬥爭的團體，都派遣代表出席。●

托派臨委響應宋慶齡的呼籲，決定參加這次大會。他們給世界反戰委員會代表團寫了一封公開信，聲稱「同意這個會議」，要求「派正式代表參加這個會議」，並且說：「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篇宣言；公開地號召全中國廣大的被壓迫群眾積極地參加這個會議；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推動這種工作，……」但是又公開地和鄭重地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須保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在〈為號召全中國被壓迫民衆參加上海反戰大會宣言〉中，他們表示「目前這種群眾革命的集合與『統一戰線』是極端必要的！不管在會議的派別如何，只要他

● 宋慶齡：《為新中國奮鬥》第60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 載《火花》第2卷第1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們不背反帝反法西斯化國民黨統治的目標，不背革命的利益，我們左派共產主義者都必須站在最前線和公開地號召你們，全體動員起來參加這次大會。」但是又向群眾挑動說：「你們必須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應迷信社會的上層分子，不應當把自己革命鬥爭的精神，溶解於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之中！」^⑤

由這兩個文件看到，托派想參加一些群眾鬥爭，但依然放不下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架子。它若參加，必然增加革命群眾內部的糾紛，干擾對外部敵人的鬥爭。即使如此，托派臨委的決定還是受到劉仁靜等人的反對。他們認為參加資產階級宋慶齡主持的遠東反戰會議，違背了托洛茨基關於當前不參加「直接行動」、只進行「文化運動」的指示，更違背托派不與資產階級「聯合行動」的原則。

結果，主要由於國民政府的百般阻撓和破壞，大會不得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秘密進行。連大會主席宋慶齡也是在大會召開時臨時知道會場地址。會場是由中共地下黨突擊布置，所以托派未能參加。

從共產黨方面看，據彭述之妻子陳碧蘭說，自從陳獨秀、彭述之等被捕後，中共對於未被捕的原共產黨員托派分子是取同情和友好的態度，有的還給予幫助。如陳碧蘭當時很困難，中共曾派人到她家裡，提議要她回到黨內來。當時中共已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統治下，有這樣的表示，難能可貴。但是，她表明堅持托派立場，拒絕了中共的提議。於是，中共就對他們封鎖了一切群眾活動的場所^⑥。這次遠東反帝反戰大會當然也不會讓他們參加。

^⑤ 同^④。

^⑥ 陳碧蘭：〈彭述之的思想和他在中國共產黨及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活動〉。

第八節 參與「福建事變」

托派臨委直接參與的重大事件是「福建事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國民黨中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社會民主黨（陳銘樞）、第三黨（黃琪翔、章伯鈞、麥朝樞）及李濟深等，受到全國人民抗日救國運動的激勵，揭出抗日反蔣旗幟，在福建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願與共產黨等全國各個抗日政團聯合，史稱「福建事變」。

在事變前，托派中許多人物，由於依靠給「神州國光社」譯著為生，與該社總經理王禮錫關係密切，從而與該社後臺老板廣東軍閥陳銘樞及其組織的社會民主黨拉上了關係。陳銘樞及第三黨的章伯鈞、陳友仁，為了反蔣反共產主義，曾在上海及平津一帶廣泛搜羅人才。神州國光社則是一個重要渠道。他們對人才的要求是：「能說俄、英兩種外國語之似共而實非共之特種人物。」⁹⁷適合此條件者，只有托派人物。

托派則認為，福建當局反蔣而不阿共的方針，與托派的綱領相合。臨委甚至特地發表文章認為，此事變在本質上「有某種程度的革命意義」，「其政綱上大部分表現為中國大多數民衆暫時要求」，並且「在其假革命形式之下，可能生長成為真革命的局而」，因此主張托派「必須積極起來贊助以至領導這一運動」⁹⁸，與社會民主黨及第三黨實行合

⁹⁷ 《社會新聞》第5卷第25期。

⁹⁸ 臨委：〈福建政變之原因與意義〉，載《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宣傳部出版，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油印小冊子。

作。

持此主張最堅決者，是當時任臨委宣傳委員的嚴靈峰。於是臨委就委派他作為托派代表入閩，參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嚴靈峰的影響和拉攏下，杜畏之、任曙等一批托派分子，也紛紛南下，想在福建新政府中撈個一官半職。嚴靈峰擔任了情報處副處長。在幾個黨派合併，成立「人民生產黨」時，他負責黨務。這批托派分子對福建人民政府的理論和政策的形成，發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外交部長陳友仁，在會議上或會晤來賓講話時，常常冒出一句「托洛茨基說過」如何如何的話。

嚴靈峰還與共產黨及蘇區紅軍派駐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潘漢年進行了接觸，建議雙方合作反蔣抗日。嚴還要求到蘇區參觀訪問。

但是，托派與福建各派及共產黨代表談判的結果，因綱領太左，自身力量又太小，還想領導人家，終於失敗，而且遭人奚落和冷遇，一無所獲^③。福建政府也在蔣介石的武力圍攻和分化瓦解下，很快垮臺，有關人員紛紛逃離。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嚴靈峰面對失敗，還不願離去，堅持在福建從事秘密工作，企望死灰復燃。一些托派分子因悔恨受其影響，為立功折罪，投誠國民黨政府，將嚴靈峰捆縛，扭送軍警機關。被捕後，嚴靈峰開始轉變，徹底放棄原來信仰，反共、反托、反社會民主黨，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到南京司令部後，他一再表示悔過自新，徹底反共，並寫了萬言書，歷述以前一切思想行動之絕對錯誤，最後竟要求「戴罪立功」，提出捕捉消滅殘餘托派及共產黨的具體計畫^④。

^③ 〈y的報告〉，《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

^④ 參見《社會新聞》第6卷第29、30期；第7卷第3、20期。

就這樣，嚴靈峰終於投靠了國民黨特務機關，一直做到處長的位置。抗戰時，在重慶任國家總動員會議經濟檢察處處長兼四川省經濟檢察總隊長。一九四六年任福州市長，翌年當選為國大代表。嗣後到上海追隨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蔣經國，在金融管制局任職，幫助蔣經國「打老虎」，整頓金融，企圖挽救蔣家王朝的覆滅。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時，隨蔣去臺灣，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任臺灣大學教授、香港珠海書院教授兼訓導長、輔仁大學教授等，在學術上頗有造詣，曾輯印中、日兩國大量古籍目錄及有關資料，出版了七十六卷本巨著《書目類編》，為中華民族和人類文化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可以說晚霞燦爛，在中國托派的云云衆生中，他的人生結局是較好的一個。

對於內部，托派臨委有感於托派成立以來一直忙於內部爭吵，對政治不能施加影響；思想不統一，無法行動，隊伍也不能鞏固，於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上海各區委、各支部及南京獄中的陳獨秀、彭述之、濮德志、羅世璠等人發了一個《反對派政治問題爭論提綱》（油印小冊子），企圖有計畫地組織一場討論，以分清是非，統一思想，「使反對派可以早日由理論過渡到行動」。但是結果是剪不斷，理更亂，愈爭愈烈，更加不可收拾。因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義的荒謬立場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誰是誰非。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托派中央宣傳部把這些爭論文章收集起來，編了三本《政治問題討論集》。這些文章，再加上同時期《火花》、《校內生活》上的文章、書信，爭論的問題很多，最激烈的是以下四個問題：

（一）形勢問題：

陳獨秀被國民黨判刑後，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托派工作上，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他為托派臨委起草了〈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

務》，認為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還「只能是反革命擡頭革命低落的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間，不應該採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維埃』等，我們的力量，應該集中於後年三月國民大會的鬥爭。」爲此，他致函臨委說：「我提議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動分子會議，決定關於參加國民大會運動的政綱（即政治要求，此政綱中，除以前我們發表的各項要求外，應加上一項：反對國民黨起草的憲法草案，憲法應由國民大會自己起草，由全國人民直接總投票表決）及工作大綱。」「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使我們相當的脫離散漫、孤立、軟弱的現狀。」^①

劉仁靜抓住這個文件，多次進行批判和譏諷。十一月，他致函陳獨秀，說陳在「一二八」抗日運動中的認識和主張是「陷於浪漫主義」，而九月二十九日的文件又「走到另一極端」，「短視的經驗主義」，「助長人民的憲法幻想」，如果聽他的話，「中國反對派的發展將更多耽誤兩年。」^②

（二）國民會議問題：

陳獨秀忠實貫徹托洛茨基來信指示，認為「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即可用爲在現時的宣傳口號」，「總攝一切民主口號而與之不可分離的中心口號」^③。「在國民會議口號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與革命高潮時「在蘇維埃口號下奪取政權」並不對立，二者結合，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以此批判彭述之把國民會議與蘇維埃對立起來，「用國民會議口號做反軍事

① 載《校內生活》第7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署名：雪衣。

② 列爾士：〈對於「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批評〉，《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

③ 頑石：〈我對於幾個問題的意見〉，載《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雪衣：《國民會議與蘇維埃》，載《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

獨裁的運動]，「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是對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令人驚異的背叛」⁹⁴。他要托派立刻肅清彭述之這種「可恥的機會主義」⁹⁵。

彭述之則以鄙夷的口吻說陳完全不了解不斷革命論，是「國民會議狂」，一貫「從右邊來接受托洛茨基主義」；聲明他與陳的分歧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路線分歧」，要求托派「慎重的考慮，堅決的選擇」⁹⁶。

(三)經濟復興問題：

劉仁靜認為托派「應當負起肅清資本主義發展障礙的責任」。因為「經濟恢復，工人也相對的多些，肚子也吃得飽些，奪取政權的鬥爭更容易勝利」；「國家統一和權力集中、生產力發展這些條件，比現在國家分裂和生產力衰敗的條件，對於它（無產階級）是有些有利些。」⁹⁷

陳獨秀批判劉的這些觀點是「改良派」，「包含了濃厚的反動性」。他認為「離開無產階級革命，而要求國家統一，要求生產力發展，特別是要求權力集中，這恰恰是法西斯蒂的政綱！」⁹⁸他指出，不管經濟狀況如何，「只要那裡有了無產階級運動，只要那裡有了無產階級之有力的同盟軍，那裡便有了無產階級革命之可能」；而且像中國這樣經濟落後的國家，通過國民會議道路，可以「比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無產階級早些得到政權」⁹⁹。

⁹⁴ 《國民會議與蘇維埃》。

⁹⁵ 〈對於區白兩篇文章的批評〉，載《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區白即彭述之。

⁹⁶ 區白：〈我們間的不同意見〉；〈對雪衣的政治意見的批評和答覆〉，載同⁹⁵。

⁹⁷ 列爾士：〈我們的任務〉，載《火花》第2卷第2期。〈關於經濟復興問題及其他〉，載同⁹⁵。

⁹⁸ 雪衣：〈我們走哪條路〉，載《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

⁹⁹ 〈幾個爭論的問題〉，載《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

(四)「共同行動」問題：

陳獨秀認為在階級鬥爭未達到最後決勝負以前，資產階級中之自由主義者，往往因外國的侵略或國內的軍事獨裁之專橫，而表示「左傾」。這時「我們可以和他們共同行動，以打擊共同的敵人，例如抗日與倒蔣。」他甚至說：「只要有接近群眾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之運動應該參加，即反動的資產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⑩

劉仁靜說陳的這種觀點是抹煞兩個階級之間的「鴻溝」，是「偷運過去革命資產階級之理論」^⑪。陳獨秀則指責他及史朝生等「籠統的對於任何形式的階級聯合或共同行動以全盤否定，這簡直是胡說八道！」這種錯誤「危害了我們的運動，將不在機會主義之下。」^⑫

其他托派成員如濮德志、羅世璠、陳其昌、蔣振東、尹寬、劉家良、史朝生、胡文華等，或者擁護陳獨秀，或者支持劉仁靜，或者同意彭述之，各不相讓，吵得一塌糊塗，直至托派組織滅亡，也一直沒有消除分歧。中國托派是一個吵鬧不休的俱樂部，這是它的致命弱點之一。

第九節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一九三三年，托洛茨基開始轉變策略，籌備獨立的托派國際

⑩ 〈我對於幾個問題的意見〉；〈雪衣來信論對宋慶齡、斯大林集團的策略〉，載《校內生活》第13期，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出版。

⑪ 〈關於經濟復興問題及其他〉。

⑫ 同⑩。

——「第四國際」，以示與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決裂。

這年七月，托洛茨基以「古羅夫」署名發出的給各國托派的信件中強調說：「必須成立新的共產黨和新的國際，……談論『改良』、要求反對派重新回到正式的黨內，都是空想的和反動的，應立即停止。」

爲什麼要改變策略呢？托洛茨基解釋說：法西斯主義奪取了德國政權，這是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未能加以阻止的過錯，於是他認爲共產國際已無可挽救。實際上，抓住希特勒上臺，是一個藉口，爲了掩飾他原來設想的通過「批評」、從內部使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改變性質」的方針遭到的失敗。幾年來，托派的種種努力始終未能影響共產國際的政策。

在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內組織「反對派」策略的破產，促使托洛茨基去建立自己的獨立的「國際」。當時他掌握和影響的托派組織只有幾個。八月，他首先召集臨時國際書記局及法國的「共產主義者聯盟」、德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荷蘭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和「獨立社會黨」，在巴黎開會，討論成立托派國際的問題。會上發生了分歧。有些人認爲托派組織和人數還太少，不具備獨立成立國際的條件。據托洛茨基一九三五年的日記所寫，他在各國的追隨者有四千人。這個數字很可能也是被誇大了的。日記中還指出，在每一個托派組織中，都有兩派、三派或更多的派別，由於個人名利和意識形態的原因而互相爭鬥。會議最後決定可以著手籌備，發表宣言，宣布第三國際已經死亡，並提出了十一條原則，作爲新國際成立的基礎。這就是第四國際的濫觴。

這年十月，托洛茨基寫了〈蘇聯與第四國際〉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第四國際」的概念。一九三四年七月，他又創辦《新國際》雜誌，作爲籌建「第四國際」的輿論和聯絡機構。一九三五年春天，簽

名於「十一條宣言」的四個團體，除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團上層領袖有中派傾向而表示退出外，其他組織又聯絡美國的「合衆國工人黨」和加拿大「工黨」，聯名發表了籌備「第四國際」的文告〈爲建立第四國際的公開信〉，把籌備工作推進一步。

一九三六年七月，托洛茨基又把追隨他的人召集在一起，催促成立第四國際，但分歧依然沒有消除。最後只成立了「爭取第四國際運動執行局和國際書記處」，繼續進行籌備工作。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經過長期的爭論和談判之後，托洛茨基終於把那些總算相信有必要建立「第四國際」的追隨者召來，開了一個「成立大會」。來自英、美、德、法、蘇、意、波、比、荷等十幾個國家的二十一名托派組織的代表參加了這個在巴黎附近舉行的會議。會期只有一天，匆匆忙忙地通過了托洛茨基事先寫好的文件和決議。會議決定第四國際的名稱叫「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總部設在巴黎，選舉托洛茨基爲「國際執行委員會秘密名譽書記」。

儘管如此，會上仍有人表示反對成立「第四國際」。他們說：「我們的運動太弱小了，還稱不上國際。」^⑩有人還說：「我們的宣言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得到哪怕一小部分工人階級的響應。」還有人警告說：「不要空作姿勢，不要幹蠢事」。他們反對人爲地成立一個國際，認爲「它只有在大事件中才有可能產生」^⑪。這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被會議斥之爲「懷疑派」。主持會議的美國托派分子沙赫曼稱此是「孟什維克鑽進我們的隊伍中來了」。托洛茨基則叫嚷道：「我告訴你們，三、五年後第四國際將成爲世界上一支巨大的力量。」在另一次講話中，他描繪了一幅更加美妙的圖景：「在今後十年內，第四國際的綱領會成爲

^⑩ 《第四國際文件集》第 163、29 頁，一九七三年紐約版。

^⑪ 同⑩。

千百萬人的綱領，這革命的千百萬人將能一舉占有大地、占有天空。」

⑩

一九三三年，上海來了個名叫格拉斯(F. Glasse)的南非籍美國人，任英文版的《密勒氏評論報》副主編^⑩，其地位僅次於埃德加·斯諾。他是美國托派組織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委員。該組織是托洛茨基當時籌備第四國際所依靠的幾大托派組織之一，所以格拉斯與托洛茨基一直保持著通訊聯繫。他來華後取了一個中文名字「李福仁」，並與中國托派取得了聯繫，於是，他實際上成了托洛茨基與中國托派之間「通訊員」。

陳獨秀被捕後，托派活動經費（主要是刻印、印刷、出版中央機關報和傳單、小冊子的費用）靠領導人交的個人收入十分之一的「黨費」。由於這些人「均靠賣文為生」，十分窮困潦倒，所交不敷所出，不足之數，悉由李福仁付足。李福仁從上述報刊編輯中，得月薪七百元。他以托派成員的資格，繳納這筆錢。

這時托派臨委中增加了剛從獄中出來的尹寬。尹寬是怎樣出獄的呢？據蔣振東生前寫的最後一篇未完成的回憶錄披露：

尹寬被捕後，被關押在上海漕河涇監獄。這個監獄以條件最惡劣而臭名昭著。區芳、陳亦謀、宋敬修先後病死在這裡。尹寬也得了「一場大病，眼兒就要死了，監獄當局才許可他保外就醫。

約在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尹寬要求保外就醫的信輾轉傳到托派臨委處，叫蔣振東找一個保人。蔣就拿著信去找金鴻圖商量，決定找朱英如作保。朱英如的丈夫沈覺開了一家小機器店。朱英如夫婦很

⑩ 伊·多伊徹：《被放逐的先知。一九二九～一九四〇年的托洛斯基》第426頁，一九七〇年倫敦—牛津—紐約版。

⑪ 格拉斯在一九八八年逝世於美國，享年87歲。

熱心，答應作保人，立即蓋了圖章。到約定的那一天，蔣振東在漕河涇監獄旁一家小茶館等候，大約上午十一點鐘，尹寬扶著牆壁艱難地走到茶館裡來。蔣振東隨即把他接到家中。

尹寬在蔣家住了兩天，身體實在太壞，就送他進了一家天主教辦的醫院，住三等病房，一共只付了十元錢，說候家裡寄錢來再付。他住了二個月，欠了二百多元，心裡很著急。向托派組織要錢，也無著落。怎麼辦？尹與蔣商量後，在星期日上午逃出了醫院。因為這大醫生、護士和辦事人員都到隔壁教堂做禮拜去了。尹寬出來後，還穿著醫院的衣服，暫住在華盛路同樂坊蔣振東家中。

幾天後，尹寬準備躲到安徽桐城老家養病。大概醫院又到監獄告了他。忽然，監獄的醫生來保人朱英如家裡，催促尹寬回監獄去。朱英如找到金鴻圖和蔣振東家。尹寬走不了，心裡非常著急。商量結果，先讓尹去開一個旅館躲一躲，再去疏通保人。

尹寬躲進了三馬路源源旅社。蔣振東隨即去找趙濟。趙濟代表托派臨委到旅館看望尹寬，安慰幾句，給了幾塊錢。下午，蔣振東拿了錢到朱英如家疏通時，朱家夫婦不在家。蔣趕回旅館時，尹寬又失蹤了，回家時才知道，尹寬被保人押回保人家。蔣趕到朱英如家，竟然看到尹寬躺在床上。一問之下，才知道這是金鴻圖夫婦搞的鬼。

次日，蔣振東去朱英如家看望尹寬。尹笑嘻嘻地告訴說：他同朱英如已商量好，去買通監獄醫官這一關。於是，由蔣振東買了四樣禮物去漕河涇監獄附近那個醫官家裡。醫官收下了禮物，答應不再催促尹寬回監獄去了。

尹寬於是留在上海，病好以後，參加「臨委」。以他的地位和影響，團結了一些幹部，基本上支持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又有一些矛盾。

李福仁與中國托派發生關係後，同時與陳其昌、尹寬和劉仁靜接

觸。劉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一直被中國托派及其中央所排斥。所以他竭力拉拔李福仁。李固然深受其影響，認為陳其昌、尹寬領導的托派組織太保守，不能開展工作，因此主張插幾個青年人進去^⑩。於是未遭破壞的北平托派組織，先派王樹本來上海探路，了解組織情況。

王樹本先與做李福仁私人汽車司機的邵魯接上了頭，介紹了北方托派組織的情況。李福仁、劉仁靜和邵魯於是決定利用北方青年托派的力量，批判臨委，改組臨委；又讓王樹本做蔣振東的工作，進行分化瓦解工作。王樹本把在上海聯繫的情況，告訴了北平的劉家良、史朝生和胡文華。他們先後南下上海。胡文華參加了臨委，史朝生和王樹本為宣傳幹事，列席臨委會議，劉家良任滬西區委書記。

史朝生又名施（斯）頌德，原是燕京大學的共產黨員，後來轉向托派。劉家良及胡文華在一九三一年托派統一時是北京大學托派支部成員，王樹本則是北平師範大學托派支部書記。一九三三年托派華北區委改組後，史朝生、劉家良任區委委員。這批思想更加極「左」的青年托派到上海後企圖奪取托派臨委的領導權，於是，他們在李福仁和劉仁靜的支持下，拋出《國際國內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討論提綱》，參加正在進行的爭論中來，使爭論很快白熱化，最後集中到更有利於他們奪權的「共同行動」和「改組」問題上，向陳其昌、尹寬及其支持者陳獨秀，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因為陳其昌托派臨委繼承陳獨秀的路線，曾要求參加一九三三年宋慶齡領導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並與「福建人民政府」談判。史朝生等人就聲稱反對任何形式的「階級聯合」或「共同行動」。同時他們攻擊托派臨委是「上

^⑩ 參見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手稿及鄭超麟給作者的信（一九八〇年十月五日）。

層官僚主義」，「工作方式好像是個保姆或教授」^⑩，要求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陳其昌則批評史朝生的意見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的辦法，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⑪

就這樣，雙方吵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史朝生、劉家良等人背著陳其昌擬訂並發出《臨委緊要通告》^⑫，通知各支部十天內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會議」。議程(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線，以「提綱」為根據，要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人放棄與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上層集團成立「反戰」「倒蔣」等聯合戰線的主張。(二)準備一個新的基本綱領。(三)發表籌備成立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宣言。(四)改組「臨委」。

一月十三日，他們果然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七人舉行「上海代表會議」(陳其昌等人棄權)，史朝生、胡文華分別作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全體一致同意，並認為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人關於「聯合戰線」的意見「乃斯大林派機會主義思想之復活」，「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必須作「無情的鬥爭」；對他們「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志，否則，應立即開除出黨。」會議決議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中央」由十人組成(包括格拉斯)，史朝生、胡文華、劉家良(書記)三人組成常委。

會議還根據托洛茨基關於組織獨立托派國際和托派政黨的指示，正式決定把中國托派的名稱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改為「中國

⑩ 〈史朝生致陳其昌「常委」的信〉(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載《校內生活》第11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版。

⑪ 紀它：〈批評朝生同志的組織意見〉，載《校內生活》第11期。

⑫ 同⑩第13期。

共產主義同盟」^⑩。

第十節 陳獨秀被托派中央「開除」

陳其昌爲此特意趕到南京，向陳獨秀匯報了這一嚴重的事態發展。陳獨秀聽後悲憤已極，立即寫信給史朝生等人，說：「一切不樂觀的現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見，應公開的辯論，切勿希圖利用組織威權來箝制異己，像這樣分裂組織的行動是不允許的。」他呼籲「必須代大及國際解決！」「不宜草率決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威權來解決政治意見，尤不可採用開除個人這種滑稽手段。」他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志尙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⑪

殊不知新的托派中央對陳獨秀遙遠的干預更爲惱火。他們本來就是把他和陳其昌等人一塊打擊的，這次他是自投羅網。一月二十五日，新的中央把陳獨秀過去寫的文章和決議都找出來，給陳獨秀覆了一封很長的信，系統地列數批判陳獨秀四大機會主義錯誤：「共同行動」；放棄「保衛蘇聯」及「聯合蘇聯」的口號；現在仍把「紅軍」看做「流寇土匪」；組織問題上「拉攏調和的中派主義立場」。指責說，如果這些錯誤不改正，「則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線和分子將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藉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表示不同意陳獨秀解決組織問題的辦法，「或者糾正錯誤，或者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辦法（如『等國際

⑩ 〈中常委通告第1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其決議〉，載《校內生活》第13期。

⑪ 〈雪衣最近來信〉，載同⑩。

來信』或『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來解決)，都是有害的形式主義！」^⑩並且他們採取斷然措施，終於將陳其昌和尹寬開除了。在他們以「常委」名義發表的通告〈爲撤銷陳其昌、蔣吉士（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中，說中央委員會與陳其昌、尹寬作「最後談話」，陳、尹表示「原來的政治主張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因此決定將他倆人「開除」，並要求陳獨秀、趙濟、蔣振東等人表態^⑪。

陳獨秀當然表示反對，所以，他也被「開除」了。當時王文元正好出獄來到上海。他也致函劉家良、史朝生托派「常委」，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色的氛圍中，我們這點點快等於零的力量，應該要相當加以珍惜的」；提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大會解決，「請國際作最後解決」；在解決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制裁」^⑫。但是托派中央沒有理他。

新中央成立前，李福仁曾出資三百元給陳其昌的臨委設立了一個印刷廠。這是個特別的印刷廠：沒有機器，只有鉛字，每次把鉛字排好，鉛條夾好，就把油墨塗上去，印出書報了。後來，陳其昌、尹寬不承認史朝生的新中央，不肯把這個「印刷廠」交出來。恰在這時，一個參加印刷工作的人，起了私心，要吞沒這副鉛字。於是，李福仁裝扮成英國捕頭，邵魯開汽車，管電話的趙志誠冒充翻譯，到那間屋子去，把鉛字搶到手。可是不久，他們窘於經費，又把這個「印刷廠」賣掉了。

⑩ 〈中央委員會致雪衣同志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同⑩。

⑪ 同⑩第13期。

⑫ 連根（王文元）：〈對目前組織問題的意見〉，載《全體起來，制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油印單行本。

這時，還有一個叫H·R·埃撒克斯(Isaacs, 中文名叫伊羅生)的外國人也捲入了這場糾紛。他是美國共產黨員，一九三〇年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在《檀香山廣告報》任職，不久來華，在上海兩家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和《大陸報》當記者和編輯，並受共產國際委託，幫助中國革命。翌年一月，他主編中共外圍報刊《中國論壇》，並參加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執行委員，營救牛蘭等中外革命黨人，做了一些對中國革命有益的工作。此外，他還為美國一家出版社翻譯中國的小說，把魯迅、丁玲、茅盾等一些進步作品匯集了一本出版，取名《草鞋腳》。

但是，從一九三三年開始，伊羅生受到李福仁等托派理論的影響，與中共發生了一系列矛盾衝突，並在《中國論壇》上反映出來。例如在對待蘇聯問題的宣傳上，他接受托洛茨基「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拒絕在報上報導蘇聯建設五年計劃的情況和成就，認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是「國家主義的」，抨擊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對帝國主義「求助」、「屈服」，宣揚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的理論。對德國問題，他認為法西斯希特勒的上臺是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政策錯誤的結果。對於中國問題，他認為中國現階段革命性質是「無產階級革命」，忽視土地問題，輕視農民同盟軍的作用，不願宣傳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的勝利，否認「九一八」後中國工農群眾反帝鬥爭的高漲，過高地估計反動派的力量。

一九三三年陳獨秀被判刑後，中國共產黨認為這是托派路線的破產，指示伊羅生在《中國論壇》上批判陳獨秀搞托派的錯誤，伊羅生拒絕。福建事變時，中共又要伊寫報告，批判托派插手這一事件，他又抵制。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國論壇》的出版，並在機關

報《紅旗》上發表〈堅決反對「中國論壇」上偷運反革命托洛茨基主義私貨（提綱）〉，批評了伊羅生在《中國論壇》上表現的上述一系列錯誤，號召「堅決糾正《中國論壇》上一切錯誤，徹底改造它，使它成爲真正革命的群眾刊物。」^⑩

伊羅生就此與共產黨決裂，徹底轉向托派，與劉仁靜、李福仁、史朝生等人搞到一起，並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寫了〈爲「中國論壇」事給中國共產黨的信〉登在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上，對中共中央的批判進行反批判^⑪。

托洛茨基一直希望有一部記述中國大革命的歷史著作，作爲他攻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砲彈和各國托派學習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教材。他認爲中國大革命運動是一個「黑夜」，是一場「慘劇」，而他的理論是這黑夜中的一顆「明珠」。他提出一定要總結中國大革命的歷史經驗，「不研究中國慘劇的教訓，也就不可能了解十月革命道路的意義。」^⑫

當時在獄中的陳獨秀答應朋友的提議，準備寫中國大革命的歷史。伊羅生轉向托派後就答應爲陳蒐集素材，並請劉仁靜幫他一起工作。於是從一九三四年六月開始，劉仁靜就受雇於伊羅生在北京進行活動^⑬。二人又支持史朝生、劉家良等人在上海進行的爭奪托派中央領導權的鬥爭。

這一齣鬧劇，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新的托派中央被國民黨破獲，

^⑩ 《紅旗週報》第64期。

^⑪ 同^⑩第2卷第4期。

^⑫ 〈需要一部第二次中國革命的歷史〉（一九三〇年九月），《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紐約版。

^⑬ 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

劉家良、史朝生、胡文華、王樹本及李福仁在上海，劉仁靜和伊羅生在北京同時被捕，才告結束。

此案發生後，李福仁和伊羅生因是「洋人」被吊起來打了一頓就獲釋；劉仁靜表示願意「反省」，進了蘇州反省院；劉家良被判七年，其餘三人都判五年徒刑^⑩。

這樣，托派又陷於「領導機關根本沒有」的狀態中。這年夏天，王文元又來到上海，收羅起二十多個托派分子，企圖重新組織起來。「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王文元——引者），暫時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著手整理工作。李福仁此時已和陳其昌及尹寬和解，常見面，也極盼組織能夠恢復。」不久，從一次上海托派分子的代表會議上，推出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陳其昌（書記）、尹寬（組織）、王文元（宣傳）、蔣振東、趙濟。李福仁因是外國人，個別人還不能接受，就作臨時委員。此時陳獨秀方面，因得陳其昌、趙濟和王文元的不斷解釋，總算對與「毛子」的合作也諒解了。而此前，陳獨秀「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與毛子（即外國同志）合作。」^⑪

陳獨秀答應與李福仁合作，以及中國托派再次與李福仁合作，是與托洛茨基的推動分不開的。

伊羅生獲釋後，不得在中國存身，隨即離華返美。他在途經挪威奧斯陸時，拜見了流亡在那裡的托洛茨基，向托匯報了中國托派中央開除陳獨秀事件，並帶去了劉仁靜反陳巨著《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他還受劉仁靜、史朝生等人的影響，說了詆毀陳獨秀的話，甚至把蒐集的材料也未給陳獨秀，帶回國去自己寫了一本名叫《中國革命

^⑩ 同^⑨。

^⑪ 同^②第195、196、194頁。

的悲劇》的中國大革命史。

該書初稿寫成後，伊羅生還特地到挪威去訪問托洛茨基，和他討論問題，請他讀原稿，提修改意見。托洛茨基很賞識這個年輕美國人（當時才二十五歲）的才華，仔細讀了稿子，認認真真提了不少意見。從後來開放的哈佛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托洛茨基檔案中，就發現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有九封這樣內容的托洛茨基致伊羅生的信。在信中，托洛茨基就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觀點來寫作？當初中共是如何決定加入國民黨的？什麼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等問題，提出了十分中肯而坦率的意見；以歷史見證人的身分，糾正了書稿中對當時共產國際、中共、陳獨秀、馬林、國民黨等史事一些不正確的記述和評論；對有些問題作了很有價值的理論分析。最後，托洛茨基還為該書寫了一篇很長很有分量的序。

一九三八年九月，該書出版後，托洛茨基在十月十六日致函給伊羅生，表示「非常高興」，稱讚「這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一項真正收穫」，並希望迅速翻譯成各種文字，推廣給世界各國。為此，他在這月二十三日特地為該書寫了一個廣告式的短條：

《中國革命的悲劇》，哈羅爾特·R·埃撒克斯著，全書五〇一頁，英文，上月出版。這本書敘述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它提供了現代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一個非凡的例子。著者對於書的題材是異常熟悉的。以一個積極的與嚴肅的觀察者身分，部分又以事變參加者身分，他曾經在中國生活過好幾年。作為他這部著作的基礎的，乃是確鑿巨量的國際文獻。著者能靈活地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又能以明白、確切與令人信服的文字來寫作。每一個真正關心中國前途與中國革命的人，都必須將它當作手

•

冊的。我寫這張短條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同志注意埃撒克斯同志的這本書。我又表示一個希望，希望它不久能譯成其他文字，首先必須譯成中文。

由於是這樣的內容，特別是運用了大量來自中國當地的材料，觀點又與傳統的共產國際斯大林及蘇聯科學院的完全相反，再加上托洛茨基親自出馬極力推崇，各國托派紛紛推銷，《中國革命的悲劇》出版後，立即在西方引起轟動。雖然該書在倫敦一家書店首次出版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書未廣泛流通，便讓粹納的轟炸機連書店一起給炸毀了。但從一九五一、一九六一年兩次在美國重新出版後，廣為流傳，銷路大增，從一九八〇年起每年重印一次，成了歷史科學類嚴肅書籍中的一本暢銷書，並有了許多種文字的翻譯本。

該書所以在西方得此殊榮，因為滿足了冷戰年代反蘇的需要。它被視為不朽之作，是國際上研究中國大革命領域中兩大對立陣營之一（即與蘇聯科學院相對立）的代表作。它更被中國托派視為經典讀物。

但是，一九三五年八月，當伊羅生與托洛茨基初次見面，以贊同的口吻向他匯報中國托派中央開除陳獨秀的事件時，托洛茨基明確表態「不允許」，並對於劉仁靜自命為中國托派運動中布爾什維克傾向的代表的那種驕傲態度，頗覺有趣。他說：「我想即使陳獨秀具有某些機會主義的成分，但他畢竟多活幾歲，有更多的經驗。……他能貢獻我們許多好的意見，……我們絕對需要留他在第四國際的總委員會中與我們合作。」他認為劉仁靜批判陳獨秀的意見是「大大地誇大了的」，「荒謬」。^⑩

^⑩ 〈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談話〉，一九三五年八月，伊羅生筆錄，載《中國革命問題》第331-334頁。

就在這次談話以後，八月十日，托洛茨基給李福仁寫了一封信，雖然他無可奈何地宣稱，對中國托派與陳獨秀的「那些思想分歧問題，我暫時不表示意見」，默認「中國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與陳獨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但他毫不掩飾地竭力推崇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業已證明為絕對可靠的。」「他是國際的人物，他現在被監禁在牢內。他不僅仍舊忠實於革命，而且仍舊忠實於我們的傾向。」為此，他以「你們不要我要」的態度表示：「陳獨秀可以而且必須有其位置在第四國際領導機關之中」；「我們現在正在創立第四國際，以總理事會為領導國際的理論機關和諮詢機關。……我認為，無疑，陳獨秀同志是應當加入總理事會的，不管他和中國支部有什麼重要分歧。」他甚至強調說：「我們如果拋棄了陳獨秀的合作，那對於第四國際的威權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⑩

就這樣，托洛茨基在陳獨秀最困難的時刻，給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榮譽」。他們二人之間的這種關係，一直繼續到一九四〇年托洛茨基去世。

那麼，中國托派中央對托洛茨基提議陳獨秀進第四國際總理事會持何態度呢？最近從一九八〇年一月啓封的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托洛茨基檔案中，發現一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國托派中央「組織重建會議」記錄，回答了這個問題。會議詳細討論了托的建議，並改選了托派中央。

原來，在斯朝生托派中央時期，曾決定推舉劉仁靜和斯朝生參加即將成立的第四國際總理事會，並由伊羅生親自告知托洛茨基。現在情況有了變化，托洛茨基熱情歡迎陳獨秀，於是托派中央這次會議特

^⑩ 《建立》第3期，一九四七年九月出版。

別討論了這個問題。出席者是：王凡西（即王文元）、陳其昌、尹寬、賀希、蔣振東、邵魯、李福仁。

首先，尹寬說，他由劉家良的老婆那兒得來消息：劉仁靜已經向國民黨自首，轉送蘇州反省院，可能不久獲釋。他已聲明自願投降國民黨。所以，他已不能充當中國托派代表加入總理事會。關於推選陳獨秀進總理事會，尹寬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但是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陳其昌說：「中國同志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第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陳獨秀進總理事會；第二個問題：陳獨秀是否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我們應當只討論第一個問題，他的提名接受與否。」

蔣振東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不能代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因此關係到他夠不夠當代表。兩個問題一定得合起來討論。」

李福仁指出創建第四國際的任務，不止包括布—列派，應該包括所有那些見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破產而需要第四國際的人們。問題在於聯合所有需要建立第四國際的人們。將來無疑會分化，但在此階段，不能以次要的分歧為理由而排除個人或黨派。現在的目的是聯合所有贊成建立第四國際的革命黨派到一個組織裡來。

長時間討論後，尹寬重申：「我們接愛托洛茨基的提議，但要加上一句話，說明我們與陳獨秀之間的分歧。」有的同志反對這一條件。

最後投票表決決議案：「我們贊成托洛茨基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四票贊成，三票反對。贊成者：陳其昌、王凡西、邵魯、李福仁。

可見，李福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接著，會議討論「組織重建」，決定組織正式名稱仍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決定由尹寬和王凡西起草一個行動綱領，「致力於我們人數的發展，使新人知道他所要加入的是什麼樣的組織」。又決定出版兩份非法機關報：政治機關報《鬥爭》，周刊；理論機關報《火花》，半月刊。前者是創刊，爭取合法。

選舉中央常委會時，討論誰來當書記—司庫，發生分歧。陳其昌提議李福仁。李提議由一個中國同志擔任較好。賀希提議尹寬書記，李福仁司庫。陳其昌說：「現在重要的是常委書記應能團結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因此李福仁應做書記。選舉結果，李福仁當選書記—司庫。李得三票，尹得二票。其他職務也通過選舉確定，宣傳：王凡西。《鬥爭》主編：陳其昌。組織：尹寬。

一個政黨接受外來津貼，並選外國人當領袖，一般人很難接受，甚至會斥之為「賣國」、「投靠」、「奴才」、「工具」之類。但是，對於以國際主義為最高原則，以世界革命為己任的托派來說，却認為是正當的事。他們排斥一切民族主義，信奉「工人無祖國」。

接著，會議討論「組織重建」，決定組織正式名稱仍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決定由尹寬和王凡西起草一個行動綱領，「致力於我們人數的發展，使新人知道他所要加入的是什麼樣的組織」。又決定出版兩份非法機關報：政治機關報《鬥爭》，周刊；理論機關報《火花》，半月刊。前者是創刊，爭取合法。

選舉中央常委會時，討論誰來當書記—司庫，發生分歧。陳其昌提議李福仁。李提議由一個中國同志擔任較好。賀希提議尹寬書記，李福仁司庫。陳其昌說：「現在重要的是常委書記應能團結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因此李福仁應做書記。選舉結果，李福仁當選書記—司庫。李得三票，尹得二票。其他職務也通過選舉確定，宣傳：王凡西。《鬥爭》主編：陳其昌。組織：尹寬。

一個政黨接受外來津貼，並選外國人當領袖，一般人很難接受，甚至會斥之為「賣國」、「投靠」、「奴才」、「工具」之類。但是，對於以國際主義為最高原則，以世界革命為己任的托派來說，却認為是正當的事。他們排斥一切民族主義，信奉「工人無祖國」。

第五章 抗戰中亂彈琴

第一節 重振托派運動

史朝生等人的新中央垮臺以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名稱保留了下來。一九三五年底恢復的臨委，陳其昌一派重新掌握領導權。他們從兩方面重振中國的托派運動：

(一)創刊了新的政治機關報《鬥爭》，復刊了理論機關報《火花》，宣傳他們的主張，發出政治攻擊。這兩個刊物從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四二年底，幾乎沒有中斷，是中國托派歷史上壽命最長的一段刊物。他們靠幾個印刷工人，還籌辦了一個簡易的印刷工場，出版了一些托派國際的文獻。

《鬥爭》報每月一期，每期四百份，每份是一張四頁半開的篇幅。印刷費用（包括兩個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及其他活動經費，除幾個臨委成員所交的數量不多的「黨費」外，多數由李福仁補足。它在一九三六年春創刊初期，主要內容是攻擊中國共產黨正在採取的新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刊號第一篇就是王文元寫的〈給中國共產黨的公開信〉。「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他們又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過了政治決議案〈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①。

① 載《鬥爭》第3卷第2期。

在這些文件中，他們堅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及其他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的路線，對中國共產黨發表的「八一宣言」、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與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的談判，以及共產黨作出的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四項讓步等等，托派都竭盡誣蔑之能事，進行惡毒的攻擊。

在〈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決議案中，他們胡說：「西安事變之發展及其解決，完全是在英帝國主義的直接指揮之下。……它目前統治中國的基本政策是：用全力支持並加強南京的地位，促成各地方勢力（在某種條件之下甚至包括『紅軍』在內）對南京臣服，企圖以『統一』的力量，對抗日本。」因此「第三國際與斯大林主義者在主觀與客觀上都做了蔣介石與英帝國主義的工具」。決議案宣稱西北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廣的陳濟棠及福建的陳銘樞等各地方軍閥和整個的落後勢力，決不能比南京政府更具有較多的「民族性」，他們之「抗日」，「完全是利用民眾的同情，藉以進行軍閥混戰，其目的只在於同南京爭奪剝削民眾與投降敵人的權利。」

決議案認為真能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是工農兵及下層小資產階級勞苦大眾，但又挑撥說共產黨、救國會以及各種法西斯式團體，「都想把工農兵上與小資產階級的各種鬥爭，引導在國民黨蔣介石的支配之下。這在目前的階段上是幫助了英帝國主義，而在終極的分析上，它又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明明自己破壞抗日聯合戰線，卻反誣別人幫助帝國主義，這種「革命」嘴臉，真令人啼笑皆非。

決議案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最為惡毒的攻擊：「斯大林黨以抗日為藉口，放棄了土地革命，放棄了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總之放棄了共產黨所有的立場，以最可恥的態度屈膝於國民黨蔣介石之前，求其『聯

俄抗日』。其第一個悲慘的結果，即推小資產階級入於國民黨的懷抱。……因斯大林毛澤東的效忠，蔣介石已經在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中獲得了一些幻想，促進了蔣介石死黨們的法西斯運動。」「第二個罪惡的結果就在於農民游擊隊的墮落及解體的危機，……『紅軍』再不是階級鬥爭的革命力量，而變成爲簡單僱傭軍隊了，……變成民族愛國主義的了。」「第三個罪惡的結果，將使復興的工人運動夭亡。」「勞資合作共赴國難」、「中國廠不罷工」的口號，「將麻醉工人的意識，分裂工人階級的統一」，摧毀中國革命的整個希望。

決議案自稱是「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要「站在徹底的階級立場上，參加並領導各種民族與民主的鬥爭」，同時又必須無情地打擊斯大林黨叛徒們的政策，且揭穿救國會第三黨等的欺騙。最後提出他們托派國民會議的政綱和口號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土地歸貧農！」

「成立兵士委員會，打倒一切軍閥！」「反對背叛階級的斯大林黨，建立第四國際的中國新黨！」「打倒降敵害民的國民黨，召集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事！」等等。

這個決議案，充分暴露了托派在抗日問題上的反動面目，從而使托派在抗戰中被視爲「漢奸」造成了條件。

陳獨秀起初對「八一宣言」也是這種觀點。他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寫的〈中國的一日〉^②和七月一日寫的〈我們在時局中的任務〉^③中，聲稱現今世界上只有階級對立，沒有超乎階級利益之上的民族利益，攻擊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騙子」，而相信這種理論的人是「痴子」，要人們不要做痴子上騙子的當；攻擊聯合英美等民主國家反對日本法西斯的策略是「奴隸選擇主人」等等。但是

② 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生活書店一九三六年出版。

③ 《火花》第3卷第3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特別是「七七」抗戰爆發後，陳獨秀的思想開始轉變，並且與堅持反動立場的托派臨委決裂。

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爲了貫徹「八一宣言」的精神，在上海文藝界中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爲防止在文藝抗日統一戰線中出現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傾向，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來補充「國防文學」的口號。二者本來是一致的，並無矛盾。但是，當時上海文藝界中共地下黨中的一些同志有宗派主義情緒，聽不進不同的意見，動輒扣帽子，說人家「托派漢奸」等等，對魯迅也是這樣。魯迅對這種傾向進行了批評。

托派臨委錯誤估計了這種情況，以爲魯迅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立場是對中共「無條件投降於國家主義的厭惡」，這是與他們一致的。所以他們聽到魯迅與中共「爭論」的消息後「非常興奮」，於是在六月初，由陳其昌出面，化名「陳仲山」，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隨送了近幾期《鬥爭》、《火花》刊物。信一開始就猛烈攻擊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轉向軍事投機」，「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依靠農民打天下，使「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現在又「一反過去的行爲，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信接著又自吹：「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爲我們的主張不懈的鬥爭。……爲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斯大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種背叛的『新政策』。」❶

信的最後又肉麻地吹捧魯迅的「學識文章與品格」，胡說只有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才歡迎中共的新政策，乞求魯迅支持他們托派的政治意見，以離間魯迅與中共的關係。

當時魯迅已病得很重，不能執筆，但他讀信後不為托派的喝彩、吹捧所迷惑，對當前錯綜複雜的鬥爭形勢採取冷靜、認真的分析的態度，立即口授給馮雪峰同志寫了回信。

回信高屋建瓴，旗幟鮮明，分清大是大非和敵我界限，指出他與某幾個「戰友」是有爭論，但「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在巧妙地批駁了托派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後，魯迅諷刺他們說：「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並進一步揭露說「只有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才會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

魯迅明確宣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反對托派的立場：「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④

魯迅將來信和回信一起公開發表在《現實》文學雜誌上，給中國托派及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陳其昌讀了魯迅的回信還感到委曲，「很覺得痛苦」，於是又給魯迅寫了一封長信為托派辯護，未見魯迅回信。二十年後王文元寫回憶錄時，還歪曲魯迅的信，為托派沒有

④ 載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第97-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⑤ 同④第99-100頁。

拿日本人的錢進行辯解，並說陳獨秀當時在獄中知道陳其昌向魯迅寫信的事後，曾「大發脾氣」，問托派臨委「爲什麼對魯迅發生幻想」，並攻擊說：「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於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⑥

一九三六年八月以後，托派的另一個重大行動是針對莫斯科正在進行的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中心案」的審判，進行反擊。這次審判，使在蘇聯國內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十五名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翌年一月，又審判「反蘇托派中心案」，皮達可夫等十五人被槍決。一九三八年三月，又審判「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布哈林、李可夫等十八人死刑。這是斯大林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濫殺精英的瘋狂事件，大傷蘇聯元氣，給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以致命的、影響極其深遠的打擊。

中國托派在《鬥爭》報上大量譯載托洛茨基關於此事件發表的言論和文章。王文元、陳其昌等人還翻譯編寫了《莫斯科審判的國際輿論》、《莫斯科審判的真相》、托洛茨基的演說《我賭我的生命》，以及美國「杜威委員會」爲托洛茨基翻案的判決書等。所有這些書籍都由陳獨秀的老朋友汪孟鄒主持的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這些書及《鬥爭》報上的文章，從各個方面論證了莫斯科審判是羅織罪名，托洛茨基等人無罪，在當時的中國輿論界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此外，臨委還爲這時期托洛茨基正在進行的籌備第四國際的活動，進行了一些宣傳。在《鬥爭》報上，刊載了一些反映這個籌備過程的歷史文獻和中國托派表示擁護並準備儘快建立獨立的托派政黨的文章。

^⑥ 《雙山回憶錄》第207頁。

恢復發展上海和全國各地的托派組織。臨委重建後，上海的組織很快恢復，開始了活動。然後，他們重點整頓香港的組織。那裡有原來「我們的話派」區芳、陳亦謀和梁幹喬等人打下的基礎，尤其在工人中，還有不少托派分子。幾年來，他們與托派中央斷了聯繫，而與章伯鈞第三黨們混在一起。一九三六年五月，臨委派王文元在洋人李福仁的掩護下，前往香港。他們以陳仲禧和另一個「無產者社」的老同志為中心，重新團結了十幾個人，以陳仲禧的家鄉中山縣為基地，建立了托派華南區委的組織，並使他們與第三黨劃清了政治界限，終止了跨黨現象。他倆還帶去了大批多年來未見的托派文件，還幫助他們仿照上海的做法，製成一架原始印刷機，建立了一個簡易的印刷工場，出版了華南區委機關報《火星》^⑦。

與此同時，托派臨委與廣西托派也取得了聯繫。廣西托派是原「我們的話派」的李希、秦強、張特去了後才發展起來的。一九三一年五月托派中央被破獲時，張特是與王文元一起去大連灣路那幢房子的。二人一進門，張特便被帶上手銬，王文元急忙衝向後門，巡捕去追他，張特便帶著手銬從前門衝到街上，坐上黃包車，就逃脫了^⑧。當時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正高舉反蔣旗幟，偽裝左傾，吸引了不少共產黨員及其他反蔣進步人士。南寧一中校長劉善繼是張特在中學時的同學，這時到上海招聘教師，於是張特等人就應聘去廣西。到廣西後，他們投靠了桂系，與桂系手下一個大紅人，曾在莫斯科留學的同學王公度搞在一起，張特當南寧軍校少校教官，秦強為省黨部幹事，進行反蔣反共活動。

王公度當時任桂系軍隊總政治訓練處處長、少將軍銜，國民黨廣

^⑦ 同^⑥第198頁。

^⑧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

西省黨部常委、省政府委員、南寧軍校政治訓練處主任，還掌握《廣西日報》等全省宣傳工具、桂系特務組織等。他在莫斯科時就深知托派的政治主張，爲了在廣西複雜的派系鬥爭中培植個人勢力，有意大量招募托派分子。張特等人就利用這種條件，在南寧一中、師範專科等校教書，在講壇上宣傳托派觀點，使不少青年轉向托派，於是就形成廣西托派組織。在這次上海托派臨委重建前後，他們就派李希到上海接上關係，支援臨委的工作，負責臨委「印刷工場」的兩名工作人員林煥元和毛鴻鑑就是廣西派去的。這二個人以及廣西托派派去的其他人如丁毅、蘇燕海、黃鑑銅、李培等，都成爲後期托派中央的重要成員^①。張特一面與托派聯絡，一面又在國民黨中做官，一直做到安徽省民政廳長。

華北地區的托派組織，在劉家良、史朝生等人去上海及一九三五年三月托派新中央被破獲之後，已經瓦解。老的華北區委書記汪澤楷已在一九三三年去廣西桂林師專教書。只有山東有一些托派分子，並在好幾個縣中有一點基礎。他們的頭目是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學讀書時加入托派的閻子桂。這時，他們也派了幾個人到上海，與臨委恢復了關係。抗戰爆發後，閻子桂曾把一大批流亡內地的山東學生拉到托派組織內。他自己後來又去西安投靠胡宗南，當了少將政治教官，收起反蔣一面，專幹反共勾當，博得胡宗南的歡心。抗戰勝利後，胡用官費把他送往美國留學，途經上海時，托派中央劉家良還爲他寫了一張介紹信，介紹給李福仁所在的美國托派——社會主義工人黨^②。

華北地區正統的托派組織沒有了，卻有一個不被托派中央承認的非正統的托派小組織，它是由杜畏之搞起來的。

^① 《雙山回憶錄》第198-199頁。史唐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致唐寶林的信。

^② 葉春華：《關於中國托派組織、托派多數派、少數派的情況》，未刊稿。

杜畏之，又名杜滄白、屠慶祺，河南永城人，在莫斯科留學時轉向托派，與吳季嚴相好。回國後曾混進中共中央某機關工作，後來被發現，開除出黨。一九三一年秋，陳獨秀介紹他去安慶安徽大學教書。一九三二年春，他與彭述之、吳季嚴、李季在上海中山公園接洽事宜後，與吳季嚴一起出公園前門時，被共產黨叛徒顧順章認出被捕，解到南京衛戍司令部。杜即與安徽大學校長程演生通電話，獲保釋。但他被司令部派人送去安大交程演生後，當夜又逃回上海。

陳獨秀被捕後，杜畏之與新的托派領導集團格格不入，遂於一九三五年到北平某大學教書，聯繫原托派華北區委成員耿炳光（耿堅白）、安景明（安明波）搞了一個獨立的托派小組。他們以這個組織的名義，在天津、北京、太原等地積極活動，並吸收因領導察北抗日同盟軍失敗而被王明「左」傾路線的中共中央開除的張慕陶參加，聯絡華北各派上層軍政人員反蔣反共，最後與閻錫山結合。

托派中央聞知杜畏之在華北的活動情況後，認為他完全違背托派不與異己政治勢力特別是反動軍閥政客聯合的原則，在機關報《鬥爭》上公開發表聲明，開除杜畏之，否認他們的活動與托派有關。

由於杜畏之這個托派小組執行反蔣反共的方針，因此竭力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客觀上為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在侵吞華北的陰謀效勞。全國抗戰爆發後，這個小組組織瓦解。耿炳光回陝西，任《秦風日報》（民主黨派所辦）主筆，勝利後，到上海某藥廠當職員。安景明先後到杭州之江大學、廈門大學教書。杜畏之則跑到福建劉建緒處做事，並與軍統特務頭子鄧文儀來往密切，曾請鄧營救關在集中營中的托派分子毛鴻鑑^①。

① 參見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未刊稿。

最突出的是浙江溫州托派的興起。

原莫斯科中國留學生中秘密托派組織頭目曾猛，由蘇聯回國後，一度混入中共中央某機關工作，被清除出黨後入「我們的話派」。托派組織統一後，被陳獨秀請去為托派中央刻印出版機關報《火花》、《校內生活》、傳單等。後來與陳獨秀等一起被捕。旋由家屬設法利用他大革命時期讀過黃埔軍校的關係，寫了一張悔過書就提前釋放。出獄後，他就在國民黨的批准下回到老家公開進行致力於反共的托派活動。

經過一段時期的籌備，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曾猛在家裡給一些愛讀社會科學書籍的青年辦了一個讀書會。每天由他講兩個小時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發展史，教材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用的課本，系統地宣傳托派的觀點。這樣搞了大約半年，引起了一些老托派分子李國棟、何樹芬、朱鈴、余嘉、黃禹石、錢川等人的注意，上海臨委也派賀希來，把他們正式組織起來，成立了「中國托派溫州支部」^②。

托派臨委的這些工作，為以後的托派運動打下了基礎；特別是香港、廣西、山東、溫州的組織，成為後期中國托派骨幹分子的四大供應基地。

第二節 托洛茨基指示倒蔣反共

受到國共兩黨夾擊、又被內部極左派緊緊困擾的中國托派，短短幾年受盡磨難，經過這次整頓，又看到了希望，頗有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情。誰知又好景不常，特別是他們在上海的領導機關，完全在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下；國民黨根據他們的活

^② 曾猛：《溫州托派組織形成情況》（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未刊稿。

動情況，隨時可以對他們採取行動。新臨委成立不久，尹寬、邵魯、賀希就先後被捕，經過是這樣的：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羅章龍派被開除。該派兩個幹部寒君、李平帶著為數不多的一批人參加了托派，其中有個在中新九廠細紗車間做加油工的叫「泰安小李」，是被國民黨特務收買的好細。他首先奉旨在羅章龍派內鼓動分裂共產黨，使該派從黨內分裂出來；尹寬等又把他培養成托派積極分子，然後他又把托派出賣給國民黨。使上海托派掌握在特務控制之中。一九三六年元旦，尹寬和邵魯到趙志誠家中吃過午飯後一起到文廟去玩，就被秘密綁架，關進特務設的監獄中。臨委只知尹、邵失蹤了，無處尋找。一個多星期後，賀希去闖北鼎鑫紗廠看朋友，剛走上造幣廠附近蘇州河大橋，後面監視的特務就跟上來把他抓走了。

尹寬失蹤後，先前被捕的寒君被放出來，代替尹寬，進入臨委。寒君在獄中深切了解到托派已被國民黨嚴密控制，對陳其昌、王文元等人說：「國民黨特務很厲害，對我們非常注意，我們應該加倍小心。」但如何小心，大家感到束手無策，只有盡量少活動；完全不活動是不行的。

尹寬等人被捕時，恰值尹往日的同學何其鞏任北平市長。他寫信給何求援。在何的幫助下，尹寬、邵魯、賀希進了反省院，而不是進監獄，以示「優待」。在反省院，有的悔過了，像邵魯、劉仁靜等，有的仍堅持鬥爭，像尹寬。一天，犯人起來同管理人員鬥爭時，他一面吐血，一面鼓動群眾上去鬥爭。一年之後，邵魯等先獲釋，尹寬因病得很厲害，被保釋，然後回家鄉桐城養病，暫時脫離托派。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間，剛剛獲釋的邵魯在路上遇見了陳其昌，遂在路邊一個隱僻處作了一次談話。邵講了自己如何被捕、如何悔過、

如何獲釋之後，說憑他一點「不泯的良心」向陳建議：依照原來方式的活動是絕對地不能繼續下去了的，因為據他知道，托派的活動已全部處在特務們的監視之下。「他們要在那一天幹完我們，便可以幹完我們。」所以他自己是從此「洗手」了，只以過去的同志之誼，對陳作此臨別贈言。陳聽了這番話，相當激動，立即跑去找王文元。他們承認時態是嚴重的，但根本放棄「原來的活動方式」，當然談不到。同時又懷疑邵魯做了特務，故作危言。所以他們還想看看，存在僥倖心理。

終於，一天下午，陳其昌去找寒君，進門時發見了可疑人物，立即轉身，兩個穿藍布工裝的特殊人物緊跟著他。陳和他們捉了幾小時迷藏，脫身後便去別處找到寒君報警。寒盡棄所有，得以身免；同時，又立即通知一切可能受影響的工作者都搬了家。這樣才算度過了驚險的一關。

事實再次教育托派臨委，情勢確實非常嚴重。可是怎麼辦呢？王文元說：完全停止活動，根本不能想像！學中共的榜樣撤退到農村去嗎？可是我們沒有「蘇區」，「同時我們的立場也不允許去做此種嘗試。結果，只有硬著頭皮照舊拼下去，讓要來的事情來吧！」終於，一個月後，一九三七年五月，國民黨特務又把王文元逮走了。

請看，這就是托派自吹的革命和他們的正確路線。「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守在城市裡就是一切，留在工人階級身邊就是「忠誠」，革命成敗和革命力量存亡是無所謂的。

王文元被捕後，其他臨委成員也在國民黨特務不斷跟蹤之下，惶惶不可終日，也不敢進行大的反對國民黨的活動，實際處於癱瘓狀態。到抗戰爆發前，上海托派分子只剩下十幾個人，組織空有其名，與各地托派組織的聯繫又告中斷^⑤。抗戰爆發後，待獄中的托派頭目紛紛

^⑤ 陳碧蘭：〈彭述之的思想與他在中國共產黨及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活動〉，《失去了的中國革命——彭述之選集》第190頁。

被釋，並再度雲集上海，中國托派運動才又有擡頭。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被迫釋放政治犯，獄中托派分子也紛紛獲釋，除了陳獨秀西下武漢、四川，鄭超麟到安徽養病外，多數人東去上海，繼續托派運動。不久，不少人又紛紛他去，例如：史朝生出獄時就宣稱「不幹托派」了。胡文華去東北參加了什麼抗日隊伍，再也沒有音訊。王樹本則在共軍攻克重慶前夕死於中美合作所。在最困難時期支撐過托派臨委的趙濟，這時也感到厭倦，回到家鄉雲南。羅世璠也回家鄉湖南，不久病死。金鴻圖回到陝西，中共掌握大陸政權後，向共產黨檢查了自己的錯誤。董汝誠回到陝西，曾任西安圖書館館長。李仲之也回陝西，投靠胡宗南。抗戰勝利後，藉胡的力量，做西安參議會議長。一九四八年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這些人紛紛脫離托派，一個共同的原因是對托派運動的前途感到絕望。

劉仁靜早在一九三五年被捕後，就對托派事業表示動搖，向國民黨三民主義靠攏。國民黨優待他，將他安排在蘇州反省院，並擔任這個反省院犯人「自治會」的主席。他在反省院辦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繼續宣傳被陳獨秀批判過的先「經濟復興」後搞革命的理論，宣稱：「現在民族復興的途徑只有靠階級調和，一致對外」；「就中國現狀看來，在中國想實現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主張中國應該「節制私人資本，即是創造國家資本主義，……實現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⑭陳獨秀在獄中看到這些文章後很惱火，並建議托派臨委開除了劉仁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托派臨委機關報《鬥爭》（第14期）刊登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為開除劉仁靜黨籍通告〉，指出在「江蘇反省院出版之《半

^⑭ 劉仁靜：〈讀「資本論」芻議〉，《半月刊》第3卷第11期；〈讀「西洋史論」〉，《半月刊》，第3卷第21期。

月刊》，見有劉仁靜投登的長文〈讀「資本論」芻議〉、〈讀「西洋史論」〉等篇，完全證實其思想的反動與叛變。……爲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劉仁靜爲共產主義的叛徒，開除其黨籍。」

抗戰爆發後，劉仁靜出反省院，得知因陳獨秀提議，已被開除出托派，就先到上海，要求恢復與托派的組織關係，未成。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就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李福仁和伊羅生，要他們轉信給托洛茨基，請求幫助其恢復組織關係，同時報告陳獨秀在武漢的言論，挑撥說：「全體同志對他表示失望了。」^⑮但是，托洛茨基在回信中對陳獨秀仍然表示關懷和尊敬，而對劉仁靜却說：「我不願給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勢太緊張，我無法確定他是否在玩兩面手法。」^⑯

劉仁靜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漢求救於「老冤家」陳獨秀，但又遭陳的冷遇。別離數年，劉仁靜突然登門拜訪，陳獨秀自然很客氣地接待。但劉第二天再去，陳獨秀就不見了，給他留了一封信，表示與他絕交，劃清界限。

劉仁靜返回托派的努力完全失敗，就公開投入國民黨的懷抱。一九三九年，他去了西安，拜倒在軍統頭目國民黨第十戰區政治部主任榮幹喬的麾下，任戰區政治部宣傳科長，並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及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戰幹第四團」擔任職務，專門對延安進行反共宣傳。

在出獄的托派分子中，只有彭述之、劉家良等少數人，仍對托派運動堅定不移，到上海開始重振托派的活動。

當時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對托派在中國抗戰中的政策，都有明確的指示，要求一方面積極參加抗戰，另一方面要「準備推翻蔣介石」

^⑮ 王凡西譯：《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第74頁注四，第73頁。

^⑯ 同^⑮。

⑭。第四國際一九三七年八月通過的中日戰爭決議案，還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⑮

在托洛茨基看來，民族解放戰爭的成敗是無所謂的，關鍵是是否實行階級鬥爭的政策，即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統治的政策，而且失敗也並非壞事，因為日本和希特勒幫助我們推翻本國資產階級統治時，革命也容易勝利。他斷言：「日本勝利以及希特勒勝利，絕非歷史的最後之言。此次戰爭也要成為革命之母的。」所以托洛茨基最不能容忍無產階級政黨與各國統治者之間的調和政策。

對於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執行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政策，托洛茨基更是竭盡誣蔑之能事。一九三八年一月，他指責共產黨人墮入了孟什維克主義泥坑：「這裡姑且不論『人民陣線』政策的好壞，它始終是孟什維克主義的一種傳統的政策。」他故意混淆黑白地宣稱：「一個是人民陣線，另一個是法西斯主義——這兩者是帝國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後的政治手段。」^⑯一九四〇年七月，即他被害前一個月，為鄭超麟、王文元譯的《俄國革命史》中文版寫自序時，又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本質，乃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是毫不妥協地反對與資產階級合作政策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之根本衝突就在此處。……所謂『人民陣線』政策，除了這個好聽而騙人的名稱之外，毫無什麼新奇的東西。無論哪種情形，都是要無產階級在政治上隸屬於左翼剝削者的。」

對於中國的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托洛茨基攻擊最烈。他說：過去「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著莫斯科命令，拋棄了

⑭ 〈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中國革命問題》第351頁。

⑮ 〈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局關於中日戰爭決議案〉，同上第372頁。

⑯ 《第四國際文件集》(1933-1940)第182頁，一九七三年紐約版。

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反動的與學究氣的『孫文主義』，加入了國民黨，服從它的紀律。在目前的對日戰爭中，又在重複著這個同樣致命的政策了」；「在中國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將孟什維克派圖謀在一九二七年革命時實行的政策，實行到底了。……以致反戰爭的階級鬥爭成爲不可能」，這將使中國革命因共產國際的領導而失敗，爲日本準備侵略的條件^④。

第三節 「托派即漢奸」的由來

出於托派傳統的立場，及執行上述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的指示，中國托派在蘆溝橋事件後，根本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有抗日的可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托派中央發表了〈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告民衆書〉（傳單），認爲國民黨政府對此事件只有「欺騙」和「投降」兩條道路：「第一是在日帝武力壓迫之下，一方面玩弄手段，欺騙民衆，以遮掩自己的投降，另一方面則擺出各種姿勢向日帝討價還價，講求更有利的投降條件。」在採行這條投降道路時，蔣介石會把華北抗戰限於一隅，讓二十九軍孤軍作戰，不予實際援助，「等到宋哲元軍閥因不甘單獨犧牲而對日屈服時，蔣介石政府則把屈服的罪名加到宋哲元身上，以便保全他欺騙民衆的面具。」「第二是日帝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國民黨政府不敢接受（怕民衆反對）或不願全部接受（因與資產階級不利），因而稍作武力抵抗，在稍微抵抗中間，要求條件之降低。」

宣言強調：「無論採行那條道路，國民黨政府結果要投降日帝並出賣民族，則是必然的。」爲此，他們提出的「抗日口號」之一是：「打

^④ 《中國革命問題》第 367-368 頁。

倒欺騙民衆投降日帝的國民黨政府!」然後，宣言筆鋒一轉，把矛頭又指向中共和其他抗日團體：「誰如果要我們民衆停止作獨立的抗戰活動，而統一到蔣介石領導下去進行抗日，那不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奸細。而目前的中國斯大林黨與各色的所謂救國團體，則正演著這種走狗奸細的腳色!」就這樣，如同過去托派在革命鬥爭中把口頭上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偷換成實際上對革命的共產黨鬥爭一樣，現在，則把口頭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偷換成實際上對抗日派國共兩黨及其他抗日團體的鬥爭，自覺地站在全國抗日勢力的對立面，整個抗戰期間都是這樣。

根據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指示精神，中國托派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時，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他們的「抗戰」綱領。決議一方面表示願與中共及一切小資產階級派別「共同進行抗日」，甚至與國民黨抗日各派「訂立臨時事務性的協定」，「以便集中力量抵抗當前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又認為國民黨抗戰只是一種「應戰」，而且，「國民黨政府的應戰是不徹底的，它隨時是在準備妥協投降的，它的『應戰』，只是達到將來妥協投降的一種手段。」因此，他們的政策是，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並準備力量推翻國民黨。對中共執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發作，攻擊中共是「徹底投降」，「自覺的叛賣」，「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只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衆之天然工具。」揚言：「必須無情地打擊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以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鬥爭政綱，去抵抗以斯大林黨為首的欺騙虛偽的機會主義（放棄階級鬥爭）的潮流。」●很顯

然，托派的「抗戰」路線，依然是「極左」加反動。口頭上參加抗戰，實際上破壞抗戰，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

會議選舉了新的臨委，由彭述之（書記）、陳其昌、劉家良、樓國華、蔣振東、寒君、李福仁、陳仲儔組成。與華北、廣東、廣西、浙江等地托派組織的聯繫逐漸恢復。劉家良被派去香港加強領導。

由於托派不進行實際的抗日戰爭，辦一張機關報和出版宣傳托洛茨基主義及托派主張的書刊，依然是托派臨委的中心工作，而且對每個事件，都發表宣言書，以表明他們的立場。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發表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爲武漢廣州失陷告全國民衆書〉（傳單），就是「托派抗戰」的代表作。

這篇長達三千多字的宣言書，把瘋狂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輕輕放過，卻通篇攻擊國民黨、共產黨、蘇聯和英美法民主陣營。對國民黨，從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而取得政權，罵到「九一八」引狼入室，這次藉「應戰」以達到它與帝國主義妥協的目的。對共產黨，也從一九二五～二七年機會主義葬送中國革命，罵到這次國共合作，「奴顏婢膝地向國民黨投降」，爲國民黨政府之反動的「應戰」政策「辯護」，「把國民黨在民衆中已失去的信仰重新替它恢復過來，尤其對於蔣介石之軍事獨裁的罪惡，盡量粉飾，同時並在民衆中極力散播侵略陣線與民主陣線的胡說，加深民衆對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的幻想。」罵「所謂民主陣線英美法等帝國主義，正在準備出賣中國」；罵蘇聯，「不積極援助中國，反而卑屈地向日帝國表示讓步」，「袖手旁觀看著中國被出賣」等等。宣言認爲，這些都是造成中國抗戰失敗的根源。「應戰」不到十四個月，即斷送大半個中國，「難道不是國民黨和斯大林黨的反動

● 同●第2卷第3期。

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謂國共合作）所造成的後果嗎!？」

爲此，宣言書號召全國民衆「立即覺醒起來」，「重新認識國民黨之一貫的妥協反動政策，尤其要立刻脫離斯大林黨的惡毒欺騙」；「立刻自動組織起來，把抗戰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幸好當時的托派只在上海的幾間「亭子間」裡活動，不能影響民衆，否則，中國抗戰不知會被他們攪成什麼樣子。

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冬上海「孤島」時期，政治性出版活動非常蓬勃。當時日本還不敢向英法等國挑釁。托派利用租界上英法當局與日本的矛盾，除繼續秘密出版機關報《鬥爭》之外，還找了一個同情托派的年輕攝影記者美國人盤克曼做發行人，依靠二三個老板的經濟資助，辦了一個月刊《動向》，公開發行。王文元編輯，執筆者除王外，還有彭述之、陳其昌、劉家良、王獨清等人。樓國華負責籌措資金和出版發行等技術工作。此雜誌每期印兩千份，在孤島上影響不小。但出了兩個月，就夭折了。接著，他們又出了兩期《破曉》和《西流》小冊子。

此外，他們還利用老關係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一些書。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在三十年代訪蘇後，寫了一本《從蘇聯歸來》，對蘇聯的政治有所指責。鄭超麟在獄中譯成此書後，交亞東出版。王文元用李書勳、張家駒的筆名譯了兩本抨擊蘇聯黨獄方面的書，揭露了莫斯科斯大林統治種種黑暗的內幕。亞東圖書館還出版了托洛茨基寫的《真理在前進中》、《新的世界大戰之前》、《兒子、戰士、朋友》等著作，以及陳獨秀、彭述之寫的小冊子。

後來，他們籌辦了自己的「春燕出版社」，印行了由羅世璠、濮德志、鄭超麟合譯的托洛茨基著《蘇聯的現狀與前途》，劉家良譯托著《德蘇協定的前因後果》，鄭超麟譯、維多·綉奇著《俄國革命軼史》，以

及托派臨委們自撰的十四本小冊子，如彭述之的《關於抗日戰爭》等。小冊子由於公開發行，影響較大。其中一本《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銷售了萬餘冊，在中國托派出版史上是「空前絕後」的^②。

這些譯書中，工程最大的是王凡西、鄭超麟合譯的托著《俄國革命史》。王凡西回憶說：過去譯的不算少，目的在於賣錢，書的選擇大半取決於出版人；「不過那次《俄國革命史》的翻譯是不同的。我（超麟同志亦然）是以教徒的虔敬，以一個作家由內心發出的創作熱情，來從事它的。」全書一百餘萬字，歷時一載。在翻譯中，他們就通知了住在墨西哥的原著者，托洛茨基極其高興地答應為他的書寫中國版序言。結果序未寫完，他就被殺死。譯著排印時，他們在卷首留下了四張白頁，表示「深刻的遺憾與無比的哀悼」。可是在臨出版時，他們意外地收到了墨西哥的托氏夫人寄來的「序文殘稿」。他們在悲喜交集中譯出，附排在「歷史」的卷末。

此書印了二千部，只賣了二三百部；一千多部由香港運往雲南途中，適逢太平洋戰爭爆發，全部「喪生」。

然而，使托派受害最深的是它自己推行的極左反動路線。由於這條路線客觀上是破壞抗戰，有利於侵略者滅亡中國，所以被視為「漢奸」路線，在當時國內外微妙的局勢中，引起了極其複雜而強烈的反響。

日本帝國主義把托派視為自己的別動隊，公開宣稱要幫助它「成功」。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華北日本駐屯軍第二課長和知（專管華北日本特務機關工作）召開了一個各地特務機關首腦的聯席會議，會上制定了改進對山西特務工作的綱領，其中有一條是：

^② 陳碧蘭：〈彭述之的思想與他在中國共產黨及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活動〉；《雙山回憶錄》第255頁。

「成、收買投機黨派——華方之黨派支流極多，如失意之共黨中托派，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於帝國之各種活動，因此輩思想之華人，專能麻醉一般知識分子，以破壞南京之統一。彼等之工作技術亦甚高明，尤可隨同彼等以學習工作，推進工作。」²³

共產黨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受到托派惡毒攻擊，對托派的批判也最猛烈。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指出：「極左傾的托派的領導分子，用盡了一切惡劣的字句，咒罵領導抗日的共產黨，咒罵抗日主力的紅軍，咒罵為黨所提出的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的統一戰線主張是出賣中國的革命，他們實際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們不僅是共產主義的叛徒，而且是整個帝國主義壓迫到吐不出氣的中華民族的漢奸。」²⁴為此，黨中央確定：「對於托派，應採取堅決打擊，使之瓦解與消滅的方針。」²⁵

在國際上，當時最轟動的事件是一九三四年底蘇聯基洛夫被刺後開始的莫斯科審判。這審判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九三八年三月，掀起三次高潮，以所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蘇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的罪名，將在蘇聯國內的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主要被告——一大批蘇聯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全部槍決。在審判中，以逼供信的手段，製造出大量駭人聽聞的所謂托洛茨基和托派的罪證，其中之一就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洛茨基給他的「平行總部」一封信中的指示：

²³ 《申報每週增刊》第2卷第22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出版。

²⁴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188頁，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²⁵ 〈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洛甫同志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報告之一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同上第492頁。

「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這條罪證在中國一渲染，也成了中國托派的罪狀。

在國內外這樣的氛圍中，「托派即漢奸」便成了全國一致的輿論。儘管中國托派的實際人數很少，它的這種反面角色的影響很快膨脹到一切政治領域，「托匪」成爲各種政治勢力排斥異己最便宜、最順手的帽子和棍子。

控制國民黨政府的蔣介石，乘領導全國統一抗戰，企圖進一步削弱和消滅反蔣地方實力派，而地方實力派爲了保護自己被迫與蔣介石合作抗日，也不惜犧牲一些堅持反蔣的分子。在採取行動時，雙方往往以打擊「托派」爲名義。

利用打擊「托匪」爲名進行陰謀活動最嚴重的是王明和康生。他倆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當時，爲了配合蘇聯的肅托鬥爭，共產國際也作出了〈關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奸細——托洛茨基分子作鬥爭的決議〉，要求「共產國際各支部須在會場上以及在報章上開展有系統的鬥爭，以反對法西斯走狗——托洛茨基主義，……要達到把這些當法西斯走狗的分子趕出工人運動的隊伍以外。」^{②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康生拿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所賜的消滅「托匪」的尚方寶劍，從崑崙山那邊飛到延安，在中國也掀起了一陣陣肅托狂風，製造了俞秀松、張慕陶、王公度、陳獨秀等一系列「托派漢奸」的冤假案件，影響所及，還有山東的「湖西事件」、王實味托派案等^{②②}。

^{②①} 《解放》第32期。

^{②②} 見本章附錄。

第四節 陳獨秀擁護國共合作抗日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陳獨秀出獄。當時日軍正大舉進攻上海，並派飛機轟炸國民黨首都南京。陳獨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塌屋頂，他躲到桌子底下，倖免於難。他見到去探望的原北京大學時的學生陳鐘凡（時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中文系主任），還「談笑自若」^②。於是，陳鐘凡便與胡適、張柏齡等商量聯名保釋他。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條件是，除了有人保之外，還需本人具「悔過書」。陳獨秀聞之大怒說：「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且拒絕人保，說：「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③他要的是「無條件出獄」。

然而，當時的時局已對國民黨萬分緊迫：一方面是日本的瘋狂軍事進攻，嚴重威脅著南京；另一方面，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全國人民強烈要求釋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釋放像陳獨秀這樣有名望的愛國的政治犯，已經勢不可擋。於是，汪精衛與蔣介石協商後，不得不令國民政府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④。因為陳獨秀拒寫「悔過書」，所以要「設法」開釋。

八月二十一日，司法院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一個「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宣稱：「該犯入監以來，已逾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擬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

② 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

③ 同②。

④ 〈汪精衛致胡適〉（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大。」^①

「愛國情殷，深自悔悟」，就是國民黨「設法」自我解嘲自下臺階找到的托詞。陳獨秀在獄中聽到宣告這個「國府明令」時，濮德志和羅世璠勸他發表聲明：「愛國情殷」，可以默認；「深自悔悟」，必須更正。陳獨秀怕橫生枝節，耽誤出獄大計，未聽此議。出獄後第三天，他才給《申報》館寫了一封聲明信，宣稱：「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②

陳獨秀獲釋後，國民黨就來拉攏他。出獄當天，國民黨中統局處長丁默村就開著小汽車來接他，提議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一下子由階下囚，上升為座上客。陳獨秀斷然拒絕，與妻子潘蘭珍和三子陳松年暫時借住在學生傅斯年家。接著，胡適、周佛海前來請他參加「國防參政會」；朱家驊受蔣介石委託，答應供給十萬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五個名額，要他組織一個「新共黨」。陳獨秀都一一拒絕。

另一方面，陳獨秀又拒絕東去上海重振托派事業，而是由南京西下武漢。因為這時他與托派領導集團的矛盾日深，更不同意他們的抗戰綱領。

陳獨秀出獄前後，由於抗戰爆發，國內外形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一向對政治形勢有敏銳觀察力的陳獨秀，思想也隨之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主要是：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由反對國共合作，轉變為擁護以這個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去武漢前，他曾兩次主動找到當時在南京籌備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和博古，「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③。

^① 國民政府司法院檔案呈字 260 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② 此信因淞滬抗戰激烈，未及刊出，原件藏上海檔案館。

^③ 葉劍英、董必武、博古給《新華日報》的信（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新華日報》，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他提出「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呼籲全國民眾，尤其是「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將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①；號召全國人民「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②

同時，爲了合作抗日，陳獨秀也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一黨獨裁的統治，實行民主政治，減輕人民負擔。他要求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派都「公開合法存在」和「政治的自由」，不採取「招降」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③；要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制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止徵兵和拉夫等等^④。

陳獨秀的轉變，完全順乎歷史前進的潮流，再現了他作爲一個偉大愛國者的形象，表明他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以民族大義爲重，爲了抗日救國，可以捐棄前嫌，放棄一些原來十分堅持的立場和觀點。與其他托派人物相比，他的表現是鶴立雞群的。

但是，抗戰軍事上的節節失敗和國民黨暴露出來的腐敗，也使陳獨秀感到震驚，他認爲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只有那些主張民主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才能領導抗戰和民眾不滿國民黨統治的「騷動」。爲此，一九三八年初，他在武漢認爲，托派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民黨而又

① 《抗戰中的黨派問題》，載《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亞東圖書館一九三八年版。

② 《言和即爲漢奸》，《抗戰文選》第3輯，戰時出版社一九三七年版。

③ 同①。

④ 〈抗戰中應有的綱領〉，載《我的抗戰意見》第28頁，華中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三八年。

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中去，爲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⑧

於是，他說服了出獄後假道武漢準備他去的王文元及羅漢、濮德志等人，在武漢活動，與第三黨章伯鈞、救國會沈鈞儒及反蔣派桂系等民主黨派勢力接觸商談，還與在武漢養傷的國民黨愛國將領一七九師師長何基澧建立了聯繫。陳獨秀與他商定，由陳派人到該師防區，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此增強軍隊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

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後爭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也是包括托派的。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的呼籲創立「全國各黨派的抗日人民陣線」的宣言，被呼籲的名單中，就有「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同盟」^⑨。後來，由於托派中央瘋狂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瘋狂攻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再加上蘇聯肅托狂風的影響，中共才對托派「採取堅決打擊，使之瓦解與消滅的方針」。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對托派的具體成員還是區別對待的，對陳獨秀等主張抗日的人士，依然採取爭取的方針。如周恩來對羅漢所說：「所謂中國的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如何分野，個人亦不十分清楚，不過我大約可以將其分爲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等均屬之；一派是和第四國際直接發生關係的；一派是受了拉狄克影響的孫大學生；一派是轉變到其他方面去活動的分子。」周還一再向羅漢保證：「以後對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字樣停止不用」，並親自將一篇文章中的「匪徒」字樣勾去^⑩。

⑧ 同⑧第 233 頁。

⑨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上）第 760 頁。

⑩ 羅漢：〈給周恩來等一封公開的信〉，載《正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所以，陳獨秀出獄時，與托洛茨基的預料相反，共產黨表示歡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解放》還發表「時評」——〈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寫道：「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裡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時評」還明確地注意到了他與其他托派的區別：「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托派在目前抗戰中主張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敗主義，這完全是漢奸理論，完全做著日賊的別動隊的作用。」

正是從這種區別對待的方針出發，當一九三七年八月羅漢到南京請求大革命時期的老戰友葉劍英幫助營救獄中的托派分子時，葉非但沒有拒絕，還特別為尋找一時沒有著落的王文元，奔跑了好幾天^①。羅漢乘此機會，未與陳獨秀商量，就重提「一二八」時他與陳獨秀等人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議。他認為現在共同抗日，國共既能合作，則共產黨和托派當然更可合作。葉劍英和博古自然表示歡迎，但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面電告中央，一面囑羅漢親自到延安走一趟，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接待，並電詢延安中央的決定。

因山洪毀路，羅漢被阻西安，延安未去成，但是中共中央認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發來的訊息。毛澤東同情羅漢的活動，覺得中國的托派不能與蘇聯的托派相提並論，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

① 同①第227頁。

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⑪於是中共中央就向陳獨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項條件：「(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⑫這三條由毛澤東和張聞天簽署，直發羅漢。

羅漢認為這是「招降」，不能接受，但可以轉達。果然，陳獨秀在武漢得知中共三條件後，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對於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他更認為是「畫蛇添足」。

陳獨秀不願承認加入托派的錯誤，不願發表公開脫離托派的聲明，根本原因是他仍堅持托派的基本立場——以城市國民會議運動為中心的路線，反對中共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具體說，在中國社會性質、共產黨性質和革命道路上，與中共存在著原則的分歧。

他仍然反對中共關於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什麼一半一半」^⑬。他有一個奇怪的邏輯，只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國家」，才會與資本主義的日本發生競爭、衝突而導致戰爭。

他仍然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放棄讓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⑭。

他不承認指導中共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道

⑪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331頁。張回憶說羅漢到了延安，與史實不符。但他所述延安研究陳獨秀問題的情況，與其他史料對照，有參考價值。

⑫ 同⑪。

⑬ 〈資本主義在中國〉，《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亞東圖書館發行。

⑭ 〈給托洛茨基的信〉（一九三九年一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7頁。

路。他與王明一個口吻，譏笑毛澤東思想是「山上的馬克思主義」，依靠農村攻取城市是「錯誤路線」^⑬。由此出發，他反對中共獨立自主抗日游擊戰爭的方針，批評說：「幻想專靠游擊隊來保護國家，便是天大的錯誤。……近代國家已經是工業支配了農業，城市支配了鄉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如果我們不懂得這個，妄想拿農村來支配城市，妄想拿農村來做抗日根據地，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過去的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爲什麼到處失敗，也正因爲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抗戰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游擊隊和游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占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⑭

凡此種種，表明陳獨秀當時與中共的分歧是多麼深刻。所以，陳獨秀既未如當時中共黨內一些老同志所期望的那樣回到黨內，也未與中共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

第五節 托派臨委批判陳獨秀背叛

然而，陳獨秀上述抗戰主張及其在武漢的活動，不僅與上海托派臨委的抗日主張相左，而且是偏離托派的傳統策略的。所以臨委對陳獨秀十分惱火。他們首先向羅漢開火，殺雞給猴看。在羅漢由西安返回上海時，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他們以組織名義發表了一個「緊要聲明」，在對中共進行了一番例行的攻擊後，聲稱羅漢早已脫離組織關

⑬ 〈「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政論》第1卷第11期。

⑭ 〈論游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係，他的行動「與本同盟毫無關係」，也違背本同盟一貫主張^⑩。

羅漢當即給托派臨委書記彭述之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在五年前已「與組織脫離關係」，西安之行並不代表托派組織，而且輕蔑地表示不知道現在的托派組織是「何物」^⑪。

在中國托派歷史上，羅漢也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是湖南人，早年與陳延年、周恩來、李立三等人赴法勤工儉學，學的是製陶工藝，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薰陶，回國後加入中共，到中共兩廣區委工作。大革命時，任北伐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與葉劍英在一起。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件」後，共產黨員被迫離開部隊。他轉到中共北方區委工作了一段時間，就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接觸到托派文件，開始傾向於托派。由於他年紀稍大，秉性厚道，作風穩重，沉默寡言，對人經常帶著父兄般的關懷，在托派中受到尊敬。初期在蘇聯結識王文元時，王說：「他便以長兄似的態度，告訴我許多蘇聯黨內鬥爭的實況，告訴我反對派的主張，並非像官方文件中所描寫的那樣荒謬。他認為我們還應多多研究，才能斷定誰是誰非，同時他又說目前學校支部負責的中國同志都是些趨炎附勢者，和他們不足以言真理，所以在會議上，他勸我還是不說話最好。」

一九二八年，羅漢回國後，繼續混在中共北方區委工作，任宣傳部長，後來托派觀點暴露，被開除出黨，加入「十月社」，並作為「十月社」代表參加了托派統一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這次「西安之行」為陳獨秀與共產黨的合作抗日而奔走失敗後，他到武漢、重慶任國民黨軍委會兵工處技術委員，並受「北大同學會」委託，照顧入川後陳

^⑩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緊要聲明〉，載《鬥爭》第2卷第9期，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⑪ 羅漢給述之的信（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手稿。

獨秀的生活。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日本飛機轟炸重慶時，他被炸死。王文元在托派中央機關報上寫了悼念他的文章^⑩。

陳獨秀也對托派中央的聲明嗤之以鼻。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給陳其昌等的信中說：「羅漢爲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對他大肆攻擊，便比他更糊塗萬倍。你們亂罵史（指中共——引者）國（指國民黨——引者），尤其是罵史，雖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將來會走向何處去！」^⑪

對於陳獨秀在武漢開創獨立政治局面的努力，托派中央斥責爲「軍事投機」和「拉攏投機政客」。陳獨秀預料他們會反對，所以他當時就「廣泛聲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⑫「我要爲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爲任何黨派所拘束；來武漢後……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⑬陳獨秀還把這種立場親自寫信給上海臨委陳其昌等人，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登載在報紙上。

陳獨秀的這個行動，引起了托派臨委的驚慌。他們有的主張「公開向外聲明陳獨秀同志的意見不是我們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見；有些同志甚至主張與他決裂。」^⑭劉家良說：「陳獨秀及其附和者對中國資產

⑩ 連根（即王文元）：〈悼羅漢同志〉，載《鬥爭》第3卷第12期，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出版。

⑪ 《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4頁。該書是一九四八年何之瑜、王文元、鄭超麟等幾個托派分子集資自印的。

⑫ 〈給陳其昌等的信〉，《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4頁。

⑬ 〈給「新華日報」的公開信〉，《掃蕩報》，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⑭ 〈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陳獨秀同志問題〉，載《保衛馬克思主義》（托派油印小冊子）卷一，第28頁。

階級存在著強烈的幻想。……據我們的觀察：這個機會主義者（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希望的了。與他決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⑤李福仁甚至認為陳獨秀是以「某種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國民黨，才被放出來的^⑥。只有陳其昌、王文元等少數人主張對陳獨秀取寬容態度，可各自保留己見，等待時間來證明誰是誰非。最後在多數贊成之下，他們通過了一個叫〈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的提綱^⑦，指責陳獨秀的抗日主張充滿了機會主義的精神。「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決擁護並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這根本是反動的思想」；指責陳獨秀公開叫民眾「要相信政府有抗戰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欺騙民眾；而要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抗日戰爭之最高統率權」的主張，則是「主張維持國民黨的軍事專政，放棄了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專政之原來的政治主張」等等。

對於來自托派領導集團的批判，陳獨秀並不感到奇怪。他毫不妥協，立即反擊。一九三九年一月，他寫信向托派總頭目托洛茨基告狀^⑧。

信一開頭就敘述中國抗戰的潰敗局勢，及中國托派由於「極左派」路線的錯誤，造成組織衰萎，因而對這種失敗局勢處於惱人的無能為力的地位。他哀嘆：「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正確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萎。我們的集團，自始

⑤ 劉家良致李福仁的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第 69 頁，譯注①。

⑥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同上第 68 頁。

⑦ 《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第 7 頁。

⑧ 同⑥第 24 頁。

即有極左派的傾向。」

接著，他對托派領導集團在抗戰中的路線，進行了嚴厲而痛心的批判：「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裡也說說參加抗戰，而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只有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向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者主要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著，不但無法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面。」而且，「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者。」

對今後中國托派的工作，他提議：「我們不應該幻想著把工作等待收復失地以後，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占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只有組織上獲得相當數量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

最後，他把中國托派內部的鬥爭——他與「極左派」集團的鬥爭與「第四國際的威望」聯繫起來，說：「現時遠離群眾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地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人話，擺領導者的人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

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

這封信，充滿著對托派在中國命運前途的關注和憂慮，可以看成他在武漢努力失敗後思歸情緒的反映。他不得不把事業的希望仍然寄託在重振托派運動的身上。

這封信由專程到四川看望陳獨秀的陳其昌帶回上海，托李福仁轉托洛茨基，引起了臨委們的憤怒。他們也立即寫了〈臨委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①，以駁斥陳獨秀加給他們的「極左派」罪名。報告承認：「我們的政治路線並沒有能給予這次戰爭以多大的影響。……但這不是我們主觀的過失，更不能以此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像陳獨秀同志歸咎於我們的）。這是一大串的客觀原因形成起來的，……至於要說到我們的錯誤，也不是沒有，如不能將我們的政治路線根據隨時發生的事變和民眾的實際要求配合起來，向各種民眾隨時進行鼓動和宣傳，並進而實行組織廣大民眾，……但同時也必得知道這是由於我們的組織太弱小太孤立了。」報告表示今後仍堅持他們自抗戰以來的基本路線：「我們認為這一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而且與托同志最近關於中日戰爭所發表的許多文件的意見相符。」

兩方面的意見，同時寄到了在美國的托洛茨基手裡。

第六節 托洛茨基要陳獨秀出洋

中國抗戰爆發以後，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注視著陳獨秀的命運和動向。他在與托派臨委成員李福仁的談話和通信中，陳獨秀問題，是一個重要話題。

① 同①卷一，第10頁。

一九三七年八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考約奧岡寓所接見李福仁，他要李在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因為那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托洛茨基出於偏見，擔心斯大林與蔣介石「盟約一簽定，他們將殺死陳獨秀」^①。

十二月，當李福仁告訴他陳獨秀的抗戰主張，並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劉家良等人與陳決裂時，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魯莽的判斷，不要促使分裂，而要友好的與耐性的態度來批評他們。同時，托洛茨基還是擔心共產黨會暗殺陳獨秀，因此他要李福仁幫助陳出國到美國或墨西哥來，並且說：「這對陳獨秀來說是一個生死問題，對第四國際說則是一個有巨大政治意義的問題：至於他能參加第四國際大會所能帶來的好處，那就更不必說了。」^②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托洛茨基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設法把陳獨秀「弄到美國來」，並教他「可以以出國宣傳，使外國工人運動贊助中國為理由，要求當局授權放洋。」他還是認為：「如果蘇聯參戰，……到那時我們的所有同志會被消滅。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對他們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讓陳獨秀出來，無論對於他或對於我們，同樣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國際中可以起片山潛^③在莫斯科給第三國際所曾起過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陳獨秀還能比片山潛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多好處。」——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對陳獨秀寄予了多麼大的期望。

過了四個月，當他得知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日本間諜」及陳獨秀一方面反對托派臨委，一方面又拒絕發表「脫離托派」聲明的

① 〈與李福仁的談話〉（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國革命問題》第344頁。

②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第68、69頁。

③ 片山潛（1860-1933），日本社會民主黨的主要創始人。同情蘇聯十月革命，曾協助美國共產黨的建立，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消息後，他又寫信給李表示：「我非常關懷的問題是陳獨秀的人身安全。」再次要求李福仁設法把陳弄到美國去，說：「陳獨秀如到美國，能為中國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很有效的宣傳。他以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老革命家、且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家資格來進行這種宣傳，對於美國工人所能發生的影響會比莫斯科的代理人們所能發生的要大到一千倍。」^⑫這封信後，大約有半年多得不到陳獨秀的消息，托洛茨基很著急，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給李的一封短信中就問：「陳獨秀的近況如何？他在幹什麼？他的思想如何？」^⑬

現在，陳獨秀的信和托派臨委的報告都看到了，他當然明白臨委在抗日問題上的意見更符合他的思想。可是，出於他一貫對陳獨秀的尊敬和利用的立場，他顯然不能站在臨委一邊批評已經孤立到只有一個人的陳獨秀，否則，勢必加速雙方的破裂，而把陳獨秀完全推出中國托派運動。所以，他十分審慎地表示：「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老朋友方面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

另一方面，對於陳獨秀的忠於托派事業的思想感情，關心第四國際在中國的威望及其提出的當前只能進行民族民主鬥爭和使托派成為「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的意見，托洛茨基深受感動，所以他又對陳獨秀表示了較多的諒解和支持：「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⑭

^⑫ 同①第73頁。

^⑬ 同上第75頁。

^⑭ 同①第28頁。

托洛茨基知道，雙方矛盾已不可調和，如何解決，他還是堅持：把陳獨秀調離，到美國參加第四國際工作。這樣既解決了陳與臨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對陳留在中國危險的擔心，也遂了他多年來要陳獨秀這個知名人物參加第四國際領導機構以提高第四國際威望的心願。真乃一舉三得。

托派臨委見到托洛茨基的信，感到委曲和難堪。他們又專門寫了一個〈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陳獨秀同志問題〉^①。

「報告」對托的回信極為不滿，說陳獨秀自出獄後便「一貫在政治上採取機會主義立場，在組織上採取取消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否認的聲明：陳獨秀同志與我們之間在抗戰過程中有根本不同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向孟什維克機會主義乖離的路線，一條是不可調和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路線。」但又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團體一貫處境孤立，……一貫與群眾沒有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不能及時反映出廣大群眾心理的轉變。」最後，「報告」還是屈服於托洛茨基的壓力，被迫同意陳獨秀「留在第四國際內，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現在仍繼續誠懇的要求陳獨秀同志和我們，和國際組織恢復正常的關係，進行徹底的討論」；「我們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見後，我們更希望他能到美國去。」但又強調說：「我們認為改正一個領袖同志錯誤的最不可少的辦法，還是對他的錯誤不可調和的鬥爭」；並對托洛茨基第四國際要挾道：「假如他仍堅執成見，把我們視為『極左派』以保留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則我們始終是無法接近無法合作的。」

由此看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親自出來干預，如果不是陳其昌、王文元出於感情的「辯護」，在彭述之、劉家良這兩個宿敵控制下的中

① 同①卷一，第21頁。

國托派，這次必然與陳獨秀徹底決裂。

第七節 陳獨秀與臨委決裂

一九三八年七月，陳獨秀入川後，思想又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由於武漢廣州的失陷，蘇聯先後與德、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芬戰爭、蘇德戰爭和美日戰爭的爆發等一系列嚴重事件的發生，使陳獨秀受到極大刺激。他不斷寫文章和書信，對時局發表政見，與托派臨委爭論。這些被稱為陳獨秀「最後見解」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民主與專政、戰爭與革命兩個問題上。具體觀點是：

第一，認為民主主義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歷史現象」；「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

●

第二，認為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是由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決定的：「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即無產階級——引者）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在十月（即十月革命——引者）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①

第三，把納粹主義與布爾什維克等量齊觀，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現在德俄兩國國社主義及格別烏政治，義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

① 〈給西流等的信〉（一九四〇年九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36、37頁。

② 同①。

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和格別烏政治。」⁶⁸「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和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⁶⁹「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⁷⁰

第四，認為反對斯大林政權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是對立的：「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決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⁷¹「至於現在的蘇俄，不但它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⁷²對於蘇聯，「若要硬說它是社會主義，便未免糟蹋了社會主義。」⁷³

第五，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獨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若希望在此次大戰中，轉帝國主義戰爭為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實的幻想了。」「有人甚至夢想戰爭會引起社會主義革命就快到來，不幸事實幻滅了他們的美夢。」⁷⁴「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⁷⁵

第六，對於世界前途悲觀。他認為：「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

⁶⁸ 同⁶⁸第 30 頁。

⁶⁹ 同⁶⁸。

⁷⁰ 〈我的根本意見〉，《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 3 頁。

⁷¹ 同⁶⁸。

⁷² 〈再論世界大勢〉，《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 15 頁。

⁷³ 〈被壓迫民族之前途〉，《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 21 頁。

⁷⁴ 〈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 10 頁。

⁷⁵ 同⁶⁸。

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⑦

鑒於以上認識，陳獨秀宣布：「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⑧他主張重新估價馬克思主義及其人物的價值，並認為「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他以他的超階級的民主主義理論，推翻了過去信仰過的一切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用他自己的話說，完全以個人口味為中心，跳出一切圈子，「見得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它，對第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他高興地戴上了胡適贈給他的「終身反對派」的桂冠^⑨。

上海托派臨委強烈反對陳獨秀上述「最後見解」。一九四〇年六月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他們先後對陳獨秀問題作出兩個決議——〈臨委對陳獨秀來信的決議〉、〈關於陳獨秀對民主和獨裁等問題的決議〉^⑩，批判陳獨秀主張站在民主陣營一邊反對法西斯陣營的立場，在本質上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狹隘愛國主義的思想」，是「極端可恥的機會主義」；批判陳獨秀反對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主張，是「企圖以此來阻止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來維持資本主義（特別是英法的資本主義）的現存制度。」

陳獨秀自然不接受臨委的批判，而且他不怕孤立，決不沉默，或直接給臨委寫信，或請人代轉，譏諷他們把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原

⑦ 同⑥。

⑧ 〈陳獨秀先生晚年致鄭學稼教授原函墨跡〉，臺灣《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

⑨ 陳獨秀：〈給S和H的信〉，《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42頁。

⑩ 同⑥卷一，第29-35頁。

則搬到今天，「對實際的歷史事實發展閉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於日本」，「只能有助於希特勒」云云。就這樣，雙方又進行了一場錯誤思想之間的大混戰。不過在這場論戰中，陳獨秀始終處於一個人的少數。正如李福仁後來在《第四國際》上所提供的「證言」：「一方面在四川鄉村中的陳獨秀，另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用書面進行爭論，結果陳獨秀居於單獨一人的少數。」「陳獨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國組織內部找不到一個擁護者。」^①連與他私人友誼很深的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非但不曾擁護陳獨秀的主張，而且與他進行了最不含糊的爭辯，以致最後，這位『老人』發了脾氣，與我們絕交了。」^②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陳獨秀病逝四川江津。由於他在死前十三天寫的〈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中宣稱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只有在世界革命的勝利中才能獲得，所以鄭超麟仍「視他領袖」，「世界革命的老戰將」^③。王文元則更進一步說：陳獨秀在最後論文和書信中表示的思想，不能算是「最後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後的歷史事變影響之下，「他多半仍將是托派的同志」^④。而彭述之則認為陳獨秀「有始無終」，「是一個光耀的民主主義者踏上中國的政治舞臺，而以一個最不名譽的民主主義者鑽進他的墳墓裡去」；「從革命的無產階級陣營退到反動的資產階級陣營」。「我們確是無情地批評他、攻擊他，因而在情感上厭惡他，乃至仇視他……爲了挽救他免於悲慘的墮落。

① 《第四國際》（美）一九四二年七、八月合刊，第241頁。

②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國際主義派）：〈致美國「第四國際」雜誌編輯部的信〉（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

③ 意因（鄭超麟）：〈悼獨秀同志〉，載《國際主義者》第3期，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④ 同②第270頁。

關於這一點，我們失敗了。」^⑤

第八節 對抗戰實行「失敗主義」

中國托派臨委的抗戰理論和路線遭到陳獨秀、中共和全國人民的譴責以後，力圖修補自己「極左派」「漢奸」的形象。王文元自武漢到上海後，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竭力為托派立場辯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在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上發表〈現實主義和托派〉、〈根絕漢奸之道〉等文章，表示：「我們目前的主張，並不是簡單地要打倒資本家、地主與軍人。我們從來認為：凡是抗日的，在目前我們都願與他們共同行動。當一九三三年中國斯大林派還一口咬定蔣介石決不能與日本帝國主義翻臉的時候，托洛茨基同志早就說過，如果蔣介石同日本作戰，我們也要同他在一起。不過我們決不是信仰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與加入國民黨罷了！」

對於托派的抗日主張，王文元重申其階級鬥爭的內容：「工人生活徹底改善，實行八小時制，延長工時則加工資，組織自己的工會，實行武裝，為防止資本家怠工或破壞戰時經濟起見，組織工廠委員會，實行工人監督生產。農民方面則首先豁免一切租賦，實行耕者食其米的制度，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抗日會管理，取消一切苛捐雜稅，……軍隊中成立兵士委員會，以防高級軍官的『保存實力』或叛逆。最後，各地應成立工農兵抗日委員會，做為抗日軍事基礎，且促成全國真正代表民意的全權國民會議。」^⑥

後來，王文元回憶為什麼如此強調托派抗戰主張時說，這個主張

^⑤ 犀照（彭述之）：〈悼陳獨秀〉，載《鬥爭》第6卷第1期。

^⑥ 連根：〈現實主義與「托派」〉，《鬥爭》第3卷第5期。

雖然貫徹了「把打倒國民黨的任務從屬於抗日戰爭」的原則，但他還是強調「加深抗戰的社會意義」，即強調「抗戰勝利有利於土地革命的實行」^②。可見，爲了在抗戰中堅持他們的「階級鬥爭」原則，爲了在戰爭中引發革命，他們真是煞費苦心。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他們又在〈給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的一封信〉中，故作姿態地建議：「(一)政府立即開放民衆運動，給全國各黨派各民衆組織以完全公開宣傳鼓動的自由（無條件的，不以三民主義爲規範的）。(二)在上述的條件之下，我們準備和你們，和一切工會、一切抗日團體，及共產黨以至其他黨派共同合作發動民衆，武裝民衆，組織民衆，總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衆活動及軍事活動中，我們一致行動。」^③

國民黨當然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也不會採納他們提出的工農兵方面的政策，共產黨也不會在這樣的基礎上與他們合作。所以，他們依然把主要攻擊矛頭對準國民黨和共產黨及國共合作爲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客觀上還是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服務。連王文元在談到上述托派主張時也承認，由於強調工農階級的要求，「自然對單純的抗戰較少重視」^④。

即使這樣，在一九四一年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托派領導集團內部，還產生出更加極左、更加荒謬的派別來，造成中國托派的再次也是永遠的大分裂。

一九四〇年，鄭超麟在安徽鄉下養病兩年後來到上海，參加了相當於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鬥爭》報編委會。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② 連根：《論中日戰爭論文集》，〈自序〉（《鬥爭》叢書之五），托派油印小冊子。

③ 托派散發的傳單。

④ 同③。

發展了他戰爭開始時的荒謬主張，提出了「失敗主義」的路線。這些思想和主張，集中於〈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和〈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等文章中，他首先論述了「中國沒有民族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將來的政權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建立獨立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民族國家。所以托洛茨基從來不稱中國革命為「民族的革命」，而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同時，鄭又說：「說中國沒有民族革命，這並不是等於說未來中國革命中沒有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未來中國革命之中，民族解放運動是沒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種限度之下帶著反動的性質。」因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實不過是掩飾著十足的階級鬥爭」；「所謂『國民』，所謂『人民』，所謂『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無產階級、農民、城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他們重視各自階級的利益過於中華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鬥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爲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他認爲群眾的「愛國主義」只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①。他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②；「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爲了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宣稱：「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只有徹底解決中國的

① 〈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下〉，載《火花》第3卷第5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② 〈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火花》第3卷第5期。

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最後他說：「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②

打出最最革命的旗號，把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政策，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抗戰中來，替日本侵略者效勞。不管他們主觀願望如何，也不管他們口頭上說得如何好聽，問題的實質和結果，只能是這樣。

托派，無論是蘇聯的，還是中國的，都口頭上尊重列寧的思想，實際上糟蹋列寧。恰恰是列寧十分強調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科學地判斷戰爭的性質，正確地對待各種戰爭。他說：「弄清戰爭的性質是馬克思主義者解決自己對待戰爭的態度問題的必要前提。要弄清戰爭的性質，首先必須確定這次戰爭的客觀條件和具體環境是怎樣的。必須把這次戰爭和產生它的歷史環境聯繫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確定自己對它的態度。」^③

列寧要求具體地歷史地分析每次戰爭，堅決反對在不同的條件下表面地類推和機械地搬用曾經是正確的立場和口號。列寧寫道：「戰爭是一種五花八門、形形色色、錯綜複雜的東西。用一般的死板公式硬套是不行的。」^④

第一次大戰和第二次大戰在許多方面的條件和情況是不同的，因此兩次戰爭的性質也是不同的。第一次大戰時，戰爭雙方都是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企圖重新瓜分世界。對雙方來說，都是不義之戰。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實行失敗主義，以造成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垮臺的形勢，乘機奪取政權，自然是正確的。十月革命就是這樣取得勝利的。

② 〈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

③ 《列寧全集》第36卷第291頁。

④ 《列寧全集》第35卷第262頁。

但是，即使在當時，列寧也反對把否定保衛祖國的口號變成死板的公式。例如，當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侵入另一個國家，使民族遭到死亡的威脅時，就使帝國主義戰爭變成真正的民族解放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點是，德、日、義法西斯軸心國，不是簡單地想重新瓜分世界，而是要奪取世界的統治權，奴役和消滅許多民族和國家。人類社會文明受到致命的威脅。另一方面，受到威脅的不僅有相對法西斯來說比較民主和進步的歐美民主國家，還有社會主義的蘇聯和正在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廣大中間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在揭露帝國主義是戰爭根源時，共產黨人不應認為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對戰爭負有同樣的責任，而且戰爭頭兩年發展的嚴峻局勢表明，集中反對德、日、義這三個抱有瘋狂侵略野心的最危險的國家，是拯救人類文明的當務之急。所以，在反法西斯陣營一方實行失敗主義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鄭超麟的這種「失敗主義」謬論，在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到一九四一年初，在托派臨委中竟得到了多數的擁護。王文元發明了一種「中國抗戰變質論」，認為由於日美衝突加劇，中國抗戰將「糾結」在日美戰爭之中，成為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因此「抗戰性質前後不同，在它未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之時，是進步的，已成為一部分之後便是反動了。」^①所以，他和陳其昌、樓國華等人轉而支持鄭超麟的「失敗主義」，劉家良亦然^②。

後來，王文元甚至認為抗戰初期實行的「保衛主義」也是錯的。他說：「革命的失敗主義正確說革命失敗主義中的一個因素，即徹底繼

① 同②。

② 李福仁：〈中國抗戰與保衛蘇聯〉，《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二，《雙山回憶錄》第263頁。

續階級鬥爭，爲了革命利益，即令前線失敗，亦所不顧。這個路線與抗戰的性質沒有必然關係。托洛茨基的指示實際上便是如此。我們把打倒國民黨這個任務從屬於抗戰是錯了，在抗戰前期，雖然戰爭是進步的，而我們的政策也必須是部分地符合於革命的失敗主義。」他又說，抗戰性質前後不同，「不過革命黨對抗戰所應採取的政策，卻應該前後相同的，都是要在戰爭中發動革命，奪取政權。至於這政策在前後不同時期中的具體應用，則當然是不同的：在進步時期，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以反動政策領導戰爭；在反動時期，我們則要反對國民黨進行反動的戰爭。」^⑦

第九節 分裂成「多數派」與「少數派」

彭述之等人堅持原來的立場，擁護第四國際關於「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及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總路線，但反對鄭超麟提出的「失敗主義」的策略，而提出「保衛主義」的主張，即支持中國抗戰，並且說只要國民黨政府抗戰一天，就支持一天，「中日戰爭的終止，行將是革命之開始」；等到抗戰結束時，不管是勝利還是失敗，再來打倒國民黨。但是，彭述之的所謂「保衛主義」、「支持抗戰」只是說說而已，實際行動上，他們爲了準備打倒國民黨，仍把主要精力放在攻擊使抗戰失敗的國民黨和與國民黨合作的共產黨身上，反對國共合作，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客觀效果只能加深抗戰的危機和失敗。

所以「保衛主義」與「失敗主義」相比，在攻擊的主要目標和客觀效果上，沒有任何兩樣，而且二者的主要依據都是教條地搬用列寧

⑦ 同⑥。

在第一次大戰爭中採取的「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手法上，前者比較隱蔽，具有較大的欺騙性；後者比較露骨，人所不齒。就這樣，兩派一時爭論得很激烈。開始時，彭述之處於少數，後來李福仁介入，情況發生了變化。

一九四一年初，李福仁根據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個決議，由「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名義通過後，帶到中國，支持彭述之的立場⁹⁸。

於是劉家良等人就倒向彭述之一邊，使彭述之一方成了「多數派」。他們控制了「中央臨委會」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發出了一個〈通告〉⁹⁹，附上陳獨秀的書信和鄭、彭兩派的爭論文章，要求在四月底以前，在托派內部，就抗戰性質和是否應該取「失敗主義」等問題進行正式討論。

結果，七月十三日，彭述之、劉家良等人，在排除鄭超麟等四人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宣稱：「中國四年來抗戰所以遭逢失敗，其主要的就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革命政黨。今後只有集中力量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黨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和工農的解放」；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向資產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我們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只有它最有資格擔當新黨的組織任務」¹⁰⁰云云。大會選出了由彭、劉、李（福仁）、蔣（振東）、毛（鴻鑑）等人組成的新中委。樓國華、陳其昌被排擠出來，鄭超麟、

⁹⁸ 同⁶第263頁。

⁹⁹ 同³第3卷第5期。

¹⁰⁰ 同¹第5卷第5期。

王文元被排擠出《鬥爭》報編委會。王文元被彭述之、劉家良們描寫成「全無定見的調和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政客」；抗戰前期，調和於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抗戰後期，投降了鄭超麟的極左主義，是「一個完全沒有一貫思想、甚至完全沒有思想的政客」。

王文元等提出繼續討論政治問題的要求，也被「新中央」拒絕。他們於是另出本派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從此，中國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兩派：前者為「多數派」，又稱「鬥爭派」；後者為「少數派」，又稱「國際主義派」。

兩派分裂後，就到各地爭奪托派群眾，結果各地托派組織也都分裂成兩派，以後永遠也沒有再統一起來。

分裂後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入租界，「孤島」沉沒。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被迫停刊。兩派與第四國際及全國各地的聯繫都告中斷。托派的活動又被壓縮到小範圍內進行。不過由於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有利於日本侵華，所以他們的組織在更加殘暴的日本法西斯鐵蹄下，反倒沒有再受到過去那樣大的打擊。

彭述之更深地隱避起來，用化名在上海的兩個大學裡講課，教授中國史、西洋史和哲學，繼續隱晦地宣傳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托派的主張。一些青年學生受到影響，從學校到彭述之家中，向他請教討論各種問題。最後，這些學生加入了托派。同時，「多數派」又結識了幾個左傾的知識分子和商人；他們對以後的托派運動提供了相當大的財政支援，特別在出版方面^①。

「少數派」由於得到律師張德澤和他的妹妹張德涵的捐助，在滬西工人區裡辦了兩所小學校，以此為基地，在工人中活動。利用原「無

^① 同^①。

產者社」在綢廠工人中的老關係，由不久從「多數派」轉過來的蔣振東領導，在王文元的侄子王頌九的協助下，發展了一些新關係，開展了幾次鬥爭。在電車工人中也搞了一點工作。

托派「多數派」中央委員陳仲僖，也搞過一支抗日游擊隊。大革命時期，他在老家中山縣搞過農民運動，失敗後亡命南洋。一九三〇年到香港太沽船廠做工，參加了托派。日軍占領廣州、香港後，他回到老家拉了一支游擊隊，進行抗日游擊戰。但是，由於他按照托派的路線領導這支隊伍，大搞階級鬥爭，不搞統一戰線，弄到最後只剩他一個「孤家寡人」。一個人躲在一個村子裡好長時間，終於出來時，被殺死在村邊。而在同一地區由共產黨領導的瓊崖抗日游擊縱隊，卻在戰爭中成長壯大，一直堅持到勝利。這是一個很好的對比。

鄭超麟和王文元是不屑於這樣的工作的，正如王文元說：「我們主要的精神仍被放在文字工作上，在對於戰爭和革命的理論性的分析與觀察上，也就是說，在於《國際主義者》的繼續出版。」^⑩這個刊物的主要文章都出於鄭超麟的手筆，一小部分是王文元所寫。鄭超麟在這幾年中，還寫下了被王文元稱之為「他一生中最精彩與最結實的作品」：《三人行》、《回憶錄》、《不斷革命論ABC》、《陳獨秀評傳》等。其中《不斷革命論ABC》是結合中國革命問題來闡述托洛茨基主義的通俗讀物，抗戰勝利後由春燕出版社出版了。《回憶錄》在一九四五年完成了初稿，實際是一部早期的中共黨史，尤其對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中共上層領導集團的情況及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記載甚詳。該回憶錄雖以托派觀點撰寫，但由於作者在這時期一直在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工作，所敘親歷之事，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但書稿寫成後，由於

^⑩ 同^⑥第268頁。

戰亂等原因，一直未能出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鄭超麟被捕後，書稿即被沒收。文化大革命中，某機關清理檔案時，擬作廢紙銷毀，被一圖書資料員搶救下來。但因該資料員不懂歷史，《回憶錄》也未署名，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不要文化等原因，書稿價值未被認識，被置之牆角一般舊資料中等待處理。一九八〇年筆者在讀了該書稿內容後，始識其是鄭超麟所寫，十分珍貴，許多記敘之事聞所未聞，遂推薦給出版社，得以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徵得鄭超麟本人同意，得以在大陸「內部發行」（只是刪去了「政治與戀愛」一節）。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能出版此禁書，實在不易，需有驚人的魄力。而主持此出版事宜的人，竟是一個女同志。

鄭超麟寫的《陳獨秀評傳》沒有完成，只寫到一九一五年。但從已寫成的篇章來看，確實功力不凡，讀此稿猶如讀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作者沒有就事論事地評述陳獨秀的歷史，而是在中國廣闊而深邃的歷史背景上來展開陳獨秀的活動和思想發展的。

「少數派」四大金剛中的「大哥」陳其昌，在一九四二年陳獨秀逝世後不久，被日本憲兵捕去殺害了。托派曾以此宣傳他是「抗日」的「烈士」。但是，陳其昌從事什麼「抗日工作」呢？王文元承認「這工作原是他的長兄擔任的，負責著一個報告日偽經濟情況的秘密電臺」，由於電臺暴露，陳其昌被捕犧牲了^⑩。他的長兄是什麼人，又向誰報告什麼樣的經濟情況呢？陳其昌的長兄原在中國農民銀行供職，抗戰爆發後，留在上海替國民黨做「經濟情報」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租界，長兄去重慶，他接替哥哥的職務，掌握設在關心大戲院內的一個電臺，向重慶農民銀行拍發「經濟情報」。

^⑩ 同^⑩第274頁。

農民銀行不是一個普通的民間的金融機構，而是由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首領陳立夫、陳果夫辦的官僚金融機關。它與上海的日偽統治當局有矛盾又有勾結，同時又與江南地區的共產黨新四軍為敵。所以上海的這個電臺工作，不是單純的「報告日偽經濟情況」，而是一個特務電臺有複雜的情報內容：即不僅有反映日偽與國民黨矛盾的經濟情報，也有重慶與日偽政府中的「地下軍」、「兩面人員」進行勾結的聯絡，更有報告共產黨新四軍活動的情報。所以日本憲兵捕殺陳其昌後，並不按慣例株連其他人。陳其昌供職的金源錢莊被查詢後安然無恙；陳其昌領導了約十年的托派中央及其要員王文元、鄭超麟等人，「連搬家這樣最簡單的應變措施都不取，照樣可以在上海大搖大擺地走路！」¹⁰⁴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對托派的態度。王文元說陳其昌的被捕「並非爲了他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確是道出了真諦。

所以，中國托派在抗戰中推行「打倒國民黨」、攻擊共產黨和「失敗主義」的路線，實在是亂彈琴。正如陳獨秀在致托洛茨基信中所指出的，使人們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者主要的究竟是誰，「托派漢奸」的說法也就流傳開來，從而受蘇聯肅托運動的影響，出現一系列「托派漢奸」的冤假錯案。

¹⁰⁴ 同¹⁰³。

附錄：幾起「托派漢奸」假案

俞秀松案

俞秀松又名壽松，字柏青，一八九九年六月生於浙江省諸暨縣溪埭村，一九一六年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一九年參加杭州的「五四運動」，成爲當時著名的一師學生運動的領導人，接受進步思想。一九一九年底，他赴北京，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旁聽生，邊勞動，邊讀書，參加了「北京工讀互助團」。一九二〇年三月，他回到上海，參加《星期評論》社工作，並與陳獨秀、李達、施存統、陳公培等人接觸，參與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他是當時黨的發起組織中年紀最輕的成員，陳獨秀因此派他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並擔任團中央書記，同時擔任團中央的工作機關外國語學社秘書。一九二一年三月，被黨和團組織派遣，作爲代表前往蘇聯參加少共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並聯繫派送留蘇學生事宜。回國後，他從事工人運動及浙江的建黨建團工作。一九二二年中共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國共合作的方針確定以後，他在這年十一月，爲打倒軍閥，先後到福州、泉州、廣州幫助孫中山做軍運工作，並任討伐陳炯明的東路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一等書記官。

一九二五年，俞秀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取名「納利馬諾夫」，任中共旅莫支部書記，並與周達明、董亦湘等人參加學校教務處的工作。因爲當時蘇聯創辦中山大學，培養中國學生，需要中國同志的幫助。俞秀松等人在教務處工作，組織教學方案，購置中文圖書，規定訓練方針等，得到教務處主任阿郭爾的信任。但由於副校長米夫企圖

控制學校而與阿郭爾發生矛盾，造成了俞秀松與米夫及其附庸王明之間的對立。當時已經篡奪了學校中共黨支部局書記的王明，爲了奪取和鞏固在中國留學生中的領導權，與米夫打擊排斥阿郭爾相配合，也竭力打擊排斥俞秀松等人，捏造了俞秀松等人組織「江浙同鄉會」進行反黨宗派活動的罪名，向中共中央書記和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向忠發控告。向聽信片面之辭，在一次留蘇學生大會上講話時宣布：凡是在共產黨內組織同鄉會的都該槍斃。於是，在留學生中造成極大的混亂。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俞秀松從中山大學畢業後，考入培養高級幹部的列寧學院。翌年，共產國際監委、聯共中央監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團三方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了所謂「江浙同鄉會」事件。審查委員會主席是聯共監委書記耶拉斯拉夫斯基（他又是共產國際監委負責人之一）。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是瞿秋白，團員是周恩來和余飛。他們審查了王若飛作的關於這個事件的詳細的調查報告後，否定了王明的指控，指出「江浙同鄉會」是莫須有的事。

王若飛調查了與此案有關的一切人員，才弄清這個以蔣經國爲中心的事件的真相是這樣的：

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的沈澤民、張聞天、郭少棠、竺庭章、吳亮平、俞秀松、董亦湘、蔣經國等人，因爲都是江浙人，常在一起玩，並要蔣經國請客，名曰交會費，實際上是敲蔣經國的竹槓。這年下半年，蔣經國到列寧格勒學習後，還與莫斯科的俞秀松等人保持著這種聯繫。有一次蔣經國和劉鳴先給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寫了一封信，內容是：

我們現在學習很忙，不知你們情況如何？很想知道你們的學習

情況。這月錢用了，「會費」交不出來，只好下月補交。希望今後多通訊，以便彼此相互了解和學習。

這封信的意思是說這個月蔣經國口袋的錢已用完，請不起客，向俞秀松等作個說明。可是，王明據此在翻譯班上突然宣稱：「在莫斯科有個反動組織——江浙同鄉會。」江浙同學聽後，精神負擔很重。人們胡亂猜測著誰是這個反動組織的成員。過了不久，王明又宣稱：「加入同鄉會的，不都是江浙人，江浙人也不都加入了江浙同鄉會。」搞得大家的思想更加混亂。

其實王明捏造這個冤案，是因為俞秀松等人不但反對王明很激烈，而且反對王明的支持者米夫。這個冤案被糾正，瞿秋白、王若飛、耶拉斯拉夫斯基及其夫人即列寧學院院長凱撒諾娃都出了力。說明在當時黑暗的環境中，中、蘇兩黨內仍有主持正義的力量。

一九三〇年，國內中共進行反對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時，列寧學院也有反應。已經在校任教的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等對米夫、王明搞宗派鬥爭、以「左」反「左」的做法有看法，在學生中不討論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不討論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一九三一年五月通過的對中國問題的決議，被指責為「在反對李立三路線和反對反革命羅章龍派的鬥爭中實行怠工，而仍舊反對中國共產黨四全會後更新領導的中央及其政治路線」。由於列寧學院領導上的保護，俞秀松才免遭打擊。

一九三三年，俞秀松被聯共中央派往伯力，化名王壽成，擔任中文報《工人之路》副總編。一九三五年，又被派往新疆，擔任反帝總會秘書長，做盛世才（新疆軍閥）的統戰工作，與盛的妹妹結為伉儷，主編出版《反帝戰線》，工作極為出色，與蘇聯及中國托派沒有任何瓜

葛。

可是，一九三七年王明、康生回國前，與到莫斯科治療彈傷的王稼祥一起會見了斯大林。王明乘機進讒，誣說周達文、俞秀松是壞人，並指責正直的列寧學院院長凱撒諾娃包庇他們。於是凱撒諾娃被撤職。王明、康生回國，途經新疆，會見了盛世才。盛拿出一張被聯共派往新疆工作的二十五人照片，問王明認識不認識這些人。王明說這些人都是托派。於是，這些人先後被捕。其他人不久就釋放了，唯俞秀松和張逸凡兩人被關押入獄。

與此同時，王明、康生就到處演講、寫文章，咒罵俞秀松等是「托匪」。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刊登康生寫的誣陷陳獨秀是漢奸的文章，就同時誣陷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三人是「在蘇聯的中國托洛茨基匪徒」。隨後，蘇聯的《真理報》和巴黎的《救國時報》，也隨聲附和，載文誣蔑俞秀松等是「托派」。

終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俞秀松被押往蘇聯，在審訊時，他直言不諱自己是反對王明的，但不是「托派」，拒不「認錯」，不久就慘死在酷刑之下。

實際上，俞秀松非但不是托派，還是中共全黨同志公認的「好同志」，「是我黨領導幹部中的佼佼者」。當然，在缺乏民主的黨制下，中共及聯共歷史上，被迫害致死的社會精英不止俞秀松一個人。但是歷史是不能永遠玷污的，冤案終要平反。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給了俞秀松家屬一張由毛澤東主席簽發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以示俞秀松是一位革命烈士。

張慕陶案

張慕陶，原名張金紉，陝西省枸邑縣人。一九二五年在西安三中讀書時，被派到西安創建共產黨的吳化之發展加入共青團，做西安的學生運動，擔任過省團委書記。大革命時期，代表西安團組織，到武漢參加全國青年團代表大會。

一九二八年，中共籌備「六大」時，張慕陶在海參崴當交通，負責接送出席「六大」的代表去莫斯科，被接送的代表中有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等。他在接送工作中很活躍，表現積極，受到黨中央負責同志的賞識，覺得他是個「人才」。當時，陝西省本來有一個出席「六大」的代表團，「六大」開幕前，這個代表團的全體成員在國內被捕，臨時決定由張金紉作為陝西省的代表出席「六大」。

「六大」後，重建中共順直省委時，周恩來主持省委擴大會議，宣布張金紉為省委組織部長。當場有人反對，說張愛吹牛拍馬，有時行為荒唐、假積極等。周恩來做了一些解釋和說服工作，得以通過。張金紉在「六大」後，又作為中國共青團的代表，在莫斯科參加了「少共國際」和中國共青團的「五大」，一九二九年二月才到天津上任，改名張金刃，主要抓職工運動，也抓軍委工作。這年夏秋又調武漢，任長江局書記。

張金刃思想作風「左」傾，忠實積極推行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帶頭搞「飛行集會」，到處製造小型罷工，主張只搞赤色工會，反對利用黃色工會，致使許多革命同志被捕。長江局機關被破壞時，他跳樓脫險，摔傷了腿，逃到上海。李立三「左」傾中央說他臨陣逃脫，沒有分配他工作。長江局恢復時，周恩來任書記。糾正「立三路線」時，他與羅章龍、何孟雄等人站在一起，要求召開緊急會議，解

決路線問題，接著又在「反對四中全會，力爭非常會議」口號下，舉起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篡奪黨中央的大旗，擔任北方各省籌備非常會議委員會主席。鬥爭失敗時，他被王明中央開除黨籍。與此同時，他又在天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在獄中，他與陳伯達、陳源道同監，表現不錯，又恢復黨籍，刑期快滿時，經黨營救，與二陳同時出獄，到北平朝陽大學教書。

這時，馮玉祥正積極組織抗日活動，並尋求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和支持。周恩來委派陳賡指示華北特委開展對馮玉祥的統戰工作。張金刃遂改名張慕陶，與吳化之、武止戈等一批共產黨員被派到張家口，參加馮玉祥領導的察北抗日同盟軍的工作，張慕陶任馮玉祥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吳化之任吉鴻昌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他們還組成中共張家口特委，張任書記。特委創辦了《抗日陣線》報，積極從事抗日宣傳和民衆工作。

馮玉祥出於對共產黨的期望和信任，又十分讚賞張慕陶的個人才能，對他十分重用，與他共同擬定了抗日行動計劃。由他負責起草了抗日同盟軍綱領，二人又共同編制了同盟軍主力部隊。同盟軍成立時，張慕陶和徐維烈（徐謙侄子，同盟軍政治部副部長，大革命時加入中共，脫黨後仍同情共產黨）一起起草了馮玉祥就職同盟軍總司令向全國的通電。

同盟軍初期，張慕陶及特委遵照周恩來指示精神，與馮玉祥真誠合作，並以馮玉祥為核心，最大限度地團結各派各系抗日力量，不公開共產黨的旗幟，不攻擊南京政府如何如何反動，也不提地方軍閥如何如何不好；以抗日為最高原則，求同存異，使同盟軍及地方上的工作進行得相當的出色。不料，好景不常，王明「左」傾中央及河北省委代表、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的饒漱石派來了柯慶施，自任書記，

取消特委，成立中共前線委員會。派陳伯達接收《抗日陣線》日報改名為《老百姓》日報。然後，完全推翻原來與馮玉祥合作抗日的方針，執行「打倒一切」的「左」傾路線，提出所謂「裡紅外不紅」的西瓜政策，把黨的工作引上歧途。柯慶施及其追隨者認為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著名的愛國將領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把他們視為「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疏遠了抗日同盟軍中非中共軍事幹部，對於外圍關係如晉軍和東北軍也不予以理睬；在中共黨內，柯慶施陸續通過河北地方黨組織調到張家口很多幹部，對原來與馮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屬於中共派去的幹部採取排斥態度，或調離工作，或撤銷職務，甚至開除黨籍。在工人、學生、士兵中發動了罷工、罷課、罷操運動，公開反對馮玉祥；甚至牛頭不對馬嘴地宣稱：日本侵占東北和華北是以此為跳板進攻蘇聯，要緊急動員起來武裝保衛蘇聯，這種情況使馮玉祥十分為難和寒心，加速了同盟軍的瓦解。同時，共產黨自己把自己公開，又貼標語，又搞示威遊行，罷工集會，宣傳黨的「左」傾口號，把同盟軍張家口搞得很「紅」；國民黨特務就把這些情況報告蔣介石、汪精衛南京政府，蔣、汪就公開指責馮玉祥「聯共赤化」，更有藉口布置在軍事上圍攻同盟軍。

最嚴重的是「左」傾的中共中央改變特委和同盟軍馮玉祥等首領們原訂的打一下以後，把部隊拉到綏陝蒙邊境，打通蘇蒙關係，爭取長期抗戰的軍事計劃，而是要求打紅旗，單獨幹，建立中共的根據地。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出給河北省委秘密指示信，要求將同盟軍前委改組為秘密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將先期在張家口工作的特委同志調離各關鍵崗位，把張家口和察哈爾中共領導或影響的軍隊，即同盟軍第二師、第五師和第十八師（這三個師中的師長、團長、營長全是共產黨員），及其他隊伍中中共掌握的隊伍，總共兩萬多人，拉

出來，開到冀南，改編成紅軍，建立蘇維埃，實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反對國民黨統治。

對於這一切，張慕陶雖不滿，但並未抵制。同盟軍失敗時，他又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竭力說服同盟軍將領攻打平津，導致軍事上的失利。同盟軍失敗時，由於沒有實現不可能實現的「左」傾路線的意圖，「左」傾領導不顧黨內同志的反對，又搞文過飾非，再次匆匆地把張慕陶開除出黨。柯慶施指責其「思想右傾」^⑮。

此後，張慕陶帶著對共產黨的滿腹怨恨，以天津、太原為中心，聯絡原同盟軍及地方上層人士，進行「反蔣抗日」活動。當時在北方進行類似活動的還有一個托派分子杜畏之和他自行拉攏二三個人組成的小組織。由於托派中央反對「勾結上層」，不承認杜畏之的活動，並將杜「開除」了^⑯，所以杜也是以個人名義活動的，並不代表托派。張慕陶就與杜畏之結合，互相利用。由於他倆都反對國民黨，同時又不滿共產黨，所以他們的活動被共產黨視為「托派活動」，實際上，張慕陶不是托派，他的活動與托派組織毫無關係。

一九三五年，山西軍閥閻錫山為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和蔣介石勢力的滲透，同時也抵制紅軍北上抗日的影響，決定搞一些改良。張慕陶受聘任閻的高級參謀，為山西「新政」出謀劃策，深得閻的信任。閻錫山同時又與共產黨合作。薄一波、安子文等中共高級幹部在協助閻錫山搞「犧盟會」過程中，積極發展抗日力量，曾多次爭取張慕陶。但是張對共產黨抱有成見，予以拒絕，雙方矛盾日益激

^⑮ 參見吳化之：〈關於張慕陶〉（未刊稿）。吳成方：〈抗日同盟軍的醞釀和成立〉；張公幹：〈我對抗日同盟軍的片斷回憶〉，均載《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⑯ 鄭超麟致筆者的信（一九八〇年七月九日）。

化。西安事變時，楊虎城將軍曾電閻錫山請求指導。張慕陶隨即來到西安活動，但他竭力主張殺蔣，以平民憤。事變和平解決後，他又支持東北軍中孫銘九等一夥患有「左傾幼稚病」的少壯派人士的主張，爲了營救張學良而不惜向南京政府開戰。孫曾邀請張到學兵隊演講。因此，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孫銘九一夥殺害東北軍主和派將領王以哲事件時，共產黨立即把此事件與托派對「西安事變」的立場，及張慕陶與孫銘九少壯派的關係聯繫起來，把「托派張慕陶」視爲少壯派殺害王以哲的幕後策劃者，延安的《新中華報》猛烈抨擊「托派張慕陶等陰謀企圖破壞和平統一」^①。但是，這在當時只是一種宣傳手法，沒有把此事件歸罪於張慕陶的意思，因爲當時中共紅軍和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張聞天在評述此事件時，只批判了少壯派極端分子和托派，沒有點張慕陶的名。而且，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在蘇聯的王明，連這種認識也沒有，他認爲「二·二事件」是南京政府中親日派的「奸細挑撥陰謀」^②。因此，事件以後約一年時間，《新中華報》對張慕陶的抨擊，沒有構成威脅。

抗戰爆發後，張慕陶在閻錫山支持下，一度在太原組織抗日游擊隊，約百多人。許權中任隊長，張任政委。太原失守後，因經費困難，游擊隊瓦解，閻錫山準備委派張任第二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長，被共產黨反對掉；然後，閻錫山又要委任他爲晉南長治等十二縣行政主任兼地方自衛軍總指揮，又被共產黨反對掉。最後，閻錫山準備派他到晉東南當專員，繼續從事抗日及反對國共兩黨的活動時，張慕陶很快就落入王明、康生編織的「托匪」羅網，遭到殺身之禍。

① 《新中華報》，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

② 王明：〈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言論選輯》第530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一九三七年九月，王明在回國前，就根據莫斯科審判中學到的「思維方式」和逼供出來的所謂托洛茨基有關中國的罪行材料，就捏造了一個所謂托匪張慕陶、徐維烈等人「每月從日寇的華北特務機關部領取五萬元的津貼」^⑩的罪名，然後，他就完全推翻自己過去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所作的雖然錯誤卻還未淪喪的結論，給張慕陶羅織了一系列莫須有的「托匪」罪狀，以發洩對這個過去一貫反對自己的政敵的仇恨，置之死地而後快。他與康生狼狽為奸，把察北抗日同盟軍的失敗，殺害王以哲，甚至與張毫無相關的「福建事變」的失敗，統統歸結為「托匪張慕陶」有計劃有預謀的破壞活動。他們回國後，更是大造輿論，添造謠言（如說張慕陶親赴日本，在東京聽受日寇指示等）^⑪，與黨內特別是山西地下黨反對張慕陶的情緒相結合，終於促使中共北方局作出了由山西省委組織除掉「托匪奸細」張慕陶的決定^⑫。托派中央當時為此發表聲明，說把張慕陶算在「托派」之內，是「對於本同盟最惡毒的誣蔑，……其實張慕陶不過是閻錫山的一個走卒。」^⑬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張慕陶應邀到臨汾民國大學演講。中共山西省委乘機組織學生圍攻他。他逃到家裡，學生們追到家中，抄家，並把他和妻子申雲心揪鬥、遊街、關押起來，揚言要「公訴槍斃張慕陶」。閻錫山得知後，半夜裡派憲兵拿著他的手諭，以提審張慕陶為名，從看守的學生們那裡，要走了張，解送到臨汾高等法院。閻錫山表面

⑩ 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解放》第1卷第26期。

⑪ 康生：〈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第1卷第29、30期。

⑫ 張稼夫：〈庚申憶逝〉（之一），《中共黨史資料》（6）第113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⑬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為答覆斯大林黨的捏造給大美、華美晚報的公開信（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載《托派對於抗戰的主張》小冊子。

上答應群眾要求，要公開審判，甚至還要薄一波準備發言，揭發罪行。可是在當天晚上，就把張解送到西安九府街第一監獄。當時一七七師西安辦事處主任趙彥青是張在北平朝陽大學的學生，趙得知張被捕，即告師長李興中；李通過閻錫山，設法把張慕陶在三月八日無罪釋放。

張出獄後，又在西安大肆活動起來，揚言「共產黨沒有希望，國民黨已腐爛，非走第三條路不可」，並成立了一個自稱是「馬列主義」的無名小組織。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要張寫白首書加入國民黨。他拒絕說：「甘爲刀頭鬼，豈作無恥徒。」^⑩國民黨乃將他逮捕，但生活上給予優待。由於日機轟炸，輾轉押解沔縣和陽縣，最後到南鄭。在此期間，國民黨又幾次找張談話，要他投降國民黨，公開反共，均被他拒絕。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蔣介石電令槍決張慕陶。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南鄭專員魏席倫執行命令，把張秘密槍殺於專員公署，時年僅三十六歲。

綜上所述，張慕陶雖有類似托派那樣在抗戰中既反國民黨又反共產黨的錯誤，但他既非托派又非漢奸，乃是事實。王明、康生所以如此誣陷他，除了歷史積怨，還包藏著打擊周恩來的禍心，因為張慕陶幾次被重用，都是周恩來賞識的結果。

王公度案

王公度，廣西永福人，二十年代因與李宗仁之弟李宗義友好，北京大學畢業後，受李宗仁資助赴蘇留學，結識共產黨及以後的托派，但他未加入共產黨，也未加入托派。回國後，任李宗仁總部中校秘書，並與程思遠一起，爲桂系主持「中國國民黨革命青年團」的秘密組織，

^⑩ 張孝軍：《張慕陶傳》，未刊稿。

同時受李宗仁和白崇禧重用，由中校升至少將，身兼桂軍總政訓處處長、南寧軍校政治處主任、廣西黨政研究所訓育主任、廣西省黨部常務委員、省政府委員、童子軍訓練所教育長、廣西民團幹部學校教育長等職，還掌握《廣西日報》等全省宣傳工具，集組織、政工、青訓、宣傳大權於一身，青雲直上，紅極一時，地位僅次於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成爲廣西「第四號人物」，遭到以黃爲代表的桂系保守派人物的忌恨。

在政治上，王公度積極幫助桂系反蔣。他在香港、上海設置情報機關，蒐集南京情報，提供給李、白，從而成爲國民黨「軍統」特務機關的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有時，他又隨著桂系態度的右傾，鎮壓共產黨和進步勢力。日本侵華加劇以後，桂系抗日反蔣行動升級，王公度竭力推動，一方面延納托派分子（如「我們的話派」的骨幹陸一淵、張特等）爲政治教官，另一方面也容納共產黨及進步教授（如陳望道、馬哲民、施存統等）到廣西大學教書。一九三七年七月，王公度還應共產黨通過劉仲容提出的要求，安排周恩來所派的張雲逸到桂林訪問李宗仁，協商聯合抗日問題^①。此舉更引起堅持反共立場的黃旭初派強烈攻擊。王公度在內外夾擊下，逐漸失寵於李、白，於是企圖以「革命同志會」爲陣地發展獨立的政治勢力，在其所擬的〈目前工作計劃大綱〉中，宣稱「前方爭取地位，後方聯絡中共」，此被李宗仁視爲「破壞團體，爭取政權」，有野心。抗戰爆發前後，蔣、桂妥協。李、白在內外敦促下，八月三十日著令黃旭初逮捕王公度，九月十四日槍決。然後，王公度是「托派」的說法就流傳開來。其實據協助黃旭初「勘理王案」的徐亮之事後對程思遠說：所謂王公度是「托

^① 程思遠：《政壇回憶》第96頁，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派」，完全是假的。當王公度處死後，立刻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對外要怎樣解釋呢？就是說要加給他什麼罪名呢？對此，李宗仁繞室徬徨，一籌莫展。我因建議道：「何不給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納議，遂定案。」^⑩

王明、康生對於這個又可以給周恩來臉上抹黑、而由別人製造的托派假案，自然更感興趣。於是，他們又在「王公度案」上大做文章，胡說：「萬惡的死有餘辜的托匪王公度、李血淚等民族叛徒，在蘆溝橋事變全國抗戰之際，利用廣西的軍隊開赴前線抗日之時，在廣西組織叛賣祖國、破壞抗戰的陰謀叛逆的行動，公開的幫助日本帝國主義。」^⑪

⑩

爲此，托派中央在當時一再發表聲明，否認王公度是托派，指出：「王公度僅是白崇禧、李宗仁的私狗而已。王公度之死，乃是與夏威、黃旭初等人衝突的結果。」^⑫

陳獨秀「間諜」案

最令當時中國社會震驚的，是王明、康生一手製造的陳獨秀「日本間諜」案。

抗戰初期，陳獨秀雖然未與共產黨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但這絲毫也不能貶低陳在抗戰問題上「轉變」的進步意義，不能否定中共中央把他當作抗日團結對象爭取方針的正確性。因此，當時的確出現了自一九二九年雙方決裂以來的和解氣氛。可惜，這種氣氛，很快被突然回國的王明、康生的錯誤行爲一掃而空。

⑩ 同⑩第98頁。

⑪ 同⑩。

⑫ 同⑩。

在得知中共中央曾與羅漢聯繫與陳獨秀合作抗日事宜後，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當場有人指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①。康生立即緊跟，發表了一篇長文章——〈剷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說什麼：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

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這種誣陷是聳人聽聞的。當時輿論大嘩，

①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18-423頁。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91頁，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二年版，譯自一九七五年莫斯科俄文版。

要求康生拿出證據來，但他始終拿不出來。這就使廣大有正義感的人們十分費解和不滿，從而對中共及其執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並為那些熱心反共的人們提供口實，致使中共的威信蒙受嚴重的損失。康生的文章更成為衆矢之的。從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開始，《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出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江蘇省教育廳長）、傅汝霖（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教授）、梁寒操（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陶希聖（國防參議會參議員）、林庚白（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段錫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九人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指責說：「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生平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時值王明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中共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也在王明的領導之下，寫了幾篇「短評」。但這些「短評」非但沒有提供「證據」來證明王明、康生的論斷是站得住腳的，反而說什麼「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⑩這種強詞奪理的蠻橫行為，更加引

⑩ 《新華日報》，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

起公憤。

此時，性格倔強的陳獨秀，看了這些「短評」，也越發惱怒了。他在三月十七日給《新華日報》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一開頭敘述了他出獄後在南京、武昌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觸，以及「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說明要陳獨秀回中共，並非陳本人的要求，而是葉等人的提議），而現在，「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接著就駁斥了「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的行動以為斷」的說法。信發洩了積鬱在他心頭多年的對中共的怨恨，用了一些十分激烈的言詞。當時，他把王明、康生的罪惡行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陳獨秀哪裡知道，王明、康生製造這個事件，打擊陳獨秀還在其次，主要矛頭是指向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對中共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之後，王明一直心中不滿。他認為遵義會議「其目的是為了反對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這次會議的政治、軍事和組織路線是完全錯誤的。」^⑩因此，他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坐在莫斯科，卻總以太上皇自居，冷眼注視著國內中共的動向。這次回來，他企圖再次篡奪中共中央大權，在準備召開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他拋出了一個「七大」「準備委員會」的名單，把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列在第六位，而他自己卻列在第二位，只在軍委主席毛澤東之下。但這他還不甘心，於是就尋找「石子」打人，在毛澤東、張聞天與羅漢、陳獨秀聯繫合作抗日問題上大做文章。康生甚

^⑩ 王明：《中共五十年》第25頁。

至用十分明白的言語旁敲側擊地說：「雖然陳匪獨秀從九一八以來就與日寇勾結，然而，他還可以在武漢演講，使用其老奸巨滑的偵探技術，……讓這些日寇漢奸在全國抗戰之後方還能繼續活動，這不能不是全中國人民的恥辱，全國抗戰的損失。爲了抗戰的勝利，中國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⑩

且聽，讓陳獨秀「繼續活動」，已屬「不能容忍」，那麼，主張與他「合作」，甚至要吸收其「回到黨內」的毛澤東們，又當何罪？

而王明則在三十四年以後，在蘇聯寫的回憶錄還造謠說他一九三七年底回到延安之後，便得知毛澤東和陳獨秀的代表羅漢達成協議：「毛澤東允許托陳集團的成員全部恢復黨籍」；只是由於他的阻止，才未實現。他以此誣蔑「毛澤東當時已準備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積極幫兇——托派分子勾結起來」^⑪。

王明一方面在陳獨秀問題上表現爲極「左」，另一方面在抗戰問題上表現爲極右，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聽從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對中共中央獨立自主的路線；在「保衛大武漢」的口號下，醉心於以城市爲中心進行速決戰、運動戰，反對毛澤東持久戰、游擊戰爲主的軍事路線。

所以，王明在與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的較量中很快失敗。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他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建立了周恩來爲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爲書記的中原局。王明終於垮臺了。但是，他和康生在武漢大抓「托匪漢奸」的惡劣影響，卻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

在陳獨秀發表致《新華日報》的公開信後，羅漢又發表了一封很

⑩ 同⑩。

⑪ 王明：〈「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方針〉，載《中共五十年》。

長的致周恩來等的公開信。還有其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都參加進來，對共產黨發起圍攻。

爲了捍衛中共的利益，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面人士做了許多工作，尤其幾次托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⑧，以免事態的繼續擴大。當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陳獨秀，才使這場風波較快地平息下來。

但是，陳獨秀卻不肯罷休，只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賬」。他在當時給何之瑜的信中說：「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真使我莫名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污蔑。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只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帳，此無他也。……」^⑨

就這樣，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再一次，也是永遠地破裂了。王明垮臺以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請陳獨秀到延安去。特別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陳獨秀多次發表文章猛烈攻擊蘇俄與納粹一樣「反動」、「黑暗」與「殘暴」後，使與蘇俄結盟的國民黨政府和中共都很被動。中共中央的意思是他弄到延安去養起來，

⑧ 《周欽岳談陳獨秀》（未刊稿）。周欽岳抗戰期間任重慶《新蜀報》主編，與陳獨秀和周恩來都有交往。

⑨ 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賀松生即何資深、何之瑜，原托陳派要員。

不讓他在外面胡鬧。因為他畢竟是中共創始人，並且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擔任共產黨的領導，中外輿論總把他的言行與中共聯繫起來，損壞後者的聲譽。

但是，陳獨秀堅決拒絕去延安。他對勸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蘊山說，中共中央裡沒有他可靠的人了，（李）大釗死了，（陳）延年死了，他也「落後」了；「他們開會，我怎麼辦呢？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弄得無結果而散。」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陳獨秀這位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叱咤風雲的人物，在四川江津一個小村裡寂寞地死去，享年六十四歲。

湖西事件

「湖西事件」是中共山東抗日根據地由「肅托」引起的一次大冤案，也是中共歷史上一次重大的冤假錯案。

如果說張慕陶、王公度、陳獨秀的「托匪」假案，因為他們曾反對過國民黨和共產黨，事出有因，並且由於發生在國統區，對抗戰、革命和共產黨造成的損失和影響是間接的、個別的、小範圍的、一時的；那麼，在抗日根據地發生的「湖西事件」，純粹是莫須有的，給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影響深遠的危害。

湖西地區是指山東微山湖以西以單縣為中心的蘇魯豫皖四省交界地區，包括微山、魚臺、獨山、南陽、昭陽等縣。「七·七」抗戰爆發後，這裡的中共黨組織領導人民進行多次武裝起義，成立了湖西人民抗日武裝，創建了抗日根據地。一九三八年七月，建立中共蘇魯豫特委，轄荷澤等二十三個縣。年底，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成立後，八路軍一一五師挺進湖西，加強了湖西的革命力量，建立了一一五師蘇魯豫支隊，轄四個大隊，組成中共蘇魯豫邊區黨委（即第五區黨委），使該

地區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但是不久，由於蘇聯「肅托」運動的影響和王明、康生的推波助瀾，在中共黨內和抗日根據地內也到處挖掘所謂「托匪」分子，終於在該地區內誘發了一個人為的「肅托」事件，殘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斷送了湖西地區的大好抗日形勢。

當時區黨委下屬的湖邊地委辦了一個幹部學校，為抗日鬥爭培養幹部。一九三九年初，一部分畢業的學員有地方觀念，在分配時要求回鄉工作，不服從統一分配。這本來是一個一般的思想問題，通過教育是不難解決的。但是負責處理此事件的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受王明、康生散布的托匪敵情嚴重和肅托思想的影響，主觀認為學生「鬧事」是「托匪」活動，將學校負責人魏定遠逮捕審訊。魏拒不承認是「托匪」，就受到殘酷的肉刑。於是，魏屈打成招，按照共產黨的組織系統，編造出一套「托匪組織」。接著，又按照他的「口供」，逮捕了郝曉光。郝受刑不過，也供出一套「托匪組織」。魏、郝口供並不相符，但並未引起地委的警覺，反而主觀認定湖西暗藏著兩套「托匪組織」。

邊區軍政委員會在聽取地委匯報和魏、郝的假口供後，未作任何調查，就主觀決定對「托匪」嚴加清洗，並對王須仁大搞逼供信的做法大加讚賞，還派蘇魯豫支隊四大隊政委王鳳鳴參加「肅托」工作。王須仁在一九三三年被捕，曾自首過，在《晨報》上發表過「反共啓示」，後來又混進黨內；王鳳鳴則在紅軍時代就道德敗壞，野心勃勃。於是兩個壞分子沆瀣一氣，互相勾結，利用職權和運動，大批殘害革命幹部。他們依據魏、郝提供的「名單」，採取順藤摸瓜，指名問供，張冠李戴，羅織株連，逐一刑訊的手法，逐步把殘害對象擴大，由幹校擴大到魚臺縣委、湖邊地委以及地方武裝部隊，逮捕了魚臺縣委書記、湖邊地委婦女部長、宣傳部長、軍事部長以及各級特務連的指導員等數十人，最後殘忍地用酷刑將他們一起殘殺。

這時的所謂「肅托」運動，完全成了陰謀家壞分子殘害革命幹部、摧毀湖西區黨組織和革命根據地的反革命運動。但是，二王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又把魔爪伸向湖西區黨委機關，按照不斷逼供不斷擴大的「托匪」名單，要求清洗區黨委機關。區黨委書記白子明在這危急關頭，居然屈服於淫威，非但沒有採取措施，組織力量，粉碎壞分子的陰謀，反而予以支持，於是逐步升級逮捕了六十多名幹部，其中包括區黨委宣傳部長馬霄鵬、參謀長李長發。白子明還親自參加逼供，毒打馬霄鵬。馬寧死不招認自己是「托匪」。當他被折磨得遍體鱗傷時，還誠懇嚴肅地勸告白子明：「子明同志，我是山東分局派來的，我是區黨委委員，你要相信分局，你要對黨負責！」但白對這位忠誠的革命戰士的勸告置若罔聞，最後仍將他處死。同時，又有四十多名幹部被捕殺。這些同志都高唱著《國際歌》，高呼著革命口號走上刑場，情景無比悲壯，表現了共產黨人的高尚的革命氣節。

二王見區委書記白子明支持暴行，就更加猖狂無忌。九月十八日，他們帶領四大隊直撲區黨委機關駐地王莊，將其包圍，狂妄叫囂「區黨委除白子明以外全是托匪！」並詭稱他們有「中央的命令」。白子明又可恥地「明哲保身」，俯首聽命，任憑二王逮捕了區黨委軍事、組織、社會、統戰、青年等全體部長，並進行嚴刑審訊。在審訊時，二王不僅要他們招認自己是「托匪」，而且還要供出山東分局的「托匪」、一一五師的「托匪」，甚至中央的「托匪」。可見他們的胃口之大，暴露了他們的陰謀野心是要摧垮整個共產黨和八路軍。軍事部長張如和統戰部長王文彬嚴詞拒絕和痛斥了他們的反革命陰謀。二王惱羞成怒，遂將他們殺害。張、王二同志大義凜然，寧死不屈，又在中共黨史上寫下悲壯的一頁。

湖西區黨委領導機關就這樣被陰謀分子摧毀了。於是，他們就一

意孤行，成立所謂「整理委員會」，代行區黨委的職權，並將殘害運動繼續擴大到縣、區基層幹部和主力部隊中去。他們以辦「訓練班」為名，假令邊區各縣區以上幹部和部隊幹部到邊區「受訓」，陰謀將這批幹部一網打盡。許多去「受訓」的同志都遭到殺害，還逮捕了主力部隊中一部分領導幹部，包括湖西抗日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蘇魯豫支隊三大隊政委郭影秋^⑩。

這時，被捕的黨政軍幹部已達五、六百人，被殺三百多人。暗害分子在整個湖邊地區大搞白色恐怖，把好端端的抗日根據地糟蹋得不成樣子，冤獄遍布，屍骨成堆。

廣大幹部和黨員群眾對暗害分子的陰謀早已有所察覺，有些同志在接到所謂「受訓」通知後，予以抵制，未入羅網，倖免荼毒；有的在獄中秘密寫報告，交可靠的同志向上級組織反映；有的從虎口中逃脫出來，準備分赴分局和延安告狀；有的則直接打電報給分局。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負責同志獲知湖西區亂捕亂殺的情況後，曾多次急電王須仁等，禁止捕殺，但見無效，反而越來越嚴重，於是在十一月派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親自前往處理。

羅榮桓到湖西進行初步調查後，採取了制止殘害運動的緊急措施：一、無條件地釋放一切被冤枉的同志，恢復其工作；二、改組湖西區黨委，重建軍政委員會；三、將王須仁逮捕，押送一一五師保衛部（王在押送途中畏罪自殺）。這些措施對扭轉湖西區的局勢起了關鍵作用，無疑是必要和正確的。但由於時間倉促和蘇聯及中國黨內「肅托」擴大化、嚴重化傾向影響沒有清除，對事件不可能作深入仔細的調查和完全客觀公正的解決。因此，羅榮桓對事件下的結論是「肅托擴大化」

^⑩ 以上湖西「肅托」事件的全過程，參見張士寶：〈「湖西事件」的真相及其教訓〉，《齊魯學刊》一九八三年第6期。

——「肅托基本上是正確的，問題在於擴大化。」

羅榮桓這個結論的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無論從當時康生掌握的中共中央社會部的調查或托派中央聯繫的山東托派分子的名單中看，還是從現在發現的所有托派分子的名單中看，湖西事件中被捕被殺的幹部黨員，沒有一個是托派分子，包括魏定遠和郝曉光。所以，羅榮桓對事件的這個錯誤結論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根據這個思想，一九四〇年三月山東分局派去湖西的調查組，經過三個月調查寫的〈關於蘇魯豫邊區肅托鬥爭的總結報告〉和六月發出的〈關於總結第五區黨委肅托鬥爭的訓令〉，雖對壞分子的處理前進了一步，但對大批被冤屈的同志，非但沒有平反，反而套了另一種枷鎖。〈訓令〉對事件進一步處理的主要內容是：1. 肯定王須仁是事件的首惡分子，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2. 肯定白子明、王鳳鳴在「肅托」中負有工作責任，給予適當處分（王鳳鳴最後被定為「受暗害分子利用，假冒中央名義亂殺胡為」，被撤銷工作，開除黨籍，送交軍法處判處徒刑。在他獲悉這個處理消息後，畏罪潛逃，攜槍投降漢奸郝鵬舉，當了漢奸團長。後來被八路軍捕獲，判處死刑。白子明被定為「受王鳳鳴威脅隨聲附和」，撤銷工作，降為候補黨員）；3. 宣布張如、王文彬、馬霄鵬等同志是受奸徒陷害而死，在黨內表揚，並對他們深致哀悼。但是，雖無真憑實據，仍肯定魏定遠等人是真托匪；將那些因受刑不過而屈打成招的同志統統視為「自首」、「變節」分子，隨後給予永遠開除黨籍、開除團籍的嚴重處分。

這種情況表明，山東黨組織思想路線上誇大托派力量的傾向還相當嚴重，以致在事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影響山東分局的工作。直到一九四一年，受康生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的山東分局社會部的工作，還誇大托匪敵情，錯誤地提出「以肅托為一切鋤奸工作的中心」；

「在其今後的工作方向上，也只提出肅托問題」；甚至「單純依據一些口供，就確定山東全境確有自上而下的整個托派組織，並繪製所謂托派組織分布與活動地區略圖。」^⑩在這種思想路線影響下，一九四二年，山東的泰山區、濱海區等地又發生了類似湖西「肅托」的事件。

儘管中共山東分局和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又對湖西事件進行了複查和處理，都沒有徹底解決。這除了黨內長期擺脫不了蘇聯肅托擴大化及誇大中國托派力量的「左」傾思想路線的影響之外，不能不說還與大肆散布「托匪敵情嚴重論」、在黨內製造「托匪」冤案的老手康生長期竊據中共鋤奸機構——中央社會部大權有關。待到此人死去以後，一九八三年五月，山東省委把湖西事件的遺留問題處理意見報告中央，中共中央組織部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轉發的中央批示中，才把這個事件徹底平反。批示指出：湖西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不是擴大化錯誤，應予徹底平反。

王實味案

王實味與托派有些瓜葛，但他被定為「托派分子」而遭到殺害，卻不是因為「托派罪行」，而恰恰是反托派階級鬥爭理論的「人性論」；是由於講民主，反映群眾意見，卻不知道怎樣去「維護領導」；講政治，搞革命，卻又書生氣十足。這是一個「陳獨秀式」知識分子、不懂「政治」是何物而又滿腔熱血投身革命卻遭到不測的又一典型。

王實味是河南潢川人，本名叔翰，一九三〇年開始用「實味」投稿，還用過詩薇、石巍筆名。父親是前清舉人，在家鄉辦學，家境貧寒。一九二三年，他中學畢業，考上河南留美預備學校。所學英文，

^⑩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下），第393頁。

成爲他日後奮鬥、成爲著名翻譯家的主要本錢。一年之後，該校停辦，留美之夢破滅，回到荆棘叢生、多災多難的人間。

爲了升學，他曾到郵局工作，一年積了小小一筆錢，終於在一九二六年考上北京大學。在這裡，他與後來成爲著名托派分子的同學陳清晨（陳其昌）、王凡西（王文元）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後來因此而遭到殺身之禍。他由陳清晨介紹入中共，而與陳、王、李芬、劉瑩等人編在一個黨支部裡，支書是段純。

王實味狂熱地追求李芬，李芬則因遭夫喪，被婆家視爲「剋夫星」，受到刺激，立志把一切無保留地獻給革命，而不願再戀愛結婚。她不便實說，請求組織婉言勸告王實味，了結此情。當時正好李大釗被捕但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籠罩北京。段純認爲值此嚴重時刻，「身爲黨員的王實味非但不化悲痛爲力量，以行動答覆鎮壓，卻拚命追求女同志，幹些無恥勾當，實在荒唐之至」^⑤，主張給予黨紀處分。爲此召開了中共北京西城部委與北京大學支部的聯席會議。與會者都不同意段純的意見，結果給了王實味一個正式批評，要他不再糾纏李芬。

王實味執行會議決定，但他認爲段純對戀愛的看法是封建的，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是官僚的，會後又與段吵鬧起來，終被開除出黨。不久，又因經濟困難，他離開了北大。

從此，他又回到家鄉，繼續在南京、上海，爲生活而到處奔波，由於他固執、暴烈的脾氣，多次找到工作，都不長久，於是他寫起了小說，搞起了翻譯。

一九三〇年一月，他與劉瑩在上海結婚，並與已經脫離黨正在搞托派組織的陳清晨和王凡西來往。但他正忙於爲徐志摩編輯的《新文

^⑤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九十年代月刊》一九八五年第5期。

化叢書》譯書，既未參加陳清晨的「無產者社」又未加入王凡西的「十月社」。在來往中，王實味同意托派的某些觀點，如大革命已經失敗，失敗的主要責任在於共產國際斯大林，革命形勢是低潮等。但他不同意托派搞分裂，即使被開除，也不應另立門戶。他更不同意什麼都提到「階級鬥爭」高度去分析，而主張講一點「人性論」。於是，他與王凡西每談此就必爭。

這時，有三件事刺激了王實味滿腔激情地要重新投入革命。一件是，一九二八年春，王實味熱戀過的李芬犧牲在家鄉湖南寶慶。王實味說：「她的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的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的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一起」，以防當時流行的軍閥流氓的姦屍醜行。王實味義憤填膺地說：「從聽到她的噩耗時起，我的血管裡便一直燃燒著最狂烈的熱愛與毒恨。」^④

一件是，「九一八」、「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國民黨妥協，東北大好江山淪為敵手，上海又訂屈辱協定。王實味氣得日夜不寧，不停地對劉瑩說：「快參加『左聯』，非揭揭他們不可。」

一件是，從報上看到顧順章叛變，出賣革命同志，他立刻動手寫文章大罵叛徒，但又苦於無處發表。

這三件事，使王實味熱血沸騰，渴望趕快參加組織，投入戰鬥，為親人報仇，為民族雪恨。於是他與托派斷絕了聯繫，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奔赴延安。起先在魯藝教書，後來調到馬列學院編譯部，編譯馬列著作。四年間，他勤奮工作，譯了一二百萬字。他的馬列譯著，不僅在延安，在敵後抗日根據地，還曾在重慶和淪陷

^④ 實味：〈野百合花〉，〈前記〉，《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

區「孤島」上海出版，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一九四一年，馬列學院改組成延安最高學府——中央研究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副院長范文瀾。院長不在時，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羅邁（李維漢）代理。這時，王實味也調到該院歐陽山的文藝研究室工作，定為特別研究員，研究文藝這個經常給知識分子帶來名利，同時也帶來災難的問題。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間，王實味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四篇總題為〈野百合花〉的散文，批評延安有些領導同志不關心幹部、不愛護同志的官僚主義作風；同情一些國統區來的青年私下發的牢騷，主張正視並改正延安某些「醜惡和冷淡」的現象，以使延安更加「美麗和溫暖」；反對某些不合理的等級制度，主張幹群和上下級之間的待遇差別不要太大。

正在這時，延安的整風運動開始了。運動的既定目標是整治還在干擾毛澤東思想領導中國革命的王明教條主義者，本來與王實味之類不相干。可是一向不甘寂寞、好表現自己、又不明運動真相的王實味，卻硬是斜刺裡出來插一桿子，干擾鬥爭的大方向，結果是飛蛾撲燈，自取滅亡。三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開動員大會，范文瀾做報告進行布置，根據羅邁的提議，宣布決定成立以院領導和各室主任為當然委員的整檢工作委員會，再辦一份壁報加以配合。但檢委會的組成辦法，遭到大多數要求「民主」的群眾的反對。言詞最激烈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王實味。他主張檢委會應由群眾民主選舉產生，壁報可以用假名或匿名，以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權利。

范文瀾覺得群眾的提議沒有錯，羅邁堅決不同意。會場大亂，羅邁提前退場，范文瀾主持表決，結果八十四票對二十八票，通過王實

味提案。王實味等人十分激動，高呼「民主」勝利。

二十三日，上述針對領導的〈野百合花〉散文第三、第四篇見報。同時，中央研究院的壁報《矢與的》創刊，大講民主，王實味一人在創刊號上獨發兩篇，矛頭直指頂頭上司羅邁。壁報上還有漫畫。壁報先貼在研究院大院門口那兩間權充接待室和活動室的平房裡，後來貼到當時延安最熱鬧的南門外。看壁報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多。

王實味一時間成了延安的明星，但也走到了他的盡頭。

毛澤東後來在「七大」上講：「黨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一九四二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於是，王實味就從巔峰墮入深谷。

三月下旬，王震到中央研究院看了牆上王實味的文章後說：「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毛澤東也在一個深夜提著馬燈來研究院看《矢與的》，隨即指出：「思想鬥爭有目標了。」^④

三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講話，嚴厲地指出：「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他的秘書胡喬木，找王實味談了兩次話，寫了兩次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批評的是立場問題，……文章裡充滿了對於領導者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⑤

④ 李言（研究院黨委書記）：〈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

⑤ 同④。

研究院的領導同志也多次找王實味談話。起先，王實味「總是狡辯，毫不認錯」^⑩。後來經臨時到黨委做宣傳工作的溫濟澤苦口婆心地勸說，他才軟下來，表示自己是一心為黨好，意見也提得對，為什麼要這樣整？太冤枉了，實在想不到。然後，他拉著溫的手哭了起來，說：「我認錯，但我對黨確實出於好心……」

善良的溫濟澤向上反映：「我看王實味這人就是思想片面，觀點不對頭。現在他認錯了，我們是不是不要提高到政治問題？」但是，康生卻批評溫濟澤有「溫情主義」，指出「王實味是托派分子，有組織活動，還是藍衣社特務。他和別人不同，不是思想問題。」^⑪

王實味的問題，就由康生一下子定性了。康生的根據是他的中央社會部掌握的檔案中，王實味在過去向組織匯報自己情況時寫的一些與托派分子陳其昌、王文元交往的材料。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時，只要是康生、王明之流所要打擊的，隨時都可扣上「托派漢奸」的帽子，更何況他自己承認過去曾與托派分子有過瓜葛。

王實味真是自投羅網，混身是嘴也說不清了。歷史與現實表現一結合，看你還往哪兒跑。

五月二十三日，延安文藝座談會閉幕。毛澤東作了著名的〈講話〉，「掃除了關於文藝問題上的許多錯誤和混亂」，特別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王實味的文藝觀，也被批判定性了。接下去就是一連串的批判大會，大到上千人參加。

大會揭批的重點是王實味平時向個別人談話時透露的一些所謂托派觀點，如共產國際要為中國大革命失敗負責、蘇聯肅托擴大化、斯大林作風粗暴等。王實味並不否認，但不認為是錯誤的。而當時中共

^⑩ 溫濟澤：〈鬥爭日記〉，《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⑪ 同^⑩。

卻認為大逆不道。

於是，王實味終於被定為「死不肯改」的國民黨特務、反黨集團成員、托派分子，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被中央社會部逮捕。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進犯陝甘寧根據地首府延安。中共中央作戰略撤離。王實味被押解到晉綏根據地晉綏行政公署公安總局駐地山西興縣蔡家窯，作為中央社會部的犯人寄存在晉綏公安局預審科看守所裡。

在這春天的一個黃昏，王實味這位才華橫溢、脾氣古怪的翻譯家、文藝評論家，被砍死在偏僻的山嶺裡。

毛澤東得知王實味被殺的消息後，大發雷霆。因為他曾明確指示：對王實味「不要放也不要殺」^⑭。為此，當時的社會部部長李克農一再檢討，請求處分。賀龍則不得不出來承認：殺王實味「是我批准的」。因為賀是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司令員、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晉綏軍區司令員」。只有他才有權批准殺王實味這樣的人。

王實味臨死時還戴著三頂帽子。現在事實證明，這都是誣蔑不實之詞：

關於「國民黨特務」：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還在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但是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時，給這句話作了否定性的注釋：「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

⑭這算是平反了一條。

關於「反黨集團成員」：潘芳等四人，當時分屬三個單位，平時與

⑭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376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⑮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90頁。

王實味沒有什麼組織聯繫，只是在諸如「人性論」觀點上，曾贊同〈野百合花〉，康生硬是把他們與王實味打成「五人反黨集團」。由於潘芳在思想上認識「錯誤」較好，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就解脫，並留下來，直接從中央社會部的囚犯變成工作人員，其他人也先後平反。一九四五年，毛澤東曾向他們表示：「是黑夜裡的白刃戰，誤傷了自己的同志。」^⑮這已足夠表明，所謂「反黨集團」是不存在的。

關於「托派分子」的問題最為複雜。王實味被捕後，康生知道「藍衣社特務」、「反黨集團成員」的帽子編得太離奇，審訊時就在「托派」問題上大做文章，大搞逼供信。據參加審訊工作的人，後來回憶王實味在長時間的折磨和摧殘下，有時承認參加了托派組織，有時又大聲抗議，拒不承認是托派^⑯。這樣，像「莫斯科審訊」一樣，托派罪名本身就是逼供信的產物，又成了刑訊的根據，如此惡性循環，足以置被陷受害者於死地。

更加使這個問題複雜混亂的是王凡西一九七七年出版的《雙山回憶錄》中說的一句話：「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但是，一九八五年，他又寫文章更正說：「這裡我應該指出，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正如我上面憶述的，王實味雖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任何組織。」「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托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他最後參加中共而不參加托派，「完全是出於他獨自的決定，當他決定重新加入中共組織之後，便斷絕了與托派朋友的來往」，「這裡絕不可能存在什麼『派

⑮ 轉自戴晴：〈王實味與「野百合花」〉，《文匯月刊》一九八八年第5期。

⑯ 同⑮。

遣』問題；絕對談不上什麼『滲透』用意。」^⑬

所以，「王實味案」完全是一件錯案。但是甄別此案著實費了一番周折。

一九四九年八月，長沙解放。王實味的遺孀劉瑩和兩個孩子就開始盼望參加革命的親人王實味早日回家團聚，但到處打聽，卻不得要領。直到一九七八年，退休後的劉瑩偶然從廣播裡聽到王實味被殺的消息，一下子驚呆了。憑妻子的直覺，她不相信這是真的。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清高自負，剛烈耿直，說話無遮無攔，但是決不會當特務，不會是托派，更不會反黨、反革命。這位七十三歲的老人，以驚人的毅力，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便不斷向有關部門申訴，要求澄清王實味問題。

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此案很重視，正式立案複查，並在一九八二年首先否定了所謂「反黨五人集團」的存在。一九八六年八月，又在《毛澤東著作選讀》注釋中，公開宣布說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但是，對王實味托派問題，卻遇到很大困難。直到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國家公安部才正式作出〈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

〈決定〉說：「經複查，王實味同志一九三〇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農（均係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覆覆。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⑬ 同^⑫。

這一頁沉重的歷史終於翻了過去。當國家公安部的兩位同志前往湖北省十堰市，向劉瑩宣布〈複查決定〉，並送去一萬元慰問金時，這位歷經磨難、飽經風霜的老人，悲喜交加，熱淚盈眶。熬了四十九個春秋啊！熬到八十五歲，才熬到這個結果，是多麼不容易啊！有幾個人能活到八十五歲呢？她感謝老天有眼，讓她活到這一天，更感謝人民感謝黨為王實味平反昭雪，但卻堅決不收慰問金。後來，她把慰問金全部捐贈給十堰市文聯，作為青年文學獎金基金的一部分，以此作為對王實味的紀念。

這是一個中國婦女、中國妻子、中國母親的情懷，多麼偉大、多麼崇高的情懷。

第六章 無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節 不希望中共戰勝國民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結束時，在上海蟄伏了八年的托派，親身感受到了淪陷區人民突然激動起來的心情。「人們心理之由消沉死寂轉而為活潑希望，完成於一夕之間」；接著又很快「由活潑希望轉成為對統治者的憤懣不平」。總之，革命迅速成熟，而且托派認為「當時中共在東南諸大城市裡並沒有組織，各個『民主黨派』也只掛了幾塊招牌，就革命領導說是個半真空。」^❶

可是，當時上海的托派「少數派」只有十幾個人，「多數派」也不過二、三十人。面對這種形勢，他們痛心地感到處於一種惱人的無能為力的狀態。雖然他們在抗戰中一直叫嚷要從戰爭中引發革命，並要為革命的來臨而準備，但是正如王文元所說：「一俟『革命逼人來』的時候，我們仍覺得是沒有準備的。組織上固然如此，甚至思想上都有點這樣。」他哀嘆道：「群眾發了酵」，但托派無力「將他們焙成餅或釀成酒」；「在那個時候，如果中國托派擁有數百，最好能有數千名基幹的組織，我相信能起來填補這個真空。如果填補了的話，……則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初的『國民黨統治區』中的政治情勢，至少會

❶ 《雙山回憶錄》第280頁。

以不同的面貌留下在歷史上了吧！」^②

但是，托派不願去尋找爲什麼使他們變得如此弱小、如此狼狽的原因。實際上，中國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證明托派的理論和路線完全破產。抗戰並不因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失敗，恰恰因此而勝利了；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並不因與國民黨合作而「投降」、「墮落」，成爲「資產階級的附庸」，恰恰因此而走出困境，更加強大，爲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國際上，蘇聯非但沒有被打敗，反而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托派理論的破產，連第四國際的頭目也不得不承認。

一九四五年九月，主持過「第四國際」成立會議的前主席麥·沙赫特曼承認：「理論的死亡——這就是我們目前在國際中所看到的……。理論由於缺乏有營養的土壤而在死去。它正在周圍事件所造成的真空中死去，這些事件把它憋得奄奄一息。它由於沒有支持自己的任何出色手段而正在死去。」他進一步說道：「第四國際的領袖托洛茨基爲第四國際所作的基本分析……是錯誤的，站不住腳的。根據這種分析作出的預言同樣是錯誤的和站不住腳的。」^③

但是，中國托派卻沒有這種承認錯誤的勇氣。他們還要打腫臉充胖子，以他們始終沒有離開大城市，沒有離開工人階級，也未向資產階級投降，而向共產黨表示驕傲。所以，他們依然堅持反共的立場，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進行種種指責和破壞，以求戰後中國的歷史能按他們托派描畫的藍圖進行。

抗戰勝利後，中國出現了兩種命運決戰的局勢。這時候的中國共

^② 同^①。

^③ 洛淪·巴茨編：《美國的左派。二十世紀的激進政治思想》第 328 頁，一九七一年紐約版。

產黨已經完全成熟，以毛澤東爲主席的中共中央，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中共在解放戰爭中，充分運用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三大法寶，又是政治談判，又是軍事反擊；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在農村，由減租減息，改變爲土地改革；又由土地改革，轉變爲減租減息。城市政策，不搞罷工鬥爭，不搞武裝起義，還要保護私營工商業，提倡勞資兩利；保護工廠，保證正常生產，增加生產，支援前方。對城市，奪取了又放棄，放棄了又爭奪。對國民黨的國家機器的支柱——軍隊，用北京（和平解放）、天津（徹底消滅）、綏遠（圍而不打）三種方式來解決。最後甚至與資產階級實行廣泛的聯合，組成「聯合政府」等等。

所有這一切，原則是堅定的，策略是靈活的，爲了一個目標——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領導人，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導演了一齣威武雄壯的歷史劇，繪畫出一幅幅色彩斑斕的畫卷，僅僅用了三年多一點時間，就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托派見此種種變化，眼花撩亂，驚慌失措，感到不可思議。他們沒有看到過革命是這樣搞的，從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不是這樣的。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也沒有這樣說過。他們認爲凡是歷史上沒有過的，馬、恩、列、托沒有說過的，中國都不應有。於是他們認定這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歇斯底里大發作，向共產黨射來一支支毒箭，干擾和破壞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

(一)對於國共談判：一九四五年八月，由於抗戰勝利迅速到來，出現了美蔣和中共都意想不到的局面：東北、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大片土地都將落入中共之手。於是他們就策劃了一個重慶談判。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想勸共產黨自己交出軍隊和解放區，以換

取國民黨政府中的幾個席位，同時為準備軍事剿共爭取時間。

從現在還未披露的當時有關檔案中看出：中共領導中有人自感當時無力與國民黨爭奪中國政權，準備學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的榜樣，接受國民黨提議，交出軍隊和解放區，參加國民黨政府，但為了爭取更多地保持解放區人民已經獲得的權利，也要與國民黨討價還價，爭鬥一番。所以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提出中共的條件。同時在軍事上也作了自己的準備，不打算無條件投降。

但是，托派認為抗戰結束時，「構成了革命前夜的局勢」，本來可以奪取全國政權，共產黨卻不去奪取，指責中共接受重慶談判是反映了「農民鬥爭的反動性」，是「中共領導政綱上的錯誤，維護莫斯科的利益和中共上層的地位。」^④

對於談判桌上的鬥爭及隨後為舊政協、國民大會問題的爭論，他們攻擊中共只看重政府改組、軍隊比例等問題，即只看成官職分配問題、槍桿問題、地盤問題，政協成了「分贓會」^⑤。然後，他們又搬出老藥方，以為先有一個「全權的真正民主產生的國民代表大會」，才能解決好這些問題^⑥。

說穿了，托派又夢想以他們的國民會議綱領來插手國共兩黨的鬥爭，干預國家根本問題的解決，甚至要把國共兩黨排擠掉，由他們托派來收拾殘局。鄭超麟寫的〈如何解決中國危機〉^⑦一文認為，現在

④ 中委會（多數派）〈關於內戰的決議〉，載《校內生活》第2卷第1期。托派內部暗語稱本組織為「學校」。故內部刊物稱《校內生活》、《校內公報》。

⑤ 三男：〈國大問題的症結何在〉，載《新旗》第5期。韻寬：〈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民大會〉，載《青年與婦女》第9期。陳人白（彭述之）：〈論國民會議〉，載《求真》第1卷第7期。

⑥ 同⑤。

⑦ 載《新旗》第10期，筆名舒嚴。

中國危機不是通常的危機，乃是革命的危機，「決不是國共兩黨或美國一國或美英蘇三國的事情」。根本解決危機的方法，就是停止召集國民黨的「國民大會」和共產黨的「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頒布新的選舉法，選舉「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總之，廣大群眾，尤其是大城市群眾，如果沒有興起，並直接干涉國家大政，則無論何種解決方案，都是行不通的或靠不住的。而現在喚起群眾的比較最適宜的手段，就是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誰代表「大城市群眾」？他說是他們托派；共產黨只代表農民。所以他號召中國民眾「起來反對一黨指定的，或數黨分配的國民大會，要求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

當時多數派的彭述之、陳碧蘭也紛紛發表文章，表示了同樣的觀點。

(二)對解放區軍民的自衛反擊戰爭：抗戰結束後，國民黨在與共產黨談判的同時，又在一些他們認為有利的地區，向解放區發動了幾次大規模的進攻，企圖搶奪勝利果實，逼迫共產黨在談判桌上就範。解放區軍民英勇自衛，堅決反擊，打退了他們的挑釁。毛澤東主席幾次發表談話和文章，指出自衛戰爭的正義性，譴責蔣介石挑動內戰。

但是托派卻在機關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攻擊中共的立場，尤其是彭述之為首的多數派。他們站在虛偽的中立與和平主義的立場上，不分挑釁與自衛，不辨正義與非正義、革命與反革命，各打五十大板，說什麼「站在人民的觀點和立場，無論內戰雙方怎樣自圓其說，……到頭來還是暴露了相互間的口是心非，形成了『上層觥籌交錯，下層血肉橫飛』的現局」；人民經過抗戰，「已苦不堪言，……但殘酷的現實還是驅使他們重遭戰禍！以前的犧牲是爲了民族獨立，現在當砲灰又爲的是什麼？」然後，他們就矛頭一轉，主要攻擊毛澤東的談話，說什麼「不要訴苦，不要控訴那一方先調兵，先遣將」；「內戰的責任，

絕不是何方先進兵，何方先發第一砲」；「戰爭只能加重人民的痛苦，加深矛盾的嚴重性。在歷史上從沒有靠單純的軍事行動，來改變社會結構的。」^⑧——裝出一副公允的面孔，為國民黨開脫罪責，把攻擊的「最大火力射向中共」^⑨，這是托派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國共鬥爭中的基本立場。

他們為了在國民黨統治下合法存在，刊物公開發行，表面上對國共雙方都攻擊，實際上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暗地裡甚至與國民黨勾結。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孫科非常讚賞彭述之辦的《求真》和《青年與婦女》雜誌。他常對屬下說，要向《求真》和《青年與婦女》學習辦雜誌的方法。他顯然認為國民黨的報紙反共太露骨，沒有欺騙性。他從南京到上海，一下飛機，第一句話，常是問《求真》出版了沒有，他要看。彭述之還以此為榮^⑩，這連少數派都感到恥辱^⑪。

(三)對於內戰和解放戰爭：政治談判沒有達到目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爆發了全面內戰。

對這場戰爭，托派兩派一概斥之為「美蘇之爭」，國共之間的「私鬥」和「混戰」。少數派進一步認為是「資產階級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鬥爭」，雖然中共一方是「進步的」，但「不是革命的」。所以這種戰爭是沒有出路的，將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滅中國。或者變成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第二」，或者變成蘇聯殖民地「波蘭第二」^⑫。

出路何在？少數派頭目、香港托派組織負責人李振聲宣稱：「最根

⑧ 元度：〈怎樣解決糾纏不清的內戰〉；青直：〈對症下藥，消除內戰〉，均載《青年與婦女》第3期。

⑨ 同⑧第282頁。

⑩ 葉春華：《中國托派組織的情況》。

⑪ 同⑧第282頁。

⑫ 劉默：〈怎樣解決內戰〉，載《新旗》第2期。

本是中共必須改變它的全部基本立場，必須丟開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放棄（與民族資產階級）階級合作的政策……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名義之下，進行深刻的社會革命。」^⑮鄭超麟不相信中共會「丟開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所以他提出更為「徹底」的辦法，由他們托派領導的城市工人運動，來瓦解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解放戰爭。他認為把無產階級革命寄託在中共身上，「那是可憐而錯誤的幻想」；使無產階級參加解放戰爭，「使進步戰爭變成革命戰爭，是幻想」。「只有在造成城市工人運動有利的客觀情形影響下，促使中共內部分化，下層左傾群眾推翻上層保守的官僚，發生內部革命。」為此，他宣稱：「我們的工作不在參加進步一邊的內戰，也不是跑『解放區』，而是留在城市做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工作。」並要求人們「寄希望於城市革命而不應寄希望於中共戰勝。」^⑯

多數派也唱這個調子，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誰也不會勝利，「不論在『解放區』或在非解放區的人民，誰都不願替這樣毫無出路的內戰來受犧牲，來受痛苦，來白流血了。」「中共雖然在『解放區』施行了某種改良，獲得了不少農民的擁護，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劉邦的時代了，再不能用鄉村來征服城市了，……要實現其改良理想，只能是幻想。」^⑰因此，他們主張國共雙方立即停戰，聽候托派提出的國民會議來裁決，「如果那一方面不願停戰或停戰期間重複進攻，……將由國民會議加以懲處。」^⑱他們的「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關於內戰的決議〉甚至號召解放區的托派毫不躊躇地參加農民鬥爭，藉以「揭破

^⑮ 振聲：〈內戰擴大以後〉，載《新旗》第7期。

^⑯ 鳳岡：〈內戰、革命與共產黨〉，載《新旗》第17期。鳳岡是鄭超麟筆名之一。

^⑰ 陳鷹：〈無條件停戰〉，載《青年與婦女》第9期。

^⑱ 鏡微：〈要怎樣才能制止內戰〉，載《青年與婦女》第4期。

中共的錯誤與叛賣」，「推翻中共的領導權」，「刺激城市的工人起來，使工人與農民合起來干涉歷史的行程。」

到底誰的理論和主張是「可憐而錯誤的幻想」，是對工農利益的「叛賣」，應該「推翻」，歷史早已作出了裁決，但在當時，托派還錚錚有詞，真是歷史的嘲弄。

四對於城市革命運動的興起：內戰爆發以後，共產黨在進行解放戰爭的同時，在城市裡開闢了第二條戰線，掀起了反內戰反獨裁民主運動的高潮。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海爆發了五萬人的反內戰、爭和平大示威，然後派代表到南京請願，遭國民黨鎮壓，發生下關慘案。十一、十二月，上海數千名攤販反對當局迫害，兩次舉行請願遊行，並與警察搏鬥，形成全市性反蔣群眾運動。十二月，北平又發生抗議美軍強姦中國女大學生暴行的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一九四七年五月，各大城市爆發了規模更大、時間更長的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的鬥爭。

托派對這些城市鬥爭，又大做文章，一方面攻擊共產黨，一方面直接進行干擾和破壞。

首先，他們認為這是他們企求的「沉寂了二十年」的城市群眾鬥爭的擡頭，是中國「真正的」革命運動的「復興」，證明了他們托派路線的「正確」，而過去城市鬥爭所以沉寂，除了統治階級壓迫太甚之外，是「共產黨路線錯誤所致」：「只看見『武裝鬥爭』一個方式或者『政治協商』方式（那也是以武裝力量為後盾的），看不見城市群眾鬥爭方式，不知道中國革命也……應當以城市廣大群眾鬥爭為主力的。」●

托派是十足的唯心主義者，他們的宣傳可以隨心所欲，完全不受客觀實際的檢驗。

● 舒嚴（鄭超麟）：〈「十一·卅」鬥爭的教訓〉，載《新旗》第13期。

衆所周知，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從被迫到自覺地逐步把工作重心移向農村，但從未放棄城市鬥爭。城鄉鬥爭是互相支援的。雖然由於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的城市鬥爭遭到失敗，組織破壞嚴重，但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以後，在劉少奇白區路線指引下，中共及外圍組織得到恢復和發展，城市鬥爭走上了正軌，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輸送了大批幹部、物資、武器和經費，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無數革命烈士，在這條戰線上，獻出了生命。所以，表面上看，中國民主革命以農村武裝鬥爭形式為主，實際是城鄉共同鬥爭的結晶。

解放戰爭時期的城市群眾鬥爭，完全是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即南系地下黨和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即北系地下黨領導的，是有計劃、有領導、自覺地進行的，絕不是自發的。

自吹二十多年來從未離開城市工人階級的托派，只是在機關報上罵罵共產黨和國民黨，吹吹國民會議，實際鬥爭一件也沒有做。現在，共產黨搞起來了，他們就來爭奪領導權，干擾和破壞運動。上海一九四六年六月五十三個團體的反內戰爭和平大示威，托派也參加了。他們在運動中提議由參加運動的群眾團體，依照人數比例，推選代表，組織一個超黨派的、統一的、集中而民主的機關，由它來領導一切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

很顯然，這是托派想把他們的「國民會議」主張，改頭換面，偷偷地塞給群眾，自然遭到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的抵制。

於是，托派哀嘆道：「我們這呼聲，可惜在占據領導地位的民主派中沒有得到響應。」接著，又挑撥說：「大城市中民衆的政治鬥爭是具有決定力量的。不要讓國民黨、馬歇爾或共產黨的態度來決定我們的態度，卻要用我們的鬥爭來決定前三者的態度。……第一步，必須加

強我們的組織，要產生出民主選舉的直接代表廣大群眾——尤其是勞工大眾的組織，要用直接行動，例如罷工、罷課、罷市，以及示威遊行的方法，來發揮我們的力量，表示我們對內戰的抗議。」^⑩

當時共產黨的方針是，城市鬥爭要服從和配合解放戰爭，托派這裡鼓吹的是用城市鬥爭來代替解放戰爭。

對於共產黨領導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托派更是竭盡破壞之能事。胡說這場運動是「小資產階級政客」領導的，最終走向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妥協分肥」。為此，他們向青年提出警告：千萬不要相信共產黨走革命捷徑，應該背向共產黨的聯合政府主張，「你們的中心政治口號，不是虛幻的『聯合政府』，而是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只有它才能帶來和平、大米、土地和自由。」^⑪

(五)對於共軍在戰爭中主動放棄一些城市的策略：內戰初起，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共軍執行毛澤東制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所以，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國民黨以重大代價換取了一百零五座城市，十一月又占領了解放區重鎮張家口。蔣介石當即宣布要召開「國大」，制訂「憲法」。

托派一方面在國民大會上大做文章，一方面對中共所謂「失敗」幸災樂禍，為美蔣辯護。多數派中央委員劉乃光發表〈從張家口陷落看中共〉的文章^⑫，說張家口的失敗是由於中共土地改良政策不徹底的弱點導致了軍事行動致命的失敗；只有這樣檢視，「然後才能明白人們將一切失敗責任全部推在美國援助國民黨政府這一點上是否正確。」

⑩ 振聲：〈再論內戰擴大以後〉，載《新旗》第9期。

⑪ 紀芬：〈目前學生運動的意義和出路〉，載《青年與婦女》第2卷第3期。

⑫ 載《青年與婦女》第8期。

多數派的另一篇文章認為，共方在逐步地失去了其原來所占領及其所控制的城市和交通線之後，國共的軍事和政治地位都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特別是張家口陷落，是一個「劃時期的標界」：「蔣介石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都占極大優勢和完全主動的地位。」^①

這與毛澤東的觀察完全相反。事實上，共軍由於丟掉了包袱，軍事上可以機動更多兵力，打大規模的運動戰，更加靈活機動地大量消滅敵人。政治上，蔣介石堅持內戰獨裁，陷於更加孤立的境地，在他召開「國民大會」時，「民盟」等中間勢力站在中共一起，進行抵制。

托派還有一篇文章，更加荒唐地認為，失去東北、華北重鎮之後，中共「大大降低了它在政治上的地位，而且深刻地動搖了它的內部基礎」；它的黨員群眾和軍隊「喪失了信心和鬥志」；廣大農民群眾「對它逐漸發生反感，乃至怨恨。——這情形如果繼續下去，也勢必釀成各種各式的分化和倒戈，走到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②

請看，他們為解放戰爭第一年粉碎國民黨全面進攻的勝利，描繪了一幅多麼可怕的圖景。

一九四七年三月，放棄延安，是共產黨為粉碎國民黨重點進攻，開始走向全國勝利的重大步驟。毛澤東以政治家軍事家的雄才大略，親自指揮了延安戰役，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托派兩派都認為這是共產黨軍事上「慘重失敗」，是「孤注一擲的軍事冒險」的結果。

更可笑的是，他們又在延安「失守」上大做起文章來，檢討中共的政治。他們認為這在軍事意義上不大的話，在政治上和革命政策意義上，卻頗為重大，是中共「一貫錯誤政治路線的必然結果」，於是又把中共歷史上所謂錯誤數落一番，最後斷言：沒有城市工人鬥爭，限

① 鶴皋：〈國共和談決裂以後〉，載《求真》第8期。

② 鶴皋：〈「國大」後的政局展望〉，載《求真》第9期。

制了中共在內戰中的規模和力量；只自限於農民游擊戰爭，不能占領與保持城市據點，不能對國民黨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能不縮小其區域，如果延長下去，最多能保持與蘇、蒙直接相連的地方^②。

托派分子是一群「巫婆」式的人物，儘管他們的預言一百次一千次地錯誤，還要預言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

(六)對於共產黨土地政策的轉變：抗戰時期，共產黨由土地革命政策變為「減租減息」政策，托派以此為重要證據，罵共產黨向國民黨「屈服」、「投降」，罵了八年。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鑒於在解放區農村清算反動地主和減租過程中，農民進一步提出了分配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決定把「雙減」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翌年十月十日，解放戰爭達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由戰略防禦變為全面的戰略進攻，共產黨發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革命形勢的猛烈發展，要求進一步深入地和普遍地實行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充分滿足農民土地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徹底發動廣大農民群眾，積極支援革命戰爭。於是中共中央在同日發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布「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出的土地制度。」同時，鑒於革命的民主性質，保護鄉村的資本主義成分，不觸動富農的工商業。由於不是沒收土地歸國有，所以也不阻止農民土地買賣、租借和抵押。

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共產黨土地政策的及時轉變，表明了中共的成熟，得到了廣大農民熱烈的擁護，很快在農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群眾運動。翻了身

② 劉默：〈延安失守以後〉，載《新旗》第15期。

的農民群眾，生產熱情空前高漲，革命覺悟也隨之提高，出現了參軍參戰支援革命戰爭的熱潮。連中間派人士也對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的轉變，給予很高的評價。民主建國會的施復亮說：這次「土地改革，其力量將勝過『百萬雄師』，有可能使中共在內戰中處於不敗的地位。」

⑭

但是托派又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們攻擊「中共的土地政策，不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立場出發，因而不但是不徹底的，而且常常是動搖的，忽左忽右的，……只是藉以做爲與大資產階級謀取『合作』時討價還價的籌碼」，「沒收舊地主的土地同時，又承認新地主的所有權。」「根據『江西時代』後的歷史經驗，……這次的『土地法大綱』也就很有可能變成未來謀取『合作』的犧牲。」^⑮少數派甚至號召托派分子起來，「努力揭穿中共『新轉變』……是中共對莫斯科外交攻勢的一個適應，所以它是虛偽的、易變的、不足恃的」；「暴露中共土地法令的實質上的袒護富農性；堅決站在貧僱農的立場，反對土地之自由買賣、抵押、租借」云云^⑯。

(七)對於共產黨的城市工商業政策：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布二十三條口號，表明了共產黨在奪取全國勝利時的政策，其中關於城市工商業政策，強調公私兼顧、尊師愛徒、保護公私企業、遵守勞動紀律、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等。這是出於革命還是民主主義性質、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而制訂的政策，同時對於在社會大變動的情況下，防止生產力的大破壞和維持人民的正常生活，具有重大的意義。有利於國計民生，大得民心，也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

⑭ 〈評中共的土地法大綱〉，載《時代評論》第5卷第98期。

⑮ 鏡微：〈評中共對土地政策的轉變〉，載《新聲》第2卷第11期。

⑯ 鳳岡：〈論斯大林主義的新轉向〉，載《新旗》第18期。

可是又遭到托派一系列的抨擊。

鄭超麟發表〈中共軍事勝利與中國工人階級〉一文^①，胡說在這樣的綱領之下，「中國工人只有犧牲，同舊政府下一般的犧牲」，沒有提「工人管理或監督生產之權」，沒有提「依照生活指數發給工資制」；一切爲了生產，不承認「工人罷工權利」，……「結果只爲了建立『新民主主義』，即建立一個生產第一、勞資『兩利』、尊師愛徒的制度，那麼無產階級就不是領導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而是在民主革命中替資產階級當苦力罷了。」

(八)對於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之前，共軍戰略進攻節節勝利，消滅了敵人一百五十二萬餘人，解放了石家莊、洛陽、四平街等一百六十四座城市；人民群眾中產生了一個普遍的認識，認爲中共將取代國民黨而奪取全國政權。

可是，托派卻起來批判這個看法。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多數派的中央黨委開會討論政治形勢，彭述之和劉家良針對上述看法指出，「我們還不要忘記，國民黨是有美援支持的，中共要想在軍事上完全摧毀國民黨是絕對不可能的。」在政治上，他們認爲共產黨雖有武裝力量，但在國民黨之區域內，還沒有很大的影響，在城市無產階級中，也沒有基礎。因此，中共代替國民黨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更沒有可能奪取政權」，最多像俄國二月革命後的「社會革命黨」，最後自願隸屬於資產階級，反過來反對無產階級^②。他們在此時還顛倒黑白，把中共的優點說成是「弱點」，妄斷共產黨「真正的弱點」在於占據了農村，它的武裝力量建立在「落後的農村經濟基礎之上。但在現

① 載《新旗》第19期，筆名舒嚴。

② 《校內公報》第8期，油印小冊子。

代社會經濟的條件下，農村是依附於城市的，無論在經濟、政治、交通及軍事上，城市都是中心，都足以左右農村。所以誰占有重要的城市，誰就是全國的主人；希圖根據農村來奪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了。」^②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底和四九年初，共軍取得三大戰役勝利，百萬雄師飲馬長江，奪取了濟南、長春、瀋陽、天津、北京、徐州、鄭州、開封等北方所有的大城市之後，托派又怎樣說呢？

他們不得不承認共產黨軍事上的勝利，並將奪取全國政權，但又胡說中共勝利主要原因是「對方的過分腐敗無能，與蘇聯強有力的軍事援助。」同時，在政治上，他們又進一步攻擊共產黨「大大地倒退而陷進了一個最危險的泥潭中了」；中共「保障工商業財產的政策，在城市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之間，將遭到不可救藥的破產，……引起工人階級的反抗。」同時，中共勝利「只能促進和加速美帝反蘇戰爭的爆發，把中國拖到第三次大戰的浩劫中去！……中國人民將有幾千萬被犧牲。」因此，他們煽動中國工人和一切被壓迫民衆起來，「要求國共立刻停止戰爭」^③。

當時，「停戰」意味著什麼呢？就是要阻止解放軍渡江作戰。當時有這個要求的首先是美蔣一方，以「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④蔣介石爲此在一九四九年元旦，親自出面搞了一個「和平攻勢」，要求與中共和平談判。

毛澤東主席寫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檄文，粉碎了美蔣的「和

② 〈關於中共能否取得政權的討論（編者答讀者周永新的信）〉，載《新聲》第2卷第2期。

③ 旭東：〈中國往那裡走〉，載《新聲》第3卷第7期。

④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80頁。

平攻勢」。同時，根據新形勢，中共又採取一系列新政策。當時，隨著共軍勝利的擴大，許多地主、資本家和國民黨的軍政人員，看到大勢所趨，紛紛中立或倒戈；而新解放區群眾組織起來要有一個過程，還考慮到支援戰爭的「合理負擔」，讓地主富農負擔大部分公糧，讓貧僱農在戰爭勝利中得到實惠。所以，共軍在攻下濟南、石家莊等大城市後，中共中央急電各地，在新區暫不實行土改，運用抗戰時期的經驗，重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不分掉地主、富農的土地和浮財等。

托派對此，又紛紛發表宣言，攻擊中共，破壞共軍進軍江南。

少數派發表所謂〈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告民衆書〉（油印傳單），攻擊中共不要階級鬥爭，而實行「勞資兩利」；不要工農政府，而要與資產階級進步分子合作的「聯合政府」；不要土地革命，而保護地主與富農的土地……。這種「妥協政策，將使我們貧農以數百萬顆頭顱換來的軍事勝利，付諸流水，……不能解救我們的貧窮困苦」。爲此，他們挑撥工人、貧農、兵士與一切勞苦大眾們，「反對中共的領導路線，獨立組織起來、獨立思考問題、獨立決定攻策、獨立發揮自己的力量」，趕快衝破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多數派發表所謂《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支部）時局宣言》（油印小冊子），自作多情地哀嘆城市工人階級，沒有像托派想像的那樣起來干涉解放戰爭，說是中共的「反動政策才造成城市工人今天對農民軍事勝利的冷漠、迷惑、懷疑和癱瘓的態度！『解放軍』占領城市（從濟南到天津）從沒有喚起過城市工人的熱烈響應。這一刺目的事實與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以三次暴動來迎接北伐軍的熱烈態度，形成可悲的對照！」

其實，他們那裡知道，中共中央考慮到敵我力量對比，解放軍已經有力量解放城市和減少城市革命力量不必要的犧牲，指示不必搞大

革命時的武裝起義來配合城市解放，而只要搞策反、護廠、護店、護校等保護其他重要設施、繼續生產、交通情報工作等^⑩。這本來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但對於教條頑症患者的托派來說，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節 「對中共實行失敗主義」

托派對中共的路線和政策，由不理解而猛烈攻擊，又由攻擊而發展到破壞。他們在上述發表的宣言中就指示各地的托派分子積極活動，向工人群眾進行挑撥，宣稱：「農民的武裝已落入一雙妥協派手裡，……勢必被利用來進攻工人的工具。工人階級不能幻想別人來解放自己，必須及時團結起來，……走向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鬥爭，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喚起農民對城市工人階級的信任，……才能把貧農從資產階級及其奴僕——妥協派方面拉開。」此宣言還要求托派，「向貧農和解放軍的下層農民武裝同志、向中共一切下層農民黨員群眾提出熱切勸告，……資產階級不願意滿足你們的土地及其他民主要求，……」只有托派才是你們「真正可靠的同盟者。立即背向資產階級，轉向工人。」

國民黨的軍隊從正面擋不住共軍的進攻了，托派就在後面竭盡挑撥之能事，不僅要把工人階級從共產黨方面拉開，還要把農民和「農民武裝同志」解放軍從共產黨方面拉開，完全與國民黨前呼後應，密切配合。他們甚至明目張膽地誣蔑人民「歡迎解放軍」、「站在共軍方面作戰」的口號，「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發狂的、不負責任的思想。」^⑪

⑩ 上海中央局給上海黨的指示：〈解放軍渡江和我們的工作〉，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四年第3輯。

⑪ 耀如（即劉家良）：《現局勢的分析和我們宣傳鼓動的幾個口號》，油印小冊子。

非洲諺語說得好，「狗在狂吠，駱駝大隊在穩步前進」。托派的上述一系列攻擊和叫囂，絲毫也擋不住歷史前進的步伐。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踢開一切絆腳石，走向全國勝利。托派驚慌失措，竟然可笑地要向共產黨解放軍實行「失敗主義」政策。

他們宣稱，由於中共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和保護富農的政策，渡江後的解放戰爭已經「變質」，「由領導農民轉變為拋棄農民，轉變為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共產黨已由「農民黨」變為「資產階級黨」；「軍隊則由農民軍變成資產階級僱傭軍。現在內戰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個農民運動，而是另一個資產階級集團的戰爭，內戰由一個歷史性的進步戰爭，變成資產階級的爭奪戰。它在客觀上的進步性消失了，成爲一個反動的戰爭。由於內戰性質的轉變，我們的態度也轉變，不再保護內戰，應採取失敗主義的態度。不過應該注意在中共方面實行失敗主義，並不是促使國民黨勝利。」^①

當時國共鬥爭你死我活，決定著中國的全部政治。托派既然供認不諱「在中共方面實行失敗主義」，必然「促使國民黨勝利」，這又何須辯解呢？說什麼「不再保護」，他們又何時保護過「解放戰爭」呢？明明自己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卻硬說解放戰爭「成爲一個反動的戰爭」。托派的立場一貫是「反動的」，又何談「轉變」呢？所有這些都暴露了他們自身思想邏輯的混亂。

至此，中國托派就由原來反共反國的極「左」派小集團，變成只有反共一面性的反革命組織了。可是他們還自稱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抗戰時期及解放戰爭時期，托派地方組織中活動最活躍的是溫州

① 〈內戰問題的總結〉，載《叛逆者》第1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該刊是上海解放後「多數派」潛伏組織的地下反共油印刊物。

托派支部。

一九三七年秋，上海托派臨委派賀希到溫州，把曾猛為首的托派小集團和李國棟為首的托派小集團合併成立了中國托派溫州支部，產生第一屆幹事會：曾猛（書記）、朱鈴（組織）、何樹芬（宣傳）、李國棟（駐上海代表）、何止錚、黃禹石（秘書）。一九三九年，在曾猛家開「代表會」，產生第二屆幹事會：曾猛（書記兼組織）、陳式家（宣傳）、李國棟（駐上海代表）、何止錚、錢川、王國龍、葉學濂，候補幹事何樹芬、朱鈴。後來，曾猛到武漢國民黨軍官學校當政治教官，李國棟、錢川先後任書記①。

溫州托派分子的人數，曾發展到三十三人，出版機關報《工農兵》。抗戰時，中國共產黨在鞏固平陽山區革命根據地同時，在溫州城區蔣管區內成立了「戰地青年服務團」，還在溫州所屬各地建立了它的分支機構，作為教育、動員各階層青年參加抗日運動的公開合法的群眾性組織。國民黨害怕共產黨勢力的發展，早想要解散它，因懾於它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不得手。王國龍等托派分子就混入這個組織，提出過左的口號，鼓吹階級鬥爭，在內部進行搗亂、破壞和分裂活動，造成了組織混亂，人心渙散，使國民黨有可乘之機，終於把它解散了②。

溫州針織業工會也是被托派操縱的黃色工會。工會頭目葉學濂在錢川、王國龍的指使下，不顧團結抗戰的大局，認為共產黨調整國內階級矛盾，向資方爭取適當地改善生活待遇，發展生產，支援前線的政策是「不代表工人利益」、「站在資方一邊」的「機會主義」，多次帶領女工向資方提出過高的工資要求，不得滿足時，就組織罷工③，造

① 周仁生：《浙江托派情況》（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未刊稿。

② 葉春華：〈關於中國托派組織的情況〉。

③ 同②。

成很壞影響。

抗戰勝利後，溫州托派組織完全與國民黨反動派同流合污。李國棟任國民黨縣黨部秘書長，掌握實權，並且操縱了溫州參議會，使托派分子黃禹石、謝循歡、朱鈞都當上了參議員。屬溫州地區的瑞安縣，托派分子何止錚、何樹芬也當了參議員。另外他們還打入軍隊，托派分子周肇同手下有一團的兵力。溫州解放時，王國龍曾根據「多數派」新成立的「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的指示，妄圖策動武裝應變的陰謀，因共軍進軍神速，未遂。在工會中，由於葉學濂破壞抗戰「有功」，得到了國民黨的賞識。國民黨浙江省省黨部一個負責社會工作部的委員到溫州視察時，公開宣稱：「溫州針織業工會是浙江省所有工會中最健全的工會。」從此，葉學濂更是身價百倍，升任為溫州黃色工會的理事長。一九四八年溫州國民黨官員競選「國大代表」時，都拉葉的支持票。在輿論界，溫州有《地方新聞》報，社長是國民黨地方惡霸吳秋江，實權則掌握在主筆王國龍手中，編輯人員幾乎清一色的托派分子，所以該報大量刊登反共文章。

就這樣，解放戰爭時期的溫州，幾乎成了國民黨與托派聯合統治的世界。托派在青年學生中大肆活動。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前後，「多數派」中央曾指示溫州托派抵制中共領導的「六二」學生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運動。後來，在上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隸屬於「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臨委會委員周仁生和「革共」中央組織委員錢川的指導下，在省立溫州中學的兩個讀書會和青夢讀書會的基礎上，成立了「溫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在甌海中學、永嘉中學、溫州師範學校、瑞安中學等，都建立了支部。

「少數派」托派也在溫州建立了「溫州地方委員會」的機構，並成立了約三十人的「馬克思主義青年團」支部。

兩派托派都還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外圍讀書會團體，在引導青年走上邪路方面，起了國民黨三青團起不到的作用^③。許多青年深受其害。

第三節 蔣經國庇護托派

托派對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勝利的一切攻擊和破壞，最後集中到一點：建立一個所謂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來代替被他們攻擊為已經「墮落」成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

儘快地從「宣傳小團體」的圈子中走出來，建立一個有強大力量、能左右全國政局的政黨，這是一九三三年托洛茨基宣布第三國際死亡，決定建立獨立的托派國際後，要求各國托派支部的，也是中國托派十幾年來夢寐以求的。可是一直是個夢，好長的夢啊！

儘管如此，他們在宣傳上卻一直以「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自居。處理成員，也叫「開除黨籍」。鏡花水月，自我欣賞，自然別人無需干涉。但在紛紜複雜的中國政治中，他們渴望插手卻又一點也不能施加影響，畢竟是一個事實。造成這種情況，除了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根本原因之外，組織上力量太小，又一直處於分裂狀態。

抗戰勝利以後，兩派繼續就以下幾個問題無休止地爭吵、辱罵：
1. 社會性質問題，彭述之認為中國是「落後的資本主義」，鄭超麟認為中國是「落後的壟斷的資本主義」。2. 革命性質問題，彭述之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但一開始有一個民主運動階段，猶如一個煙蒂接在一支新香煙上抽一樣。鄭超麟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但一開始民主任務與社會主義任務就糾纏在一起進行，分不清哪是民主任務，哪是社會

^③ 葉春華：〈關於中國托派組織的情況〉；周仁生：〈浙江托派情況〉，均未刊稿。

主義任務。3.對陳獨秀的評價，彭述之認為陳以「可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而告終，鄭超麟和王文元雖不同意陳晚年的思想，仍認其是「同志」，若天假以年，他會重操托派事業的。4.組織原則，雙方都以「民主集中制」攻擊對方，彭述之強調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派意見可在內部討論，不得在機關報上發表；鄭超麟認為行動上可服從，但少數派意見應該在機關報上發表，讓群眾了解和選擇。於是彭述之罵少數派是「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鄭超麟則回敬他們是「斯大林官僚專制主義」。

就這樣，兩派始終沒有統一起來，都以「第四國際中國支部」自稱。它們又都有各自的機關報和宣傳陣地。多數派有內部油印機關報《校內公報》，少數派有相應的刊物《建立》，兩派之間上述內容的爭論和攻擊，在這兩個刊物上進行。對外部國共兩黨的評論，尤其是對共產黨的攻擊，則在十六開大型的公開鉛印刊物上發出。多數派有彭述之主編的政治理論月刊《求真》，陳碧蘭及其女兒陳秋燕主編的機關報《青年與婦女》，後來改名為《新聲》。少數派由鄭超麟、王文元主編的《新旗》半月刊。

他們辦這些刊物以及其他活動的經費，都有各自獨立的來源：多數派經費主要來源是幾個資本家：夏杏芳、李華卿、嚴燕賓等。夏杏芳是上海金源錢莊的老板，給了他們一筆捐款幾十兩黃金。彭述之在這個錢莊任顧問，每月領取高級職員的薪金。錢莊經理的寫字間，是多數派中央的「辦公室」，在江灣的錢莊倉庫，則是多數派集會的場所。李華卿與國民黨特務機關有聯繫，他不僅經濟上資助彭述之派，還為他們找政治靠山。他們的兩個公開發行的機關報的出版執照，就是李給代辦的。嚴燕賓開了一家規模不小的煙紙店^①。

① 喻守一：〈九一八後托派組織概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未刊稿。

少數派的經費來源，一是張德澤律師資本家的遺產及親友送給家屬的治喪費，一是美國托派社會主義工人黨給的一筆贈款，還有資本家「顏料大王」吳興齋的資助。吳在抗戰前及抗戰中經售德國顏料發了財。鄭超麟和王文元的生活，主要依靠譯著。王雲五主持的商務印書館一直收買他們的稿子。王文元還為文華影片公司寫劇本及翻譯從中文到英文的廣告。鄭超麟則任中華書局的編輯^⑩。

第四國際一直指示兩派儘快統一，然後建立正式的中國托派政黨。但是不斷分裂是一切托派組織的頑症，連第四國際本身也是如此，又怎能說服中國托派統一呢？托洛茨基建立國際時，曾預言會有千百萬群眾加入，但他卻連身邊的同志都團結不了。那些和他一道發起托派運動的人，沒有一個成為他的事業的繼承者，而很快就分裂出去。美國托派分子沙赫特曼在主持第四國際成立大會後幾個月，就與托洛茨基發生爭吵，便同一些志同道合者組織了一個與國際對立的小組。站在沙赫特曼一邊的有美國托派分子伯恩漢和詹姆士。這兩個人過去常和托洛茨基接觸，一度曾是他的熱烈的崇拜者。與托洛茨基最親近的人又先後離去的，還有荷蘭人范海爾諾特、西班牙的安德列斯、法國的納維爾、美國的麥克斯·伊斯特曼等等。他們都曾是各國托派的頭目。托洛茨基的私人秘書皮·弗朗克也一度離開他，一九三五年托洛茨基指責他搞中派活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才又回到「托洛茨基主義的懷抱」。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四國際」有兩個中心——一個在美國，是戰爭前夕遷到那裡的「巴黎書記處」，由托洛茨基親自指導。托氏當時千方百計要把陳獨秀弄到美國去參加第四國際的工作，就是指這個。

⑩ 同⑨。

另一個在歐洲，是戰時在法國召開的歐洲「支部」代表會議上選舉產生的。一九四六年春，美國的「國際書記處」與歐洲的「第四國際書記處」聯合召開「國際代表會議」討論了托派的組織鞏固問題。會議代表來自「第四國際」二十個支部，選出了新的「執行委員會」和「國際書記處」；會議號召各國托派為召開「國際代表大會」進行準備，以爭取在大會上制訂出「把宣傳小組變成與群眾鬥爭相結合的政黨」的綱領。為此，新的國際領導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在「忠於托洛茨基思想」的口號下，把戰後的托派聯合起來。

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間，第四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終於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十九個國家托派組織的代表。大會的任務是「為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而鬥爭」，批判戰時和戰後出現的各種離心傾向，「肯定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立場」。大會再次向各國托派發出了建立「群眾性政黨」的號召。

中國兩個托派組織曾為建立一個統一的托派政黨而多次努力，但一直不成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少數派首先發表〈為建立第四國際中國新黨告全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書〉，回顧了中國托派產生和分裂的經過，提議在總結三個問題爭論的基礎上，進行中國托派統一和新黨的組織工作。這三個問題是：

- (一)關於帝國主義戰中中國抗日戰爭的性質；
- (二)關於抗戰中托派的根本態度；
- (三)關於未來中國革命的性質。

他們希望：「只是那三個問題的爭論結果，或事變關於它們所給我

們的教訓，必須寫進團聚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政綱中，否則將變成無原則的團體了。」具體辦法，他們提議在一二個月內召開全國托派代表會議，「磋商有關組織新黨的一切政治的與組織的問題」^①。

一年之後，即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多數派才在他們發的〈告同志書〉中作出反應，聲稱：「假如他們真是有悟於過去擅自分裂的錯誤，誠心誠意來與我們謀取統一，來努力建立新黨，我們是表示歡迎。但從他們所表現的那種極端的虛偽和謊言看來，連起碼的普通人的誠實當屬缺乏，怎能談得上同我們革命者『統一與合作』呢？」又說：「最後，我們重復聲明：雖然少數派過去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犯了那樣極端嚴重的錯誤，我們對於他們的門還是敞開的；只要他們停止說謊，誠實地提出政治意見來和我們討論，坦白地承認民主集中制，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紀律，他們隨時可以回到組織內來。」

這個答覆以及他們向少數派表示的口頭意見，明確要求少數派先承認錯誤，然後談判統一。

少數派的態度相反，主張先討論「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在分清「原則分歧」是非並且錯誤的一方改正錯誤的基礎上，進行統一。為此，他們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發表〈為建立新黨再告全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書〉及六月二十二日〈再致鬥爭派中央委員會的信〉^②，向多數派提出了五條建議：

(一)雙方立即宣布第四國際中國支部兩派有重新統一之必要。

(二)雙方領導機關進行談判統一，以對等代表成立一個「協議委員會」，負責起草一個簡單政治綱領，在起草中討論一切理論上

① 《建立》第1期。

② 同①第2期。

和政治上分歧問題。

(三)「協議委員會」同時負責籌備「統一大會」。雙方依照人數比例推舉代表參加大會。

(四)大會通過「協議委員會」起草的綱領及其他議決案，其中應有一個議決案，明白規定：無論那一派都須遵守大會決議，成爲少數的須服從多數決議而行動，同時成爲多數的須尊重少數有表示其自己意見並替自己意見辯護的權利，連公開刊物開爭論欄登載少數派文章之權利在內。

(五)統一大會選出新的領導機關後，雙方領導機關立即解散，雙方刊物立即停刊，而出版共同的機關報，雙方支部及其他組織立即合併。

對此，多數派中常委在七月十四日作出了關於「統一」問題的決議；十六日寫了給少數派答覆的信，明白宣布拒絕上述五條建議，認爲「根本無考慮之餘地」，並向少數派提出三條反建議作爲談判統一的「前提條件」，要求少數派改變「偽造和歪曲作風」，承認多數派「代表中共同盟的組織傳統」，承擔過去分裂的責任，並最後通牒說：「你們如拒絕我們所提出的關於統一的前提條件，那你們以後可不必再向我們要什麼統一。」

就這樣，中國托派統一的希望，再次也是最後一次成爲泡影。但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發展迅猛，建立托派政黨刻不容緩，於是兩派就決心各自分別建黨，並爲此而使出全部招術，大力發展成員，而這時也出現了較好的發展條件。

抗戰勝利後，托派只反共、不反國、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的面目逐漸暴露，再加上一些在國民黨上層機構中任職的原托派分子的作用，

他們的組織和活動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當局精心庇護。

在上海，除了那些有政治背景的資本家爲他們說項外，還受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原「我們的話派」的大頭目張特的「關照」。彭述之曾大言不慚地對喻守一說，在張特的保護下，他只要用一個假名「陳堯伯」，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活動了；國民黨特務是不會找他麻煩的^④。

抗戰中及戰後初期，是蔣經國開始崛起的時期。一九三九年，蔣經國到江西，任贛南地區（五個縣）的行政督察專員，以「良心政治」，大搞變革，打擊豪紳勢力，提出「新贛南三年建設計劃」，用蘇聯學得的辦法，搞「教育建設」、「社會革新」，發展經濟，訓練幹部，達到「五有」目標：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書讀。爲此，蔣經國大量利用留蘇時的同學。從前述所謂「江浙同鄉會」的事件中，就可以看到，蔣經國是一個很重友情、講義氣、善交際的人。於是許多脫離托派組織的人，紛紛前來投靠幫助蔣經國推行這些變革。例如：

曾任上海托派滬東區委書記及中央臨委委員的高恆，一九三六年先到廣西投靠桂系軍閥，一九三九年轉到蔣經國門下，改名高理文，在蔣經國的第四專員公署當秘書，地位之高，被捧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⑤。一九四三年，他受蔣之託，任《正氣日報》總經理兼主筆，與另兩個投靠蔣經國的原托派分子吳季嚴、彭桂秋主持的「正氣出版社」聯在一起，把贛南的主要文化機關控制在本派手中。

當時的贛南是蔣經國崛起的搖籃。雖然改革未取得多大成就，並最後失敗，但他卻因此聲名鵲起，被捧爲「蔣青天」，成爲青年偶像。他在這裡爲自己培植了一大批心腹和親信。高恆是他智囊團中的知囊。

^④ 喻守一，〈九一八後托派組織概況〉。

^⑤ 同^④。

一九四五年，蔣經國任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青年軍編練總監政治部主任；抗戰勝利後，又被任命為東北外交特派員，赴關外接收東北，與共產黨爭奪勝利果實。高恆和吳季嚴也隨之前往，左右策劃，曾打算在東北出版《正氣日報》為蔣經國喉舌，未成。東北失敗，他倆又隨蔣到上海。高恆任中央信託局顧問，吳季嚴到趙君邁手下漁業管理處任高級職員。

一九四八年，蔣介石為挽救危局，派兒子蔣經國在上海整頓金融，發行金圓券，打擊投機倒把和屯積居奇，平抑物價，刮起了十二級颱風。高恆是他的得力幹將。當時已當上「國大代表」的嚴靈峰，也參加進來，助蔣經國一臂之力。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大陸上徹底垮臺前夕，高恆和嚴靈峰舉家隨蔣去臺灣^④。

這些脫托分子，多數頗有才幹，蔣經國不嫌他們過去曾反對國民黨而拒之，仍加以重用，表現了非凡的膽識。但另一方面，這些脫托分子們保持著反共的一面，也是重要原因。自然，蔣經國此舉為他個人創造光輝的前程受益匪淺。

同一時期，又有兩個原托派骨幹分子前來投奔蔣經國。黃鑑銅是在抗戰爆發前在廣西南寧鄉村師範讀書時受影響加入托派的。抗戰初期被國民黨逮捕，釋放後就到贛南投奔蔣經國的心腹高恆，為蔣辦《贛州日報》效勞，任資料保管員、校對、編輯，加入了國民黨。勝利後，他隨著到東北長春，然後到上海。到上海後，他一方面繼續與高恆保持聯繫，由高為他安排工作，一方面與鄭超麟派托派中央接上關係，參加該派「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的籌建工作，並當選為團中央委員。他還把李培拉了進來^⑤。李培與他一起在廣西加入托派的，後來被捕

④ 同③。

⑤ 同④。

釋放，投奔廣西軍閥，做了上校軍官，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裡耽了一段時間，與保安副司令許鐘伍關係密切；然後到溫州，用他自己的話說，與溫州城防司令黃權（浙江省主席黃紹雄之侄）的關係「猶如父子」。他還是國民黨特別黨部的成員。在這樣的崗位上，他一方面保護當地的托派組織，一方面積極反共，曾親手散發蔣介石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九四七年他輾轉來到上海，參加鄭超麟派的托派活動，後來又參與籌建「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同時又向國民黨軍事機關領取相當高的退役金^①。

由於以上種種關係和原因，再加上國民黨警特機關已經完全看清托派主要反共的性質，非但不再予以鎮壓，還要加以利用，因此，中國托派獲得了相當自由的活動餘地。他們乘此機會大大活躍起來，除了公開出版刊物以外，重新整頓了上海、香港等大城市的組織。「少數派」在上海正式成立「工作委員會」，由范文華、梁誼、梁啓穗、陳甚、李培等人組成。一九四八年五月，工委會結束，另成立「上海地方委員會」。「多數派」在香港先後成立了「香港特委」、「香港市委」和「港九特委會」，後來還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地方常委會」。

爲了吸引青年，培養他們的幹部，彭述之開辦了「幹部學習班」，召開「星期討論會」，據陳碧蘭說，出席者常常超過百人。這種活動持續了兩年半，彭述之擔任這些學習班和討論會的講師^②。

由於這樣，托派組織發展較快，特別是彭述之、劉家良爲首的多數派。一九四七年七月，他們的人數已經發展到二、三百人。在上海幾個大學中建立了支部，另外還有五個青年團支部。南京、杭州也建

① 同^①。

② 陳碧蘭：〈彭述之的思想與他在中國共產黨及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活動〉。

立了組織。浙江溫州地區建立了地委。廣州也有好幾個支部，並深入到幾個大學中活動。桂林、南寧都有組織。香港由於劉家良、彭述之親自去抓工作，托派力量最大，而且多數在工人中。他們召開了一次香港托派幹部會議，通過一項組織決議，要在太沽等造船、印刷、電力、汽車、燒焊業七個單位中，每個單位建立一個區委，每區包括三個支部；在內衣、織造、中華書店、水泥、大中學校等七個單位中，每單位至少建立一個三人以上的支部。——這樣，到一九四八年底，香港托派可達二百人^⑬，恢復了機關報，改名「星火」。另外，四川的托派組織也有相當的發展，復刊了機關報「電光」。

第四節 建立「中國革命共產黨」與「國際主義工人黨」

根據以上情況，多數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召開了「上海黨團幹部會議」，彭述之任主席講話後，作出了〈怎樣推動建黨工作的決議〉。決議規定年內開「全黨大會」，提出了到年底「三倍發展」的口號，每個人必須發展二人，開大會時發展到六、七百人。一九四八年發展到二、三千人，一九四九年一萬人^⑭。

當時彭述之曾揚言，如果發展到五百名，他就把組織公開出來，參加國民黨國大代表的競選^⑮。

爲了達到以上目標，決議號召每個人「十倍的努力」，「集中全部

⑬ 〈上海黨團幹部會議錄（主席犀照的講話）〉及〈怎樣推動建黨工作的決議〉，載《校內公報》第4期。

⑭ 《校內公報》第4期。

⑮ 同⑭。

神經纖維努力發展群眾關係，從秘密地下工作轉向爭取公開的工作，徹底改變過去宣傳小團體時代的作風。」特別要到工人中去，同時到學生中尋找革命分子，推動他們去接近工農大眾。

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國共雙方的戰爭將會拖好幾年，這樣，「就有一年、二年甚至三年可供我們好好準備」，準備一個新的「政綱」，「準備在工人、學生及其他重要城市中建立群眾基礎」，建立起一個托派黨，在國共雙方「無出路的狀態下」，火中取栗，由他們出來發揮「重要的作用」^②。他們以為只要今後一二年內建立起一個「黨」，「影響和控制工人運動，便可進而影響學生，在徹底的民主政綱下，可能影響農民。」^③因此，他們把全部賭注下在「建黨」上面。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由於共軍勝利進軍，形勢急轉直下，他們不等爭取到預期的人數，就在中常會會議上，作出了籌備建黨大會的決議：(一)大會經費十兩黃金，從四月份起，四個月內按月強迫徵募大會基金特別捐，根據劉家良主持的中央組織委員會提出的辦法，按黨員的經濟收入大小，分自由捐、徵月收入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三種，並向同情者募捐。(二)黨和團的大會分別召開，十人選一名代表。(三)大會日期在文件討論三個月以後。(四)新黨名稱一致同意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黨」（最後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④。

五月，彭述之拋出了〈第四國際中國黨綱領草案〉，作為這次大會的中心文件，在托派內部討論。

「綱領草案」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進行了歪曲描述後，

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常委討論局勢與任務時彭述之的發言，載《校內公報》第7期。

③ 同②，劉家良的發言。

④ 載華南區委編：《校內生活》第2卷第1期。

攻擊中共是「斯大林的工具」、「小資產階級的黨」，現在已經成了「中國革命最主要的障礙」、「中國革命的真正危機」；消除此危機，只有成立「新黨」。草案認為「當前政治形勢是革命客觀條件成熟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不成熟，克服這矛盾是當前戰略任務」，為此提出「過渡綱領」以爭取群眾。

「綱領草案」宣稱他們當前的目標是：爭取民族獨立，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官僚對中國的反動政策；實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收歸國有，建立集體農莊；成立工廠委員會或由工人監督生產，等等。

王文元立即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綱領問題——犀照草案批判〉，猛烈批判彭述之的這個「綱領草案」。他說：

「犀照用以寫作這個文件的那個思想，依我們看來，卻萬分不幸，竟是他一貫錯誤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立場之徹底發揮。它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無緣，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立場恰恰成了直接的對立。這樣的思想，當然不能被規定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根本準繩，而是應該予以無情打擊，堅決加以排斥的。」^⑤

多數派根本不理睬少數派的攻擊，繼續加緊組黨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們的成員發展到三百五十人，終於在嚴燕賓家即煙紙店樓上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通過了彭述之起草的綱領。當時遼瀋戰役剛打響，他們就把攻擊矛頭集中指向中國共產黨。大會發表的宣言，竟然宣稱國民黨反動統治所以能「苟延二十一年的殘喘！這個空前罪惡的責任應該由斯大林及其中國工具——『共產黨』來負擔。」宣言表

^⑤ 《新旗》第20期。

明今天中國托派主要歷史任務是「趕快從那個名不副實的共產黨手中把共產主義旗子搶救出來」，建立龐大的「無產階級政黨」，打倒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反動公式，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云云。爲此他們號召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毫不猶豫」地加入他們的「革命共產黨」⁵⁰。

大會選舉了彭述之（書記）、劉家良（組織）、尹寬（宣傳）、喻守一、陳碧蘭、周仁生、錢川、葉微慶、籍雲龍、王國龍、熊安東等人爲中央委員。

據尹寬說：這次「建黨大會」，開得很開綽，會後還辦了酒席，大吃一頓。

尹寬怎麼會任該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呢？他在一九三七年因病保釋後，一直在家鄉桐城養病，不再顧問托派組織問題。抗戰勝利後，他任桐城簡易師範校長，還當了縣參議員。但他還是關心著托派事業。有一次，他看到《求真》雜誌上彭述之與李季爭論老子的文章，知道托派還在活動，於是又與上海兩個托派領導集團發生聯繫。他還多次到上海，了解雙方分歧，希望托派再統一起來，結果未成。一九四八年，桐城師範學生鬧風潮，反對「托匪尹寬」，把他趕到上海。彭述之爲了彌補早期托派「老同志」多已離開他的缺陷，不惜費盡心機，把尹寬拉過去，並在建黨大會上，選他當了中央委員、宣傳部長，給他房子住，還把他介紹到大學中去教書。

但是，這位有點像劉仁靜式的人物——「托派中的反對派」、獨立大隊尹寬，與彭述之、劉家良不久就發生了衝突，無論在理論方面、政治方面以至個人生活方面，他均難與多數派合作。於是只好分手。

⁵⁰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成立大會宣言〉（一九四八年九月），油印件。

少數派則鄙視其投機，也不理睬他。他就只好回老家桐城去了。一九四九年初，彭述之派領導機關決定撤到香港時，劉家良曾寫信去桐城，要尹寬一起去香港，尹寬置之不理。

中共接管大陸政權後，尹寬不思悔改，公開在群眾中繼續散布托派言論，攻擊共產黨的政策，還倚老賣老，宣稱周恩來總理是他的老朋友，說了許多怪話，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終於在一九五〇年被逮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多數派又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它的團章中宣稱：「本團在中國革命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以教育、組織並領導中國青年工人及一切革命青年，進行階級鬥爭，從事社會主義革命為宗旨。」^①

這年年底至次年初，共軍取得三大戰役勝利時，由於他們一貫的反動立場，害怕得到蘇聯托派那樣的下場，彭述之帶著妻女偕劉家良南逃香港，「中央機關」也同時遷港，在上海布置了一個以錢川為首的「江浙臨時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作為指揮上海、江蘇、浙江地區托派反共活動的潛伏中心。「江浙臨委」的成員，多是溫州地區托派提供的人，其中有劉毅、王國龍、熊安東、葉徵慶等。

「革共中央」南遷香港時，彭述之故意轉道廣州，妄圖在那裡與孫科直接會談，與國民黨合作反共，未遂。到港後，他們一面與第四國際保持聯繫，一面以「鞏固基地，面向大陸」為方針，頻繁地向大陸派遣人員（如曹惠白、康溪、斯佩瑤等），發出指示，指揮托派對渡江後的解放戰爭進行「失敗主義」的破壞活動^②。

以鄭超麟、王文元為首的少數派，起先反對彭述之等人獨立「建

①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草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油印小冊子。

② 同①。

黨」，指責他們的建黨大會只能造成托派運動更深的分裂^⑤。但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被共軍包圍時，他們也匆匆忙忙地與俞碩遺領導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翌社」）合作^⑥，籌建本派的政黨，召開了所謂「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緊急統一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議，確定了在中共統治下的工作方針：

「關於大會名稱和職權的決議」宣稱：「因局勢迅速變化，使統一建黨大會不能按原定籌備程序完成，政治問題，……未能在同志中普遍討論，代表人選，除在滬各單位外，均未直接派出，爲此，本次大會應定名爲『緊急統一大會』。」「本大會應特別討論今後我們在中共統治下的工作方針。」

「政治決議案——現局勢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任務」，王文元起草，胡斷「中共目前所走的不是革命道路」，同時「又充滿了困難與矛盾，因此它的統治是難以穩固的，……它的統治欲構成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是不可思議的。」爲此號召托派「深深地走進」勞動群眾中，暴露「新民主主義」、「人民解放」等等的真相與實質，以便從中共目前的勝利中，導引出「一次真正徹底的反中共統治的社會革命」。

「關於綱領問題的決議」，由於來不及起草「黨綱」，由鄭超麟起草了這個決議，重彈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和「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老調，攻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理論^⑦。

⑤ 〈爲卹照派召開所謂「建黨大會」告全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載《內部通訊》第3號。

⑥ 黃鑑銅：〈中國托派組織前期歷史概況材料〉（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未刊稿）。

⑦ 各項決議載《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緊急統一大會決議案》，油印小冊子。《雙山回憶錄》第285、286頁。

大會宣布成立所謂「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舉了王文元(書記)、鄭超麟、俞碩遺、何資深(何之瑜)、林煥元等人為中央委員，黨員一百餘人。

大會決定把該派托派中央機關遷往香港，把大陸上托派組織劃分為三個互不聯繫的部分，直接受香港指揮。這三部分是黃鑑銅、李培為首的廣西籍托派組織；涂嘉、陳莽、陸幼東為首的溫州籍托派組織；嚴西成、俞碩遺為首的上海籍托派組織。王文元帶領托派中央乘上海解放前最後一班航機逃往香港時，鄭超麟臨時決定留在上海，聲稱要像尼羅王迫害下的原始基督徒彼得那樣，留在「羅馬」殉教^②。他還把王文元比作梁啟超，自比譚嗣同，指揮大陸上的托派活動。解放軍進入上海時，他竟然指使一些人在馬路上散發傳單，煽動工人起來「奪取政權」^③。

他們還成立了「馬克思主義青年團」，專門在青年學生中活動，該團臨時中央委員會由嚴西成(書記)、黃鑑銅、葉春華、鄭良、李培、許衛之、陳道桐等人組成^④。

中國托派這時不顧一切地成立政黨，正如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國際」時一樣，希望能有一個「小先鋒隊」，拖著群眾跑，將來會變成一支大規模的「大先鋒隊」。他們認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是，喊出「中國革命共產黨萬歲！」「國際主義工人黨萬歲！」的聲音；在歷史上留下中國托派政黨成立的記載，至於其他的事，留待以後去解決。

② 同①第286頁。

③ 同④。

④ 黃鑑銅：〈中國托派組織前期歷史概況材料〉。

第五節 苦惱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大陸上的勝利，不僅使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感到震驚，也使中國托派感到意外。他們不願承認這個事實，又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在托派內部產生了極大的思想混亂：「爲什麼中國共產黨會勝利？」「怎樣用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思索。於是，有些托派分子就懸崖勒馬，驚回首，向中共靠攏。

劉仁靜在抗戰勝利後，曾爲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機構辦的刊物《民主與統一》擔任寫作與編輯；一九四八年，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和國防部工作，寫作誹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的文章，一直到南京解放。解放後，他改名劉亦宇，在北京師範大學擔任教師。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劉仁靜和李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聲明，檢討了自己托派的錯誤。

劉仁靜說，一九三七年被托派開除，「但托派思想的殘餘仍支配著我很久，使我不能認識黨的路線之正確。去年京滬解放以後我進行了深刻的反省，由於偉大的勝利的革命之助，我發現了我政治思想的錯誤有以下三個根源」：

(一)脫離群眾。我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家庭，生活不接近群眾，不做群眾工作，「我的思想總傾向於把群眾的力量估計很低，因此總批評黨的路線是冒險的，在這種路線下革命必遭失敗，實際這只表示我的落伍，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壓力，並傳播這一思想的影響以阻止革命的前進。」

(二)自由主義，「我自以爲是，不肯服從組織的紀律，因此當我不

同意黨的路線的時候便鬧分裂的派別活動，實際是削弱革命的力量，讓反革命勢力更容易鞏固起來。」

(三)「我的思想實質上是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常混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幻想可以與反革命妥協，和在反革命的統治下進行改良。」

他沉痛地表示：「中國革命的勝利使我更清楚的認識我過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說我過去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是一個孟什維克，而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所以我在政治上長期的和黨對立，表現於對中國革命和國際革命的諸問題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事實和經驗都證明我是完全錯誤。」

最後他說：「中國革命之能勝利，當首先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尤其是毛主席能把馬列主義的理論融合到中國革命的實踐。……我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這位參與創建中共和托派的怪人，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死於車禍。

李季在聲明中，檢討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否認中國封建社會的性質、反對農村武裝鬥爭和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錯誤，表示：「我完全擁護毛主席所提出的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後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我願誠懇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最大的熱忱，為祖國工作。」

劉、李的聲明，為中國的托派運動作了最好的總結，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歡迎，以後的實踐表明，他們也遵守諾言，為人民做了一點好事。

但是，也有些托派分子不承認錯誤，不承認失敗，最後走向深淵。當時已逃到澳門的王文元說：「中國托派在一九四九年年終到一九

五〇年年初這段時間內，經歷了一次緊張的思想生活。當時發生在國內的種種，實在太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了；「對中共階級性的錯誤判斷」等種種原因，「促成了我們在中共勝利面前所感到的思想混亂與狼狽」。又說：「中共從來執行的政策，我們深信是錯誤的；托派一貫堅持的戰略，我們相信是正確的；可是到頭來，取得勝利的反而是中共而非托派，這到底是什麼回事？這個問題苦惱著每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⑤

最使中國托派苦惱的是，幾年來他們從托洛茨基主義理論引出的預言，一個一個在事實面前破滅了，其中心問題是「中共的階級性質」和「斯大林主義政黨的歷史作用」。王文元說：「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前後所作的種種錯誤分析，完全導源於他們對此二問題所採取的特殊立場」；「好多年來，中國托派中流行著一個見解，即是說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因為中共完全退出了城市，長期存在於農村中，其成分幾乎百分之百是農民與少數知識分子，其主張則偏向於階級合作和勞資兩利。」王文元承認，「正是這一個不知不覺間形成了的有關中共階級性的錯誤估計，在很大限度內，決定了我們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我們對中共勝利的看法：……這個黨決不能領導一次真正的革命，更不能領導它取得勝利。……即使（解放戰爭）勝利了，也一定會陷於死巷之中——有如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農民起義的勝利一樣。後來，事實證明，中共所領導的農民軍隊正在內戰中取得勝利，我們便說，這個軍隊勝利不將等於革命勝利」；甚至，「當中共軍隊完成了徐蚌決戰之後仍硬說他們不能勝利；在廣州解放之後仍宣布他們不願勝利；當中共已在北京組織政權，土地改革將推及全

⑤ 同①第291、300頁。

國之時，尚說他們不能與不願保持政權，說他們必然要對資產階級讓步，又莫名其妙地預言土改將以長江為界！」⁶⁶

彭述之也始終肯定北京新政權「實際上便是建築在依靠農民武裝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妥協基礎上的，一種赤裸裸的巴拿帕脫的軍事獨裁」，並且說：「此種獨裁政權，不論將來再經過什麼『人民代表大會』的偽裝，其資產階級的性質是決不會改變的。」⁶⁷

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勝利了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能確保勝利，還能加深勝利，並且從保護和擴大工農群眾的利益出發，從事於國家在經濟與政治方面的深刻變革。於是，托派在理論上就陷於兩難困境：或者承認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至少不適用於中國的特殊情形」；或者「改變對中共階級性的看法，承認它至少在某種程度內確實還是一個代表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黨。」哪一種，他們都不願承認。

托派是怎樣走出這種困境的呢？王文元和鄭超麟首先被逼承認「過去把中共看成小資產階級農民政黨是錯了」。可是他們又覺得，「中共決非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一樣的無產階級政黨」。然則，既非小資產階級政黨，又非無產階級政黨，中共到底是代表哪一個階級的政黨呢？他們研究的結果，認為它是代表著一個全新階級的利益的政黨。這個新階級，鄭超麟稱之為「國家資產階級」，王文元名之曰「集產主義的官僚階級」。他們斷言：「這兩個新階級不能使這些變革循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或官僚集產主義的政制。」⁶⁸

66 同①第 305 頁。

67 彭述之：〈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勝利的原因及它的背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上），載《失去了的中國革命》（中島嶺雄編譯）第 44 頁，日本東京，新評論一九八〇年日文版。

68 同①第 297、300 頁。

鄭超麟在一九五二年底帶著這個觀點進了共產黨的監獄。王文元則「在迅速發展的新事變的印證下，在政治實踐的驅策下」，不久放棄了「官僚集產主義」的說法，承認「中共在某種程度內仍不失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黨」。但是他又攻擊說：「它是以非常醜陋與奇異的方式來保持」工人階級傾向的；「它是異常可怕地官僚化與特務化了的，其成分由小資產階級占絕大多數，其理論則常常表現為對馬克思主義之政客式的曲解與玩弄。」^⑩

彭述之則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寫給第四國際書記處的報告的幾點補充與修正〉中，突然宣布，「在過去兩年餘的時間內，中共內部工人黨員已經增加，它的工人階級方向業已加強」，因此，中共這個小資產階級政黨變成工人政黨了，北京這個「赤裸裸的巴拿帕脫軍事獨裁」也變成「畸形的工人國家」了。

托派在中共一九四九年勝利面前這種忸怩作態的表現，再次暴露了他們主觀主義和故意不願考慮客觀事實的思想作風。只有符合他們對現象和事件的反動空想的東西，才被認為是真實的。由於他們對整個世界簡單的公式化的觀察和宗派主義的仇恨心理，導致凡是超出他們想法的事物都被說成是變態的和反常的。正如西德《新社會》雜誌一篇文章中所譏諷的：「世界不理睬他們，所以他們把世界說成一所瘋人院。」

總之，不管中共如何成功和勝利，托派總要千方百計地否定或挑剔，而他們不管如何錯誤和丟醜，都總以「失敗的真理」自居。於是，他們就走進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死胡同。

⑩ 同⑩。

第六節 回光返照一夕亡

中共政權建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爲了徹底消滅國民黨政權的殘餘勢力，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整頓和發展國民經濟，開展了一系列運動，工作極其繁忙。托派則步步進行對抗和破壞。他們認爲既然共產黨已轉變成「國家資產階級」，而他們托派則代表「無產階級」，與共產黨是兩個階級的矛盾。他們要進行的「第三次革命」——「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了。

他們有計劃、有綱領、有領導、有組織地，以過去對國民黨政權從來沒有使用過的手段，對共產黨發動了地下鬥爭。

兩個托派黨都出版了六十四開小型的油印地下刊物，來統一指揮潛伏組織的活動。鄭超麟主編的是《新方向》；「革共」的刊物是《叛逆者》。

這兩個刊物上，以各種理論的或通俗的文章、講座、通信、報導，系統地攻擊毛澤東思想，非常詳細具體地指導托派如何抵制和破壞共產黨領導的每項運動和新政策、新制度。

《新方向》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在「編者語」中，明確宣布該刊內容「批判以毛澤東思想爲代表的各種基本理論」和「國家資本主義之各種政策、制度、運動。」

具體活動如下：

(一)對於抗美援朝運動：他們認爲朝鮮戰爭是美帝集團爲一方，蘇聯集團尤其是中國爲一方的、「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除了給人類社會遭受慘重的毀滅之外，不會有什麼好處的」^①；還說中國

① 一觀：〈反攻與斡旋〉，載《新方向》第8期，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進行抗美援朝，一是「在外交上支撐蘇聯的腰，並求自己能踏進聯合國大門」，二是「在內政上加緊對工人階級剝削，以便擴大軍火生產。」^①所以，他們聲稱「堅決反對」抗美援朝，對它實行「失敗主義」，「用社會主義革命代替它，葬送它！」他們在工人群眾中煽動說，不要因為打倒美帝而「上另一個資產階級的當，替它去火中取栗」；「我們工人階級應該看清楚這一點，不要為它束緊腰帶，加緊生產，來支援它的戰爭。」應該用罷工、民主、自由，把抗美援朝運動引導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去，「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政權。」^②

(二)對於鎮壓反革命和反動黨團登記：他們認為這是「想以此來壓制工人言論和行動，塞住工人們的嘴，……達到準備戰爭和加緊剝削的目的。」^③為此，兩個托派黨中央指示他們在大陸上的潛伏組織頭目「完全不理睬反動黨團登記辦法，寧可被捕，不去登記」；胡說逮捕他們就可暴露中共「反動」^④。

(三)對於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運動：解放後，工人階級翻身當了主人，勞動熱情空前高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運動。托派卻挑撥說：「我們看到勞動階級僅有忘我的拚命勞動的義務，卻沒有過問產品的權力，能夠過問的只有國家資產階級；它吞占了全部剩餘價值，勞動階級『解放』了，做了國家的『主人翁』了，然而卻過著比國民黨時代更卑下的生活，受著比國民黨時代更嚴厲的剝削。」^⑤於是，他

① 一觀：〈抗美援朝運動〉，載同上第2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② 阿陳：〈如何制止世界大戰〉，載同上第3期，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③ 大為：〈論「反動黨團登記」〉，載《新方向》第6期，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④ 同②。

⑤ 于平：〈勞模運動的意義及其本質〉，載《新方向》第1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們就在工廠中挑起各種矛盾和鬥爭。他們首先煽動所謂「爭取工人管理生產」，提出「工廠委員會要民主化，由工人用無記名投票普選產生，並且有最高的權力，反對政府或資方指派廠長，反對廠長獨裁。」^①工資待遇是關係到工人群眾切身利益的最敏感的問題，也是他們做文章最多的問題。在《新方向》上，不斷報導他們在一些工廠如何組織新來的年輕藝徒和練習生要求提高工資，發動臨時工要求加入工會等各種各樣鬥爭的經驗，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和工會幹部是「資產階級」、「官僚主義」等等^②。

四對於「五反」運動：中共建立政權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利用為主，以使國民經濟早日恢復。在舊中國，民族工商業受到官僚資本及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排擠，呈現不斷衰敗的景象。現在，國家在「勞資兩利、發展生產」方針指引下，以加工定貨、統購包銷等辦法，扶持工商業發展，從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如電影《不夜城》中所描寫的那樣。但不少資本家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剝削者的本性也充分暴露。他們向國家幹部施放五毒：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據上海當時十六萬三千四百戶工商戶調查，守法戶15%，基本守法戶50%，半守法戶30%，嚴重違法戶5%。有些罪行令人髮指，如奸商王康年，給抗美援朝的志願軍訂做的軍用藥品，大量是假藥和不消毒的衛生棉，致使許多英雄兒女負傷後，不是犧牲在戰場上，而是蒙難於這些奸商之手，有的則終身殘廢。為此，中共

① 大明：〈工人管理生產〉，載《新方向》第12期，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② 〈我們的鬥爭經驗〉，載《新方向》再刊號，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工廠通訊〉，載《新方向》，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此刊「再刊號」後不分期了。

開展了一場五反運動，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

但是托派卻誣蔑說「五反」運動是「國家資產階級爲了鞏固自己統治，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向民族資產階級開火。而且還顛倒是非地說資本家所以違法，是因爲「民族資產階級不堪國家苛捐雜稅的嚴重掠奪，甚至使企業不能維持，因之他們便不惜以『五毒』求生。」所以他們宣稱要揭穿「五反」運動的「陰謀」，指示工廠中的托派分子，「通過每一個事件啓發工人階級的覺悟。」^⑤

(五)對於思想改造運動：歷史轉折，新舊交替，需要調整各種關係。解放後一些知識分子由於長期受美蔣及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對新政權不適應，有的有嚴重的崇美、恐美思想，對抗美援朝運動不理解，有的在學生中散布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因此共產黨開展了思想改造運動，幫助知識分子轉變思想，提高認識，適應新的歷史時代，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爲更好地發揮知識分子在革命建設中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時美蔣和一切反共勢力都說這場運動是所謂「洗腦」。托派也與他們操一個調子，攻擊這是「爲了洗刷掉知識分子中一切不替國家資本主義服務的思想」；「本質極端反動」^⑥。爲此，他們要求托派分子不僅拒絕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還要「在群眾中揭露這個陰謀」，要抵制這個運動。具體做法是：(1)不接受改造，不進行批判；不脫離群眾，不隨聲附和。萬不得已時，我們也只是找一些平日生活工作中已經給他們知道的事例來說說，應付過去。(2)方法上，怎樣做到既不脫離群眾，又不隨聲附和呢？我們要在各種「定義」上進行爭辯，告訴群眾

⑤ 阿秀：〈略談「五反」運動〉，載《新方向》，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⑥ 頑人：〈漫談我校的「思想改造」運動〉，載《新方向》，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出版。

什麼是資產階級思想，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以此提高群眾的思想認識。如「享受」，現在社會還不平等，為維持生活水平或享受好一點，是人之常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享受唯一不同之點是「勞動」還是「剝削」。(3)我們避免突出，不當小組長，不做幹部，不做典型，不做統治階級的工具，還要巧妙地把問題引導到領導機構的缺點，揭露中共自上而下的官僚手段，培養群眾的民主觀念●。

請看，他們為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新政權，真是煞費心思，用心良苦，唯恐天下不亂。過去他們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又何嘗這樣動過腦筋呢？

托派在進行這些攻擊和破壞同時，在工廠，特別在一些大學和中學，大量發展他們的「黨員」和「團員」，把許多思想「左」傾但又不辨真假馬克思主義、難分真革命假革命的青年，甚至學生會的幹部，拉下了水。他們竟然還在刊物上公開今後如何發現、培養和發展托派分子的經驗：

(1)「搜尋對象，肯定對象。」看對象是否對現實社會不滿，並用平日談話方式調查其家庭出身、成分、個人社會關係和經歷；看對象的人生態度是否積極負責，有無從事「革命」工作的可能；看對象品質，是否有自我犧牲精神，處理事是否勇敢，有無對「革命」有幫助的性格：堅毅、耐心、樂觀、剛強、獨立。(2)「倒過來，站到我們一邊。」在爭取過來有80%可能時，然後進行個別談話，把懷疑和不滿由小引導至大，由下聯繫至上，使對象認識是整個制度問題。(3)「引導走向同志之路。」成功可能100%時進行，分兩步進行：第一步，理論教育，向對象灌輸托洛茨基主義——不斷革命論；第二步，國家資本主義理

● 堅人：〈論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載《新方向》，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論教育，使對象認識到現在的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中共是「國家資產階級」。把兩種教育聯繫起來，使對象從現實中找出革命的理論根據^①。

托派這樣猖獗的活動，一直進行到一九五二年底。在這三年半的時間裡，共產黨由於忙於建立、鞏固全國政權，恢復發展國民經濟，一時無暇顧及別的問題。他們卻錯誤估計形勢，以為新政權會容忍他們的種種破壞活動，或對他們毫無辦法。其實他們的行動和刊物早已被公安機關所掌握。而且，他們瘋狂攻擊毛澤東思想，反對共產黨領導，顛覆人民政權，已構成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罪行，成為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集團。那個「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的頭目嚴西成甚至還與國民黨殘匪勾結，妄圖發動武裝暴亂^②。「革共」的潛伏中心「江浙臨委」被破獲後，葉徵慶向政府坦白自首，重新做人；錢川、劉毅等人教育釋放後又逃香港；王國龍等人化整為零繼續活動^③。

鑒於此，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根據毛澤東簽署的命令，公安部門在全國採取統一行動，將大陸上的托派組織一網打盡，所有托派分子全被逮捕，托派骨幹分子被判處二十年、十五年、十年等幾種徒刑，收監入獄。

人民政府對入獄的托派分子，採取與蘇聯政府完全不同的方針，不是肉體消滅，而以教育和改造為主，在生活上實行人道主義，為此經常組織他們學習參觀，座談討論，寫思想收穫。特別是經常參觀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① 〈談談關於發展幹部問題〉（經驗介紹），載《新方向》，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② 同①。

③ 同①。

以事實來教育他們分清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偽革命，批判托派的錯誤理論，與昨天告別，重新做人。

曾被判處二十年徒刑的鄭超麟回憶說：他被捕後關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五六年七月初，他和尹寬、何資深、蔣振東等幾十個同案犯，調集到提籃橋監獄。他和尹寬等幾個重案犯估計可能要被槍斃。結果卻是來參觀學習的。他們分成幾個小組，每組十二人。起初幾天是漫談，七月五日起出去參觀：工廠、商店、高級合作社、文化宮、展覽會、體育場等。大約參觀了一星期。以後就開會學習，最後寫總結，直到八月十二日才結束。集中起來的人，又調散各處^①。

這年九月，他們又集中到提籃橋監獄學習一次，學習的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同時去人民廣場參觀上海人民慶祝國慶節的群眾大會和遊行。翌年，他們又觀看了五一節大遊行，並在上海及北京、東北、武漢等地參觀學習。

一九六四年五月起，中蘇論戰時，政府又把他們集中起來，學習陸續發表「反修文件」。學習完畢後，鄭超麟把總結系統地寫成八萬五千字的小冊子，書名為《幹部主義論》。

政府非常關心他們的健康。尹寬原本有病，常去監獄的醫院療養。鄭超麟沒有病有時也被送往醫院檢查身體。在醫院一住就是十幾日。一九六二年十月，鄭超麟等人正式轉到上海市監獄。尹寬有病，吃「營養飯」；鄭超麟不是病人，也被照顧吃「營養飯」。起先每星期吃三頓，菜中有一些肉片或肉絲。以後增加至每日一頓。

尹寬因健康原因，一九六五年十月提前釋放。那時，他已病得不能獨立行走。當他女兒尹龍珠來接他回家鄉桐城時，政府知道他們路

^① 參見鄭超麟：〈記尹寬〉，打印稿。以下有關內容，皆參見該稿。

費不夠，還專門派人送他們回去。尹寬回到家中，改變了生活條件，病慢慢地好起來，甚至能帶著孫子在屋外散步。一九六七年去世。

尹寬出獄時，上海監獄的托派犯人曾集合向他告別。他與鄭超麟、蔣振東等一一握手後講話說，「我們錯了」，並勸告其他案犯「好好改造，改造好，政府會釋放我們的」。

鄭超麟在一九七二年刑滿獲釋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爲了保護他不被群眾揪鬥，及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就安排他在勞改工廠。二十年牢獄生活，並未罰做勞役，除上述當局安排的活動外，主要是看書、寫作。監獄給他供應紙和筆。他寫了一百多萬字的回憶錄、四百多首詩詞，還譯了一部德國的長篇小說。到勞改工廠後，雖然只能在限定的範圍內活動，但是他妻子劉靜貞獲准遷來同住。同時，每月還發給他八十元生活費，比當時勞改工廠廠長的工資還高。對此，他非常感謝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就是這位領導同志指示，給他生活上予以照顧。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鄭超麟恢復公民權，並被聘爲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享受較高的待遇，遷入國家分配的二居一套的新樓房。由於妻子在一九七八年去世，政府又幫助把他的一位侄女從福建家鄉調來上海，照顧他的生活。

從此，他雖然仍保留一些不同的見解，心情是舒暢的。他以空前的熱情投入到政協和文史工作中去。由於他參加過許多黨的早期活動，直接接觸過許多黨史人物，所以他又積極地寫起了回憶錄，同時也不斷接待各地的黨史研究工作者。爲了確認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工作機關的一些地址和「八七」會議的會址，他還隨同有關同志跑遍了上海、漢口許多地方。

一九八六年，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出版他一九四五年寫的《回憶錄》時，其中還附錄了他一九八〇年寫的《陳獨秀與托派》一稿（前

者十六萬字，後者七萬字)，得到了一大筆稿費。上海市黨史辦公室還給他打印了《記尹寬》的手稿，共八萬五千字。

除了鄭超麟之外，其他托派骨幹分子獲釋後，都得到了較好的安排。如蔣振東、喻守一等是上海某一區的政協委員；濮清泉、趙濟等是雲南省的政協委員。

第七節 在香港與巴黎的餘波

一九四八年底逃到香港的「革共」中央頭目彭述之、劉家良、陳碧蘭等人，首先建立起中央「政治局」與「組織局」兩個機構，分別由彭述之和喻守一負責。他們還設立了新的印刷所，幫助整頓了香港地方的托派組織和訓練教育工作。他們的活動以及此前托派在工廠中組織的罷工鬥爭，引起了港英當局的注意。當局為自身的利益及顧忌到中英關係，對托派也進行了搜捕，破壞了他們的印刷所，所捕的托派分子，大部分放逐海外。彭述之、陳碧蘭夫婦的家也被搜查，因他們事先有所聞而逃走了，但警察追捕他們。一九五〇年一月，彭述之一家和劉家良逃亡到越南。喻守一則潛回大陸，後來被捕。在越南，彭述之他們與越南勞動黨前身——印度支那共產黨內的托派分子結合在一起。有一次，在越南軍隊中的某個托派參謀長防區開會時，劉家良與越南托派同時被捕。越南托派很快瓦解，劉家良死在獄中。彭述之等人雖在西貢，仍惶惶不可終日，最後由香港的托派提供旅費，亡命歐洲^④。

一九五二年，在香港的「革共」政治局和組織局撤銷，成立「全

④ 同^③。

國臨時委員會」，「黨」與「團」合併，由焦勵夫任書記，以後由劉乃光接任。在香港，設五個區委，二十二個支部，成員最多時達二百五十餘人。

彭述之到歐洲後定居法國巴黎，參加第四國際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他參加了第四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成為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書記局書記。

在這次大會上，彭述之作了一個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指示中國托派用兩面派的手法，設法混入共產黨、青年團和各種群眾組織，以極「左」面目出現，反對共產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篡奪領導權。彭述之一直與香港的托派領導機關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郵寄第四國際的有關文件，寫信指導香港及大陸上的托派活動。「文化大革命」中，第四國際頭目吉爾曼，曾竄到香港，布置收集大陸上「文化大革命」的情報。香港托派也不斷向第四國際提供資料和文件。

但是，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後，很快發生了分裂。彭述之參加加農為首的「少數派」，反對第四國際總書記巴比洛為首的「多數派」的理論和政策。

第四國際的分裂傳到香港，也造成了「革共」托派的分裂。以焦勵夫為首的一派，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主張打入共產黨內部進行破壞活動，不要「另起爐灶」。另一派以林斯為首，認為共產黨是「小資產階級政黨」，主張公開進行反革命活動。兩派一直明爭暗鬥，不斷爭吵。在活動上，他們主要在工人和學生中組織一些讀書會、學習小組、劇團、音樂社等，以學習和娛樂為名，拉攏群眾，散布托派思想，從中物色發展對象。他們還利用通信、回大陸探親訪友的機會，與大陸上的托派分子聯繫，企圖重建托派的潛伏組織。

但是，由於他們的反革命面目逐步暴露，中共政權的嚴厲鎮壓，他們的活動很難開展，在香港的成員也逐漸覺醒，不少人聲明退出，有的消極不幹，到一九六五年僅剩五個支部，成員七十餘人。

彭述之在一九七三年移居美國，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死於美國。在六十、七十年代，他寫了大量論著猛烈攻擊毛澤東思想、攻擊共產黨和新中國，反對中共的立場至死不變。

托派另一個黨「國際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書記王文元到香港後，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也被迫離開，定居於澳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因大陸上取締托派，他與鄭超麟等人的聯繫中斷，他的思想始終未曾停頓，亦未曾改變，密切注視著中國政局的每一次變動，並都及時地寫出文字，進行評論和抨擊。在一九七三年他出版了一本《毛澤東思想論稿》，一九七七年又出版了自傳體《雙山回憶錄》。這兩本書，匯總了他及中國托派對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全部認識，也是他們攻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集大成。

一九七五年三月，王文元去歐洲活動，在一些大學中講述托洛茨基主義、中國托派運動和陳獨秀的評價問題。一九七七年他還對「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的禍害幸災樂禍，說什麼從這裡他看到了新中國走上托派道路的希望，是一片「朝暎初露的瑰麗景色」^⑧。可是，以後的實踐表明，他又失望了。粉碎四人幫後，在中國人民面前展現的確是「朝暎初露的瑰麗景色」，而在他們托派面前展露的卻是他十年前不願看到的「夕陽已墮的一片昏暗」。

看來，歷史對中國托派是要嘲弄到底了。

在香港，至今還在活動的原「少數派」人物，是「四人金剛」中

⑧ 同①英文版自序。

的「老四」樓國華。抗戰勝利後，他到上海文華影片公司當高級職員，管理財務。解放時，他抽逃該公司資金亡命香港。幾十年來，他以托派「文魁」和「陳獨秀問題專家」自居，為文寫字，進行反共活動，但其觀點都是抄襲鄭超麟和王文元的。

目前，香港托派組織有三個，主要由青年知識分子組成。他們活動的重點是支持大陸上的「持不同政見者」，要求解放政治犯，唯恐天下不亂。中國革命共產黨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大會上還通過一個長達三萬多字的新綱領——《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一切領域，揭出與中共全面對抗的旗幟，大有氣吞山河、取中共而代之的架勢，宣稱：「中國的官僚層已形成為牢不可破的一個社會階層，緊緊地保持著政治經濟特權，……變成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物。」號召農群眾進行一場「澈底的政治革命，推翻中共的官僚統治，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民主政制」，「使中國最後走到共產主義。」⁶⁷

但是，中國與世界發展的趨勢，與他們追求的目標越來越遠了。

⁶⁷ 《十月評論》（香港）一九七八年第10期。

附錄

- 原始文件
- 參考書目
- 索引

原始文件

我們的話

中國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的機關報

第二十三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目錄

1 致中國左派反對派書	托洛茨基
2 反對國民議定的國民會議選舉法!	亦 蘇
3 中國第三次革命之性質的討論	勞 他
4 這樣修改就正確了么?	紅 印
5 中國反對派的統一運動之前途	亦 蘇
6 史大林以邊線放在後的新舉	勞 他
7 打倒國民黨! 打倒國民會議!	勞 他

歸國留蘇學生第一個托派小組組織辦的刊物

LE PROLÉTAIRE

Organe de l'Opposition Communiste Chinoise

無產者

第 一 期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出版——定價大洋三分

陳獨秀爲首的托派小組組織辦的刊物

十月
第一卷 第一期

歡迎轉載
歡迎翻印

編輯者 十月社
出版者 十月社
發行者 十月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每册大洋一角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號出版

我們的立場

自從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及列甫痛它以後，國際的工人運動，因世界資本主義的重新穩定，及改良主義在工人中影響之回復，因以消沉。此有個之表現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者，就是那始自一九二三，由史大林，喬斯維也夫所領導的所謂托羅基主義的運動。

其實，托羅基主義，這一名詞（一九二三年以前沒有這個名詞）之出現，却恰恰表示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小資產階級傾向之開始抬頭，機會主義思想與托羅基主義的階級一舉。

德國的革命，在一九二三年中已顯極可恥地失敗了。而德國的資產階級與美國的金洋及民主黨之助面形勢強了；然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五次大會上，喬斯維也夫

歸國留蘇學生第二個托派小組籌辦的刊物之一

十

月

之

號

中國留蘇學生第二個托派小組編的刊物之二

一九三六年

歸國留蘇學生第二個托派小組編的刊物之二

Report No 1

Shanghai 9 May 23.

Dear Comrades of the Secretariat and Rotatory
 Unification Conference of Chinese Opposition
 was taken place on the historical day May 22nd
 the Secretariat Shanghai 17 representatives pre-
 sented and besides some with advisory
 rights they totally represented 183 members
 (of 4 groups) Conference adopted our common
 platform and other resolutions which were work-
 ed out by the unification committee. A na-
 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8
 members and 4 candidates) was elected
 from which formed a secretariat of 11
 members. The name of our organization has been
 fixed as the Left Opposition of Chinese
 Com-party. Her organ is called 'Sparkle'.
 Our platform and resolutions sheet is translated
 into European language at the recent part
 Chinese opposition was united that

provoked great attention both from the
 reaction and working masses. We hope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left opposition she can and will carry
 on the great historical task. We hope
 that between the secretariat and Chinese
 sections will have a constant and
 relation.

The news about conflagration of Comsat
 Rotatory Library was learned from the
 Comintern press and confirmed by your
 circular. We have appointed a special
 Committee for Contribution.

With affection greeting

Secretariat of the Left Opposition
 of Chinese Com-party.

Secretary: Lin Tsun-shan
 Chairman of org dep: Chun-e-mo
 Chairman of org dep: Chang-mo
 Editor of organ: Wang wen yuan
 Secretaries: E. K. Chung, Fung Chue

—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國托派組織成立時給托洛茨基的兩個報告之一—

(譯文)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執行委員會
寫給托洛茨基的信

親愛的托洛茨基同志：

從資產階級報紙上我們得悉您那個無法估價的珍貴圖書室被焚燬，這消息又讓國際書記處的通告給證實了。對此，我們感到最大的痛惜。爲得重建您的圖書室，我們已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進行募捐。

四個分別存在的中國反對派現在已經統一了。我們希望這個好消息能多少補償您所蒙受的巨大損失。

統一大會是在五月一日這個歷史紀念日召開的。從各個反對派團體選出了十七名代表，此外還有四名代表列席。我們（預先）起草好的共同政綱和其他決議案已由大會通過。這些文件在最近將來會翻譯成外文。從今以後，中國反對派是一個單一組織了，它的口號也將是單一的（案：上面最後這句話原體上無法認清，大意如此——譯者）。關於中國的一般情況以及我們這個運動的特殊情況，我仍將會給國際書記處和您另寫詳細報告。致

共產主義的敬禮！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 上海

Letter to Trotsky

Shanghai 5 May 1928

Dear Comrade Trotsky, (Krasnii)

We learned from the ~~Communist~~ bourgeois press and confirmed by the circular of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that your priceless library was burned. Whereupon we express our deepest sorrow and sympathy. A special committee for contribution to rebuild your library has been formed.

The good news that four groups of Chinese Opposition had been united perhaps may console you and somewhat repair your greatest loss.

The unification conference was taken place on the historical day - 1st of May, 17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organisations of the Opposition) with four advisory deputies. One common platform and other resolutions ^{were} ~~were~~ passed, which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t the nearest future. From now on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pposition is the one and whole, her slogan single! (this sentence in the text is not clear - decipher). We shall write to the Bureau and you about the situation of China in general and our movement in particular.

With Communist Greetings,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of the CCP

(deciphered by F. Wang in 1993)

(譯文)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寫給國際
書記處和托洛茨基的信 (第一號報告)

親愛的書記處諸同志：

親愛的托洛茨基同志：

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大會已於五一這個歷史紀念日在上海召開。出席代表共十七人，另有四名列席代表。他們一共代表了（原屬於四派的）四百八十三名成員。大會通過了我們的共同政綱，還通過了別的幾個決議案——這些議案是預先在統一委員會中起草好的。大會選出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九個正式委員和四個候補委員）。全國執行委員會又選出其中五人組成書記處。我們的組織已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它的機關報定名為《火花》。我們的政綱與各個決議案將於最近將來翻譯成歐洲文字。

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也引起工人大眾的注意。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之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我們希望今後在（國際）書記處與中國支部之間能建立起經常的與密切的關係。

托洛茨基同志的圖書室被焚燬的消息，我們是從資產階級報紙上獲悉的，現在又讓你們的通告給證實了。我們已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為重建托洛茨基同志的圖書室募捐。

致

反對派的敬禮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書記處

書記處書記 陳獨秀

組織部主任 陳亦謀

宣傳部主任 鄭超麟

黨報主編 王文元

書記處秘書 宋逢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 上海

注：以上兩個報告是現在旅居英國的九旬老人王凡西（即報告中列名的王文元）從一九八〇年啓封的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托洛茨基檔案中覓得，並譯成中文，提供給作者，特此表示感謝。——作者



第一卷

RS

VOL. I



第九期

KRA

NO. 9



1932, 4, 16.

陳獨秀爲首的托派中央機關報

熱潮

第一一〇九日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第一期 時評
第二期 時評
第三期 時評
第四期 時評
第五期 時評
第六期 時評
第七期 時評
第八期 時評
第九期 時評
第十期 時評

定價：每月一元二角
零售：每份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法租界
電話：二二二二

印刷所：上海法租界
電話：二二二二

發刊詞

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飢寒奴隸向一班寄生更狡賤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算賬的熱潮，這兩種熱潮，雖是時有起伏而不是一面高牆，其結局將無物能與之抵抗，特別是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此次日本帝國主義無忌憚的強佔了遼吉黑三省，並在中國各地示威行國或砲擊，英法美各帝國主義在巴黎會議上，無忌憚的犧牲中國見好於日本，正是他們乘著熱潮還在伏波中一逞其兇焰；然而他們的兇焰，有時固然會使熱潮低伏下去，有時也會使熱潮高漲起來；今日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兇焰，開始決鬥時期，在這一次決鬥中，將是他們的兇焰盡滅我們的熱潮，還是我們的熱潮淹滅他們的兇焰，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

我們三四萬萬有歷史而且具有文化歷史革命歷史的中國

人，能說沒有力量嗎？除開少數國家的軍隊，官僚，奸商和家紳等寄生蟲；還有多數愛國的民衆，只有近視的寄生蟲們，只見其槍砲飛機的力量，而不看見民衆熱潮的力量，並且他們就根本害怕，仇視這一力量，因此他們寧肯受帝國主義兇焰的煎灼，「實已爲刀到他們頭上。」

我們相信，民衆熱潮具有大的機機以上的力量，經歷過其其能即且只有拿這一力量而水浸滅帝國主義的兇焰，淹滅牠一切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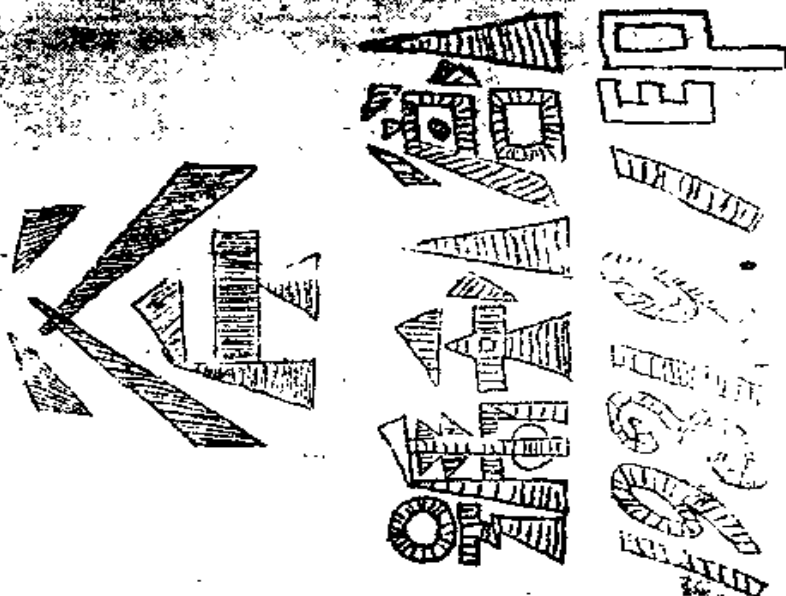
抗日救國的民衆們，只有你們自己無忌憚的熱潮是你們的根本武器，沒有牠，一切都是幻想！

本刊之發行，便是要爲熱潮做一小小紀錄，也要供給熱潮一點小小動力，或者爲內外兇焰所壓滅，或者浮在熱潮中向前發展，這就是牠的命運！

時事短評

冤了獻送的人

「九一八」後抗日高潮中托派中央辦的救亡刊物
「頑石」、「三戶」是陳獨秀的筆名
刊頭是陳題字



三民書店

目
錄

● 緒言	● ●
● 軍閥戰爭與中國革命	● ●
● 從濟案到高案	● ●
● 南昌二事變	● ●
● 附錄	
● 編後餘談	

一九三一年托派華北區委機關報



1932年10月，陳獨秀（左）、彭述之被擄後，在江寧地方法院候審室

來世第

號

長沙來電

紙電譯處官文府民國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鈞鑒 共黨首領陳獨秀提倡赤化煽動
 青年毒氣兩場全國憂症前奉天心慨亂元
 惡就擒奉國人莫不稱快惟近日報復所
 載竟有不取大義共曲為底復頭戮久稽尋
 情惶惑最傷劇共心遂至為重大仰懇鈞
 座獨斷乾綱在揆三新以予委決游輿情竟
 國幸甚清共幸甚湖南青仰司令何健宥印

何健要求處決陳獨秀的電報

國民政府文官處公函

字第一四二號

逕啟者奉

主席交下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代電陳共匪首陳
綦蔭及其黨羽在滬被捕並搜獲大批文件及宣傳品証
據確鑿罪無可逭務乞乾綱獨斷依法嚴懲一案奉
諭交行政院等因相應抄同原件函達

查照此致

行政院

計抄送原代電一件

金樹仁要求嚴懲陳獨秀的代電

校內生活

1933.11.23 第七期

組織問題

我們對於目前工作的意見…… 雪衣

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 雪衣

一年來上海組織現狀的教訓…… 紀宅

反對派的危機和同志間應有的覺悟…… 志衣

目前應該做點什麼？…… 工軍

一個提議…… 昔冠

我們怎麼幹？…… 沉毅

組織問題

陳獨秀被捕後托派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討論組織問題專號

「雪衣」即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與托派內部討論問題之(三) 下冊

陳獨秀被捕後托派內部討論政治問題的集子

1934.10.22.

陳獨秀被捕後托派內部討論政治問題的集子

國民政府指令

第一八四四號

令司法院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二六零號令一件，為陳獨

秀前因危害民國案件，經最高法院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

十日終審判決，處有期徒刑八年，惟查該犯自入監以來

已逾三載，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擬請依法將陳獨秀原

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由。

呈悉。應予照准。業經明令宣告減刑矣。仰即轉飭知照。此

令。

提前釋放陳獨秀的國民政府指令

THE NEW BANNER

新旗

第十二期
第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出版

定價每份一角

香港太古船塢李振聲

目錄

- 反對恐怖
- 工人階級與特別改革
- 戰爭與革命
- 中共軍事勝利與革命前途
- 秋收與毛澤東
- 給「八一」九一號追悼會
- 讀者信箱
- 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綱領問題
- 中共在工會中與道上的組織
- 第四國際書記部致南斯拉夫共產黨書

反對恐怖

振聲

九月三十日，上海特種刑庭判決了上海電力公司的工會理事長王季和。根據特種刑庭的判決理由，王季和是共產黨員，他「率了共產黨，暗中煽動放逐發電機軸內，企圖破壞上海的發電機軸」。但據王季和刑前對記者所說的話：「他根本不是共產黨員」。他是「產業工會常務理事，最近二千八百人中選出來的，這工人刑庭委員會把持工會，竟勾結社會局，替國河令都來調查」。所以特種刑庭記者「替他伸冤定案」。

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們很平靜與「中立」地報導了這個消息，工人們自己去判斷，或者讓人家把他當作一段極平常的社會新聞讀過去，根本不利。

其實這是一件大事！不僅是工人運動如是如此，便是就資產階級的民主憲法而言也是如此的。

王季和案顯然是國民黨的有意破壞。特別庭所公佈的理由都是捏造。王季和是否共產黨員不得而知。但縱令他是，共產黨也決不會命令他的黨徒破壞上海的發電機軸，因為這是在情理之外的。再進一步說，縱令具有這種事實，那為什麼不公開審判？為什麼不准發表有特種刑庭？為什麼不將破壞的罪證公諸大衆？

對於國民黨我們雖然不幻想他真能依循民主方式來對待無情殘酷，因而起來為起碼的人權而鬥爭的。

不過，我們——工人階級的革命者，並不能停留在問題的點，我們必須站在階級的立場上，進而探討王季和案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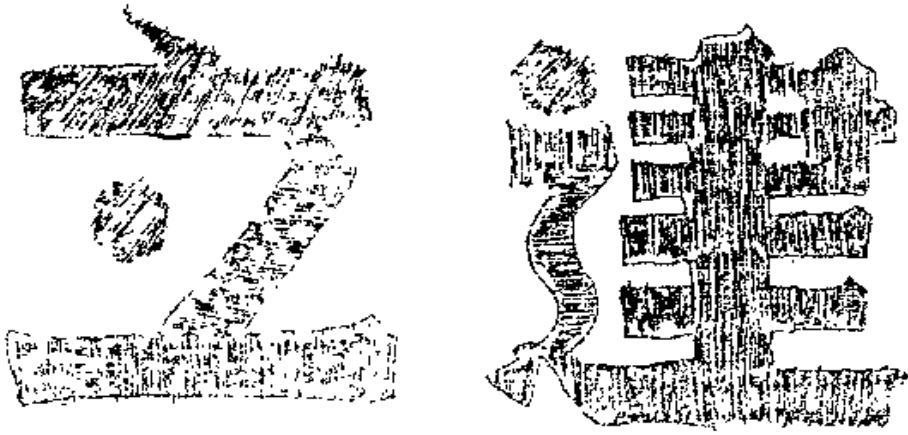
在國民黨當政的二十一年中，可以說無一日不槍殺大批的工人和農民。牠的統治完全建築在刺刀上，牠的生命全靠槍殺工人的血來維持。所以從這一點看，王季和不過是這無數槍殺者之一。

牠的死亡似乎不值得重視。可是從另一角度看，從戰前結束後的中國工人運動，尤其是上海的工人運動的演變看，此次王季和工友之慘遭槍殺，却具有極大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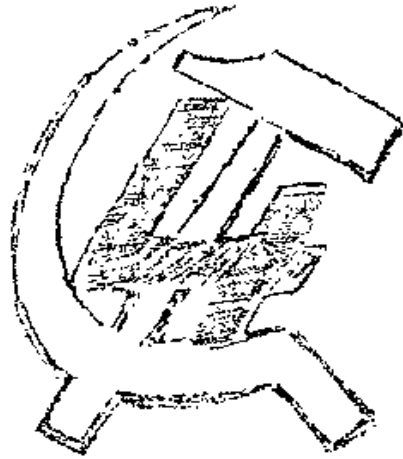
抗戰結束，上海工人階級從長期屈辱與困苦中掙扎起來，掀起了波濤洶湧的罷工鬥爭。這些鬥爭雖在國民黨的鐵腕與共產黨的欺騙之下，因之未能繼續增高，激成革命形勢，可是對於工人階級力量的關係，以及工人生活之改善，確已收到了不少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工人自己的工會之普遍成立，以及工資按照生活指數發給這二大項目。

國民黨與戰後的工人運動作鬥爭，前後經歷了一個長過程。自帝後降到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乃是工人階級的全面進攻。

抗戰勝利後少數派的機關報之一



第 五 期



一 九 四 八 · 三 · 八 ·

抗戰勝利後少數派的機關報之二

求 真 雜 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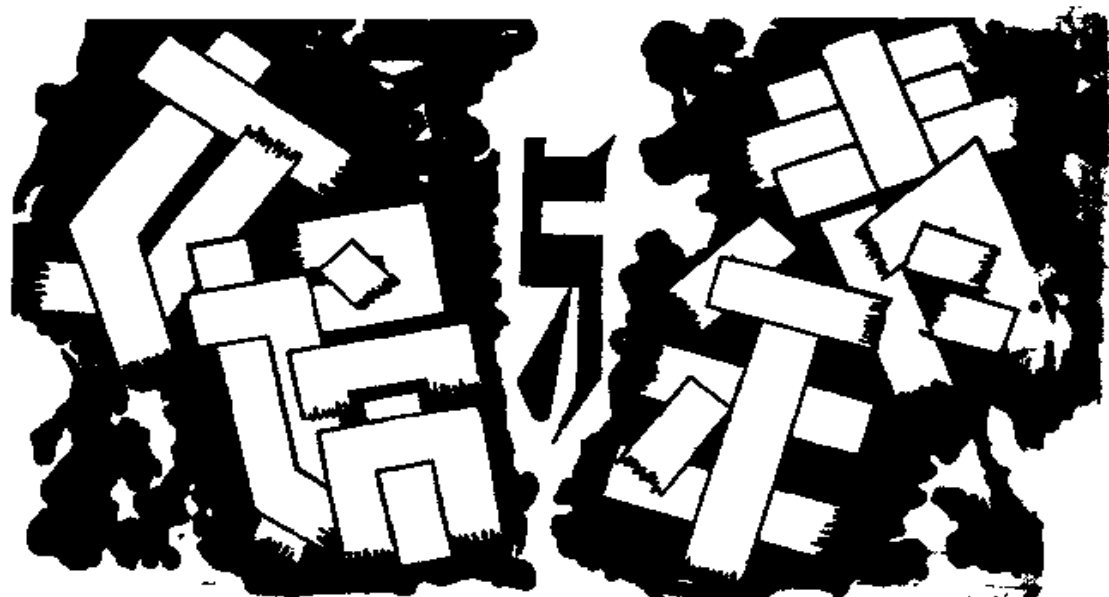
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國共和談決裂以後	韓 加(二)
最近歐洲選舉之透視	海 明(四)
從共和黨勝利到煤礦大罷工	康 君(五)
評中美商約	陳人白(七)
歐洲的脈搏	劉少嚴(二)
希臘——巴爾幹的波斯	趙天龍譯(三)
巴勒斯坦局勢概觀	仁昌譯(三)
評李林台爾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	歐 伯(六)
法蘭西大革命的民主與獨裁	唐虞世譯(完)
周末社會大轉變與諸子學說的勃興	密文甫(完)
關於易經卦畫起源之研究	劉 鈺(美)
論中世紀戲劇	冰夷編譯(完)
大 壩 樓(小說)	巴爾扎克作 謝均譯(完)
青島剪影(地方通訊)	志 青(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抗戰勝利後多數派的機關報之一

陳人白、歐伯即彭述之



第二卷 第一期

延安失陷後的贖共前途…………… 顧寬

論「護權運動」…………… 饒微

台灣事變的前因後果…………… 劉乃光

怎樣保障人權…………… 辜音

莫斯科會議與德蘇同盟…………… 旭東

英國運轉工人罷工是怎樣大勝利的…………… 許慶譯

青年正道的道德觀…………… (座談會)

真理展開了翅膀(詩)…………… 藍天

薩爾的「經濟」合併…………… 李靜薇

蘇聯在德佔領區的移民…………… (巴黎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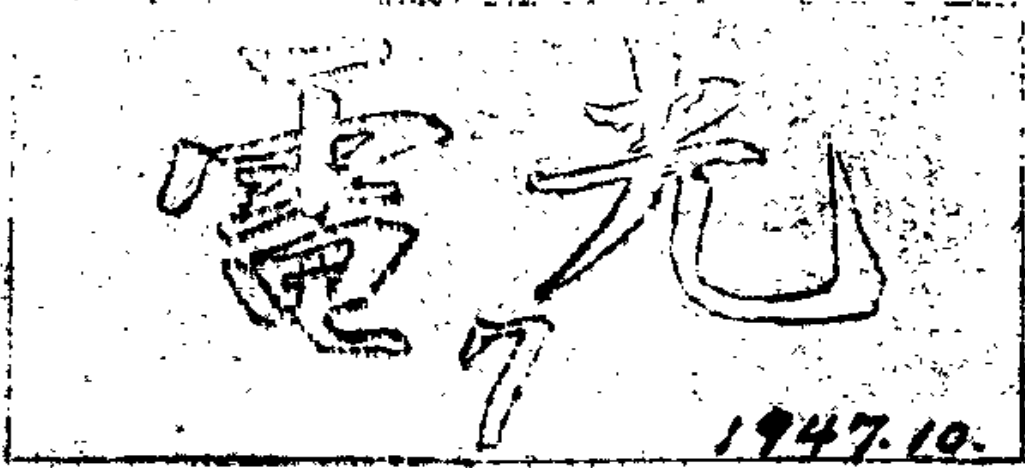
一個僑胞者苦悶的申訴(憶懷)…………… 趙真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一日出版
上海四川路三六六號二六號

抗戰勝利後多數派機關報之二



抗戰勝利後多數派的機關報之三



目	關於電光的幾句話	
	現階段的殖民地問題	
	問題的提出	
	我們的建議	
	電光的報告與我的批評	13
	電光與四川全體同志書	
次	新民主主義組織的一種新作风	

大 星

期 七 第

社版出原越 ；者行發

日 月 年 十三國民

四第 二第 上 大 法 馬 河 邊 巷

一九四九年華南托派區委機關報

校內公報

建黨大會討論特輯(二)

五、

等

等

第四

六、
運動六綱章

中國青年

多數派機關報《校內公報》及上面刊登的建黨文件



一九四八年九月革共成立時發的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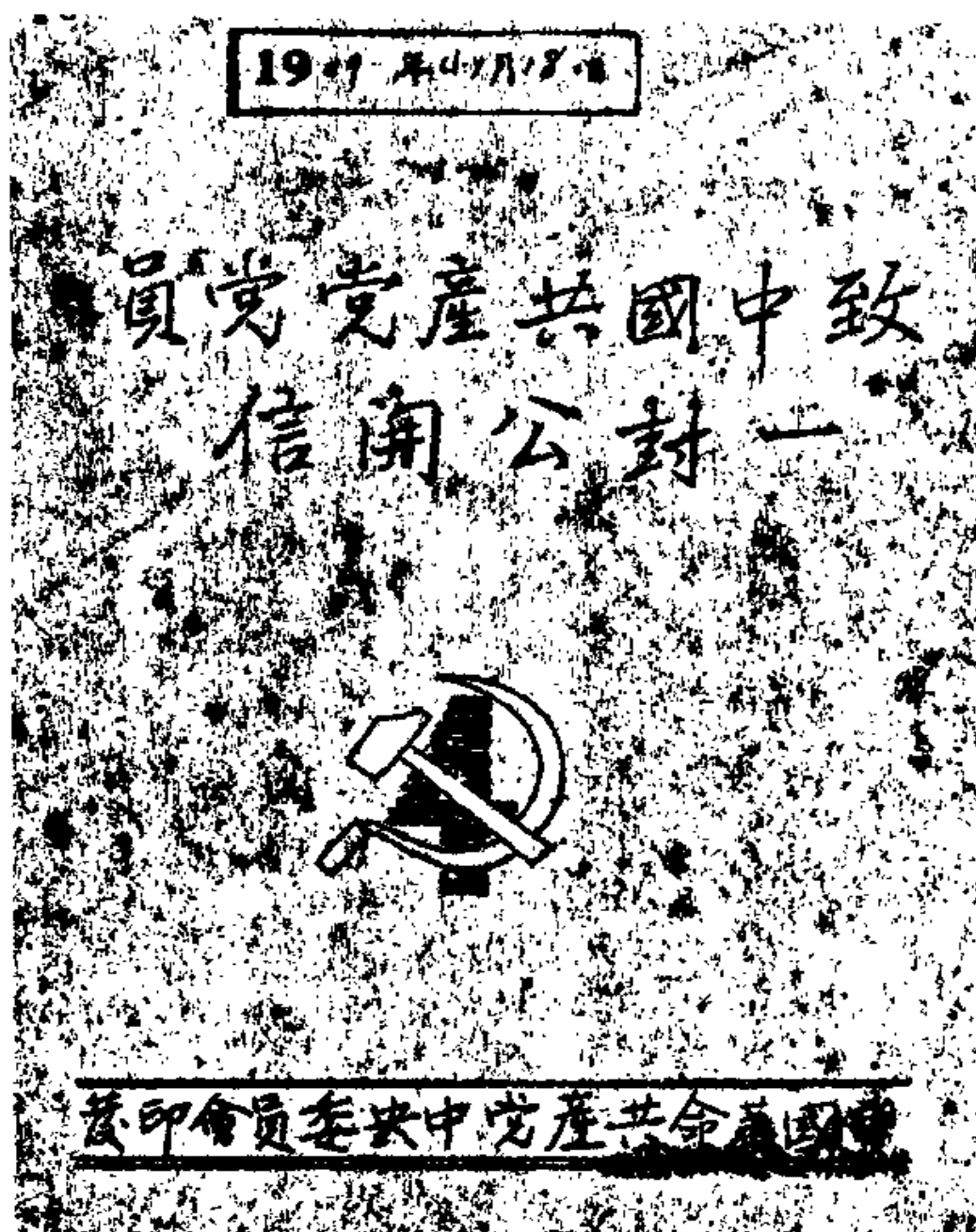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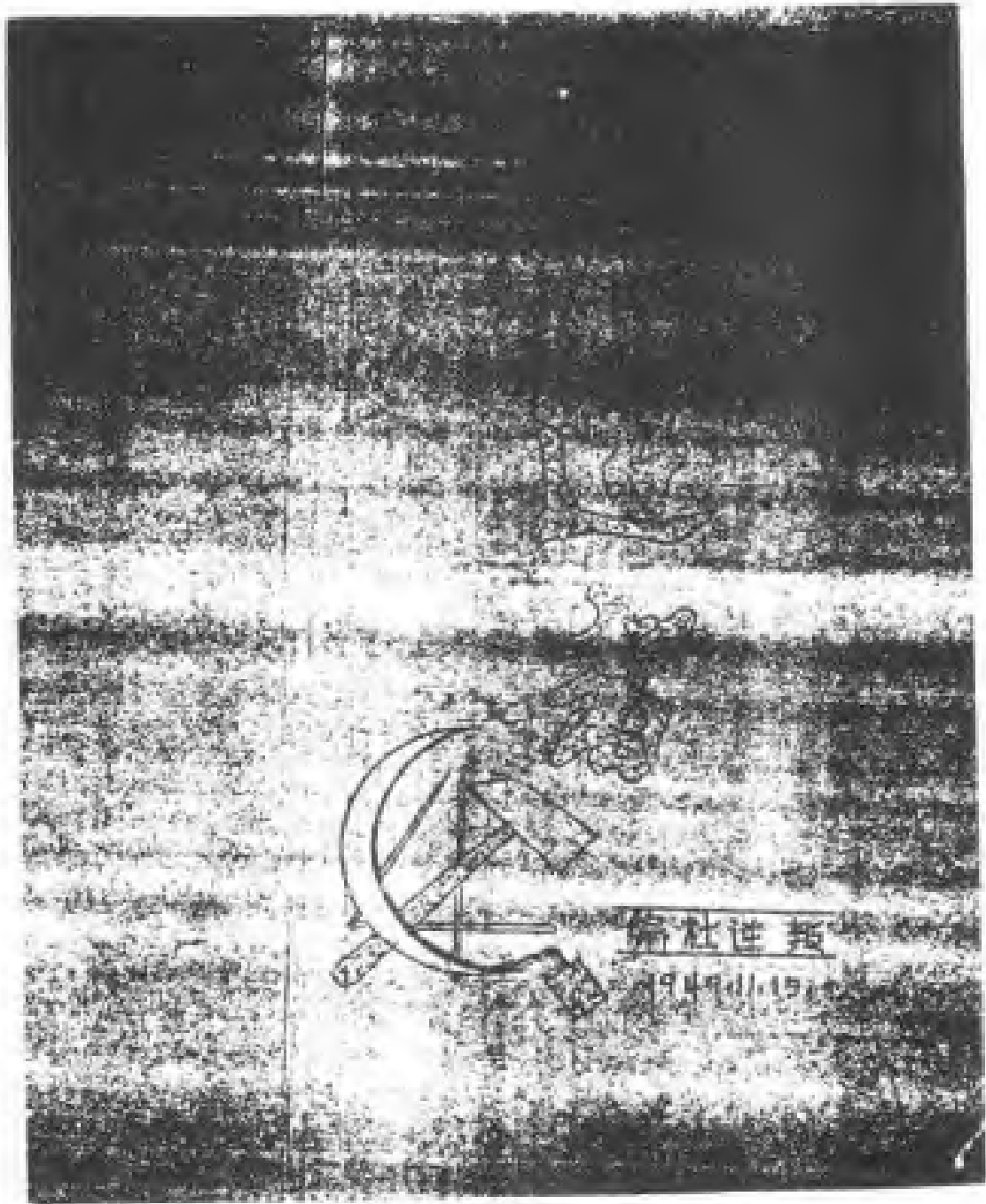
1948.11

(三)

革共的外圍組織社青團章程草案





中共進占上海前夕革共散發的宣傳品



中共占領大陵後平共潛伏組織辦的地下刊物

新 方 向



1951.11.25.

中共占領大陸後國際主義工人黨潛伏組織辦的刊物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彭述之、
陳碧蘭在美國寓所合影

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

[編者按：這是中國革命共產黨一九七七年四月大會通過的綱領。登於「70年代」月刊從第一期開始，刊登「地下編輯委員會」批評這篇綱領的文章，我們特把它轉載，以供讀者對照斟酌。]

(一) 革命的成果，其演變及其領導

1 一九四九年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獨裁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土地改革、民族獨立，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統一。革命繼續按照不斷革命的邏輯向深廣的方面發展，沖破了階級領導者的理論政策在限制，為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帝國主義勢力完全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無情的剝削階級而廢除，已逐漸被消滅了！雖然資產階級的個別分子仍殘存存在，但已不能再不勞而獲地過着寄生生活。初期的雙重政權局面，不久已變成單一的政權。一個工人國家（但是官僚主義地變態的）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土上建立起來了。生產力從私有制從東時下之剝奪解放，新生產關係之建立，提供了經濟上相應進步的巨大可能性。

這次革命的偉大結果，是使過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一次極重大的勝利。在國際平面上相當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基本對立的社會陣營間的力量關係，對以後的世界革命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

2 可是，上述革命成果並非順利地取得的；革命的發展過程是曲折的。革命發展之所以自給地走着被阻撓的曲折，其原因不純由於客觀上的困難，而主要是由於革命階級內主觀力量方面的缺點；就是說，主要由於第三次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動搖、錯誤的政策所引起。

3 革命動力的興起，最初源自抗日戰爭。日寇的侵略，激發了全國性的廣大的群眾運動。這一形勢使中共獲得機會，重新干預歷史進程。可是，中共領導這股力量是第二次革命期間階級合作政策失敗的教訓，在抗戰中群眾運動興起的初期，重新採取機會主義政策，自由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稱，放棄土地革命，聲明願從三民主義，要求與國民黨重新「合作」，在「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戰爭。

4 抗戰時期，中共在政治思想上表現得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這一綱領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革命階級論」錯誤地混淆，幻想可以通過「統一戰線」將國民黨及一切剝削階級、小資產階級高層合作，成立「聯合政府」，領導進行抗戰和社會改革。但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起實質作用，是推動國民黨即

工農改善生活、要求民主權利與獨立民族參加抗戰的鬥爭，這就大大地妨礙了群眾的革命行動，並引致中共本身陷入重大的危險中。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群眾的武裝力量，被日寇、國民黨、地主、漢奸、土匪的軍隊所包圍，遭受嚴重的打擊，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5 可見，儘管中共領導階級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基本教訓，這教訓卻在開始地投入鬥爭的群眾心中坎底，在運動底洪流中，許多實際參與戰鬥的勞動群眾，表面上固仍接受領導階級的政策，但在實踐中則加以不同的運用。

6 歷史事實顯示，在危險關頭，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中共領導階級終於被迫作了改變；它放棄階級運動內部一方面大力執意反對，另一方面却仍保留的這些要義，把它揉合于其階級之中，作為黨對黨員及干部關於其政策的解釋和指導。但在對外的政策聲明中，則其政策面貌一直保持原狀。

7 正是由於這樣的改變，中共避免了覆亡的危險，且進一步使其軍隊、黨員與群眾相結合，在日特力量逐漸削弱個人及不斷投入戰鬥這一消長的過程中，人民解放軍力量壯大了隊伍，並且在日有投降階級發展到新的高峯。

8 抗戰結束後，當勞動群眾興起，要求階級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軍事專制的運動遍及全國的時候，中共不但沒有乘此這個最有利的時機，提出革命政綱，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反而率領胡適的國民黨要求和平談判，希望建立「聯合政府」來「建設新中國」，以放棄華介石獲得了時間，準備了和發動了對中共的全面性進攻（1946-47）。直到這種進攻威脅到中共的存在時，它才迫不得已而起而抵抗和反攻（1947-49），發出「把內戰進行到底」的口號。這時，它一方面不得不在其統治區域內進行部分土改，以此穩定自己的基地，另一方面仍不敢召國民黨的群眾起來為奪取政權而鬥爭；它只敢召工人群眾進行「遊藝運動」，號召群眾停戰解武，而單靠國民黨軍隊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由於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激化，則又進而引起惡果：由於長期戰爭破壞造成經濟的崩潰，群眾的困苦和對國民黨統治的憤恨；由於資產階級的分崩離析和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與無能；更由於帝國主義體系陷入空前危機中，它在華北所遭遇的嚴重困難，迫使它不能直接動用軍事力量支持蔣介石，因而在中共的反攻下，國民黨軍隊全面瓦解，使中共利用了極有利的局勢，奪取了政權。

9 中共在取得勝利後，它的政治經濟措施仍舊依舊階級主義，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方向進行。它和資產階級高層及小資產階級高層（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工具黨等），經由「政治協商會議」製訂「共同綱領」，公開宣佈採行「民權」實際階級的私營財產，實行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拖延土地改革，並公然聲明保護帝國主義在華財產。這一切機會主義的措

革共一九七七年四月大會通過的新綱領

參考書目

一、刊物：

《我們的話》，第一、十、十五、二十二期，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油印。

《無產者》，第一至十二期，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從第三期起油印。

《十月》，第一至三期，一九三〇年。

《十月之路》，第一、二期，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油印。

《明天》，第一至四期，一九三一年，油印。

《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一、之二，一九三〇年，油印。

《火花》，第一卷第一、二、七、九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油印。

第二卷第一、二、四期，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油印。

第三卷第三、五期，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一年。

《校內生活》，第一至十三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油印。

《熱潮》，第一至六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

《鬥爭》，第二卷第九期，一九三七年。

第三卷第二、五、十二期，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

第五卷第五期，一九四一年。

第六卷第一期，一九四二年。

《國際主義者》，第一至三期，一九四二年，油印。

《求真》，第一、二、三卷，一九四六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青年與婦女》，第一卷第一至十二期；第二卷第一至六期，一九四六年三月～一九四七年九月。

《新聲》，第二、三卷，一九四七年四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新旗》，第一至二十一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校內公報》，第一至十一期，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油印。

《內部通訊》，第三、四號，一九四八年八、九月，油印。

《建立》，第一至六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油印。

《新方向》，第一至十二期；再刊號共十二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油印。

《叛逆者》，第一至六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九五〇年四月，油印。

《國際評論》（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至第三十五期，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

《中央政治通訊》（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

《黨的生活》（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第五期，一九二九年。

《紅旗》（中共中央機關報），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

《解放》，第三十二期，一九三八年；第二十四期，一九三七年。

《紅色中華》，第三十七至四十一、七十七期，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

《蘇俄評論》，第一、三期，一九三一年。

《社會新聞》，第一至第七卷，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

《傳記文學》，第三〇卷第五期，第三一卷第二期。

二、小冊子：

《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簽名，油印。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一九二九年九月），油印。

列爾士：《反對派統一運動的前途》，油印。

《告同志書》（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劉仁靜、王文元等九人簽名。

《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國民會議與蘇維埃——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出版，一九三四年，油印。

《統一代表大會文件集》（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委員會編，油印。

《全體起來，制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油印。

《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卷二、卷三，一九四二年，油印。

《托派對於抗戰的主張》，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編印。

連根：《論中日戰爭論文集》（《鬥爭》叢書之五），一九四一年，油印。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成立大會宣言》（一九四八年九月），油印。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草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油印。

《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緊急統一大會決議案》（一九四九年四月），油印。

《致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信》（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發，油印。

《目前國際國內形勢之新發展與我們的工作方向》（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油印。

三、檔案：

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托洛茨基檔案。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至十四，一九二一～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藏胡適檔案。

四、回憶錄

鄭超麟：《回憶錄》，一九四五年手稿。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二年刪去《政治與戀愛》一節後出版。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日），手稿，現代史料編刊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

鄭超麟：《記尹寬》（一九八三年五月），打印稿。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一九七七年出版。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手稿，一九七九年。刪節刊登於《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一輯。

《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記，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未刊稿。

曾猛：《一九二八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中托派組織活動情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手稿。

- 張國燾：《我的回憶》，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 彭健華：《回憶和陳獨秀的兩次會晤》，《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 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手稿。
- 黃理文：《一九三〇年江蘇省委和閩北區委的一些情況》，《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 杜畏之：《關於中國托派的材料》（一九七三年三月），手稿。
- 何之瑜：《關於陳獨秀的托派活動》（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手稿。
- 《柯柏年談話記錄》（唐寶林訪記，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未刊稿。
- 《李維漢同志談一九二九年時的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 喻守一：《中國托派的形成和我追隨陳獨秀加入托派的情形》（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稿。
- 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 周仁生：《關於早期中國托派情況》（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手稿。
- 王學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鬥爭情況》，《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 《吳亮平談話記錄》（唐寶林訪記，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未刊稿。
- 曾猛：《〈火花〉的情況》（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手稿。
- 《劉仁靜談話記錄》（唐寶林訪記，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未

刊稿。

蔣振東：《陳獨秀被捕以後》（一九八二年一月九日），手稿。

葉春華：《關於中國托派組織、托派多數派、少數派的情況》（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手稿。

曾猛：《溫州托派組織形成情況》（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手稿。

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一九四二年七月），手稿。

吳伯之：《關於張慕陶》（唐寶林訪記，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未刊稿。

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張稼夫：《庚申憶逝》，《中共黨史資料》第6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周欽岳談陳獨秀》（周祖義訪記，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未刊稿。

喻守一：《九一八後托派組織概況》（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手稿。

周仁生：《浙江托派情況》（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手稿。

黃鑑銅：《中國托派組織前期歷史概況材料》（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手稿。

吳靜如：《關於托陳派的活動》（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手稿。
吳即劉靜貞，鄭超麟妻子。

趙濟：《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習、生活和鬥爭》（一九八〇年八月），手稿。

濮清泉：《中國托派的產生、發展和滅亡》，載雲南《黨史研究參考資料》第三期。

五、論著：

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譯：《中國革命問題》，春燕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

意因（鄭超麟）：《不斷革命論ABC》（《新旗》叢書之四），春燕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周恩來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五七年版。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漆高儒：《蔣經國的一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一九四三年版。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臺灣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陳案書狀彙錄》，亞東圖書館一九三三年版。

沈醉：《軍統內幕》，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沈醉、文強：《戴笠其人》，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亞東圖書館一九三八年版。

《馮玉祥與抗日同盟會》，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王明言論選輯》，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王明：《中共五十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俄文版，又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二年中文版。

《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何之瑜編，一九四八年少數派幾位同志集資印刷。一九四九年，胡適將其改名《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並作序，由自由中國社出版。

《彭述之選集》，香港十月書屋一九八四年版。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第四國際文件集（一九三三～一九四〇年）》（*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一九三三～一九四〇），一九七三年紐約版。

伊·多伊徹：《被放逐的先知。一九二九～一九四〇年的托洛茨基》（I. Deutscher.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一九二九～一九四〇），一九七〇年倫敦—牛津—紐約版。

詹姆士·P·坎農：《美國托派史》（James P. Cann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Trofskyism*），一九六九年紐約版。

中島嶺雄編譯：《失去了的中國革命》（彭述之選集），一九八〇年東京新評論株式會社出版。

米·伊·巴斯馬諾夫：《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義（М.И. Басманов. *В ОБОЗЕ РЕАКЦИИ: ТРОЦКИЗМ 30-70-х ГОДОВ*），一九七九年莫斯科版。

索引

- 十月社 96,112,127,142
大陸上的托派組織 339
不愛資產階級的國家 160
中山大學 1,3,4,6,14,18,34,35,99
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 148
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 26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189,195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 74,88,123,128,195
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 136
中國革命共產黨 322
中國革命的悲劇 200
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 37
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 328
中國論壇 199
尹寬 56,62,80,82,88,144,147,192,204,217,325,341
反斯大林遊行 1,16,22
少數派 255,293,314,316
巴·亞·米夫 7
毛澤東 69,70,233
王凡西 204
王公度 213,269
王文元 18,20,39,41,44,47,96,100,112,129,132,144,218,250,328,344

- 王平一 20,62,79,174
王明 33,35,159,228,274
王若飛 51,53,55
王實味案 282
王澤楷 57,79,129,162,173
王耕 82
卡爾·拉狄克 2
史唐 19,24,25,26,29,43,72
史朝生 194,195
失敗主義 248,250,252,309,310
伊羅生 198,200
任卓宣 34
任曙 57,162,175
共同行動 189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 43
列寧格勒反對派 5
多數派 255,293,314,317
安福 19
托派中央第一次大破獲 144
托派中央第二次大破獲 166
托派中央第三次大破獲 199
托派中央開除陳獨秀事件 197,202
托派即漢奸 222,228
托洛茨基 2,5,10,11,16,24,38,45,97,103,109,117,164,201,202,224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 14

-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爭 8,136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論戰 4
托陳取消派 61,71
江浙同鄉會 33,36,260
江蘇省委獨立事件 59
米夫 35
何資深 57,91,144,328
吳季嚴 20,29,44,47,88,91,101,132,148,164,319
宋達春 19,24,25,27,93,96,129,132,144,164
我們的話源 31,93,111,127,142,148
李季 80,90,329
李福仁 193,204,207,224,254
杜畏之 20,29,44,214
周恩來 46,100,232,263,270,276
拉狄克 6,7,14,16
東方大學 1,4,18,35
保衛主義 253
俞秀松 36
俞秀松案 259
叛逆者 334
范金標 19,40
格拉斯 195
格拉斯 (F. Glasse) 中文名字「李福仁」 192
馬玉夫 57,61,75,79,88,144
高恆 44,319

- 高衡 44
區芳 24,25,27,29,31,72
國民會議 114,126,140,154,166,189,296
國共合作 8
國際主義工人黨 322
康生 228
張特 19,24,72
張慕陶 263
梁幹喬 19,20,24,25,26,72,92,142
第四國際 45,190,294,315
莫斯科反對派 5
陳亦謀 19,24,25,129,132,144
陳其昌 175,177,200,204,210,218,224,250,257
陳岱青 160,162,175
陳獨秀 9,49,58,66,72,80,85,88,109,117,129,155,164,172,200,229
陳獨秀「日本間諜」 271
陳獨秀「最後見解」 244
陸一淵 24,25,26,29,142
彭述之 49,56,75,79,88,117,129,159,163,224,253,306,321,332,342
斯大林 10,11,125
曾猛 19,41,175,216,311,149
湖西事件 277
無產者社 88,117,127,142
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 92,112,114
肅托運動 98

- 越飛 9
- 新方向 334
- 楊明齋 84
- 溫州托派 216,311
- 福建事件 103,184
- 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 155,166
- 趙濟 20,39,44,102,132,177,200
- 劉仁靜 39,73,94,96,102,122,160,175,219,329
- 劉伯莊 57,80,177
- 劉家良 194,195,224,306,325,342
- 樓國華 29,144,224,250,345
- 熱潮 150,152
- 蔣介石 11
- 蔣振東 147,177,179,204,224
- 蔣經國 3,20,32,319
- 蔡振德 57,61,79,103
- 鄭超麟 57,76,80,129,144,249,306,328,332,340
- 魯迅 210
- 戰鬥社 102,127,146
- 濮德志 20,44,129,164,167
- 謝少珊 164,169
- 羅漢 20,129,175,233,236
- 關於所謂「紅軍」問題 88,115
- 嚴靈峰 29,132,136,175,185